

中共換代： 從第四代到第五代

柯宇倩



領袖出版社

書 名: 中共換代: 從第四代到第五代

作 者: 柯宇倩

發行人: 何 頻

編 輯: 林思勤

校 對: 黃小菁

封面設計: 川北

版式設計: 川北

行銷總監: 柯宇倩

策 劃: 明鏡有限公司

出 版: 領袖出版社

網 址: www.mirrormediagroup.com

電子郵件: taiwan@mirrormediagroup.com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20號7樓

通訊地址: 11199 台北郵局第42-73號信箱

電 話: 0975150134

印 刷: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號

電 話: (02) 8990-2588 傳 真: (02) 2299-7900

全球郵購: 明鏡書城www.mirrorbooks.com

通訊地址: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SA.

美國紐約電話: (516) 487-0343

電子郵件: usa@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ISBN: 978-986-88622-1-0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定 價: NT\$399

本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轉載，複印，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請寄回更換

目錄

習近平履歷完整一下子出線	007
習近平與胡錦濤差異大	013
李克強有大國領袖形象	020
李克強和80年代各種思想有過碰撞.....	026
第五代領導人上台，朝野更具共通性	033
胡錦濤是最後一個團派領導人	042
胡錦濤或分三步退下	051
“胡溫”概念不再合適	063
溫家寶談政改已醞釀多時	069
中共從農民政黨轉為菁英政黨	075
國家的最高領導層是否一定得來自黨員？	081

中國領導接班制產生民主假象	088
中共接班人體制有長處	094
中國經歷兩次“三頭政治”變“個人獨裁”	102
中國政府的角色已改變	110
中國派系界線已顯得模糊	116
實現民主，靠爭取還是靠讓步？	122
一黨制度下解決腐敗更難	170
難說中國一黨專制造成腐敗	176
中國權錢交易越演越烈腐敗滋生	183
中國已揭發貪腐案只是冰山一角	192
中國舉行中央級選舉不比地方選舉困難	199
這次唱紅打黑以笑劇出現	207
兩會期間中央曾給薄熙來兩次機會	215

薄熙來下台對十八大常委的影響	224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的再改革	232
美國律師詳細解析王—海—薄案疑點	247
單純政治打擊只會讓大大小小薄熙來繼續往上走	261
案件的發言權在調查人員身上	275
“鄧頭毛身”是薄熙來事件的土壤	284
打倒薄熙來中國的改革和民主反而大倒退	297
“中共要搞改革，否則薄熙來死不了”	307
周永康或為自保同意辦薄熙來	315
薄熙來案反映中國社會的成熟	323
薄熙來是否並不顯得特別壞	333
薄熙來未注重維護軍隊在地方上的利益	341
重慶和廣東模式之爭還將持續	348

住房問題，重慶模式提實在方案	357
提高重慶模式地位阻礙中國改革開放	363
重慶模式的政治依賴性強	369
後記	376

習近平履歷完整一下子出線

習近平接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如無意外，將成為胡錦濤接班人，而具有軍方資歷的習近平，未來如何處理中國對外關係，也成為關注焦點。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家楊大力認為，習近平掌權後，不代表中國外交政策就會變得更加強硬，現在已不是任何一位領導人能自己獨立做出外交決策的時代。

習近平履歷完整受青睞

近幾年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正越來越多地受到大家的關注。不管是接班地位幾乎確定的習近平，或是其他亮眼的政治新星，如李克強、李源潮，都勢必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佔一席之地。其中，習近平能脫穎而出成為接班第一人選，楊大力認為，與他完整的資歷有關。

“中國目前不是通過選舉來競爭，而是有相當於選舉的一批菁英來審議，如中央委員會，以及在民意的基礎下，才將習近平增補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習近平能夠出線，與此（這個方式）很有關。”楊大力對《明鏡》分析，各派都比較容易接受習近平，尤其習近平從基層一步一步做起來，並在福建、浙江、上海都經營出成績，得到大家的認可，因此有相當的支

持率。

“雖然很多工作不是從他開始做的，比如他在浙江的時候，但畢竟他當時是浙江的省級領導，浙江在中國改革發展中又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令人印象深刻。”楊大力指出，習近平在上海時也有這種情況，在2006年底陳良宇案爆發後，習近平2007年初臨危受命調任上海市委書記，他到上海的幾個月時間，便將上海的情勢穩住，因此可能給許多人一種“習近平舉重若輕”的感覺。

此外，習近平的家庭背景也被視為出線的重要因素。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曾支持胡耀邦的改革路線，楊大力表示，某程度上來講，習仲勛的作為對習近平有利。“一般對胡耀邦有好感的人，只要習近平沒有得罪他們，也會認同習近平。”

與胡錦濤不同的地方在於，習近平擁有軍方資歷，雖然這一段軍方工作經歷不代表習近平的軍方經驗深厚，但楊大力認為，畢竟還是比其他人多一個亮點。將這些林林總總的資歷加起來後，便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履歷。

“我個人，還有我接觸過的中國國內地方官員，尤其是組織部門的觀念，都認為習近平擁有一個相當完整的履歷。一方面他在家庭因素下，受到一定的重視，另一方面他也從河北、福建一步步走出來，得到長期歷練，有相當的領導能力。不是說其他的潛在競爭者不好，而是習近平在這種情況下一下子出線了。”楊大力說。

習近平與軍方有一定默契

雖然履歷完整，但其中的軍方資歷卻引發擔憂。中國自今2010年以來時而發生國際衝突，近月來由於釣魚島主權爭議與中國船長遭日本扣押事件，爆發的中日互相仇視潮，更是



楊大力(芝加哥大學)

至今尚未平息。習近平去年12月訪問日本時，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曾協助習近平“插隊”與日本天皇會晤，受到日本輿論批評。如今習近平的接班態勢大致底定，《朝日新聞》認為，習近平有江澤民與軍方的支持，有可能比胡錦濤對日更強硬。《產經新聞》則擔憂中國軍方的影響力將增加，美、歐、日本都應保持警惕。

楊大力認為，中國確實處在一個跟過去30年不太一樣的時期。在過去，中國面對某些國際問題時，相對來說採取比較忍讓的態度，這與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的目標有關，但也可能由於中國的領導人認為中國的實力尚不足，因而並未顯現強勢作風。

但目前的情況有了改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全球第一，軍力也不斷增長。中國感覺到，雖然過去很多陸地上的爭議已經解決，但當時可能做了一些讓步，因此在現今的海上主權問題上，如果還保持讓步態度，恐怕將一路讓下去，中國認為，必須堅持自己對主權的認知。

另一方面，民間對國際問題的呼聲也特別強烈。楊大力舉例，如目前的中國對日關係，民眾的反應便相當強硬。在民間呼聲比較強的情況下，中國軍方內部也不一定有一致的意見，因此中國的外交決策絕不是習近平或任何一位領導人能自己獨立做決定的，而是需考慮各種各樣的因素，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才能真正做出決策，也因此，即使習近平未來掌權，也不代表

中國外交政策會變得更加強硬。

不過，習近平的軍方資歷，仍可能讓中國政府與軍方保持一定的默契。楊大力指出，歷史上，中國領導層一般不是穿軍裝的一定領導軍方，而是有平民領導（civilian leadership）的傳統，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因此，相信擁有軍方資歷的習近平，會與軍方有一定的默契。不過習近平相對來講也較能傾聽多方面的意見，會先瞭解情況，平衡各方勢力。

中國政經改革將持續

第五代領導人上台後，中國將如何發展，也是外界關注的議題，尤其近日總理溫家寶多次談論政治改革，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熱議“一二五規劃”的情況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更引人注意。楊大力分析，中國的經濟發展趨勢毫無疑問會持續，過去幾年，中央在這方面已做了不少的工作，如改善收入不平等問題、穩定房地產市場；在國內民眾的呼聲仍高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肯定會持續這方面的工作。

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楊大力也相信，已在中國各個地方試行的各式各樣舉措，未來會繼續走下去，但具體上哪些試驗會普及全國，還無法做出預測。“總體來說，應該會先引進民意，不管是公務員、地方領導、民眾，都會讓他們進一步參與管理與決策的事務，但是否有特別大的、從體制上進行的政治改革，我覺得還要等待。雖然可能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政治改革感到悲觀，但我認為考慮進一步改革的趨勢是存在的。”

一些對上層推動政改感到悲觀的人士，認為中國政改的最終力量將來自民間，楊大力表示，確實任何一個國家的改革，都不能僅依賴上層的動力，也有賴下面的推動，但也不可能只依賴民間的力量，而是需要雙方合作推動的。

胡錦濤可能不留任軍委主席

雖然習近平可望在 2012 年秋天的中共十八大接任胡錦濤卸下的總書記職位，並在 2013 年 3 月的人大政協兩會上接任胡錦濤卸下的國家主席一職，但胡錦濤是否會在中共十八大後繼續留任掌實權的中央軍委主席，仍是未知數。在江澤民交棒給胡錦濤時，江澤民便曾“扶上馬，送一程”，短暫留任軍委主席，延後 2 年才將實權交給胡錦濤。

楊大力表示，從歷史事件來看，胡錦濤留不留任軍委主席都有可能，但不留任的可能性或許大一些。“過去江澤民曾保留了一段時間的軍委主席，尤其有一段時間有兩個軍委主席，那時候從中國政體的角度來講是比較尷尬的，對江澤民本人的聲望也有些影響，一方面感覺他在護航，但另一方面又讓人摸不清誰才是最高領袖，對江澤民來說不是個亮點。因此胡錦濤可能會吸取經驗教訓。”

楊大力分析，雖然江澤民的作法確實可能出於擔心交接班不順利，但實際上，如果能一下子就完成權力轉移，未嘗不是件壞事，如果兩代領導人能在短時間內便把班交好，對中國的政治發展可能更有好處。但不論如何，胡錦濤在十八大後肯定都會繼續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中國政治趨向穩定

外界分析，習近平在接班過程中，顯現出中國政治內部勢力的此消彼長，在現任領導人具有隔代任命接班人的權力下，太子黨與團派的力量交替出現。

楊大力認為，外界可能過度推測中國政治的派系力量了。

“畢竟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發生轉變，在這過程中，習近平能脫穎而出，是體制運營的結果。從胡錦濤的角度來看，習近平也是個能接受的人物，所以比較難說是派系拉距的結果。我想更多是外界的推測而已，胡錦濤實際怎麼想的，我們並不知道。”

相較於派系角力，更能確定的是中共的接班模式正在逐步成熟，朝和平轉移的方向邁進。楊大力表示，目前的權力的和平轉移態勢，肯定比過去更加文明。雖然有些人認為這種交接班的作法不是特別好，中國應該走向直接民選，但回顧歷史，中國在 2002 年、2003 年才第一次真正地和平交接班，因此目前的發展並不完全是壞事。“總體來講，這是中國政治穩定的一種表現，正在往正面的方向前進。”

習近平與胡錦濤差異大

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與李克強接班，台灣也已選出新的領導人，屆時兩岸關係將展開新局。台灣淡江大學教授、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對《大事件》指出，不論台灣大選後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兩岸政治談判都有可能出現。習近平上台後，對台政策也可望更有彈性。

林中斌為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曾任華府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專任學者兼亞洲部副主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一副主委兼發言人、國防部副部長、中華歐亞基金會執行長，專長中共軍事、外交、政治與兩岸關係

習近平與胡錦濤差異大

目前被視為中共總書記接班人的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曾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下放勞動、甚至入獄，直到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習仲勛獲平反，但隨後又因替趙紫陽辯護，再度被鬥。林中斌對《大事件》分析，習近平年輕時大起大落，由於父親的遭遇，習近平有一度無家可歸，還曾因家庭因素，10次申請入黨被拒。不過他主動到農村梁家河大隊插隊，並靠自己努力、受村民愛戴而選上黨委書記，還拿到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隨後，習近平被安排到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曾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飭的秘書，累積軍隊工作經驗，他也在福建、浙江等沿海一帶服務 20 多年，長期在地方耕耘，且與美方人員有許多互動。林中斌指出，習近平對兩岸情事與台商事務有相當程度的瞭解，西方對他也比對剛上台的胡錦濤還要瞭解，這些都是習近平的特色。

雖然大部分時候，習近平給人低調、沉穩的印象，但有時的行事作風顯得很不一樣。“他在地方服務時，有些作法蠻大膽的，比如讓市民給官員打分數。近年來要接班了，作法變得非常保守，比如在墨西哥城的時候，就發表了很強硬、很有個性的話。”林中斌說。

習近平於 2009 年 2 月在墨西哥出席當地華人聯誼會時，指出“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言論一出立即引來熱議。

林中斌對《大事件》表示，習近平這這番話在中國國內受到很多掌聲，由於代表了國內很多人的想法，這番話對他來說有相當的加分作用。

維基解密曾披露美國前駐北京大使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指出習近平在地方服務時，“一度迷上佛教神秘主義、氣功和功夫，並相信超自然力量。”不只習近平，其夫人彭麗媛對此也感興趣。

種種事件都顯示習近平跟李克強、跟胡錦濤剛接總書記時不一樣。林中斌指出，習近平父親是開國元勳、年輕時受苦、跟軍方有淵源、有博士學位，並且比胡錦濤剛接班時更加瞭解台灣和美國，都讓習近平與一般的太子黨不一樣，在這些經歷下，林中斌相信習近平能更有手腕、更謹慎地處理各種問題，對政治也更有抱負。



林中斌(資料圖片)

雖然另一方面，林中斌認為李克強的政績不是很亮麗，但由於習近平的潛力，林中斌推測第五代領導人領導下的中國仍可能出現新局。“習近平的所作為主要是幾個方向：第一，兩岸事務上，胡錦濤已經比江澤民更有彈性，但習近平會更有技巧地處理，第二，維基解密指出，習近平不是一個敵視美國者，第三，習近平對佛教

有興趣，因此他在對美、對藏問題上會更靈活。雖然習近平現在表現得很保守，但我認為接任不久後他的作為可能比胡錦濤還大。”

在對台關係上，林中斌認為，習近平上台後還會延續胡錦濤的台灣政策，不過會用更彈性的方法爭取台灣民心。“北京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們在經過多次錯誤後，終於瞭解台灣不是中國大陸的境像，台灣是多元社會，民意不是一、兩人帶頭產生，而是由下而上產生，這點與中國大陸相反。”

林中斌指出，對台灣民眾來說，上面一、兩人喊台獨、下面不跟他走，仍舊沒有用，但如果上面不喊台獨，北京卻對台灣惡劣，人民會反感，總有想台獨的人上來當總統。因此預料習近平將會繼續在台灣的心上耕耘。

北京不滿馬英九“只取不給”？

根據中央社報導，美國兩岸問題專家戴傑(Jacques deLisle)在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舉行的“中國第五代領導人與兩岸關係”研討會上表示，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上台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將走進終點，“有所作為”即將上路，因此中共第五代領導人會希望在任內展開兩岸的政治談判。

林中斌對《大事件》表示，政治談判有可能展開，但原因不是因為習近平上台。“任何一個人上台都是如此。目前為止，北京認為在經濟上做得夠多了，最近兩年他們主攻軍事的安全互信，台灣反應不是那麼如北京的願。台灣認為應先從政治方面解決、撤飛彈，但北京認為撤飛彈前要有和平協議，所以僵持在那。”

2012年習近平接班後，台灣新總統也已選出，林中斌表示，馬英九連任，在沒有爭取再次連任的包袱下，會比在第一任時“更敢跟對方互動”，政治談判有可能在之後的四年內出現。

兩岸問題專家戴傑指出，中國大陸強硬派已有人不滿馬英九的“只取不給”，甚至暗地裡懷疑馬英九和前總統李登輝都是口袋裡有“事實獨立”的議程，才總以“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當藉口拖延政治談判，恐怕讓第五代領導人認定胡錦濤的對台路線失敗，因而採取強硬手段。

林中斌對《大事件》評論，這個看法將北京上下都當作鐵板一塊，認為“下面講的就是上面所想的”，“有些是一顆星的少將和大校講的話，這些人並不真正代表最高層的決策。”林中斌說，最高層者與這些將領是黑臉白臉、配套講話，例如2009年11月，解放軍少將羅援批評馬英九的“三不”政策是“和平分裂”，但一個禮拜內，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便公開要大家不要忘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事隔兩週，中國外交大老唐家璇則相當罕見地出來喊話，同樣提醒大家不要忘了“韜

光養晦”，羅援也不再提馬英九之事，可看出他的講話不代表上層的意見，但羅援的一番話確實給了台灣壓力。

“當時台灣很多人說，北京給台灣的好處夠多了，現在要緊縮了、要給台灣懲罰了，但從 2010 年 1 月開始，北京派了很多省長、省委書記到台灣來，證明這種推測錯了。”林中斌說。

軍方與政府唱雙簧

林中斌進一步說明，僅以中方片面的舉動推測北京意圖的看法，在 2010 年 3 月也出現過。2010 年 1 月底華府宣佈對台軍售，中方反應強烈，共有 4 個機構同時站出來批判華府，數目之多前所未有。3 月初，許多華府學者認為北京和平崛起之路動搖，因為強硬派架到胡錦濤頭上。

但其實 2 月 17 日，在中美關係還相當緊張時，北京就已悄悄地對美國釋出善意，讓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停靠香港，之後美國也派出兩位高級官員訪問北京，雖然 6 月時由於朝鮮的“天安艦”事件，雙方關係再度緊張，但 10 月底中美關係回溫，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主動取道海南會見戴秉國，談論恢復雙方軍事互動、準備胡錦濤 2011 年初訪美、諒解南海衝突等議題。

2011 年 3 月 31 日，北京宣佈《國防白皮書》，中共國防部發言人耿延生在記者會上“講話很客氣”，指出與美國的軍事交流相當重要，將盡力讓此交流順利進行，說明中美間的氣氛完全不一樣了。

因此，林中斌認為，中共軍隊與政府漸行漸遠、胡錦濤壓不住底下的人的說法，都不正確。“胡錦濤是軍委會主席，他有權將在位的將領捧上去，讓他退休，讓別人接位。殲 20 在成都試飛時，評論說軍方蒙蔽胡錦濤，所以當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問起時，胡錦濤說不曉得，我覺得這種大事胡錦濤一定曉

得，只是細節不一定。

“在很多外交場合，胡錦濤與溫家寶也願意讓美國人相信他們是無辜的，這樣就能有雙簧演出，軍方唱強硬的角色，胡錦濤唱和緩的角色。”林中斌說，最好的例子就是2011年1月胡錦濤訪美。“西方人認為胡錦濤是弱勢領袖，但為什麼美國批評中國人權沒進步時，胡錦濤在華府說：人權不是沒進步，只是還有很多改進空間？他這次去華府也沒有提台灣問題。如果他是弱勢領袖，講這種話、沒提台灣問題，回國就慘了，這代表他很有自信。”

確保通過“一二五規劃”

林中斌對《大事件》指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上台後，馬上要面臨的重要課題將是貧富差距、地方貪腐，以及兩個未爆彈：西藏和新疆。“西藏和新疆每年都有動亂，不好好處理，將來會像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變成心腹大患。”

其中，貪腐與貧富差距增大，都讓體制改革顯得更迫切。林中斌指出，溫家寶在2010年3月5日至10月3日之間，共提10次政改論，4次在國外，6次在國內，不過在挪威宣佈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前5天，溫家寶不再提政改，外界以為溫家寶“受挫”，但近來溫家寶又高呼民意民生，2011年3月全國人大開幕演講上，溫家寶受到熱烈的鼓掌，前後成強烈對比，究其原因與中共的施政策略有關。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佈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北京極為憤怒，中斷中國和挪威的雙邊關係，指責挪威干涉內政，但在12月10日挪威主辦單位頒獎給空椅時，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卻與挪威石油公司簽署合約，中方提供資金和兩個鑽油平台，幫助挪威石油公司在北海鑽油，其中內情，

林中斌認為與 2010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舉行的中共 17 大 5 中全會有關。

林中斌對《大事件》解釋，中共領導人為了防止因貪腐而累積的民怨失控，一方面加大社會控制，另一方面“在胡錦濤默許之下，試探性推動政改”，由溫家寶配合向外發聲。

只是中途突然出現諾貝爾和平獎，挪威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施壓，溫家寶如果還繼續談政改，就變成“賣國行為”，因此溫家寶停止公開呼籲，並非因為有人打壓溫家寶。

另一方面，17 大 5 中全會也將重點放在加強社會穩定，重要的“十二五規劃”把過去 2 位數的經濟成長率降到 7%，代表政府的心力將在改善貧富差距、人民生活品質和環境上，未來 5 年衡量地方官員的指標也改變了，衝擊到許多在高經濟成長下，有更多貪腐機會的官員，因此遭到這些人的抵制。

胡錦濤和溫家寶為了確保“十二五規劃”在 17 大 5 中全會通過，必須對外強硬，因而表現在對挪威強硬上。“如果沒辦法通過，將威脅中共的執政權力，因為北京現在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美國或是台灣、西藏的獨立，而是內部貪腐越來越嚴重、人民群眾事件越來越多，遲早動搖國本。”

林中斌對《大事件》表示：“既然通過了，對外沒必要演強硬的戲碼，溫家寶也自由了，2011 年 2 月又開始講政治改革，胡錦濤 1 月 21 接受電視訪問時，也特別強調要政治改革。”而未來的領導人在面臨嚴峻社會問題的考驗時，也將在“十二五規劃”的綱領下帶領中國前進。

李克強有大國領袖形象

中共第五代領導人 2007 年才進入中央，培訓的時間短，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薄智躍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指出，第四代領導人有意給第五代領導人更多的鍛鍊機會，而後者未來在社會管理、行政機制改革與中國外交形象上，都要再下功夫。

薄智躍為著名中國精英政治問題專家，曾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美國美利堅大學、美國聖約翰菲舍大學、美國塔爾頓州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大學任教。曾獲“美國聖約翰菲舍大學董事會傑出學者獎”、美國塔爾頓州立大學社會學系首席 Long Endowed 講座教授。著有《中國省級領導人：經濟績效與政治升遷》、《中國精英政治：政治轉換與均衡權力》、《中國精英政治：治理與民主化》等專著，以及多篇中英文學術論文。

鄧小平之後政策延續

“中國共產黨是一黨執政，其特點是政策的延續性。”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薄智躍對《大事件》解釋，其實在鄧小平之前，中共的政策沒有延續性，例如毛澤東在解放之初，極力主張新民主主義路線，後改而倡議社會主義，之後又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所以即使是同樣一個領導，也

經常改變政策。

鄧小平上台後，由於認準了中國若不改革開放，將沒有出路，因此他的基本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堅持改革開放，亦即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核心，以保證共產黨的領導和政治社會的穩定。

薄智躍指出，鄧小平的路線比較明確，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他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時下令中共十三大的報告內容“一個字都不能改”，1994年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上則做了“政治交代”，其中有一點非常重要，即路線政策不隨著領導人的更替而改變。“雖然不論是江澤民或胡錦濤也不一定有那麼大的能力做大改變。”

不過，胡錦濤接棒後，雖然延續鄧小平的思路，但有另外的新發展。“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開始注重環境和其他的配套改革，比如社會改革、平衡發展。”薄智躍對《大事件》說，胡錦濤和溫家寶尤其在社會的增長模式上有新的突破，這是第四代領導人的貢獻。

但也因為國家發展的大方針已經定下，因此薄智躍認為，習近平、李克強上台應該會帶來一些變化，只是不會太大，比如在處理具體問題時稍微與前任不一樣。

“其實我對胡錦濤感到很意外，他原來比較韜光養晦，隱藏得較好。”薄智躍表示，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後，雖然有點太嚴肅，比較缺乏人情味，但他確實擁有一個大國領導人的形象，說話均經過慎重考慮，並未出現過失言的情況。

相較之下，薄智躍認為習近平的草根氣比較足，易於與中國老百姓打交道，但在國際舞台上還顯得不夠自然，“如果讓他自己發揮，會因為不知道結果如何而對他比較不放心，這方面他還需要累積經驗。”



薄智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比起習近平，薄智躍對另一位接班人李克強的印象更好些，“他有大國領袖的形象，有點像胡錦濤，韜光養晦，但他可能做地方領導不太適合，因為他的成績體現得不太好，但一旦把他放在比較高的位置，他的學識、修養會得到發揮。”

薄智躍對《大事件》舉例，李克強曾在2008年的抗震救災中，指導協調救援工作，2009年則支援新疆7·5事件各部門的協調，出國

訪問時，李克強的英語水平也較好，能與媒體或其他人員打交道。

“由於2010年10月習近平進入中央軍委，所以大家認為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基本確定了，但也未嘗不會有變數，李克強甚至李源潮都有可能當上總書記。”薄智躍說。

有意給第五代領導人鍛煉機會

胡錦濤1992年進入中共領導人階層，培訓了10年才接班，但習近平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才進入中央，2012年就要接下棒子，培訓時間整整少了胡錦濤一半，薄智躍解釋，由於2002年中共十六大時，“第三代不下去，第四代剛上來”，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還不想下台，因此雖然中央內部曾考慮讓第五代早一點進入政治局，最終未能如願。

由於第五代領導人進入中央的時間晚，培訓時間比較短，只有 5 年，薄智躍對《大事件》說，在這期間只是適應環境與工作，新一代領導人原來頂多當地方大將，因此如果寄望他們提出一整套新的施政方向，可能性比較小。

此外，2011 年是“一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十七屆三中全會主要講經濟，四中全會主講政治，到的五中全會主講‘一二五規劃’。”雖然習近平、李克強作為決策的參與者，對“一二五規劃”有自己的貢獻，但整體來看，中共十八大以後的 4 年，基本的大政方針已隨著“一二五規劃”的通過而定下，因此第五代領導人應該沒有太多能大展身手之處，出台大政策的可能性也比較小。

目前，第四代領導人有意給第五代領導人更多的鍛煉機會。薄智躍舉例，習近平 2008 年才擔任國家副主席，但進入政治局常委後，鍛煉的機會增加許多，他在 9 名常委中，已是在溫家寶和胡錦濤外，出訪外國第三多的常委，至 2011 年 6 月約訪問了 42 個國家，給他提供很多外交經驗。

除了外交歷練外，習近平也被胡錦濤委任統籌奧運。“在奧運的籌辦上，雖然是大家一塊做，但給習近平的擔子多一些。”只是在 2009 年烏魯木齊的漢維衝突上，薄智躍認為習近平的維穩做得不是特別好。

胡錦濤 2011 年 2 月 19 日於中央黨校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提出 8 大要項，除要求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與公共安全體系、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以及健全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制外，也提出幹部加強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信息網絡管理等要求。

胡錦濤提出的管理觀念，正是未來中國當局必須思考的。

“社會管理的觀念非常好，第五代領導人面臨的最主要任務還是社會管理。”薄智躍對《大事件》指出，中國的民怨很深，矛盾積累大，現在當局採取的基本措施是打壓，但只能暫時緩衝，要根本解決還是得透過社會管理，以社會手段協調社會矛盾。

胡錦濤的講話提出以非政府組織來解決問題，薄智躍舉例，新加坡的許多社會矛盾，就是透過非政府或其他重要組織來解決與緩衝。“所以中國如何在社會管理上建立一個較好的體制，培養一定的社會力量，讓社會來管理自己，而非用高壓手段，是第五代領導人的課題。”

除了體制上的建立外，還必須確實執行。薄智躍說，習近平3月1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重點是抓落實，也表明此為第五代領導人的重要任務。

行政機制改革持續進行

目前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動作，於第五代領導人上台後也渴望延續。薄智躍首先釐清政改的定義：“政治改革在英文與中文裡的意思完全不一樣。一提到 political reform，許多人就想到西方式的民主選舉，或者通過遊行等方式讓中共下台或搞多黨制，但中文裡的政治改革，尤其是中共口中說出來的政治改革，更多是行政機制上的改革，因為共產黨不可能提出一個推翻自己政權的改革。”

因此，薄智躍對《大事件》解釋，溫家寶最近一年談得最多的政治改革，也不完全是西方式的政改，更多是探討如何將制度改革得更有效率、更具監督性，才能更加防止腐敗。

“中文裡的政治改革涉及4個民主，分別是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民主管理。”薄智躍表示，民主選舉上的改革，

可能反映在中共十八大人員的篩選上，比如選拔政治局委員時出現新的舉措，又例如在中央委員選舉時將差額比例加大，如此的話，民意不高的人可能被篩下來，也是漸進式黨內民主的表現。

在民主管理與監督上，也可能見到新的舉措。薄智躍舉例，各省的紀委書記，過去是由該省自行提名，現在由中央空降。“未來類似這種加強反貪局、中紀委監督能力的措施，應該還會繼續。”

中國於國際舞台崛起之際，一方面受到其他國家的另眼相待，另一方面也衝突不斷，中國挾著經濟與軍事實力“強硬”起來的說法時而傳出。薄智躍表示，現在國際間的共識，是中國應該隨著國力的增強承擔更大的責任。“但我不太喜歡‘強勢’這個詞，有民族主義太過強盛的意味，習近平也有強勢的苗頭，比如他 2009 年在墨西哥說過的一番話，但這不是大國領袖勇於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形象，反而有點缺乏修養的表現。”

薄智躍指出，如今整個國際社會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出現許多需要人道支援的時刻。“中國外交部門已經形成一個慣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出現自然災害，至少要慰問，並在能力所及之下進行支援，也要保護自己的公民，這是中國在這方面一個比較好的開端。”未來中國在國際上要做的，薄智躍認為是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和活動、為發展中國家發聲，但同一時刻，中國下一代的領導人必須有更好的修養、更寬的國際視野，以及更勇於利用中國現在的國際地位，為中國的利益服務。

李克強和80年代各種思想 有過碰撞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與中共第五代接班人李克強同為北大校友，王軍濤對《外參》回憶，學生時代的李克強思想活躍、言詞犀利，但一個領導幹部的未來作為無法僅以從前的表現來做評斷，不論是李克強或習近平，都還要考慮當前形式以及與周遭接班團隊的關係。

王軍濤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曾任北京《經濟學週報》副主編，六四事件後被判刑 13 年，1994 年“保外就醫”被送往美國，2006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2006 年 10 月擔任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當代中國文宣與思想工作研究計劃博士後研究員，目前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

李克強和 80 年代各種思想有過碰撞

在北京大學的校友中，王軍濤對李克強、胡平、張煒的印象最深刻，如今，李克強已是中共最高層領導。“李克強較有典型北大學子的風格。”王軍濤回憶，與李克強是在北大學生會常代會上認識，當時李為法律系 77 級代表，隨後李克強當



王軍濤（記者柯宇倩攝）

上北大學生會主席，“他思想活躍、言詞犀利，喜歡用跨學科的視野來思考學術和現實問題。”

1982年畢業後，李克強留校擔任團委書記，但卻在選舉共青團全國第十一次大會代表時，因發言招致其餘幹部的不滿而落選。王軍濤當時在團中央認識了中組部部長兼青幹局局長王照華，王負責組織青年幹部。由於胡耀

邦曾對團十一大班子指示，要選拔20多歲、德才兼備的年輕人，但王軍濤卻沒見到這樣的人在名單上，因此詢問王照華。王照華說這種人不容易找，王軍濤立刻答道：“那我就能推薦3個：張煒、楊利川、李克強。”

“那時候的風氣比較民主，可以推薦，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王軍濤對《外參》表示，當時中組部已經準備把楊利川放到河南輝縣，張煒則要去天津，加上王照華也認為李克強不錯，雖然在團十一大落選，但“列席代表不需要選舉，書記處的書記也不是非要從代表中選。”因而開啟了李克強的團中央之路。

王軍濤指出，他們當時說話很人微言輕，主要還是王照華從考察幹部小組來看喜歡李克強的背景。“王照華是全國青聯的，是比較重要的人物，從團十大開始，胡耀邦一直讓他物色青年幹部，組建幹部隊伍，包括團中央撤換第一書記韓英也是他代表胡耀邦到場，解釋為什麼換掉韓英，所以（李克強進

團中央）主要是他在主導。”

而根據明鏡出版社的《十八大：中央爭角》一書披露，王照華之所以注意到李克強，是因為聽了老戰友、老部下程金瑞的推荐。這位程金瑞正是李克強的岳父、時任中國“三西地區”辦公室主任，與王照華早在“文革”前同在共青團工作時就十分熟識。

進入接班車道的李克強，一路從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河南省省長，到如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軍濤說，李克強在團中央待的時間比較長，“一般在團中央歷練的幹部待幾年就轉到別的地方，李克強中間經過了89年的政治大事件，可能因此耽誤了幾年。”

“（北大）77、78級的學生和後來學生不一樣是，他們在社會上歷練過很長時間。”王軍濤舉例，李克強後來到農村插隊時當過基層主要幹部，其插隊的鳳陽縣是當時中國包產到戶的發源地，也是原本較貧困，但經過改革開放後變化比較大的地方。

雖然在北大時曾與李克強有過不少交流，但王軍濤對《外參》表示，1989年後，中國政界的官員、學界與民間的領軍人物，思想上都發生很大的變化，因此很難根據20、30年前的印象來談論現在的李克強。

“我當時的眼光也覺得李克強是一個很不錯的人，如果做官或做學問都不錯，但後來的發展讓我對李克強產生疑惑。”王軍濤對《外參》表示，李克強所待過的地方，例如中國最大的農業省河南、中國最大的老工業省遼寧，都存在過許多問題，“官府應該先管好自己的官員隊伍，應該決定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雖然李克強在國際名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不見他在官場時做過大動作進行整肅，這是我對他的困惑。”

王軍濤認為，雖然一個人由傻變聰明不容易，但由聰明

變傻也挺難的，既然李克強早年已經把一些事看得比較清楚，也吸收了新的知識和觀念，那麼要他忘掉這些事是不可能的。“李克強這幾年在官場混得不錯，我們都知道官場腐敗，所以李克強如何平衡自己早年已經明白的道理，和現在的政治實踐，是該問的問題。”

領導幹部的作為取決三因素

李克強外，胡派的另一員大將李源潮原也備受看好，甚至被視為總書記的接班人選。《明鏡月刊》曾刊文指出，早在中共十七大前，李源潮和李克強、習近平均進入中共下代最主要的接班人候選名單之中，中共十七大之後，李源潮的政績似乎比排在他前面的習近平、李克強更為耀眼。北京觀察人士說，人們普遍看好李源潮將在中共十八大更上一層樓，一般認為他最可能接替賀國強的中紀委書記，甚至有成為習近平的備胎之勢，扮演當年曾慶紅的角色。

不過，目前的總理接班態勢，應是李克強更明朗些。王軍濤對《外參》表示，共產黨在配置跨世紀接班梯隊時選擇李克強不是偶然，現在李克強出線的原因，與他本科學法律，以及各方表現都比較突出有關。李克強在讀書時，還曾提交一份論文，以新的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研究法學系統的問題，獲得北大受過西方教育的老教授很好的評價。

“李克強是現在領導人間唯一在北大的漩渦中和 80 年代的各種思想有過碰撞的人，口才和辯才都不錯。”王軍濤說，其實共產黨的幹部，特別是團派的幹部，從胡耀邦開始就出現一個問題：比較老實。“不要說搞民主建設，就算是稍微讓黨內開放一點的，例如共產黨說的民主風氣，也就是開明專制，都沒有辦法討論。”

雖然李克強經歷了各種思想的交匯，視野或許更為不同，但若要討論李克強接班後是否還能保有以往的新潮想法，並在現實中實踐，王軍濤認為還得考慮其他因素。

“一個領導能不能有作為，取決於三個因素，第一是個人素質。”王軍濤對《外參》舉例，溫家寶來在做中央總秘書與中央辦公廳主任時都不出峰頭，也從來不見有強勢的動作；溫家寶剛任幹部時，說話較謹慎，但最近兩年則頻頻放出對官場來說比較超前的政治訊息，這些都是在做到重要幹部之前看不出來的。因此李克強在北大和後來在官場的表現，都不能說明他將來做了主要幹部後會如何。

第二個因素決於當前所在的情勢。王軍濤認為，如果當時有大事件發生、民意較為高漲，領導需要做一個比較不同於常規的決定時，才能看出此領導能不能真正做出歷史貢獻。“例如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胡耀邦、趙紫陽，如果當時沒有一個大轉折，很難說他們有機會成為政治上的象徵性人物，或者鄧小平，沒有文化大革命後的轉折，也很難說他有機會成為主要領導人。”

第三個因素取決於周圍的接班團隊與領導幹部的關係是什麼。“越到高層，周圍與你競爭、合作的人，跟你的關係都會越重要，是決定一個人前景最直接的因素。”而中共下一任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員，目前只有大致的輪廓，特點也不明顯。“或許除了薄熙來以外。但薄熙來會怎做也很難說，因為我不相信‘唱紅打黑’，尤其是‘唱紅’，根據薄熙來的閱歷和知識，很難相信他信奉‘唱紅’，如果不是出於意識型態上的真正信奉，就是為了功利性的需要。”

因此，不但包括李克強，還有習近平，未來在政壇上能做出什麼樣的成績，都還有待觀察。王軍濤對《外參》表示，包括異議人士在內的人，對習近平的回憶都不錯，但習近平的思

維方式是否會在接班後產生變化，還沒法看出。

“雖然習近平不是北大，但從北大校友進入官場的情況來看，他們私下的一些想法與官場表現不一樣。”王軍濤解釋，這代表這些人還沒有放棄 80 年代的理想主義與理念，這群人不大接受毛澤東的革命，也不大接受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只是在官場上必須存活、牟取利益，因此表現出不同的一面。

王軍濤相信，機會出現時，80 年代的理念還是會在這些人身上發揮作用。“80 年代大家對於國家發展的基本取向，在這個年齡層沒有太大區別，都主張經濟、政治要搞民主化、自由化，要與文明世界接軌。”

只是，80 年代後期思想發生了分化，信奉反西方或不相信普世價值的大有人在。“這些人在政界肯定也有代表。對於習近平這些人，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特別在中國快速崛起之下，我相信他們肯定對西方懷有戒心，必須兼顧中國本身的利益，但在內政變革方面，他們是否持續信奉 80 年代的普遍理念就不得而知。”王軍濤對《外參》說。

中國政界不適合劃分為太子黨與團派

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政治學教授唐文方在接受《外參》專訪時表示，從習近平是“太子黨”而李克強是“團派”這一點來看，以後第五代人可說是“太子黨”與“團派”互動的局面。不過，也有分析認為，“太子黨”與“共青團”將是未來中國政治角力的兩大要角。

王軍濤指出，“太子黨”與“團派”是媒體的噱頭，中國目前處於大變動的過程中，派別的劃分應依據其政治經濟的需求、思想取向，以及實際力量，不能光從幹部提拔的渠道來劃分。

實際上，王軍濤認為，“太子黨”和“共青團”也不是兩個

派系。“一般專制國家中的派系都是宮廷政治陰謀對抗(而來)，由領軍人物開始往下發展自己的幕僚，像康熙年代的索額圖和明珠。”

因此，王軍濤對《外參》指出：“我也可以說有秘書幫、石油幫、農民黨，‘太子黨’和‘共青團’的劃分還不如這些靠譜。”

“我認識的一些‘太子’，其實很具平民色彩，而共青團的幹部，比如王樂泉，則不具有團派的厚道。”不過某些時候，王軍濤點出，如果某些派系劃分的觀念一直被大家強調，被評論者可能會產生認同感，只是程度多寡罷了。

第五代領導人上台， 朝野更具共通性

習近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一步步朝接班之路前進，其餘的新一代領導人也即將在中國政治版圖上發揮影響力。中國政治家陳子明在接受《明鏡》採訪時指出，第五代領導人具有獨立的政治見解，並且與體制外人士具有類似的背景和經歷，使得未來雙方的互動可能性增加，憲政平台的建立也更有希望。

中國領導人之間的“代際現像”

中共領導班底處在世代交替的關頭，雖然同一代人裡，每個人代表的派系不一、擁護的觀點各異，但說到主要的政治分野，還是兩代人之間的差異，這就是陳子明所提出的“代際政治”理論。

“代際政治是某些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一種特殊政治現像。它的意思是說，主要的政治分界線不是在同一代人中，而是在兩代人之間。”陳子明解釋，只有在人事的代際更替時，才會出現具有實質性的政治轉變，盡管每一代人登上歷史舞台都會卷起一陣旋風，但只有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才會

出現典型的代際政治。

陳子明指出，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一代人中間的派系劃分，往往沒有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政治分歧深刻。“政治上的派系之間，同一代人的差異不大，只涉及到誰進局、誰進常委、誰進書記處、誰當省市長等等，他們的政治路線、思想底色沒太大差異。就算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國民黨也很容易進入共產黨，反之亦然，因為他們這一代人有類似的追求，要中國獨立、實現工業化，但他們與上一代人，不管是革命黨還是憲政黨，就有很大區別。”

陳子明認為，現在當政的這一代人對於對現代化的理解不佳，他們追求的是沒有現代性的現代化。而“四五”一代人，經歷過上山下鄉、四五運動，並在文革後重新恢復大學的學習，雖然有些人在台上、有些人在野，但他們成長時期曾有過一段非常接近的經歷，思想上也有很大的共通性，基本底色一致。

因此，陳子明對習近平這一代開始進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持歡迎態度，因為新一代領導人上去，必然帶來新的氣像、做派與路線。

中國四代領導人各具特色

陳子明分析，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過三代中共領導人。第一代領導人是“老紅軍”出身，鄧小平、楊尚昆、胡耀邦都屬這一代的人。除胡耀邦等少數人外，大部分“老紅軍”出身的領導人對於知識分子都有偏見，他們只信任自己的子女。

第二代領導人是“地下黨”出身，江澤民、朱鎔基屬於這一代領導人，他們都搞過學生運動，當過“地下黨”，這群領導人的長處是懂外語，正由於有這樣一個長處，在他們掌權期間，中國沒有在國際上進一步樹敵，而是在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陳子明（陳子明提供）

方面有所前進。

第三代領導人是“輔導員”出身，例如胡錦濤曾擔任過清華大學的專職政治輔導員，其他的第三代領導人或也在中學和大學期間當過業余政治輔導員，“輔導員”只能照本宣科，充當一個“傳聲筒”的角色，很少有自己發揮的餘地。因此，“輔導員”出身的領導人比前兩代的領導人更缺少政治創意和主動性。

第四代領導人是“博士”出身，跟第三代相比，在人生經歷上有著明顯的差異，習近平便屬於這一代。中共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取締了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使得“輔導員”一代人在求學期間無緣接觸這些人文學科；而理工科的大學教育，更使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成為“文學盲”和“社科盲”。

但“博士”出身的領導人則有幸成為文革後考試入學的第一屆大學生，得以親炙1949年以前老一輩學人的教誨，也或多或少瞭解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寅恪以來的“士人—知識分子”傳統。

陳子明特別強調“輔導員”一代人與“博士”一代人的差異。“輔導員”一代人，是受紅色教育最深的一代，屬於毛澤東所謂的“三門幹部”：家門、校門、機關門，他們對最底層農民

的生活、思想瞭解較少。“博士”一代人出身“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老大學生”是端“鐵飯碗”的，“知識青年”是端“泥飯碗”的。後者對於民間疾苦、百姓心聲和體制弊端的瞭解更深。

而“輔導員”一代人耳聞目睹或者親身參與的政治運動是“肅反運動”、“反右派運動”、“拔白旗運動”、“反右傾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博士”一代屬於“四五”一代人的範疇，四五運動是由民間自發的群眾性運動，它在實質上是一次反毛的政治運動。此後，這一代人又經歷了民主牆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的洗禮。

第五代領導人的特質

除了上述的四代分法外，陳子明也依照一般外界的五代分法，分析各時代的領導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主體是軍人，第二代領導人大多是黨務工作者出身，第三代與第四代領導人大多是工程師出身，但到了第五代就出現了變化：現任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中，擁有文科最高學歷者已經超過了理工科出身者，屬於政法系成員。

尤其是即將接班的第五代領導人，有自己的獨立政治見解，也有自己打天下的經歷。習近平作為黑五類，能在一個生產大隊裡當上支部書記，靠的是自己的努力，與胡錦濤這一代人基本上依賴“安排”的情況相當不同。“像我們插隊的人，都有改變農村面貌的設想，當到黨支部書記、大隊長的人，也都有對本大隊的規劃，要身先士卒去做，像胡錦濤這代人，大學畢業後進入機關，都是很平順的發展，主要靠領導人提拔。”陳子明說。

從薄熙來的作為，也可看出第五代領導人的獨特之處。陳子明指出，胡錦濤在貴州省當省委書記時，並未聽說他做了

特別的舉措，但薄熙來敢於做別省不敢做的事。習近平或李克強到了真正掌權時，也會有自選動作，不會完全聽從官僚機構的安排。“比如這次五中全會的文件，裡頭沒有提計劃生育，現在這一口已經歸李克強管，他這次不提計劃生育，就表現出他的獨立見識。這代人從文化大革命到插隊，都是沒有導師的，憑自己想像和摸索來做事，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

不過，相較於薄熙來的敢作敢為，習近平至今還沒有充分的表現，因此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如果從習近平在古巴的講話來看的話，可發現他的政治自信與“不是那麼循規蹈矩”的一面。

習近平拉美講話的背後

2009年初，習近平在拉丁美洲訪問期間，被問到西方國家對中國不友善時表示：“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有什麼好挑剔的？”

陳子明認為，習近平脫口而出的講話，反映出這一代領導人已經形成的思維定識，與毛澤東、斯大林輸出革命的想法、或由於毛澤東多年來執政不良而造成的輸出飢餓劃清界限，同時表現出對挑戰資本主義世界、挑戰普世價值沒那麼大興趣的態度，反而希望全心全意做好中國本身的事。

雖然習近平的“三不”，反映出對於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國際戰略思維的一個超越，但陳子明指出，習近平批評外國人“吃飽了沒事幹”，“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就缺乏了一點雅量。“中國正在崛起為世界領導國家，其領導人要逐漸習慣聆聽全地球村人的批評指責抱怨，並從中吸取有益於中國健康發展的精神營養。”

陳子明表示，習近平的一番話反映出他認為對外國人的口氣強硬一點沒有問題，同時表現出中國領導人喜歡打民族主義這張牌，繼承了過去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性格。“這是需要警惕的，當‘太子’時說話隨便一點，人家不會太當真，但接了班後還這樣，國際上會由於你的講話，而改變對中國的戰略，這對中國有很大危害。習近平對外事活動的包容度還沒經過充分的考驗。據說他對國內的人和事比較包容，但他的包容度應該一以貫之，國內外一個樣。”

博士 VS. 博士

除了未來第五代領導人多為政法系外，民間的民主運動組成份子也產生了變化，朝野在這樣的變化下，反而產生憲政平台建立的契機。

陳子明分析，排在接班序位前列的習近平、李克強和李源潮，都擁有法學或經濟學博士頭銜，可以算作政法系的成員。十七大的新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也有不少法學博士或院長、教授、經濟師等身份的成員。盡管這些頭銜的“含金量”不等，但都可以說明他們願意躋身於哪一個群體。

至於體制外的政治反對派陣營，也呈現不同面貌。陳子明以自己與習近平的共通點談起。“習近平 53 年出生、我 52 年出生，他當時因為爸爸是反黨份子，屬於黑五類，我因為職員出身，是灰五類，他當過黨支部書記，我當過大隊長，我 74 年進北京化工學院，他 75 年進清華大學化工系，76 年我在四五運動中起過比較重要的作用，習近平肯定也參與過至少是認同四五運動，他也許就是當時廣場上反四人幫人群中的一員。”

陳子明回憶自己在下鄉時帶了一批書，而習近平下鄉時也

同樣帶了一批書，“這些書肯定不是《卓婭與舒拉的故事》或《雷鋒日記》，我自己和周圍很多知青帶的書，無非是 19 世紀英、美、法、俄的經典文學作品，或者中國四大名著，黃皮書和灰皮書，我還帶了洛克和孟德斯鳩的書。下鄉時，我們看到農民的艱苦生活和他們對未來的真實期望，讀書學習的時候，看的也是離經叛道的讀物。當然還受到美國之音等所謂‘敵台’的影響。”

因此，陳子明認為，這一代人在 78 年之前的發展很接近。79 年後，他自己的道路與習近平的道路開始分岔。陳子明參加了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創辦體制外的民間思想庫，89 年後成為政治犯，長期坐牢；習近平在父親平反後就當了耿飆的秘書，從此走上仕途。但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世界觀，是在青年時期打下的，不會因為後來發展不同而有根本性的變化。陳子明說，以他現在的身份，目前不可能接觸到習近平、李克強這樣的高官，但可以接觸到同年齡層的副部級以下官員、企業家和學術界人士，絕大多數人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前景，都抱有期待。“中國必須過這個坎，否則無法成為世界的領導國家，只能處於與主流國家長期對峙的狀態，前途無法預測。”

陳子明指出，海內外民主運動和維權運動的中堅力量也有不少人擁有文科博士學位，例如劉曉波、王軍濤、楊建利、張博樹、範亞峰等。執政集團中的博士與反對派陣營中的博士對壘，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一個嶄新的現象。陳子明認為，博士與博士之間除了有學術上的共同語言，還有一些人脈上的聯系，從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來看，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有利於朝野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對話，而一旦憲政平台建立起來，在朝與在野的博士各有各的優勢。

因此，陳子明對未來中國憲政平台的建立抱持較樂觀的態度。“體制外過去缺乏像胡錦濤這個年齡層的一代人。江澤

民的時候，黨內民主派鐘沛璋還可以代表他的大學地下黨同學‘集體進言’。現在不知道在胡錦濤這個年齡層裡，有哪些人是既有思想又有渠道的，所以胡錦濤恐怕也聽不到什麼肺腑之言。到了習近平、李克強的年齡層，體制內外有共通的人生經歷和學習經歷的人就多了去了，例如習近平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的人，有些也是經常在社會上發言引領潮流的學術界人士，李克強的同學、導師裡，有些人的言論也是接近於體制外的，這使得雙方互動的可能性增加了。”陳子明說，多看看“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時代和台灣轉型時期人物的回憶錄，比聽信網絡上的種種流言，對於預測中國未來，要更有價值。

政治禪讓制度的進步與不足

未來，在習近平正式接班後，預料胡錦濤還會繼續發揮影響力。陳子明分析，由於有兩任太上皇的存在，使得每一任太上皇都不能那麼隨心所欲，所以胡錦濤可能不會繼續兼任軍委主席，不過還會保持一定影響力。

經過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領導人權力終身制”開始退出歷史舞台，相對制度化、常規化的中共領導人禪讓模式已經基本確立。

陳子明表示，毛澤東時代，哪怕立了接班人，甚至將此寫入黨章，最後仍不靠譜，鄧小平時代的兩任總書記也沒獲得善果，造成接班預期性非常差，但經過江澤民與胡錦濤後，政治禪讓制度基本上確立。

雖然這樣的禪讓制度與過去的無序政治繼承相比，是一種進步，但陳子明指出，離憲政民主的普世價值還差得遠，並非人們所希望的。“我們還是期待民主的領導人更替制度，而不是由少數人來決定。當然，習近平上台是由幾百個高層領導

人，在非正式投票中確定的，但缺點是人數太少，他還是沒有信心和把握。他允許你在非正式投票中投票，但不允許把這種投票放在十七大或十八大上，因此還是帶有摸底性的投票，而非裁定性的、終局性的選舉。”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以來，共產黨就患有“選舉恐懼症”。“選舉不等於民主，但沒有選舉，就肯定沒有民主。”

胡錦濤是最後一個團派領導人

中共十八大 2012 年召開，高層人事佈局的較量早已展開，最後到底是“團派”取得優勢，或者“太子黨”權力突出，仍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不論如何，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張煒認為有一點可以確定：“團派”和“太子黨”在中國的過渡階段，都只是暫時現象，胡錦濤將是最後一個團派的領導人。

政治局委員優先入常委

中共政治局常委是最高的權力機構，2012 年十八大時，9 人的政治局常委中，將有 7 人退位，目前盛傳江、胡兩派勢力正奮力爭奪這些位高權重的位置。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張煒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分析，未來的政治局常委，絕大多數一定是現在的政治局委員裡，在十八大時年齡 67 歲以下者。

“第一，這樣做比較符合過去兩、三屆來共產黨換屆的不成文慣例，第二，比較符合現在領導人不願意出大亂子、希望實現平穩交接的心態。”但張煒也不否認可能出現一些意料外的人選。

對於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除了已是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與李克強外，目前出現在台面上的政治局常委角逐人選中，張煒認為，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源潮，

掌管的工作關鍵、年齡正好，“不進常委就是出乎人們意料外”，此外，資格相對而言比較老的劉雲山，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無論是江派或胡派都能接受，進入常委也是順理成章，其他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和王岐山順補進常委，應該也不會有大問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是可能人選。

“現在政治局委員裡面，還有擔任國務委員和在基層工作的，比如上海市委書記、廣東書記、天津書記，顯然他們所處的位置，不應該排在現在已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人的前面，所以張德江和王岐山，在十八大時還處在‘留’的界線內。”張煒說。

比較具爭議性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此篇報導撰寫時，薄熙來尚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張煒認為，薄熙來能不能進常委，完全靠黨內兩派勢力的角逐。“從他一路的政績來看，他是能走一步留下一印記的人。他是個想有所作為的人，絕對志不在政治局委員而已，但由於他的父輩和胡錦濤之間的恩怨，胡錦濤肯定不希望看到他順利進入政治局常委，但胡錦濤能拿什麼理由擋住他，又是另一個問題。所以，除非出大意外，否則薄熙來應該也會進入常委。”

其他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延東、張高麗等人，也是外界討論的人選，張煒認為，這些人是否進常委，關鍵看政治局常委最後會保留多少人。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數並非向來都是9人，十八大後，到底會維持目前的人數，或是有所增減？張煒分析，從現有體制來看，如果還想保留政治局這樣的體制，9個已經是最多的人數，否則一半以上的政治局委員成為常委，有些不倫不類。至於常委最後會不會減少人數，則完全取決於內部權力鬥爭的結

果。

越過政治局委員任常委不太可能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排名歷來相當講究，不只昭示著權力次序，也是政治角力的結果，張煒指出，習近平和李克強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肯定靠前，另外排得比較前的可能是劉雲山、李源潮。

但有評論家認為，相較於習近平幾乎確定接任國家主席，李克強的變數仍比較大，最後李克強連總理都當不成、反而由王岐山接總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張煒表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若想改變習近平和李克強的格局，難度都會比較大，王岐山至少可以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如果最後談不攏，王岐山當上總理也並非不可能。

“其實原本是計劃李克強當總書記，他沒做成總書記，不只出乎胡派的意料外，對李克強本人來說也是出乎意料的，因為李克強就是朝著總書記的方向來準備，突然要他從事總理工作，角色變換需有一個過程，並不是沒有難度。”不過，張煒指出，這基本上是一種政治任命，而不是根據個人特長來任命，若想改變它，除非有大事發生。“但以我一個局外人的觀點，還看不出發生很大事情的可能性。”

除了政治局常委是個焦點外，誰能擔任政治局委員，也是外界關注的議題。其中，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中辦主任令計劃，作為胡錦濤的大管家和心腹助手，仕途一向被看好。張煒認為，令計劃進政治局委員應該沒問題，但“根據中國的政治格局，作為一個政治局委員本身沒有太大意義，除非大家看好你未來的政治仕途，只要沒進入政治局常委，未來發生什麼樣的變化都有可能。”



張煒(資料圖片)

張煒舉例，王剛便做了很長時間的政治局委員，但誰也不認為王剛是個很大的威脅，或有很大的作為。

不過，令計劃若想越過目前已經是政治局委員的人，搶先一步進入政治局常委，張煒認為難度不小。“若是這樣，胡錦濤要有很

強的說服力。人們很常拿令計劃與曾慶紅相比，但如果比較兩個人的履歷，會發現無論是人脈履歷或情勢，都完全不一樣。”

張煒解釋，中國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做到中央辦公廳主任之前，已經在軍隊待過，也曾到上海，直至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最後才到北京，加上他擁有“太子黨”背景，其父輩與他本人在北京與高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都是令計劃不具備的，更重要的一點，曾慶紅被提拔為政治局常委前，已經是政治局的候補委員，當屆所有67歲以下的政治局委員全部進入常委，因此他理所當然順補進常委，但令計劃不具有這樣的情勢，目前的政治局委員在十八大時，能夠留下來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人，不是不夠數，是多了。

其他如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孟建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等人，也均為政治局委員的討論人選，張煒表示，這些人進入政治局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不太可能越過政治局委員進入常委，

而光進入政治局並沒有意義。“誰能進入政治局委員的可能性太多了，至少有 10 到 12 個政治局委員的空缺。”

黨派鬥爭“鬧而不翻”

倫敦智庫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亞洲項目高級研究員布朗（Kerry Brown）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表示，由於年齡限制，許多可能人選做不到兩屆，使得下一屆政治局常委似乎只是個過渡階段的領導層。

張煒認為，習近平、李克強、汪洋都是能做兩屆的人選，但總的來說，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通常都有一半以上的常委無法連續做兩屆，因此不應該是個問題。

此外，外界也預料從現在到中共十八大的時間裡，由於派系競爭，中國政治可能進入不穩定時期。張煒指出，任何一個權力交接的過程，只要沒有一個清楚明白的程序，內部一定會有各種政治力量的較量。中國政治局常委的人數，沒有法定的安排下，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較量的空間。

不過，不論誰進常委、誰當委員，張煒表示，都說明了在目前情況下，中共黨內主要的兩派勢力基本上還沒有誰能壓倒過誰，這也使得他們盡可能按照既有的不成文規定辦事，免得船在內鬥過程中翻了。“他們最懼怕的就是翻船，所以他們還是有個共識，要‘鬧而不翻’。”

有評論認為，從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每一次的黨代會都出現意料外的情況，最新的“意外”要屬 2007 年中共十七大前，雖然共青團勢力高漲，但習近平卻一舉超越了李克強。張煒認為，從 1980 年代到現在，除了 89 年以外，實際上都沒有發生太出乎意料外的事，基本上與觀察家們分析的八九不離十，所以中共十八大應該也不會發生太料想不到的事。

“比如現在的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八大時，年齡在 67 歲以下者，進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肯定大於非政治局委員進常委的可能性，至於有沒有一些突破重圍的黑馬，被安排作為第六代領導人進常委班子，從目前情況來看，如果胡錦濤想做這樣的隔代安排，難度很大。

因為我們看到，江澤民在任內時，實際上沒有隔代安排接班人，而是在下台的五年以後，通過他留在政治局的力量，和胡派互相競逐的時候，才完成習近平的安排，現在胡錦濤如果要這麼早做安排，他所屬意、可能被安排的人，在政治上還沒有到位，所以有難度。”張煒說。

“團派”、“太子黨”只是暫時現象

今年 6 月省部級高官進行異動，團派主政的省分並未增加，有分析認為，此結果顯示近年團派在地方並非一派獨大，而且前總書記江澤民在“上海幫”失勢後，改扶持“太子黨”以對抗“團派”的策略奏效。

張煒認為，“團派”和“太子黨”在中國目前的過渡階段裡，都只是暫時現象。團派是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期，中國遵從官本位，沒有退休制度，堵塞了一大批官員升遷的道路下產生的一批人，在當時的局勢下，只有青年團裡有年青人的機會，而一旦坐到青年團的位置，就是在中共體制內部坐到級別較高的位置，一旦離開青年團，就必須安排他到一個相同的位置上，如此，此人就比其他同年、又沒在青年團待過的人有官位優勢，另一方面，跟同樣官位的人比較起來，又具有年齡優勢，使得青年團成為一個升遷的渠道。

但 90 年代以來，中國幹部退休制制度化後，加以政府內部的技術、經濟管理官員、大型國有企業增多，“團”的路較

不突出，團派過程會逐漸衰弱，因此，張煒預料，胡錦濤會是最後一個團派領導人。而“太子黨”也不可能長期存在。中共的第一、第二代領導人，都在黨的核心位置上待了很長時間，人脈深廣。從江澤民一代開始，中央的“領導核心”大都不超過兩屆，早已沒有老一輩的權勢和威嚴，他們的後代在晉升上雖然也有優勢，但也遠不如老一代領導人的後代們優勢之大。他們早已沒有了“皇上”的威嚴，“太子”們也就自然式微了。

“目前因為習慣使然，‘團派’仍受到許多人關注，但他們也有先天不足之處。”張煒解釋，相對於技術官員，“團派”技術上的資本不夠，掌控實際工作的能力也有缺陷，雖然有的人經過一段時間後，上級有意識地彌補此項缺陷，但彌補過程太倉促，也很難完全解決先天不足的情況。

“比如在團裡待過的書記和副書記，在一定時間後被派往地方。他們先派去做省長，是省裡的第二把手，他們的第一把手一定是比較強勢、能幹、能把責任擔起來的人，一段時間後，讓他們當省委書記時，中央一定會派一個實際操作能力強的省長輔助他們，所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其中利益面的色彩濃厚，容易引起不滿。”張煒說。

目前普遍認為江澤民仍在發揮影響力，只要他的身體許可，他的聲音在十八大前仍可能是最強的。張煒認為，一個派別群龍無首是不行的，但江澤民已經離開五年多，他不像毛澤東、鄧小平，在黨內經歷如此長的時間。

不過，張煒指出，江澤民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1990年代時，他有特殊的機遇，使得他在許多位置上很快地安排自己的人，尤其當他離開的時候，這些人還在位置上，比如現在的政治局常委，一半以上仍然是江澤民的人馬，所以與其說江澤民發揮作用，不如說目前在江澤民安排下的班底發揮作用。這種制度，由於沒有人有絕對的權威，所以一個班底的存

在，會影響現行的領導人發揮作用。

而如果胡錦濤在十八大後仍留任軍委主席，張煒認為這個作法會“非常愚蠢”。“江澤民當時這樣做，本身就是一個敗筆，鄧小平在 80 年代長期擔任軍委主席，不是因為軍委主席的位置給鄧小平帶來權威，而是他個人的歷史和在黨內長期領導職務，讓他擁有權威。江澤民錯誤地以為軍委主席能帶給他權威，如果胡錦濤聰明的話，就不會這樣做，這既不會給他帶來下一屆政治安排所需的權威，也不會帶來歷史上的聲譽。”

領導人不變革、社會出亂子

中共的接班過程已經與以往不同，張煒表示，目前看來，中共在接班問題上有一個協商機制。現在已非毛澤東時代的完全壟斷或鄧小平時代的寡頭政治，而是開闢了多種可能性，但這個機制有其問題，協商各方一旦錯誤判斷形勢，還可能在權力交接當中出婁子，因為制度本身沒有正規機制，所以不代表一勞永逸有了和平、順利交接的機制，真正的和平機制必須更加透明、民主化。

對於第五代領導人的可能作為，張煒抱持相對樂觀的態度。“我認為在習近平時代，中國完全有發生變革的可能性，因為從 90 年代到現在，趙紫陽對江澤民、胡錦濤的重要評價是：沒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他們只是守成，整個機制靠慣性用作，他們不具領袖氣質、不去解決中國發展的方向問題，雖然對他們來說，守住鄧小平時代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是個機會，但他們不主動解決社會矛盾，他們希望通過經濟增長、時間推移，能讓矛盾自然消化掉。”

只是，張煒表示，現在看來矛盾不但不會自動消化，還越積越深，人們對政府的信任越來越弱，因此需要下一個班子

來解決矛盾，若不解決，社會可能出現大問題，新領導人也不可能像江澤民、胡錦濤那樣不解決矛盾。

此外，張煒指出，中央最高層的領導核心，從毛澤東一路到胡錦濤，權力的勢頭正在遞減，因為訊息更加廣泛後，核心權力遭侵蝕，加上第五代領導人在黨內擔任領導職務的時間，不像過去的人那麼長，自己的班底也不會這麼鞏固，如果處理問題沒有新的角度，將很容易遭受政治危機。

第三點，張煒表示，習近平和胡錦濤比較起來，在中央軍委擔任耿飈秘書時，已在接觸核心層，並在 1982 年時到河北農村，在外省一幹 20 多年，說明他是個有抱負之人，也瞭解中國基層問題，“當然，隨著時間推移，他的抱負被黨內利益導向淘汰的機制消磨多少，他又有多大的魄力，是另一個問題。”

最後，張煒認為，習近平的父親在共產黨鬥爭當中受到殘酷對待，習近平也因此過了一段苦日子，使得他雖然習慣共產的一黨專政，但也看到社會矛盾之處，若習近平想減輕社會矛盾、推動變革，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如果他們堅持不變革，他們控制局是的能力一定不會特別強，中國社會一定會出比較大的亂子，這個制度很可能終結在他們這代人的手裡。”張煒說。

胡錦濤或分三步退下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黃靖在接受《明鏡》專訪時指出，由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國，經濟獲得進一步發展、政治維持穩定，中美關係也有所提升，在胡錦濤剩下的任期中，預料將持續在“替下一屆領導班子創造良好工作環境”與“扶持領導團隊”上有所動作，不過胡錦濤也留下幾項嚴峻的社會問題，亟待往後的領導人去解決。

黃靖教授為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2008年起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以下為《明鏡》對黃靖教授的專訪：

胡錦濤為下屆領導人打基礎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即將下台之際多次提及政治體制改革的議題，相對來說，胡錦濤在 2008 年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 30 周年大會上，已表明“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態度，其後也多次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然而也有分析指出，為了尋求下一代領導人與自己的合作，以及爭取群眾、

幹部的支持並擴大、延續政治力量，目前的中國領導人，包括溫家寶和胡錦濤在內，正積極營造進步改革的形象。

明鏡：政治改革是當前許多人關心的議題，胡錦濤下台前，在政治改革上是否可能有作為呢？

黃靖：應該不會有太大作為。因為政治穩定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首要任務，如果在交接班期間，政策上出現太大變化，可能會引發不必要的不穩定情況。

但如果是為下一屆領導人打下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扶持一批他能夠信任的領導班子的話，胡錦濤在兩個方面將有所動作：

第一，為了替下一屆領導班子創造一個較好的工作環境和氣氛、讓下一屆領導人不致於一上台就面臨一個有風險的局面，胡錦濤可能會採取一些嚴厲的手段，打擊在共產黨看來是害群之馬的貪腐案件，比如最近鐵道部長劉志軍的案子。另一方面，胡錦濤可能在經濟或其他社會政策上有作為，比如最近以強硬的手段打壓房價。

第二，胡錦濤可能在下一屆領導人接班團隊的安排上，加大動作和力度，也就是從政治局常委 9 個人，到政治局委員方面的安排，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建構上的安排。

明鏡：另外如果談到胡錦濤可以有什麼作為的話，您是否認為，在十八大後不繼續任軍委主席，將對胡錦濤的歷史地位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黃靖：軍委主席的交接應該成為一個制度，當年江澤民退的時候是分三步，即：2002 年退黨、2003 年退國（國家主席）、2004 年退伍。如果這個慣例被繼承下去，胡錦濤很可能在 2012 年退黨、2013 年退國、2014 年退伍，因為中共有三個比較重要的會議，從時間順序上來看，第一個是 8 月、9 月召

開的軍委會，第二個是10月或11月初舉行的黨代表大會，接下來是隔年3月份進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如果按此程序，胡錦濤就會在2012年9月召開軍委會時，把新的軍委班子搭建好，在搭建過程中，胡錦濤應該還是軍委主席。2012年10月的黨代表大會會決定領導人的交替，胡錦濤將從黨領導人的位置退下來，並且應該由習近平接班。到了2013年3月，胡錦濤會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從國家主席的位置退下來，並由習近平接班。至少要等到2013年9月或2014年9月軍委會議時，胡錦濤才會從軍委的位置上退下來。這樣做的原因未必是留戀權力，從比較正面的因素來看，這樣做可以保證領導班子在交接過程中保持穩定。

胡錦濤當年在1999年就做軍委副主席，江澤民按道理應該在2003年退下來，但他延緩了一年，或許多少有留戀權力的因素，因此胡錦濤2004年才做軍委主席，不過這中間就有5年的間隔。習近平在2010年才當軍委副主席，如果2012年馬上當軍委主席，間隔時間短，可能產生些問題，因此胡錦濤在2013年底或2014年從軍委主席的位置退下來的可能性比較大。

維穩打貪腐都在治標

撤查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不但展現了中央反腐的決心，也是北京當局維穩的方式之一。劉志軍在2003年正式出任鐵道部部長後，每年春運一票難求的情況不但沒改善，還相繼發生膠濟鐵路列車相撞事故和2008年雪災導致60萬人滯留廣州火車站的事件，在民怨累積的情況下，劉志軍弟弟劉志祥於2006年4月30日因故意傷害罪、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宜昌中院一審判處死刑，劉志軍則在2011年因涉嫌嚴重違紀，被中共中央免去鐵道部黨組書記職務。

明鏡：胡錦濤所強調的“維穩”是否也為了替下一屆領導班子創造一個較好的工作環境和氣氛？

黃靖：維穩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被動維穩，就像前不久茉莉花革命時中央如臨大敵，用壓制的方式去應對，這種方式看起來比較容易，實際上有很多後患。另一種方式是積極的維穩，用強力的手段清除不穩定的根本因素。就像大水來臨，一種是開渠把水引出去，一種是把壩建得更高，但後者只是讓水積累得更多，一旦壩崩潰了，問題會更大，就如同中國的一句老話：“斷流做壩毀，開渠做壩堅。”

我想在這個問題上，胡錦濤現在的領導班子好像有分歧，於是有了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方面用高壓的手段“維穩”，壓制社會不滿；另一方面又採取強力的手段“反貪”，打擊官員腐敗。比如把一個多年來不倒翁的劉志軍一舉拿下。其實這不只是劉志軍本人的問題，2006年劉志軍弟弟就僱黑幫殺人，高鐵建設也有很多問題，因此還牽扯到治安、法律、財務甚至安全等各方面，範圍很廣，涉及的人物可能還有高層，胡錦濤有能力把他拿下，說明他確實採取一些治標亦治本的手段。

談到治本，溫家寶提的政治改革十分必要，但胡錦濤在政治改革這種大議題上會非常謹慎，我感覺還是打擊貪腐的力度會大一點，在打擊貪腐上可能有所作為，但目的都是為了維持穩定的局面。

明鏡：壓制的手段並未治本，在胡錦濤下台前，中國社會是否可能發生大動亂？

黃靖：中國社會要出現像埃及那樣的動亂，需要幾個因素：一個是突如其來的通貨膨脹，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驟跌，但如果通貨膨脹只在房市上，老百姓的感觸不會太大，一旦通脹



黃靖 (新加坡國立大學)

進入超市，普通百姓的生活就會立即受到影響，引發政治問題。第二是經濟發展長期低迷。第三是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而且主要的失業人口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第四是整個社會政治結構的崩潰，一方面是無所不在的貪污腐敗，另一方面是政府治理能力的下降，加上權力制度長期沒有進展，20、30年都由同一人統治、並

且還要提升自己的子女接班。

這四種情況造就了兩種革命的必要條件，首先是人們感到絕望，其次是人們覺得無所失去 (nothing to lose)，也就是馬克斯的：“如果失去的只是鎖鍊，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那為什麼不拼命？

回過頭來看今天的中國，雖然也有通貨膨脹，但政府正加大力度加以控制，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較好，高失業率也還可以忍受，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雖然不是很滿意，但還有工作做，社會政治結構上也有很多問題，但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比較強。

中國自鄧小平以來採取集體領導制，很難把發洩的矛頭指向某一個領導人，只能指向整個制度，而且某些領導人的公眾形象還不錯，中國人也沒有絕望，加上絕大部分的人有東西不願意失去，例如財產、家人，所以中國很難發生大規模的動

亂。其實人們起來革命並不是因為他們想要什麼，而是不想要什麼，想要什麼很難造成革命。中國在 1989 年發生過一次動亂，因為當時大家都不想要通貨膨脹和腐化。

此外，要有效地開展政治運動，還要有三個必要條件：第一，需要一個領導；第二，需要一個政策主張——至少是一個有號召力的想法；第三，需要一個組織，哪怕這個組織比較鬆散。暴動發生後，應該很快出現領導層，形成比較明確的思想與要求，並且有所組織，但在中國共產黨多年來的高壓政策與經濟發展下，社會利益多樣化，很難出現有全國聲譽的領導，也很難出現一個有效的組織，在思想上也是各說其事，因此各地小規模的動亂不斷，但政府可以各個擊破，大規模動亂則很難產生。

財富分配不均是中國領導大問題

胡錦濤延續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持續發展經濟，但也造成貪腐、通貨膨脹、分配不公等社會問題。胡錦濤強調，將在十二五開局的 2011 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保障與改善民生。

明鏡：如同您提到，經濟發展的結果造成許多問題，近來胡錦濤多次強調改善民生，是否代表經濟發展已不是最重要，他將把重點放在改善社會問題上？

黃靖：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基本上秉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這個政策可說取得很大的成功，只是在創造社會財富的時候，往往不需要一個新的政治制度，看看台灣、韓國、日本，或某種意義上的新加坡、香港就能得知。問題是創造財富後要做分配，分配就一定需要一個新的政治制

度。

人類最大的矛盾就是無限的需求和有限的資源，從人類社會形成以來，所有政治制度所解決的根本問題都是分配問題，因為任何一個政府，不管是集權、民主，都要維持基本的社會正義與公正，而社會的正義與公正最根本的反映就是經濟分配問題。古今中外歷史上，所有政治革命從根本上說都是由分配問題引發的，並且以建立新的分配制度——也就是新的政治制度——而告終。

中國經過 30 年的改革開放，積累大量的財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分配不均：一種是資源上的分配不均，即有特權者在經濟發展上得到最大的好處，弱勢者得到的分配少，使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另一種是結構上的分配不均；影響經濟生產有三個因素，分別是資本、技術、勞力，中國多年來強調投資引導型經濟，由外需拉動內需，在中國，有資本的人拿到最大的財富，有技術、勞力的人則拿到較少的財富，受到剝削。

如果分配不均，整個社會的正義與公正就會受到侵蝕，政府會垮台，在這方面，胡錦濤和溫家寶是想有所作為，比如加強改革經濟結構的力度、加強控制房市、出台資產稅，雖然力度如何有待觀察，但從胡錦濤開始，尤其到習近平一代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分配問題，強度和難度都遠遠大於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的發展問題。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領導人面臨的是發展問題，下一代領導人面臨的是分配問題，不改革政治制度，分配問題就解決不下去。

胡錦濤成功改變對台政策

陳水扁在 2000 年上台後，雖然曾提出“四不一沒有”緩和兩岸的緊張關係，卻又在 2002 年提出“一邊一國”、2003 年提出“制訂台灣新憲法”等主張。2004 年陳水扁連任就職前，胡錦濤率先發表強硬的《五一七聲明》，表明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2008 年國民黨上台後，胡錦濤針對馬英九政府提出“胡六點”，重申統一台灣的戰略目標以及政策框架。

明鏡：您在台灣由陳水扁執政時，曾說胡錦濤對台灣是“身段軟、手段硬”，他對馬英九是否也採取同樣的策略？未來還會延續這樣的策略嗎？

黃靖：做事情一般都“事要硬做、話要軟說”，亦即“手段要硬、身段要軟”。在胡錦濤領導下，兩岸政策最成功的一點，是把以促進統一為首要目標，改成以防止台獨為首要目標。毛澤東的“解放台灣”、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江澤民的“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都是以統一為首要目標。到了胡錦濤後，尤其是 2004 年的《五一七聲明》和《反分裂法》後，中共的台灣政策完全變了。《五一七聲明》裡頭有兩句話：台獨沒有和平，分裂沒有穩定。中共在胡錦濤領導下的對台政策變成“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積極促進兩岸的和平發展，爭取實現和平統一的願景”。

在胡錦濤的將近 10 年中，對台灣根本戰略的改變反映在三個方面：

第一，以前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在國際上尋求和平，在台灣問題上卻總帶有武器統一的味道，與中國的整個和平崛起政策不太和拍。到了胡錦濤，他意識到台灣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兩岸問題、不僅牽扯到中國安全和統一的問題，還牽涉到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所以胡錦濤將台灣問題當成中國和平發展大戰略框架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中國認識到中美間的核心問題是台灣問題。因此胡錦濤開始在這個問題上尋求兩國的共同利益。對美國來說，解決台灣問題無非是兩種方法，一種是統一，一種是獨立，統一對美國來說是個長期的潛在戰略威脅，因為台灣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如果台灣獨立，對美國來說也是長期的包袱，所以最好的情況是不獨不統，但維持現狀必須以和平為前提。

胡錦濤把台灣政策變成以防獨為主、促進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和平發展。這使得中美間有了共同的利益：這就是共同維護亞太穩定、維持兩岸和平現狀，這就是為什麼中美兩國當初聯手壓制陳水扁台獨路線的根本原因。1995年第一次台海危機時，美國派了兩艘航空母艦，那次是以中美對抗的局面做結。10年後，2006年陳水扁廢統造成第二次台海危機，那次是中美聯合壓制阿扁，2007年布什政府對陳水扁的嚴厲程度可能比北京還厲害。胡錦濤的策略使得中美間的矛盾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化解。

第三，胡錦濤的戰略盤算是，只要把通向台獨的這條路徹底堵死，同時加強台灣和大陸的聯繫，總有一天，台灣會像“冷水煮青蛙”，不知不覺越來越深地被納入大陸的軌道中。ECFA就是一個“手段很硬、身段很軟”的例子。大陸在兩岸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問題上一直不讓步——因為那樣等於承認了台灣的主權地位，堅持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就是要把兩岸經濟關係鎖定在兩個“地區”之間的經濟整合——手段很硬。但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又用柔軟的身段以平等的地位與台灣簽訂協議，同是也給了台灣相當多的好處。不過這項協議到最後，是加大了台灣對大陸經濟的依賴性。

從以上幾點來看，都說明胡錦濤的台灣政策比較成功。所以習近平應該會繼續堅持胡錦濤的政策。

胡錦濤的三好與四壞

曾是最年輕政治局常委的胡錦濤，一向給人低調內斂、謹小慎微、明哲保身的印象，不少評論在胡錦濤剛接班時，就斷定胡錦濤不會有所作為，不過多年來中國確實獲得極大的經濟成就與進步，大國崛起的態勢也越來越明朗。

明鏡：您是否能總的談談胡錦濤執政的政績，以及哪些問題仍待解決？

黃靖：胡錦濤在位 8 年，有三點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他持續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儘管接受了比較嚴峻的考驗，比如經濟危機，但中國的應對措施基本正確。

第二，他在沒有共產黨政權沒有取得“程序合法性”的前提下，維持政治穩定，這點非常難，因為當中國越來越開放，老百姓也會越來越傾向自由的政治制度，所以對胡錦濤來說，政治穩定的壓力遠大於鄧小平與江澤民。

第三，如果說江澤民最大的貢獻是穩定住中美關係，那胡錦濤最大的貢獻是讓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國家接受中國為一個“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把中國看作體制內的國家。以前美國把中國當作現代國際政治體制外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國家發展越大，對體制的挑戰就越強。2005 年 9 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發表重要講話，將中國定位為“利益攸關者”，從此在根本上改變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基點，使得美國對中國只能使用防禦性的防範（hedging）策略、而不能再是進攻性的圍堵（containment）策略。胡錦濤 2011 年初訪問華府中美首腦的聯合聲明中，奧巴馬保證不會對中國進行圍堵，希望看到一個繁榮和平的中國，胡錦濤也保證中國的崛起不會挑戰美

國的霸權地位，承認美國在亞洲的積極存在。這是胡錦濤對美關係成功的最大亮點。

胡錦濤執政雖有貢獻，但也有留給下一代領導人的社會問題，且越積累越嚴重。

第一是腐敗。中央領導越來越控制不住 7200 萬共產黨的幹部隊伍。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的垮台，表面上看是因為外族入侵或內部起義，但實際原因是皇帝控制不住自己的官員，所以一有外侵或起義就垮台，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朝，明朝是典章制度最嚴密的朝代，到明朝末年，皇帝控制官員的唯一手段是透過東廠錦衣衛這種私下的力量，所以有李自成造反，所以滿族只靠 20 萬騎兵就讓明朝垮台。現在中共透過中紀委控制高層幹部，這就說明中共的典章制度已經失靈。

第二，中央與地方在利益上有很大的矛盾，這也是中央控制不住自己幹部的主要原因，比如不管中央政府制訂什麼政策，如果上海讚揚這項政策，四川可能非常氣憤，如此造成嚴重的政策扭曲現象，“土政策”泛濫。這是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

上述的政治問題又形成第三項的集權與分權問題。過去 3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之所以成功，是引進了市場經濟。要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分權，可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是集權的一黨統治，不集權，在政策制訂和實施上都不可能具有有效性。要保持經濟發展，必須放權；但要保持政策的有效性，又要集權。這個問題具體表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上，胡錦濤任內不但沒解決這項矛盾，反而還使其加劇，這是下一屆領導人要面臨的大問題。

第四個問題，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開放，人們的思想越來越傾向於自由、獨立，但由於政治體制問題，中央不但沒有順應這種發展潮流，反而進行打壓與封鎖，這種手段短期有效，

但長期會大崩潰，一旦中國經濟發展緩慢或出現問題，可能會造成井噴式的爆發，這也是胡錦濤任內沒解決，反而某程度上加遽的問題。

“胡溫”概念不再合適

“如果權力壟斷的格局沒有用民主的方式打破，就實現不了社會公正與民生發展，如果在（胡溫）最後任期沒有改變權力格局的話，他們的整個任期將顯得相當失敗。”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中國研究副教授馮崇義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說。

馮崇義為中國最早的中國現代史博士生，在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創辦了中國研究專業，現任該系副教授，馮崇義也為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著有《中共黨內的自由主義——從陳獨秀到李慎之》（明鏡出版社出版）、《走出輪回：農民意識與百年中國》、《和解的智慧》等多部著作。

中國社會倒退走

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上，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將正式接班，在現階段領導人即將交出棒子之際，溫家寶打破歷來總理不干涉政治制度的慣例，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及政治改革，明顯與胡錦濤不同調。馮崇義對《外參》表示，原來大家的概念都是將“胡溫”連在一塊兒，但這情況現在已經有了變化。

馮崇義解釋：“胡、溫兩人的分野比較大了，至少在言論上，

溫家寶不斷呼籲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對民主的概念接近既有知識份子對民主的定義，但胡錦濤不僅不往前做民主改革的動作，還控制言論、回到人治的階段，特別是 2007、2008 年以來，更加走回頭路，所以已經不合適再使用‘胡溫’的概念了。”

只是，馮崇義認為，胡錦濤和溫家寶還有一年多的任期，不到最後，不能“蓋棺論定”。“從行動的自由度與空間度來論，胡錦濤比溫家寶要大得多，所以雖然胡錦濤這幾年往回走，但在剩下的時間裡，胡錦濤有大動作的可能性即使很小，也不能完全排除。”

1978 年至 1988 年任台灣總統的蔣經國，曾大力打擊腐敗、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雖然之後仍接連爆發震驚社會的官商貪腐案，但反而讓蔣經國更堅持政治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整頓腐敗。蔣經國也結束了“蔣家王朝”的時代，並解除戒嚴令、報禁、黨禁，開放大陸探親，讓台灣從專制獨裁走向較為開明的威權時期。馮崇義以蔣經國為例，指其曾做一些比較出格或違背政治邏輯的事，因此政治人物雖然被周邊的利益集團所左右，但若想疏離利益集團、做出抵觸這些集團利益的事，不是沒可能。

“整個社會的大趨勢需要中國領導人開放黨禁、報禁，扶植公民社會，為多黨政治鋪開道路，但目前只有溫家寶在言論上有動作。”馮崇義對《外參》說，現在很多人對胡錦濤失望、甚至絕望，這群人中最活躍的一塊在網路上，例如冉雲飛、艾未未，以及維權律師滕彪等，都受到全面打壓，而且打壓的手段是法律之外的“黑社會方式”，亦即讓人失蹤，民間社會在 2008 年推出《零八憲章》之後，也受到統治集團極大的阻撓，再再顯現民主走回頭路的情況。

馮崇義指出：“人民只是在胡溫剛上任對他們有所期待，

最大的期待是政治改革方面，他們曾提出一些理念，接近當年胡耀邦、王若水（《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的人道主義，比如新三民主義、以人為本、建立現代法治體系，從意義上告別專政鬥爭，想讓共產黨往人道統治的方向上走；雖然理念上沒障礙，但具體上沒做任何事，所以被諷刺為‘口號治國’。”

溫家寶得不到胡錦濤支持

雖然胡溫政治上沒有大作為，但民生上確實出台了一些措施，例如廢除農業稅、健全失業保障制度、實行村民自治、完善農村基層選舉與農村戶口制度等等。除了為減輕民眾負擔而推出的政策外，溫家寶也推進市場化改革，例如國務院在2005年和2010年頒佈《關於鼓勵支援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民間分別稱“老三十六條”與“新三十六條”），鼓勵民間資本的發展。

馮崇義對《外參》表示，雖然中國領導在民生上做了些事，但“不能說是大成就”，況且不但沒有根本性地改變貧富差距的問題，還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糟糕局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政府弄出4萬億救市方案，這筆錢幾乎都讓國營企業拿走，壟斷範圍還在擴大，連鋼鐵、房地產這些原本逐漸走向民營化道路的產業，都被國企吞併，可以看出溫家寶在推行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的路上，遭遇到極大的阻力。”

溫家寶遇到的阻力在政改方面更大。溫家寶在即將下台之際多次公開談論政改，雖然贏得掌聲，但也被批評為只想擁有名聲、光說不練，反正交棒後就“不關他的事”。馮崇義指出，他屬於樂觀派，傾向相信溫家寶所講的是內心話，只是他做不到。

“共產黨的體制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壟斷，溫家寶想徹底地打破壟斷，給民間權力去監督政府，在這點上，溫家寶比前任的朱鎔基又走得更遠，特別是兩個‘三十六條’的文件，溫家寶要打破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壟斷，讓其他個體得到發展，都可看出溫家寶是想有所作為。”

“只是現在溫家寶只是在經濟上有更大的發言權，在其他方面沒有權限施展拳腳，除非他得到胡錦濤的支持。”馮崇義對《外參》表示，溫家寶也有意想把胡錦濤逼到牆角，讓胡錦濤站出來主持這方面的工作，例如溫家寶回憶在貴州陪同胡耀邦的文章。2010年4月15日北京《人民日報》刊登了溫家寶署名的“再回新意憶耀邦”一文，時間點雖然是胡耀邦逝世21週年，但背後動機廣被人議論。

馮崇義對《外參》指出，溫家寶與胡耀邦到貴州時，正好是胡錦濤任貴州省委書記，因此溫家寶特地挑貴州來回憶，有暗示胡錦濤有責任繼承胡耀邦的這面旗幟繼續往前走的意味。“胡錦濤的權力來源，是我們歸類的‘團派’，溫家寶公開與胡錦濤叫板，指胡錦濤辜負了胡耀邦的栽培，但胡錦濤沒有接溫家寶的球。實際上，胡錦濤在民主改革上儘管沒有打擊溫家寶，也沒給他支持。”

如果政治體制上沒有進展，則民生上也會保持“沒辦法有成就”的現狀。馮崇義表示，中國領導在民生上沒有大成就的理由很簡單，民主和民生是連在一塊兒的，如果權力壟斷的格局沒有用民主的方式打破，就實現不了社會公正與民生發展，因此如果在胡錦濤與溫家寶的最後任期內，權力格局沒有改變的話，他們的整個任期將顯得相當失敗。

馮崇義對《外參》說：“領導人下台或權力轉移本身是個新的制度安排，以前都是沒有規矩和框架的。但任期制也是把雙刃劍，負面來說，會讓即將下台的領導人有種惰性的考慮，



馮崇義（記者柯宇倩攝）

不做長遠安排、保證任期內的安穩就行，但同時也有正面的結果，就是政治上的風險減少了，以前在終身制底下，要負責到底，現在不管如何都要下台，因此讓領袖有空間做一些大膽的嘗試，但很可惜的，目前這種正面的思考沒有體現出來。”

政治沒進展，兩岸
難突破

如今，下一代領導人即將上任，但胡錦濤還有一個能延續權力的職位：中央軍委主席。馮崇義認為，胡錦濤已讓習近平晚一年接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因此沒有跡象表明胡錦濤會在十八大後徹底放手。“胡錦濤還留戀這個職位，所以至少會像江澤民一樣，在軍委主席上延續一、兩年的時間，甚至多任一期都有可能，這不是很好的現象，特別在大家原本對他有期望，但他至今卻毫無建樹的情況下。”

不過，習近平任軍委副主席的時間並不常，胡錦濤若留任，是否能給習近平更多緩衝時間，有助接班工作？馮崇義對《外參》表示，胡錦濤和軍隊毫無關係，也沒有軍事上的專業能力，所以不能期待他留任，才能對國防軍事有更好的掌控。

中國大陸政治上的無進展，不只影響國內的民生，也影響到兩岸關係。馮崇義認為，胡錦濤任內兩岸關係改善，很難

說是胡溫的成就，因為在這段期間國民黨重新掌權，避免讓台灣往台獨路線繼續靠攏，台灣本身也有意緩和兩岸關係，都為兩岸提供了新的契機，然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期待，也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期待一樣：中國大陸可以談統一、可以談更親密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但如果要更親近，前提必須讓中國政治民主化。

中國的國防、經濟力量持續提升，國際間也越來越重視中國，其中相當重要的中美關係，雖然時而順暢、時而崎嶇，但大體而言較以往熱絡。馮崇義認為，比起胡錦濤，江澤民反而屬於親美派，比較積極推動和歐美之間的關係，胡錦濤則相當保守，會在意識型態上做出接近毛澤東的外交路線，例如更堅定地支持古巴與朝鮮等獨裁國家，因此胡錦濤應非刻意尋求一個更緊密的中美關係。

中國在世界舞台崛起的同時，也身負更大的期望，如何處理國際關係，是目前與下一屆領導人需思考的問題。馮崇義對《外參》說：“國際社會，特別是歐美，都希望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參與並遵守國際秩序，提倡普世價值，這些都是胡錦濤這幾年公開挑戰的，因此西方國家也很憂慮，因為中國的作法會勾起二次大戰之前，日本、德國等新興國家挑戰既有秩序、導致國際大震動的回憶。”

溫家寶談政改已醞釀多時

“天下想做大事的人很多，做成的卻很少，關鍵就是方向對不對，不懂得拿捏分寸……真正的政治家，能從小空間裡殺出自己的活路。”原趙紫陽體制改革班子成員、電視片《河殤》參與者之一的張鋼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若能從老百姓的生存安全與生存品質入手，不但最順應民意，還可望已經濟改革帶動政治改革。

政治家更重視現實情況

中國總理溫家寶近日多次提中國的政改，外界褒貶不一。張鋼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這個時間點正好是中國國內各種矛盾交集的時刻，因此溫家寶頻繁談及政改，而深圳是鄧小平最早圈出來搞改革的地方，溫家寶在深圳首次提出政改意見，較不會招來“走歪路”、背叛鄧小平的批評，反而能被看做是延續鄧小平的路線。

雖然有人支持溫家寶的政改，但也有人認為溫家寶不過是在作秀。張鋼認為作秀的說法很淺薄，並未深入考慮問題。他指出，一般國家的獨立知識份子和菁英，必須旗幟鮮明，講究一步到位，因此他們談的政改，肯定是三權分立，開放言禁、黨禁、報禁，讓權力由選舉產生。

但政治家的不同點在於，他們必須結合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從中判斷能夠做些什麼，並且有分寸、有步驟地提出實際的建議，因此政治家和知識份子談政改時，會有時間與內容上的差別，而溫家寶近日談的限權和黨政分離，便是在考慮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制度轉型過程等因素後，一個更符合政治層面上的操作。

由於溫家寶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 CNN 專訪時表示，雖政改面臨議論及阻力，自己仍將推動改革，至死方休。這番話被人解讀為溫家寶“豁出去了”，想留名青史。同樣地，張鋼認為這種看法也是比較淺表的考慮。“溫家寶主持經濟工作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這過程中，他深切感受到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不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往下進行，所以他不斷講改革。”

溫家寶的思路延續以往

張鋼指出，溫家寶的政治理念有四個，分別是讓人有尊嚴地過著幸福的生活，讓人感到安全和可靠，讓社會充滿正義，讓人對未來充滿信心。但溫家寶在親民過程中，尤其在救災的時候，深切感受到中國的制度有問題，接觸到大量人民的情緒與要求，發覺人們活得沒有尊嚴、活得不安，也感到社會到處充滿不正義、對未來喪失信心，因此認為中國勢必要改革。

張鋼強調，溫家寶提倡政治改革的思路，其實已經醞釀多時。“胡耀邦與趙紫陽的體制是中國共產黨建政以來最好的體制，溫家寶曾是中辦主任，親身經歷過這樣的體制，對那段時期的改革路線很清楚，比如沿海戰略、外向型經濟，這是正確的路線，中國非得走這條路不可雖，然溫家寶不提趙紫陽說過的話，但他不批評趙紫陽，在現在條件下，他只能讚



張鋼認為，溫家寶提倡政治改革的思路，其實已經醞釀多時。（中新社）

揚胡耀邦。”

張鋼指出，溫家寶讚揚胡耀邦的背後，實際上就是讚揚胡耀邦與趙紫陽當時推行的體制和一系列方針，包括當時就要啟動的政改，因此溫家寶提政改並非偶然。

此外，中國國力不斷提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交往非常頻繁。張鋼表示，

溫家寶在國際交流中，感知到時代潮流的走向，因此溫家寶在今年10月初的“中歐論壇”上提到普世價值、義大利人文精神、德國哲學精神與法國的民主科學，都是延續了以往的思路。

中國政治在模糊中推進

由於中共高層並未積極回應溫家寶的政改言論，有分析指出，溫家寶的行動顯示了中共高層已將原有的分歧公開化。張鋼駁斥這種說法，他表示，這是對中國政治的不瞭解。

“中國政治辦起事來經常在模糊狀態中進行。中共高層說要進行經濟改革，還要政治改革作配套，沒有人否認，但政治改革的內容是什麼，咱們先模糊著，所以只要原則上同意了，政治改革就可以提，溫家寶得到這種認可，就可以說了。”

張鋼強調，中國政治很多時候要模糊著，如果一清晰，就會出狀況。因此中國可說是在模糊中一步步前進、一步步取得合法性與進步性，並創造歷史。“所以不用去猜測高層是否觀點統一，中央不可能開會讓他去講這番話，大原則認可就好。”張鋼開玩笑道：“從制度上來講，溫家寶還有兩年（註：此文寫於2010年），在這期間不可能把他換掉，所以也拿他沒奈何。”

只是，外界也有聲音質疑溫家寶對於推動改革，有多大的影響力。張鋼認為，他已在盡自己最大的力量。“溫家寶一直想改，但推不動，劉少奇的兒子劉源也是，都知道這是制度性問題，但改不了制度，所以他們都在盡可能地一點一點滾動。”

張鋼表示，以目前的中國來說，不管能推動政改中的哪一個項目，都有所助益，但問題是哪一步都做不到底。“比如黨政分開，比如人事精簡，都沒做到底，很多人不以為然的村級選舉也是。但別小看村級選舉，老百姓就是從這些村長鎮長身上直接感受到共產黨統治的，所以如果真正把這個老百姓最需要的村級選舉推下去也行。不管做什麼，只要能進行，將來都會產生無法逆轉的影響力。”

改革從百姓生存問題做起最合適

張鋼強調，任何改革的推進，都要從各個利益集團的重合點切入，才能收最大效益。例如1980年代的農村改革，無論左、中、右派誰上臺，只要解決吃飯的大問題，就沒人能反對，而改革一旦運轉起來，各個項目都會環環相扣，整個社會動起來，由不得他人控制。

他建議，如今的政治改革，可以考慮從老百姓生存環境這點上入手，讓經濟改革圍繞生存安全、生存品質為中心來進行，進而達到社會政治調整的目的。“比如住房、教育、工資、

勞保政策，雖然這些和政治沒有直接關係，但與經濟改革有關。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也會在這，這些都是順應民意的，沒人會反對。這種作法，比直接談政治改革可能更切合實際，需付的社會成本最低，但成功可能性最大。”

張鋼指出，天下想做大事的人很多，但做成的卻很少，關鍵就是方向對不對，不懂得拿捏分寸。“知識份子的邏輯，在天上看起來很嚴密，但掉到地下來，實施的空間不大，真正的政治家，能從小空間裡殺出自己的活路。”

目前各省、各部主管中，也正討論或已推出一些改革舉措，在溫家寶於深圳談論政改後，廣東書記汪洋也提及了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政改內容，引起外界對深圳試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注。

張鋼認為，深圳試點政治改革，在不可能開放深圳市長、市委書記選舉的情況下，影響有限。相對來說，一些其他的舉措，如目前四川正在進行的精簡行政層級，便有更大的意義。“這是一個過渡政策，把這批退下來的、無關的人養起來，養一代過去，後頭就好辦了，共產黨對過去資本家採取贖買政策，我認為在行政人事改革過程中，也該採取贖買政策，花一代人的本錢，把體制改過來。”

中國的改革端看領導人魄力

張鋼指出，其實許多面向都在進行，現在的中國已經看到進步的一面，只是不能一下放開，如談論開放黨禁、報禁，其實現在中央的控制手段有限，電視不能播的，還能出版書籍，不能印成簽字的，底下還可隨便說。

“最近國家話劇院有一齣劇叫《這是最後的鬥爭》，把共產黨的弊端在台上罵了個夠。原本這齣戲改了幾年不敢演，後來

請了曾慶紅看戲，曾慶紅看完後帶頭鼓掌，說是反腐敗的好戲，這下子鬆開了。”張鋼說。

目前中國的第四代領導人即將卸任，第五代領導人將帶領中國走向何方，也是各方關心的焦點。張鋼分析，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打天下，敢作敢為；第二代中很多人是 1950 年代培養出來的，更願意繼承傳統，但這批人的專長多在技術層面，缺少治國方略，沒有第一代管理國家的魄力，也沒有自己創新的能力，不過由於技術層面做得較好，因此能做到“維持”的程度；第三代較多是團系統出身，黨說到哪，團就打到哪，不需動腦子，在這種狀態下能邁出多大步子，是能預見的。

至於第四代領導人，張鋼則看好太子黨的作為。“很多人罵太子黨，但我認為第一，他們不怕別人說，第二，他們長期的生活環境，使他們上能通天、下能接地，第三，他們認為老一代思想陳舊，他們的自我感覺良好，覺得‘這是我們的天下、是我們的責任’，因此自負性極強、責任感也極強。所以《這是最後的鬥爭》，如果不是曾慶紅去，誰敢鼓掌？”

張鋼指出，下一步領導人對中國的影響，如果也這樣分析其中的權力結構，就能得出大致的判斷。不過他強調，不管什麼領導人，都希望社會進步與中國得到發展，但誰敢做這一步，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中共從農民政黨轉為菁英政黨

中國共產黨已從早期的農民政黨轉變為一個菁英政黨，習近平、李克強等第五代領導人都是菁英中的菁英，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政治學教授唐文方在接受《外參》專訪時指出，這些菁英成員在黨內民主的推動上起到一定作用。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共產黨中“實用型”黨員的增多，政黨的意識型態已明顯產生變化，這些“實用型”黨員將在未來的中國揮發其影響力。

唐文方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分別獲法學學士學位和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現為愛荷華大學政治學系斯坦利華夏講座教授，著有《美國青年看中國》、《民意與中國政治變遷》等十部著作，論文可見於《美國政治學雜誌》、《中國季刊》等重要期刊。

從農民政黨轉為菁英政黨

無論是哪個政黨，在時代變遷與政策的調整下，或多或少都會經歷轉型的過程，如今中國共產黨的組成份子，已經與以往不同。在中國做過相當多調查的美國愛荷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唐文方對《外參》指出，中國共產黨最早是一個農民政黨，完全靠農民和普通士兵起家，但特別在 70 年代末以後，菁英

政黨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唐文方表示：“中國共產黨向來說自己是工農兵，是普通老百姓的政黨。根據我的研究，現在的共產黨員，與一般老百姓做比較的話，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多，住在城市的人居多，男性居多，並且年齡偏大。”

中國在 30 年的改革開放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與教育程度都提升了，即便城市和農村存在差距，但整體國民的收入仍比以往要高，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士，條件自然較以前農民政黨時代要好，但即使在這樣的基礎上，黨員在各方面的條件仍舊遠遠高於一般老百姓，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本質上已是個菁英政黨。

唐文方對《外參》表示，會有這樣的轉變，與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中的作用改變有關。“以前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動員一般老百姓造反的政黨，毛澤東在的時候，動員的都是底層的群眾，但現在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發展經濟，需要把最好的人才用在這方面。現在不像文革或大躍進時，要求老百姓把家裡的東西捐出來打煉鋼鐵，而是需要科學技術，需要教育程度高的人，才能在與先進國家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不過，這些擁有高教育、高技術的人才，還必須符合一個重要條件：對共產黨忠誠。而招攬這類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他們還具有相當的可塑性之際，便讓他們融入黨的文化與紀律中。唐文方舉例：“中國共產黨最近這些年大量吸收菁英，比如有步驟、有系統地到中國最好的大學裡招募最聰明、最優秀的人。”

中國共產黨的菁英化，從高層便可看出。唐文方表示，即將接班的習近平和李克強很明顯是菁英份子，習近平不只畢業於清華大學，還擁有法學博士學位，這是中國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李克強則是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



唐文方（愛荷華大學）

其實不只第五代領導人，唐文方對《外參》指出，現在還在位的一代領導人就已經是菁英份子。“政治局9個常委的教育背景，好幾個是頂尖大學，或擁有研究生學位。”

不過，第五代領導人與第四代仍舊有個明顯的不同點：新一代的人是中國第一代文科出身的領導人，而目前政治局的常委都是工程師出身。但如果

要具體談兩代人在政策落實上會有什麼樣的區別，唐文方認為現在談還太早。“至少文科人與工程師的眼光會不一樣，文科的眼光應該又更寬廣一些。”

黨內民主已在進行

中國共產黨走向菁英化，眼界或許更寬廣、對事物的接受度可能也更高，但唐文方對《外參》指出，即使轉變為一個菁英政黨，對中國的民主化仍舊沒有幫助，因為這些人依然是從制度裡起家的，對民族主義和政權的服從與滿意度，都明顯較高。“共產黨最主要的原則就是要忠於政黨與政權，而這個政權最根本的基礎就是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因此，共產黨員不會想要搞一個多黨制民主，拿另一個政黨與共產黨競爭。”

但另一方面，唐文方表示，黨員又比一般民眾有更高的政治參與度，且中國共產黨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存在不同

的觀點，因此黨員比一般民眾又更能推動民主的發展，雖然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政治轉型並未開始，但其實這樣的過程已在進行。

“黨內的民主會比黨外民主要先發展，其實現在已經可以見到黨內民主。”唐文方對《外參》舉例，過去10年內，很多方面可見到這樣的變化，比如擁有徵求民意的機制、差額選舉、領導人更替方式的制度化與透明化。此外，中國共產黨內存在不同的派別，也是一種民主表現。唐文方說，從習近平是“太子黨”而李克強是“團派”這一點來看，以後第五代人可說是“太子黨”與“團派”互動的局面。

只是，中國共產黨不同派系間的“互動”，也經常被描繪成“派系鬥爭”或“政治角力”，反而削弱了政權的可靠性，例如利用反貪腐打擊對手。唐文方認為，“太子黨”與“團派”基本上是不同的兩隊人馬，肯定有競爭的一面，有自己掌控的資源與權位，但從共產黨執政的角度來說，兩派人馬有共同的認同，沒有利益上的衝突，因此應該會見到更多良性的互動。

若要談到兩派不同之處，唐文方對《外參》分析，“團派”是一個從團中央到地方的、有組織的系統，因此“團派”在地方上的勢力或許會比“太子黨”要強一些，而“太子黨”並非一個正式組織，主要靠人與人之間的網路聯繫，因此可能在中央的勢力比“團派”要大一點。

雖然黨內民主已經展開，但諸如對媒體的控制、反對派的建立等限制，中國共產黨並未鬆綁。只是，唐文方認為，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與老百姓教育程度的提升，都會給當局帶來更大的改革壓力，不過這種來自民間的力量，比不上黨內自發的力量。

“中國的民主是否會由民間來推動？這是一個辯論。有些人覺得民主可透過民間的不同意見者來推行，另一些人覺得中

國民主會從黨內開始，就我的研究來看，這兩種情況都有。”唐文方對《外參》解釋，劉曉波、艾未未等人的努力，是一種推動力，但更不可忽視的是中國共產黨內的民主趨勢。

“實用型”黨員將在未來成要角

“很多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有什麼民主可講？可是其實現在黨員之間的價值觀相當不一樣。”唐文方指出，黨員中有的人很保守，想繼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認為自己在為共產黨奮鬥，這類人也很被動，領導說什麼就做什麼，另一方面，也有“實用型”的黨員，這些人更自我，在政治上較為獨立，更想傳達出個人價值、擺脫意識型態，會要求發出自己的聲音，以及想有決策的權力；“實用型”黨員增多的趨勢很明顯。

而這種思想上較開放的“實用型”黨員，將會在未來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力。唐文方對《外參》表示，“實用型”黨員肯定會在未來主導政黨，因為他們都是年輕人，而如今年輕一代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動機，也更偏重有助於各人在工作上的發展，或是提高社會地位。

“所以中國共產黨內，不同意識型態的人，可以用年齡來區別。年輕的黨員非常明顯是實用型黨員，年齡長的比較是保守型黨員，因此可以預見共產黨意識型態的轉變。”但轉變的關鍵，唐文方認為是黨內民主如何向黨外民主過渡，雖然這樣的過渡遲早會來到，但至少在第五代領導人的身上，還看不出能實現這個過渡的跡象。

唐文方表示，其實黨內擁有不同意見、不同派別的情況，對共產黨執政具有積極的影響。“在上位者不能不管共產黨內的聲音，因為一定要取得各種意見的平衡後，才能站得住腳。”

但另一方面，不同派別之間的矛盾，例如傳統派與“實用型”

黨員之間的分化，也是中國領導人應該注意的問題。“這種矛盾在一些方面能反映出。”唐文方舉例，如果共產黨的地方基層企業，員工想罷工，則保守的黨員一定不會支持罷工，但如果是年輕黨員會站在罷工者的一方。“這個情況在廣東很明顯，比如當地工會支持工人罷工。這是中國有趣的地方，工會到底是站在資方還是勞方，每個地方都不一樣，這與工會幹部以及地方企業裡的黨幹部的價值觀、年齡都有關係。”

黨內的問題外，黨外還有更嚴峻的考驗等待中國領導人去解決，尤其是現在表現得小心翼翼的下一代領導。“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都非常謹慎，特別不敢出聲，深怕在接班過程中出了批漏，但他們面臨的挑戰和第四代領導人一樣，就是如何保持共產黨政治統治地位的同時發展經濟。”

唐文方對《外參》說，第五代領導面對的困難會比上一代要大，因為上一代的經濟實現了10年高速增長，但在中國經濟已經幾乎到頂端了，“很多經濟學家說，下一個10年中國的經濟很難在基礎上保持同樣高速的成長。”

第二個是政治上的問題。“現在中國社會矛盾非常多，腐敗、通貨膨脹、高失業率、城鄉收入差別、醫療問題，老百姓有了矛盾後就會上街，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也越來越大，都會造成社會與政治上的不穩。”唐文方認為，雖然第五代領導人可預料還是會以經濟發展為前提，而壓制政治上的反對派，但這樣的策略否能保持下去還是未知數。

國家的最高領導層 是否一定得來自黨員？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有許多有天分、有想法的人才，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問題在於，國家的最高領導層是否一定得來自遵守黨綱和政府階級制度行事的黨員。”知名歷史學家、海外華人研究權威王賡武在分析未來中國領導人的特質時，對明鏡記者如是說。

在印尼出生的王賡武，曾任馬來亞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與太平洋研究院院長，香港大學校長，目前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東亞研究所和李光耀公共管理學院主席。

王賡武 2010 年 7 月時在新加坡“中國政壇的明日之星”研討會上指出，戰勝後取得合法政權的中共，在和平盛世的今日，能否持續照顧好人民的生活，更顯重要，而中共政權的持續穩定取決於是否能選出應變能力強的領導人才、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

王賡武也認為，目前這一代的中國領導人走得很穩，不是抱著革命家打天下的心態，而是想辦法解決實際問題，讓國家穩穩當當地發展。在西方呼籲中國繼續前進的期盼下，中國領導人更願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速度來行事。不過，這樣的結

果，卻使得“中國稱霸”、“中國威脅論”的說法持續傳播。“中國一直說自己不稱霸，可總是沒人信。”王賡武指出，中國是否有霸氣，還是看中國這一代領導人對外部世界的態度，不過中國領導層在很多場合都非常小心處理中國與他國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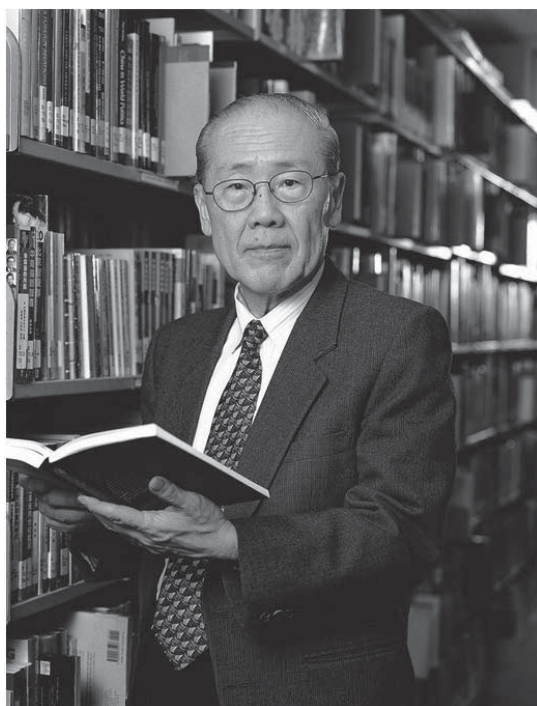
明鏡記者就中國領導人、中國崛起、海外華人、兩岸關係等議題，請王賡武教授進一步分析，以下為本次專訪：

明鏡：目前中國領導層欠缺什麼樣的人才？之後哪些人有可能成為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新星？

王賡武：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有許多有天分、有想法的人才，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問題在於，國家的最高領導層是否一定得來自遵守黨綱和政府階級制度行事的黨員。如果這個情況持續，未來的領導人仍會是同樣的一群人，這是這個制度裡的嚴重弱點。國家會錯過許多聰穎的年輕人，他們或許不符合黨的要求，但更有創造力、做起事來不會太呆板。

我現在無法準確說誰是未來的新星。我覺得在 2012 年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太多可以期待的轉變。如果我們對這些在現在的權力架構下冒出頭的人有所期待，反而會使得目前和下一代的領導人覺得，他們應該保有自己的風格。不過年輕的黨員比較能意識到人們藉由新科技表達自己觀點的情況，比較可能以新的方法和黨員以及老百姓溝通。某種程度上，那些特別能良好處理新溝通方式的人，可能會勝過那些仍困在傳統科技中的人。

雖然黨階級內的彈性有限，但領導們有一點至今為止做得很好，那就是在這些有資格的候選人當中，選擇出願意奉獻心力的人和有能力的人。共產黨似乎很樂意去改善選擇人才的方式，只是目前有能力的人選中，大部分是懂得如何玩弄權力的



王廣武（新加坡國立大學）

男女，好像玩弄權力是常態那樣。

明鏡：您說，當前中國的領導人走得很穩，是本著工程師的出發點，想辦法解決實際問題。您覺得，對於民主、人權和民族議題，中國領導人也確實在想辦法解決問題嗎？

王廣武：目前的領導人展現了深思熟慮的一面，也會在仔細評估實際解決方案

與政治後果後，做出重大的決定。他們似乎意識到你提到的這些敏感問題，比如民主、人權與少數民族權利。有的黨組織，比如中央黨校與一些智庫，都被要求研究這些問題，許多研究也已展開或出版，但總有一些不能背離的先決條件，例如中國政府與解放軍的主權。所有在中國境內可能影響權力分散的改革，都要遵守這樣的基本原則。因此，只要民主和權利在框架內、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地位、永遠不會對中國政府想讓國家強健的神聖目標構成威脅，那民主和權利就能被接受。

明鏡：您說過，中國平等地對待其鄰國與周邊國家。不過中國不選邊站的策略，有時候會讓一些國家不滿，比如朝鮮問題。美國也經常呼籲中國有所行動，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您覺得中國的“平等策略”，是否有時候會損害自己的國

際地位呢？

王賡武：我不確定中國對朝鮮的態度是否真的出自你所說的“平等策略”，或者說“一視同仁”的概念。朝鮮是唯一與中國有友好條約的國家，這種從韓戰開始的“唇齒關係”似乎成為一種義務，因此，這種特別的關係是中國主要的考慮點，許多中共黨員偏好最終與朝鮮保有“等距”的關係，比如跟韓國保持的距離一樣。如果能達成，或許能降低目前東北亞難題的複雜性。

說到“負責任的大國”，美國和中國似乎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來理解這個概念。對中國來說，負責任代表進一步支持美國所謂的“國際”利益，或支持美國和其同盟國抵抗他們的敵人。但中國無法確定自己的國家利益會不會與美國的“國際”利益相符，因此中國的態度很謹慎。做為一個仍在發展中的國家、很大比例的人民活在貧困中，中國相信國內利益必須優先考慮，中國無法像美國和歐洲那些已發展的富裕國家那樣行事。

中國還沒準備好與美國並列，比如 G2 那樣，中國領導很有智慧，拒絕了這個標籤，他們滿足於在大一些的地區性與全球性團體中做好該做的事，不過，在那些與美國和其同盟國相符的利益中，無疑的，中國會盡全力合作，扮演好自己的國際角色。我們先前已見到這種情況。

明鏡：西方國家近來總瀰漫著“中國威脅論”的論調，為什麼中國說自己和平崛起，西方國家總是不信呢？是中國的實際作為跟說的話不一致，還是西方從政治上、從民族主義上，必須炒作這個話題？

王賡武：兩者都是。此外，任何真正的大國都肯定是一小一點鄰國的潛在威脅，不管大國的領導說什麼，這都是不可避免的事。中國崛起快速，現在能用非常優良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因此小一些的鄰國更有理由對中國產生警覺。無疑的，中國在

調整自己，他想用很果斷、迅速的方式來護衛自己，中國不管是陸地或海洋的國界都非常長，中國也認為自己從幾個方向受到大國或強國的挑戰，特別是東南邊、西邊與東北邊。

因此“中國威脅論”不會消失，所以必須好好處理，不能只是不斷的抗議或強調和平意圖，也必須透過行動、實際展示來解決問題。最重要的，如果要外界的人相信中國總會站在和平和善意的一邊，並公開支持中國，中國必須在境內展現出道德與人道關懷、用公平與正義的態度對待自己的人民、對需要幫助的人做出符合文明與文化的行為。

最終說來，都還是可信度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像美國這樣有“軟實力”的國家，都會在未能做到先前設定的高標準時失去可信度，不論這個標準是為美國境內或國際事務而設。對中國來說，想贏得現代文明國家的美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中國仍需建構出自己的立場，直到做出其他人會欣賞的文明行為，否則中國的成長與實體上展現出的力量，一直都會引發恐懼。

明鏡：您也對華人留學生做過許多研究。許多人說近幾年來，中國境內的人民自信心增強、民族主義高漲，您覺得海外中國人也有這樣的心態嗎？還是說到了海外，對於中國歷史與國際情況更瞭解，反而會反思一些事呢？

王賡武：中國人有很多種，不同年齡、不同教育背景。確實，有的中國人對中共過去 30 年達到的成就非常驕傲，也的確許多現在的中國人比以前更有自信，甚至自負，有的人開始表現出有侵略性的國家主義行為，但也有更多處在巨大困難中的人，試著努力生活，渴望為家人和社區打造一個更快樂的生活環境，卻在面對廣泛的貪腐情況、不在乎人民需求和不重視公義的當局時，感到無助。

簡言之，你不用環遊世界或住在海外，才能瞭解中國有沒

有好好對待對普通老百姓，幾個世紀以來，政府中只顧自己利益的人，比關心人民的官員還要多，你不用受過高等教育就會知道這件事。

明鏡：您說，中國本身意識到，東盟的不結盟，對中國有利。您能否進一步解釋一下，為什麼對中國有利？

王賡武：如果有權力的東盟國家結盟了，而這些權力可能會對中國產生敵意，那就明顯不符合中國的利益，目前，東盟同意提供一個強化地區和平和繁榮多邊關係的平台，並小心避免結盟的動作被視為是對中國政府的威脅。只要持續保持下去，中國南部邊境的安全問題就會減到最小，中國政府已發現東盟的貢獻，也做了許多鼓勵東盟保持這些政策的事。

明鏡：您覺得現在一代，或是下一代中國領導人在看待台灣問題上，與前幾代領導人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您怎麼看待未來的中國與台灣關係？這樣的關係如何影響整個亞洲的情勢呢？

王賡武：這是一個被情感佔據、合理性受到挑戰的問題，身為歷史學家，我知道一個中國的理念是一回事，但中國在歷史上分裂多次是另一回事。歷史上，中國分裂多次，但中國人民和領導總相信遲早會統一，在他們看來，統一是準則，分裂是脫序。

這個問題在今日有新的論點，有些論點來自於擁有合法性的強勢機構的人，這個論點認為，國家必須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國土，不論這個論點從何而來，都激起了強烈的情緒，也推翻了傳統上對文化和民族的認同。

目前中共的領導人將歷史上的統一理想與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結合在一起，未來的領導會如何看待這種結合，還不清楚，不過傳統上的統一理想可能持續保持他的重要性、繼續決定台灣海峽的關係。只是，這個議題向來也跟中華人民共

和國對海岸安全的顧慮結合在一起，19 世紀的鴉片戰爭對中國領導來說是段痛苦的回憶，除非他們能確保台灣永遠不被用來支持潛在的敵人，否則他們目前的對台政策仍會持續。

我相信所有該地區利益相關國的領導，都知道中國在這個議題上的想法，有主權與安全的考慮，不會想要鼓勵任何可能被中國解釋為恐嚇的舉動。

中國領導接班制產生民主假象

“我想胡錦濤在任期的最後時期不會有什麼樣的作為。”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歷史學副教授張信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說。雖然胡錦濤在下台前料不會有太大的動作，但在他領導下的中國，正朝著更開放、國際地位更加提升的方向前進，胡錦濤所提的“和諧社會”也讓中國社會得以養精蓄銳、持續發展，這些特點都將在胡錦濤的剩下任期中延續下去。

張信為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歷史學副教授、副院士以及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副院士，研究中國現代史、亞洲史、世界史。獲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及中國文化基金。撰有《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河南的狀況與地方精英，1900-1937》一書與大量學術論文。

中國的假象與實質民主

胡錦濤即將在 2012 年的十八大後，將棒子交給下一代領導人。目前普遍認為，中國領導人上任之初地位尚不穩固，因此不會出現大動作，但任期將盡時為求平安過渡，也不會做出改變。張信同意這樣的說法，他對《明鏡》分析，不做出改變有幾個好處：首先，不會把船弄翻，第二，不會讓自己的歷史地位承受風險。



張信（張信提供）

“在胡錦濤開始考慮自己政治遺產的情況下，冒險是不值得的，萬一出現無法想像的問題，將影響到自己的歷史定位，穩穩當當把權力交出去就行，因此我想胡錦濤在任期的最後時期也不會有什麼樣的作為。”

張信對《明鏡》指出，自從鄧小平把職務交給江澤民後，中國領導人已經產生新的接班人傳統，但這樣的轉換造成

了幾個結果：第一，產生中國比較民主的假象，第二，讓外界以為中國也有政權更替；實際上，領導人換了，但總的政治方向並沒有改變。

雖然政權體制上的民主只是假象，但其他不會動搖到政體根本的部分，則展現出實質的民主。張信解釋，民主對中國人來說是個外來的東西，是種非常歐洲化的文化，這種文化隨後傳到美國；由於美國經濟與政治上的強大，使得美國有足夠的影響力在世界上推廣民主意識，其影響範圍包括中國。

然而，中國社會有自己的傳統，這樣的傳統很大程度上是反民主的，中國歷史上有民主思想，卻沒有民主傳統，中國要接納民主，就必須與自己的傳統做鬥爭，但張信認為，即使如此，中國也應改變，應該走向民主。“自從法國開始強調以民為主要的思想後，民主已經成為一種不可推翻的世界潮流，

世界各國多少都朝這個方向走，中國也意識到這點。”

張信對《明鏡》表示，雖然中國目前的接班人制度與真正民主之間還有根本上的差別，但在其他方面，為了給世界一種開明的形象，中國實際上正在走民主這條路。

“中國政府在各方面已經比以前開放得多，89年民運時，由於中國政府鎮壓學生，表面上看，社會對民主的訴求到了頂點、全盤西方化將停止，但實際上，雖然中國政府一方面持續壓制任何對於民主的訴求，另一方面自己又悄悄地不斷改變，因為他們感到自己不得不轉型。”

張信強調，中國政府所進行的最大轉型以及全盤西方化，是在89年以後出現的，從上到下，包括婚姻法、民事訴訟、商業往來、電視節目都可看出端倪，因此民主在中國並未停止，直到現在，中國都還在走向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

持續提升中國國際地位

只是，若要談到政權上的改革與開放，張信對《明鏡》說，江澤民當初沒做，胡錦濤到下台前不會做，到了習近平，估計也不會做。“中國政府可以在經濟上非常開放，但政治開放卻很難，原因有幾點：第一，他們不習慣政治開放的運作方式，他們把政治開放看做失去權力，把老百姓對政府批評的權力，看成是自己丟棄的權力。”

“第二點，他們不相信別人，他們認為政權在他們手上才能把事情辦好。第三，如果要問這個政權現在所代表的是什麼？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政治集團利益。中國共產黨已經形成一個政治利益集團，不單單是親屬、錢等等的利益，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權力。很多時候，權力比錢更重要，所以中國共產黨千方百計要保護自己的利益，也不會隨便把這樣的利益

交給別人。”

不過，民間推動政治改革的力量沒有停過，最近的運動便是“中國茉莉花行動”，這項行動有可能成為胡錦濤最後任期內的棘手問題。張信對《明鏡》指出，發生在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對中國來說是很大的刺激，雖然官方管制嚴厲，但中國社會裡仍到處都在提，老百姓處於一種“什麼都知道”的狀態。

“中國茉莉花行動”初期以輕鬆、和平的方式進行，每週日在各大中小城市的廣場散步、微笑、聊天，將之當成“熱身運動”，等待和選擇個適當的日子大規模集會。由於最終目標是大規模集會，因此張信指出，胡錦濤在最後的任期面臨了考驗，在他把棒子交給習近平的時候，可能正好是中國茉莉花行動進行到最後階段的時候。“我猜想，胡錦濤覺得要是有意問題，也要等習近平接棒了再有意問題才好。”

在胡錦濤領導下，雖然政治民主這一項沒有太大的發展，但在經濟上則跨出大步。張信對《明鏡》表示，中國現在最大的目標，表向上看是單單發展經濟，但中國真正的目的不止於此。“發展經濟只是基本，中國還希望經濟發展後，能讓國際地位也跟著提升。中國幾千年來把政治大國當成一種理想，這與中國講的‘統一’是聯結在一起的，中國政府很少問自己：為什麼要統一，但總認為統一是千秋大業。他們也知道，必須有強大的基礎才能統一、成為政治大國。”

而在中國朝大國目標邁進時，國際上正好出現一個契機，那便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正好處於下降時期。張信指出，全球化的一個有趣現象，同時也是個頭疼的問題，就是本來國際上所發生的事，很多是一對一，例如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一個共同體對一個共同體，但進入國際化的局面後，所有遊戲規則都改變了，不再是一對一，你不知道到底是在跟誰競爭，而且最後的贏家還不得而知。

張信對《明鏡》表示，目前來說，中國、印度、拉丁美洲國家是贏家，但誰是最後的贏家還不知道，因此中國國家領導人相當注重如何把握、利用現在契機的問題，如此才能成為最後的贏家，在世界取得政治地位，也因此強調經濟發展。

胡錦濤讓中國休養生息

除了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外，胡錦濤也強調“和諧社會”。有評論稱，胡錦濤深知鄧小平用槍炮建立的政治平靜期已過去，任何突破性的行為，只可能得罪複雜的官僚階層、引爆積累的矛盾，因此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張信認為，胡錦濤的“和諧社會”較多從中國的社會情況出發，希望給社會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

“自從共產黨當政以來，中國一直提倡的是階級鬥爭。馬克斯提出共產主義，在理論中強調的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歷史必然性，如果馬克斯理論對人類社會有什麼貢獻的話，就是依據歐洲的歷史，提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假設，這個假設不完全準確，但作為假設存在有其意義：人類就是通過不斷修正假設來瞭解社會。”

張信對《明鏡》進一步說明，之後列寧在馬克斯的假設中加入階級鬥爭的概念，變成一種行為準則，到了斯大林時，則演變為“如果不能自然走向共產主義，就應該通過階級鬥爭的手段造一個共產主義”，使得整個社會變成以破壞、壓制、消滅為主，走向一個對抗性的局面，到了鄧小平時期仍是如此。江澤民時期，這種情況好一些，胡錦濤上台後，感到社會有休養生息的必要，因為從前的中國社會都是在休養生息後才獲得穩定發展的機會。“雖然不見得是一個很大的作為或突破，但提出‘和諧社會’仍可說是胡錦濤的一種貢獻。”

張信表示，相對於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雖然也不是一個創新的理論，但能從一個中國領導人的嘴裡說出一些嘗試性的概念，並讓中共和政府當作普遍公理來接受，仍是很大的貢獻，“至於胡錦濤的貢獻，就是沒有做特別大的事情，但也沒有犯什麼錯誤。”

在胡錦濤下台前，提升國際地位與“和諧社會”的理念都將延續，而另一項胡錦濤能做的，張信認為，就是交出軍委主席的棒子。“如果胡錦濤要退下來的話，應該所有一起退，十八大後，他不應該再任軍委主席。鄧小平讓位給江澤民，與江澤民讓位給胡錦濤有很大的差別，鄧小平是虛退實不退，江澤民是實退，因為江澤民開了先例，所以胡錦濤估計也會實退。”

張信對《明鏡》說，如今的中國政府是個相對弱的政府，這種情況反而在經濟發展上有利。“一個國家越是發展成一個弱政府、沒有一個強權人士，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越容易，現在的中國更需要一個弱政府，否則對中國經濟發展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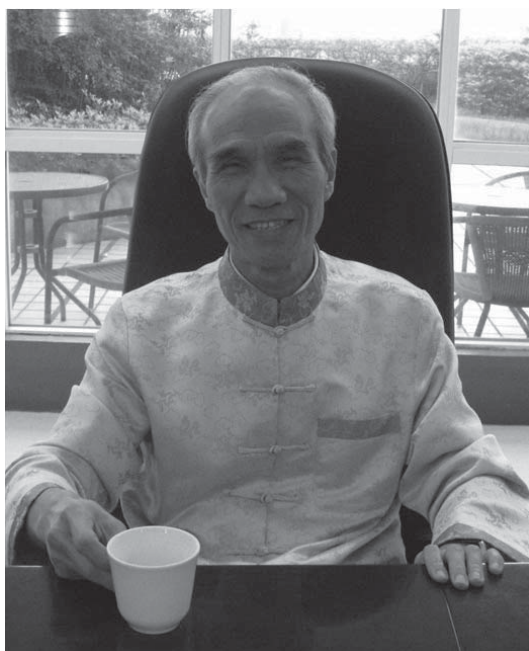
中共接班人體制有長處

兩岸關係雖然自馬英九上台後逐漸熱絡，但仍存在不確定因素，其中，領導人風格是關鍵。中共領導人臨屆改朝換代之際，未來的兩岸關係是否會因習近平的接棒而有所改變？台灣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楊開煌認為，外界在探討這個議題時，應該與時俱進地去看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遷，中共的對台政策，與習近平是否為“知台派”無關。

習近平 VS 兩岸關係

習近平接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後，台灣媒體曾廣泛報導習近平的妻舅居住於台灣嘉義，拉近了習近平與台灣的關係；台灣國家安全局長蔡得勝指出，從習近平過去與台商接觸的經驗中，可以確定與其他的中共政治人物相比，習近平是位“知台派”，但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是民族主義者，所以只要涉及主權、領土等問題時，習近平也不會有所退讓。不過，也有評論認為，習近平剛上台之際，權力還不穩固，無暇顧及台灣，反而給了台灣發展的空間。

雖然各方關注習近平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但楊開煌提醒，有許多評論並未深入瞭解中國目前的接班人制度。實際上，習



楊開煌（記者柯宇倩攝）

近平是否為“知台派”、是否為民族主義者，與他推出的對台政策都沒有關係。因為中共的對台政策是繼承自鄧小平以來的政策，並經過反覆協商，綱領非常明確。

楊開煌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尤其是台灣人在看問題時，比較容易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其實中共在處理接班人時，有自己的一套模式，他們不像奧巴

馬、馬英九是選上來的，在當選前沒有在中央長期與同僚共事的經歷，但中共的接班人會有五年的時間在中央，並在這段期間瞭解各個部門的運作與行事標準，除習近平、李克強外，李源潮、汪洋等未來可能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都能利用至少五年的共事時間相互磨合。

“我認為中共中央的接班人制度在繼承政策、理解官僚文化方面有其長處，比外面選舉上來的領導人強得多。”楊開煌表示：“所以胡錦濤在接江澤民的棒子時，雖然外面有很多傳言，但至少在政策的延續上可說是無縫接軌。”

習近平若順利接任國家主席，依慣例將兼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回顧過去，習近平曾在福建工作17年，擁有豐富的地方經驗，從福建寧德市市委書記一路做到福建省長，在福建的這段期間，被各方視為習近平全面掌握台灣情勢的時間點。但楊開煌指出，若從當時的政治環境來看，他最

關心的不是對台工作，而是如何做好福建的建設，甚至關心自己如何升遷，因此不存在習近平是否為“知台派”的問題。

其次，楊開煌表示，習近平上台後，如果他認為胡錦濤擔任總書記以來的對台工作是有績效的、長遠來說對統一工作是正面的，他當然會延續胡錦濤的政策，這樣的情況與胡錦濤接江澤民棒子時不同，當時兩岸關係非常緊張，許多政策無法延續，否則對中國大陸來說，和平統一的大業就會受到損傷，因此胡錦濤肯定要予以修改。“所以應該從中共對台政策的延續性、有效性、合法性這三個角度去分析。”

由於媒體普遍流傳“習近平非胡錦濤最屬意的人選”，因此政策是否真能良好延續？楊開煌舉例：“王滬寧是江澤民從上海帶去的，他現在輔佐胡錦濤不是輔佐得好好的嗎？所以外界沒有與時俱進地去看待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遷。”

習上任兩、三年可望見政改明確措施

30年前，鄧小平預見“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深入不下去。”如今中國正處在這樣的改革關頭。不只溫家寶倡政改，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王民大使近日也在聯合國明白表示，中國清楚地認識到，不僅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還要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國政、經走向，自然是各方熱議的話題。楊開煌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已經有自己的邏輯跟規模，主要倚重智庫、專家，做出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的決策，而未來習近平主要掌管黨、政、軍，李克強主要掌管經濟，有助於將個人自己的專長用在領導崗位上。

“習近平在福建、浙江、上海都有全面掌握地方事務的經驗，所以他對經濟事務也並非完全不瞭解，相信習近平會在方

向上有所拿捏，具體上，李克強應該有執行能力。”楊開煌說。

至於政治改革，楊開煌相信中共高層已認識到經濟發展至今，原來能發揮作用的政治體制，已或多或少變成今日經濟再發展、轉型、調整的制約，因而被逼著不得不在政治體制上做調整，只是，調整的方向或許不會符合外界期待的、如西方三權分立的形式。

“我認為，大陸會從中國文化、馬列主義出發，考慮現實情況，從世情、國情、黨情中，找到一個比較平穩的改革路線。”楊開煌表示，目前看來，黨內的民主應該會先行，有了基礎後，再一步一步朝政治改革的方向做，溫家寶最近多次呼籲政改，便可視為中共內部出現焦慮感。因此楊開煌認為，習近平在全面掌握權力、瞭解情況後，或許在就任後兩、三年，便會在政改方面有比較明確的措施，例如將黨政分開。“只要鄧小平在80年的文章中說過的，今後都有可能逐步去實施。”

溫家寶最近談的政改中，“限權”是一處亮點。媒體分析，中共領導層認為鄧小平當年批評“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但也不能再以“分權”、“放權”的方式進行改革，因此應從“限權”入手。楊開煌認為，中共在“限權”方面已經做了很多，朱鎔基提出的“審批權透明化”已是“限權”的一種，現在中國大陸比較缺乏的是更公正、更客觀的監督機制，因為目前的問題是越到地方，制度的落實越差。“大陸的政改，要看總書記或領導人的執行決心和技巧外，還有落實的程度。中央有九個常委，權力基本不會太過膨脹，所以大陸的政改重點是地方有沒有落實，如果地方切實按照中共中央發佈的文件做，就不會有問題。目前看來，省這一級已經做好了整頓，問題是縣、鄉的層級恐怕問題還很嚴重。”

集體領導制度是權力和平轉移關鍵

外間在看待即將接班的中國第五代領導人時，多半抱持正面的評價，認為第五代學歷高、有自己的獨立政治見解。楊開煌對未來中國領導人的評價也是樂觀的，他指出，第五代和第四代、第三代領導人比較大的差別在於，不論是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薄熙來，學歷都相當完整，是更加屬於知識份子的一群人，可以預見未來將是知識份子治國。

此外，第四代領導人是進到領導班子後，才開始與國外有所接觸，但第五代的眼界要比第四代來得寬廣。第五代還沒正式接班，就已開始頻頻出國，在自己國內的崗位上也不斷與外國人接觸，因此他們對國際事務的瞭解可能比第四代更早、更成熟，使得第五代領導人在與世界溝通、全球化等各個面向上，都會更活躍、更具彈性。

而從習近平接班的模式來看，中共的“由現任領導人任命隔代接班人”與“權力和平轉移”的模式或已漸漸穩定。鄧小平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時確立了胡錦濤為江澤民的接班人，開啟“由現任領導人任命隔代接班人”的作法，中共十七大時，據傳江澤民提了習近平為胡錦濤的接班人，讓習近平快速“三級跳”。而自江澤民交班給胡錦濤後，或也開始進入權力和平交替的時代。

“中國這種接班歷程：從指定接班人、透過內部小圈圈選舉來得到菁英的支持、自中央政治局就開始共事、相互磨合，一直到正式接班的模式，是中國政治上一個獨有的特色。”不過，楊開煌認為，目前的中共權力交接，還不能說形成了制度，因為一個制度的“制度化”要經過好幾十年的時間，且制度化的定義就是他人不敢破壞，若破壞就要付出高代價。但現在已經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的權力轉移從 1990 年開始，已經慢慢出現三個可喜的跡象。

第一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規定任何一位幹部，不管位階多高，都不得終身任職。這個規定看起來或許稀鬆平常，但對中國大陸這樣的政治結構來說，卻是一個相當重大的改變。

第二是權力和平轉移，2002 年，江澤民將權力和平交給胡錦濤，如果 2012 年的權力交接也和平進行，那麼以後的中國幹部應該都不會破壞這個規矩，除非外在環境有了極特殊的變化。

第三是集體領導制度的建立，中共的權力之所以能和平轉移，不像過去出現劇烈的鬥爭，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是鄧小平在 1991 年建立的集體領導制度。楊開煌表示，在此之前，總書記一個人掌握大權，因此大家都在爭奪總書記這個位置，現在的權力則是分配到九個人手中。“以前我們看到，雖然喬石和江澤民、李瑞環和江澤民有矛盾，但最後都沒有構成領導班子之間的決裂，因為每個人分管一塊，就是到了那樣的位置，權力也多不了多少，鬥爭容易緩和下來。”

因此，最艱難的挑戰不是在於如何取得更大的權力，而是在於九個人如何合作、同舟共濟。楊開煌說，歷史上來看，這點一直是個考驗。

習近平入上海成出頭因素

習近平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少分析圍繞在“習近平非胡錦濤最屬意人選”上，雖然據傳中共十七大時，江澤民提了習近平為胡錦濤的接班人，但楊開煌認為，“欽定”接班人的時代已經結束，江澤民畢竟不是鄧小平，習近平的接班是中共中央委員在 2007 年 6 月一個小範圍投票的結果。

不過習近平能出線，有分析認為是中共黨內權力平衡的跡

象，雖然“上海幫”在陳良宇案與黃菊逝世後勢力消退，但江澤民仍有影響力，“太子黨”也不希望見到“團派”勢力坐大，因此習近平更能被其他派系所接受。

楊開煌首先指出，外界經常討論的中共派系鬥爭，在他看來並沒有如外間描述得那樣繪聲繪影。他解釋，成立共青團的目的，本來就是吸收青年中比較積極者，並源源不斷向黨輸送幹部，所謂的團派與上海幫、太子幫不一樣，後兩者有特定的身份去劃分，不論如何，三者的身份都可以重疊，某個人既可以是“太子”，也可以是上海幫跟團派。“現在講的派別只是出生背景比較靠近哪一方，而不是權力鬥爭意義裡的派系。”

因此習近平能出線，楊開煌認為，靠得主要還是他自身的優點。“第一，他是高幹第二代，在大陸，這個條件會讓他站在有利的起跑點上，但符合這個條件的還有薄熙來和俞正聲，所以習近平還有其他優勢。”

楊開煌補充，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對胡耀邦有恩，大家若感念胡耀邦，就會想到習仲勛，且習仲勛因為《劉志丹》小說事件遭受迫害，有將近 20 年時間被冷凍，改革開放後在廣東任職時，交出漂亮成績，廣東能有今日的發展，與習仲勛有想當大的關係，在父親的種種經歷下，習近平自然受到“愛屋及烏”的關照。

但光靠上一代的光環當然不夠，楊開煌指出，習近平從基層上來，和別的含著金湯匙的高幹第二代不一樣，由於在基層工作，習近平擁有豐富的地方閱歷，且相對而言，習近平比較苦幹實幹。“尤其是他這樣受迫害的人，養成他在作風上相對內斂，對人家比較誠懇、寬厚，在高幹子弟圈裡得罪的人比較少，是少數有學歷、沒有傲氣的高幹第二代。”

此外，有心向學也是習近平的優點之一。“他之後擔任地方要職時，還回到清華人文社會科學院去補學分，拿一個博士，

一方面從政，一方面向學。”楊開煌表示，一個從基層幹起的人能進入清華大學理工科，可見此人的用功。

最後，除了實力外，也要靠機運。楊開煌指出，習近平最大的優勢，或許就是胡錦濤將他從浙江提拔到上海，這才使得他開始受到大家重視。“我想如果他繼續留在浙江，江澤民也不會去注意到他。”

中國經歷兩次“三頭政治” 變“個人獨裁”

被稱為“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落幕。在過去的35年間，社會曾經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批判反思，然而，隨著集體記憶的模糊，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形象也逐漸淡化，甚至興起“平反文革”的呼聲。著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在接受《明鏡》專訪時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從“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的過程，雖然中國如今出現的讚譽文革言論，某程度上是社會多元的表現，但文革一套無法解決今天中國的問題，中國唯一的出路是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嚴家祺為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前所長，1989年六四後被中共列為“知識分子的頭號通緝犯”，與妻子高舉流亡海外，曾任總部設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主席、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現居美國，與高舉合著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另著《首腦論》、《霸權論》、《普遍進化論》（明鏡出版社）等多部著作。

中國經歷兩次“三頭政治”變“個人獨裁”的過程

1981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嚴家祺（嚴家祺提供）

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儘管官方對文化大革命有了定論，社會也普遍進行了反思，但1989年後，

反思聲音一度中斷，其後，文化大革命逐漸以另一種面貌在社會中出現。

2007年，薄熙來入主重慶，相繼推出“十大民生工程”、“唱、讀、講、傳”等政策。雖然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獲得許多掌聲，卻也招來不少非議，尤其是“唱紅打黑”一項，被批評是“鞏固集權”、“搞文革大革命”的作法，不過薄熙來已斥責此為無稽之談。

重慶之外，以“烏有之鄉”為首的左派網站極力鼓吹文化大革命，指人們能自由辯論、集會，令社會呈現多元觀點，文化大革命也打破各種階級的界線、遏止了官員的腐敗，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民主試驗”。

但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強調，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確立個人獨裁的過程，與民主毫無關係。“毛澤東利用民眾反對共產黨各級官員‘特權’和‘官僚主義’的情緒，摧毀文化大革命前的共產黨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

嚴家祺對《明鏡》說明，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雖然也為專制政治，但屬於多頭專制政治，其中最重要的三頭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這樣的形式與個人專制獨裁仍有不同。“1949年後，中共名義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同羅馬共和國晚期有‘元老院’、‘任期制度’，中國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元老劉少奇、周恩來、其他政治局委員都很有權力，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形成的政體，在形式上與古代羅馬也有相似之處。嚴家祺解釋，古代羅馬共和國轉變為羅馬帝國時，經歷了兩次“三頭政治變成個人獨裁”的過程。羅馬共和國的“前三頭”為：凱撒、龐培、克拉蘇。公元前53年，克拉蘇在戰爭中死亡，凱撒進一步消滅龐培，建立了個人獨裁，但沒過多久，凱撒身亡；公元前43年，羅馬的“後三頭”出現：屋大維、安東尼、雷必達，接著，一人謀獨裁的歷史重演，公元前36年開始，屋大維相繼除掉雷必達與安東尼，確立屋大維的個人獨裁，羅馬帝國建立。

而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將“三頭政治”變成個人獨裁後不久，毛澤東去世，中國再度出現“三頭政治”的局面。由嚴家祺夫人高皋所著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明鏡出版社出版），便講述了80年代中國這段“後三頭政治”的歷史。嚴家祺對《明鏡》解釋“後三頭政治”權力並不是平衡分配的，鄧小平處主導地位，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前後，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下臺，鄧小平建立起個人專權，中國在1949年後經過這兩次“三頭政治變個人獨裁”的過程，造成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文化革命”是“紅色恐怖”時代

2010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曾專闢“對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基本分析”一章，指這場革命絕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講的本來意義上的文化革命，而是對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嚴重扭曲教育思想，產生的危害包括中國知識分子隊伍建設出現了長期空白、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拉得更大等。

然而，“烏有之鄉”等左派網站卻極力為文化大革命翻案，認為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能任意貼大字報、辦小報、進行思想辯論，還可自發地成立組織，大家充分享有言論與集會自由。

嚴家祺感嘆，今天的人看45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像1949年看45年前的清朝慈禧太后時的政治一樣，“年輕一代沒有實際感覺，以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就是民主。”

嚴家祺以實際例子說明為什麼文化大革命不具言論、集會自由等民主特質。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斯大林於1953年去世後，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引起莫洛托夫等人反對，赫魯曉夫把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黨集團”，獨攬大權。然而1964年，勃列日涅夫將赫魯曉夫趕下台，蘇聯的政治鬥爭給毛澤東敲響了警鐘。嚴家祺對《明鏡》表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開始懷疑中央委員會裡多數人不擁護他，懷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有一天也將奪取自己的權力，因此目標在文化大革命時打倒共產黨內的所謂“走資派”，堅持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1968年10月份召開的中國共產黨8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是9大換屆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嚴家祺解釋，8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有71%的人被定位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份子、反黨份子，雖然“被打倒的人”如果參加8屆十二中全會，仍舊有資格投票反對毛澤東，像譚震林曾說“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但中央委員譚震林就不被允許參加，

最終只有 40 名中央委員被許可參加這次全會。如果嚴格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即讓當時受到批鬥的全部中央委員都前來參加 8 屆 12 中全會，並按黨章規定在會上發表意見，那可以肯定，毛澤東、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將占少數。因此毛澤東決定增補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等人為中央委員，使全會達到“法定多數”。

同時，被擴大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解放軍各大軍區負責人等有 74 人，占會議全體到會人員總數 133 人的 57 % 以上。會議在“分組會”上，就批判“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批判所謂“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堵住他們的嘴。這次會議決定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當時只有陳少敏一人始終沒有表態，投票時扒在桌子上也不舉手。就這樣，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摧毀了集體領導，將劉少奇打倒，周恩來的權力也大大削弱，使得三頭政治變成毛澤東的一人獨裁。

嚴家祺對《明鏡》表示，中國共產黨 8 屆十二中全會說明，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全國紅衛兵運動、沒有全國的紅海洋、沒有全國對“紅太陽”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無法在中央全會上剝奪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等中央委員的發言權，他們肯定不認為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就可能有 71 % 的人會不完全贊同毛澤東。他發動群眾、利用“個人崇拜”和紅衛兵運動的方式癱瘓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體制。

“到了 9 大，毛澤東個人獨裁的體制正式建立起來，無論是林彪還是周恩來，都不可能和毛澤東持不同意見。在毛澤東把陳伯達趕下台後，林彪想到要輪到他了，非常害怕，最後

造成了 913 事件。”嚴家祺對說。

因此，嚴家祺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紅色恐怖”時代，完全與“民主”無關，“儘管可以出版各種小報，實際上是在高度控制下進行的。”任何編印攻擊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的小報、出版物的人都立即逮捕，從“聯動”、伊林·滌西、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楊曦光到寫《出身論》的遇羅克，都被投入監獄。而雖然有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造反組織”，可任意集會，但都是在全國對“紅太陽”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大環境”中進行的。在“文革”中，即使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任何“全國性組織”一經成立，立即取締。“紅色恐怖”不僅隨意把“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拉去批鬥，而且千百萬戶被隨意抄家。在 1968 到 1970 年間，同時“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兩大組織”，從“文鬥”發展到大規模的“武鬥”。

包容比民主還重要，互相包容，民主才能成長起來

廣東汕頭創辦文革博物館的前常務副市長彭啟安在《明報》的報導中指出，年輕人在未經歷和不瞭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下，對文化大革命出現糊塗的認識，如今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在中國尚未消除，“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思維方式仍延續至今。

儘管嚴家祺認為文化大革命時的個人獨裁，在中國已經沒有產生的條件，但文化大革命的土壤確實仍舊存在。“中國從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直走到今天，經濟社會狀況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嚴家祺對《明鏡》解釋，毛澤東時期共產黨的幹部有些特權，但與今天相比，非常有限，可是現在的幹部都已不是“特權”的問題，而是“普遍的權錢交易”、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官員貪污腐敗空前，在中國經濟高度發展

的同時，老百姓也感覺到社會的不公正與分配不均，並且對腐敗憤怒。

嚴家祺對《明鏡》指出，與“文革”時代相比，“向錢看”是中國的一大進步。羅馬帝國和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是“地中海文明”時代。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進入“大西洋文明”時代。這都是“對外貿易”發展和“向錢看”的時代。嚴家祺研究古代羅馬史和文藝復興史，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在專制政治下，財富帶來腐敗。羅馬帝國和文藝復興時代，既有光輝燦爛的一面，也是政治黑暗和空前腐敗的時代。今日中國進入了“太平洋時代”，貿易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而在沒有民主和法治的情況下，財富帶來腐敗，巨大財富帶來巨大腐敗。消除腐敗的關鍵是，必須把政治權力與獲取財富分開，民主政治就是限制政治權力的政治。現在不是古代和中世紀，那時代腐敗可以持續幾個世紀，在全球化的今天，嚴重的腐敗是無法持續的。

在沒有民主、法治的情況下，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最習慣、最能夠接受，也最容易做起來的方式，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嚴家祺對《明鏡》舉例，薄熙來在重慶提倡“唱紅”後，老百姓很容易就唱起紅歌，“紅歌”中許多是“老歌”，“老一代”許多人喜歡唱“老歌”。許多人唱“紅歌”也是對當前腐敗的憤恨。但用群眾運動方式去反腐敗，只會走上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老路上去。中國仍然有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

如今，在社會對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逐漸淡忘之際，“烏有之鄉”等左派言論讚揚文化大革命，使得文化大革命似乎被美化了。嚴家祺認為，從全國來說，文化大革命不可能被美化，它仍舊是一場災難，這場災難造成了後來的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不只是一般人民的災難，共產黨大部分高幹、中央委員也受了很多難，使得共產黨內有‘反對個人獨裁、廢除終身制’的共識，因此改革開放可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果，它

是文化大革命的反作用。”

雖然官方對文化大革命已定調，但並未如同禁止《零八憲章》言論般，也禁止“烏有之鄉”等網站的言論。嚴家祺對《明鏡》指出，共產黨向來不好禁止左派言論，雖然中國確實有必要進行“非毛化”，但如今毛澤東沒有科學地、全面地被評價，毛澤東的像還掛在天安門，因此無法禁止打著毛澤東旗號的言論，不過，引用毛澤東的言論也是表達社會不滿的一種方式。

嚴家祺進一步解釋，反對派分為右翼反對派與左翼反對派兩種，雖然“烏有之鄉”還沒成為真正的左翼反對派，但已經有挑戰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意圖在內，他們不贊成今天的兩極分化、懷念毛澤東時期的平等與公有制，雖然社會不可能恢復到毛時代的樣子，但如果“烏有之鄉”繼續發展下去，部分人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的左翼反對派。

因此，嚴家祺也不認為“烏有之鄉”等網站的言論只帶來負面效果。“儘管我不認同他們，但他們有權利發表自己的言論，而烏有之鄉的言論能在中國共產黨內傳播，也不是壞事，對於攪動胡錦濤所造成的‘一潭死水政治’有好處，共產黨內存在各種派系，是中國社會未來必然走向多元化的起點。”

嚴家祺對《明鏡》解釋，社會擁有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包括反對意見，政治多元化了，中國才可能進步。包容比民主還重要，互相包容，民主才能成長起來。當然，毛澤東的某些言論，好像表面上起到了作用，但實際上完全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式，中國唯一的出路還是走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

中國政府的角色已改變

“經濟發展已經不夠維持社會穩定，因此要搞好社會保障和政府控制。”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鄭宇碩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央黨校提出強化社會管理的8項措施，可看出目前中國的政府一方面朝服務型政府轉型，另一方面加強維穩條件，胡錦濤提出有別於之前科學發展觀的觀點，顯示出往後政府想維持社會穩定，不能只靠經濟發展。

鄭宇碩為香港公民黨前秘書長，曾任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及非全職顧問，創辦《香港社會科學學報》、《比較亞洲發展期刊》，同時為香港亞洲研究學會創會會長，已出版逾160篇中、英論文。

光靠經濟發展已不夠

中國社會變遷快速，領導幹部的治理方式也要有所改變。胡錦濤2月19日於中央黨校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提出8大要項，要求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與公共安全體系、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以及



鄭宇碩（資料圖片）

健全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制。

除了公共服務外，胡錦濤也在管控方面多有著墨。他要求幹部加強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信息網絡管理，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並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鄭宇碩在接受《明鏡》採訪時指出，胡錦濤的講話可看出中國政府的角色已經有所改變。“現在國內相當強調政府必須是服務型的政府，政府應該把主要職責放在提供公共服務、重視群眾權益上，因此胡錦濤強調 8 項措施，同時也是強調政府角色的改變。”

但另一方面，胡錦濤的言論也透露當局維持公共安全的決心。“中央政府相當強調維穩思路，這點可以從講話裡看出。雖然提出小政府、大社會，但政府仍維持黨領導的狀態、控制網路，因為中央認為社會管理的好，就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同時強調民生問題，也能穩定民心。”鄭宇碩對《明鏡》說。

鄭宇碩表示，要維持社會穩定有三個元素，第一個元素就是經濟發展。然而中國在創下經濟奇蹟、長期經濟高增長後，不少分析指出中國不可能永遠維持如此高的增長率，經濟成長的速度將慢下來。從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人大會議上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可看出，目前中國政府強調的是加快經濟發展

方式的轉變、調整經濟結構，而非追求 GDP 的高增長率。

“由於經濟發展是維穩的方式之一，所以之前非常強調保 8、保就業，但中央現在明白，單靠經濟發展已經不夠維持社會穩定、保持黨的權利壟斷。”鄭宇碩對《明鏡》表示，經濟的影響力減弱後，就必須強化其他的維穩方法。

“中央維持社會穩定的第二個因素，就是建立社會保障網。”鄭宇碩表示，溫家寶在建立社會保障網路上投注相當大的心力，從一開始的義務教育，到近幾年的醫療改革，乃至最近開始的穩定房價、強力支持保障房等措施，都可看出中央完善社會保障的努力。

“第三個維穩因素，是在沒有民主的前提下，搞好政府管制。”因此，鄭宇碩指出，在經濟發展已經不足以維持社會穩定的情況下，中央就必須加強另外兩點因素，胡錦濤選擇在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政府服務與管理，不是沒有原因。

胡錦濤曾在 2003 年提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此觀點在中共第 17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寫入黨章。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胡錦濤指出，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持平穩較快的經濟發展勢頭，並且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

2008 年，胡錦濤同樣出席了中央黨校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並闡述實踐科學發展觀；雖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觀點延續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核心，但鄭宇碩認為兩者仍有相異處。

“科學發展觀主要強調調整經濟發展的思路，但現在維穩的需要不同了，不能只強調經濟。”鄭宇碩對《明鏡》說。

危機仍可能爆發

胡錦濤發表講話的同時，正是中國網民受突尼西亞和埃及等中東國家影響，發起“中國茉莉花行動”之際，雖然中國官方文件與官媒的中文稿對此事不提，但胡錦濤提出加強治理社會矛盾源頭與完善信息網絡管理等要求，似乎是為了因應“中國茉莉花行動”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強調政府的執政力度。

“中國領導層一向抱持堅定的維穩心態，他們也明白，一黨專政的情況下，社會上積累了一定的不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官員腐敗日益嚴重，當然，茉莉花行動可能也是胡錦濤講話的重要影響因素。”鄭宇碩對《明鏡》表示。

中國老百姓的不滿反映在統計數字上。中國從1993年到2007年間，群體性事件已由1萬起增加到8萬起，一項調查顯示，從2008年到2010年，此類事件數量每年平均約增長20%。中國近年每年發生10萬起以上的群體性事件，2010年平均每5日就發生一宗較大的危機輿情事件。

“中國今年（2011年）的維穩預算首次超過軍費，況且還有很多隱蔽性的維穩開支沒有公佈，例如幫助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其實也是出於維穩的考量。”鄭宇碩對《明鏡》說，維穩經費在未考慮隱藏性開支時就已經比國防預算多，更可看出這筆經費的龐大。

而目前由於中國百姓仍對未來抱持希望，社會或許還不致於出大亂子。鄭宇碩表示，中國過去30年改革開放下，大部分老百姓覺得生活水平提升了，因此對未來仍然抱持樂觀態度，認為生活水平還會持續改善，自然比較接受現狀。“老百姓也不願意和中央政府對抗，否則代價會非常高，所以目前表面上還是可以維持穩定。”

“況且胡錦濤的講話也傳達一個訊息：只要不挑戰共產黨對經濟權力的壟斷，政府還是希望儘量維護人民權益，願意

多關注社會公平、公正問題。”鄭宇碩對《明鏡》補充。

然而鄭宇碩認為，要是民眾見不到經濟發展的明顯成果，期望落空，社會問題還是會爆發。“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沒有民主、沒有監督、政策沒有確實執行，很難達到社會公平、公正的目標。現在大家反而都看到權貴資本主義的現象，有錢人憑藉權力、貪污致富，而非憑藉真本領致富。所以一旦經濟發展遇到瓶頸，危機就會出現。”

習近平第二任時才可能推改革

而目前還未看見政府展現政治改革的決心。分析指出，沒有政治改革，就無法保證民生問題能得到解決，因為任何民生問題都離不開政治。然而本屆的兩會裡，民生為重頭戲，政治改革不見蹤影。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更是強調，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他更警告，如果政治方向出現動搖，“國家可能陷入內亂深淵”。

雖然溫家寶在 2010 年曾強調政改的重要性，但鄭宇碩對《明鏡》表示，中央視社會穩定為重心的結果，代表至少在胡錦濤任內，政府都不可能推動任何政治改革。“可以看看過去 10 多年，有哪些是真正的民主改革？都只是一些行政改革。”

“現在的問題，第一，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放棄對權力的壟斷，政府不接受制衡，第二，不管溫家寶怎樣提，既得利益群體都太大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推動真正的政治改革。”鄭宇碩說。

即使是習近平接班後，也不會馬上見到變革。“就算習近平真正想推動改革，起初幾年也不容易。雖然當上總書記，但中央軍委主席能不能接過來還不知道，因為江澤民開了一個很

壞的先例，即使一開始就接上中央軍委主席，也需要一點時間做中央人事的安排，才有基礎推動改革。因此大概要等到第二任的時候，習近平才有實力去推動。”鄭宇碩對《明鏡》說。

中國派系界線已顯得模糊

中國的社會主義集權體制，經過多年發展後，轉化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韌性威權”制，雖然目前中國內部多有矛盾，但這套體制基本仍能持續運作，由於沒有強制中國領導層做出改變的事物或力量，美國知名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為，即將在 2012 年接班的新一代領導人，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作為。

中國接班人重治績

在權力繼承的過程中產生的對立與衝突，向來是危及政權穩定的因素，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外界紛紛關注中共內部的權位角逐與可能出現的局勢動盪，然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黎安友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指出，中國如今的派系界線比起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已顯得比較模糊，政權繼承人不再由領導者指定，派系政治的力量逐漸削弱，自鄧小平後，中共領導層的退休和繼承過程都已漸漸制度化，因此不致於出現危及政權的不穩定情況。

“中共整個權力交接的過程是漸進的、小心謹慎的，而且兩個重要的職職位已幾乎確定由習近平和李克強接任，雖然



黎安友（哥倫比亞大學）

剩下一些仍待決定的職位，但不應會由於其中的角逐而構成動盪的局勢。”黎安友說。

在派系界線模糊的情況下，一個人也不能只簡單被劃分為“保守派”或“改革派”，或者“上海幫”、“團派”或“太子黨”，如今決定中共內部政治升遷的理由，不再只是他人的照應，雖然對黨的忠誠度也很重要，但還得看

個人的成績與多種其他的因素。好比習近平，要說他是基於政治版圖定義的上海幫也好，或是在父輩照應之下的太子黨也好，但習近平會成為接班人，還因為自己的成績與公眾形象，習近平進入中國的頂尖大學，擁有跨利益黨派的支持，治績良好。

“今日的中國在提拔領導時，更看重的是他們的表現，以及其他幾個要項，比如他們是否有能力發展經濟、是否有能力維持社會和諧與穩定，是否有處理特權的能力等等。習近平在福建與浙江的形象佳，所以我想他們（中共）在找一個有良好公眾關係、有公關技巧和形象的人，並且能在國際間良好、強力地代表中國人。”黎安友說。

雖然中共遴選接班人的模式逐漸制度化，冒出頭的候選人也不再只因為派系力量而當選，但黎安友強調，這種模式不但不能幫助中國逐步走向民主，甚至離真正的民主制度還很遠。

“中共黨內不同的力量，讓中國政治的權力不光集中在北

京，而是分散到各個層面，派系角力在某方面來說，讓權力顯得較為分散，省級的領導和書記也都有很大的權力，但它仍不是個民主制度，沒有助於中國的民主。我也不覺得中共的和平交接模式對中國民主進程有所幫助，這個過程仍舊是一個由上而下的嚴密結構，仍是由一個小團體做出的決定、選擇自己的繼承人，離真正的民主還很遠。”黎安友表示。

中國的威權具韌性

中國的一黨專政，向來是支持民主者批評的體制，中國是否能一直保持一黨專政的制度，或一黨專政將如何發展，各方看法向來不一，有中國將逐漸轉型民主的論點，也有集權制將持續存在的說法。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袁易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中國雖然權力集中、經濟發展快速，但同時一黨專政的本質已經變化過很多回，並維持著相對的穩定，說明存在一種超穩定結構。

黎安友認為，中國的體制確實不斷在變化、調整，他以2003年時便提出的“韌性威權”（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一詞來說明中國的體制。

黎安友表示，在他做過的東亞八政體（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蒙古）抽樣調查中，他發現中國民眾對政府的經濟表現持肯定態度，也認為自己的體制比較民主，不過民眾也對腐敗、分配不均等問題感到不滿，但相對來說，民眾較少察覺到中央的腐敗，多半認為腐敗是地方的問題。

此外，大多數的中國民眾抱持“以和為貴”、“集體利益”等傳統的價值觀，而非“政治多元”、“公民責任”等民主的價值觀，由於中國老百姓對威權的敬畏、肯定威權能創造集體

利益，加上上述對腐敗的認知，都有助於中央繼續維持政權的穩定，也造就了中國的“韌性威權”。

因此，雖然有專家認為中國將走向市場開放、政治民主，但黎安友指出，中國的市場力量由政府所掌控，沒有跡象顯示有政治菁英願意改變，因此短期內不會出現全面市場化的情況，政治方面，在可預見的 10 或 15 年內，也沒有跡象顯示會變成一個民主制度。

“中國的本地菁英政治已逐漸穩定與系統化，這是中國特色的韌性威權的跡象。”黎安友表示，西方相信中國應該走政治改革的道路，但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應該走的是法治、和諧社會的道路。

“我相信中國的制度很具有韌性，可是它的內部也有很多的矛盾。”黎安友指出，“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永遠持續的”，因此，中國的制度也沒有強韌到能夠永遠存在。“我認為這個制度面臨了一些嚴重的挑戰，最終要改變的。”

第五代領導人或沒有大作為

只是目前來說，黎安友表示，由於中國的制度基本上現在還能持續運行，因此不只現在的領導人，他也不認為未來的領導人會著手改變中國的體制。“他們不去改變，因為沒有強制他們改變的事物或力量。”不過，中國的基本不變與穩定，某方面來說符合美國的利益。

黎安友認為，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與第五代領導人，整體來說沒有差很多，兩個群體都是工程師與實用主義者，都將發展經濟當成提升中國國家實力的方式。但在個人方面就顯現出了些許不同。“如果以習近平和胡錦濤相比，胡錦濤非常安靜，沒有太多的個性，習近平的個性就鮮明得多，比較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tic)。李克強與溫家寶比起來，是個技術專家，至今為止並未特別支持任何事，不像溫家寶，對政治改革等議題的態度相對來說比較自由、是個改革者。”

胡錦濤即將交棒，過去幾年來，胡錦濤的謹慎與內斂曾被批評為無所作為、逃避責任，不少人因此將希望放在習近平身上。黎安友指出，胡錦濤確實可以說小心謹慎，但小心謹慎或許是件好事，也不能說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政績。“實際上胡錦濤作為中國領導很成功，他成功和其他人一同讓中國度過金融危機、處理好台海問題與中美關係。”

只是，黎安友不期望習近平會有什麼大的作為。“習近平不太會改變基本的政策，仍然是目標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持續讓中國的經濟、軍事崛起，不會著手大的政治改革。”

黎安友解釋，政治改革的定義比較模糊，不論大小，都可稱為政治改革，在胡錦濤和溫家寶的任期內，實際上已見到小範圍的政治改革，比如死刑制度、強制上訴等法律上的改變，以及正在討論的戶口制度。“其實每年都在改變，但都不是體制上、方法上的變革，所以習近平接班後應該也是一樣，他會做些改變，但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只是，雖然中國的“韌性威權”仍可持續運行，但黎安友認為，中共組織內部不夠多元、民眾無法參與，恐讓選拔出來的領導人缺乏創造力，無法應付越來越複雜和全面的社會與國際挑戰。

在對外方針方面，黎安友認為，中共十八大後的中國外交方向基本上不會改變。“每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會為了因應新的挑戰而有所調整，中國會與世界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維持在經濟上相互依存的關係，但也要避免美國進行包圍中國的動作、避免日本再度武裝起來，同時處理朝鮮、台灣危機，所以中國基本的政策會持續。”

中國 2011 年以來與美國、日本等國的摩擦不斷，中國境內的國家主義情緒每每隨著事件的發生而高漲，高層的對外態度似乎也比過去更加強硬，有分析認為，中國的民意也是影響外交政策的一個因素。

黎安友指出，中共當局為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而努力的目標，不會改變，因此他不認為民眾的情緒會迫使當局採取特別的行動或反應。“所以通常我們問，這個政策是否更國家主義了，真正代表的，是政府是否更加順應民意，比如老百姓討厭日本，所以政府就對日本做出什麼舉動。但我認為中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一直拿捏著分寸，老百姓想說什麼，就讓他們去說，但真正的對外方針還是由政府掌控。”

實現民主，靠爭取還是靠讓步？

中國老百姓究竟渴求民主？“以暴治暴”是否可行？動搖中共專制統治是否越來越不可能？兩位海外著名思想家，圍繞“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進行了針鋒相對、旁徵博引的理性辯論

眼下的中國老百姓並不需要民主？2011年11月1日，《明鏡月刊》編輯部於紐約舉行了“蘆笛對話胡平”討論會，兩位海外著名思想家圍繞著“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這一主題進行針鋒相對的理性辯論，對中國的未來之路開啟了不同角度的思考。

“交戰”逾3小時仍難分勝負

向來甚少參加公開討論會的蘆笛，在《明鏡月刊》編輯部邀請下，趁著訪問紐約的機會再度與其他知識分子進行交流。此場討論會由明鏡集團董事長何頻主持，蘆笛與胡平除了說明自身對中國民主化的看法外，也對另一方的論點提出質疑。

會上雙方先禮後兵，待聽完對方觀點後，開始就中國社會是否需要民主、以暴治暴是否可行、革命是否必須、動搖中共專制統治是否越來越不可能、中國是否會稱霸全球等議題你

來我往，兩人均旁徵博引，援古證今，質疑對方、辯護自身，“交戰”逾3小時仍難分勝負，與會者則充分享受了一場思想饗宴。

1940年代末生於中國大陸的蘆笛，高中畢業適逢“文革”爆發，他學業中斷，上山下鄉，後返城進廠當工人，1977年高考恢復後考入大學，1980年代後期出國留學，獲博士學位後一直在海外科研機構工作。他自2000年開始活躍在中文網站上，其評論題材多元、看法精闢，許多人折服於他的論點，令他獲得海外“第一寫家”、“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文史作家之一”的稱號；2010年元月以來，明鏡出版社一連出版了蘆笛的《毛澤東與他的近臣和女人》、《國共偽造的歷史》、《百年蠢動》、《野蠻的俄羅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華夏文明解剖》等書。

但蘆笛的言論也引來眾多質疑聲浪，被視為近年海外最有爭議性的評論家之一。有人抨擊蘆笛“十分像是一個隱形在叛逆言論後面的中宣部便衣官員”，不過蘆笛倒認為這些都是外界的“標準反應”，他自嘲道：“自寫出《重釋“民主恩賜”論》之後，我就不勝榮幸地當上了特務，迄今（2011年）工齡已達十來年”。

參與對話的另一位學者胡平，所抱持觀點與蘆笛大不相同。蘆笛認為民主得靠統治者讓步，而身為《北京之春》主編的胡平，1978年投入民主牆運動，1980年參加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當選為北京大學海淀區人民代表，1988至1991年則擔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曾於《中國之春》《北京之春》主持筆政，向來積極傳播民主觀念，認為民主應通過爭取而來。

胡平與蘆笛對話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將自己搞到沒有後路，而老百姓在考慮到後果的情況下，不一定會上街抗議，這種情況若持續下去，中國並不會變得更好，只會越來越壞，因此除非出現一個巨大的轉折，才能讓中國有好起來的可能。

胡平曾在《犬儒病——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一文中提



何頻（記者柯宇倩攝）

到，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沈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繫。胡平接受《大事件》專訪時也曾表示，中國社會裡有公民意識的人也相當多，但因為他們感到無奈感到無力，知道局勢惡劣，覺得做任何事都是徒勞無益的，所以

採取迴避、不參與的態度，而他們的態度反過來構成體制維持的條件。

蘆笛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中國已經從一個一元化社會變成多元化社會，如今中國社會的自由度極大提高，因此也應該看社會巨大進步的一面，不能只看道德敗壞、統治者態度僵硬的一面。蘆笛表示：“不鬥爭社會一樣會進步。”

蘆笛也在會上進一步闡明其認為民主得靠統治者讓步的理由。2011年8月份《新史記》雜誌曾刊發蘆笛書面接受高伐林專訪《我的“哥白尼革命”》，指出“社會進步必須靠統治者的讓步才能實現，中國式鬥爭只能造成社會倒退，一部近現代史就是證明。我認為，這個發現，是社會學裡的‘哥白尼革命’，顛覆了一般共識。”文章一出引發廣泛迴響。

蘆笛在會上指出，中國一般觀念裡，社會進步都是鬥爭來的，但他認為社會進步和文明化的必要條件是統治者的讓步，

被動也好、主動也好，沒有讓步社會就不可能進步。如果鬥爭之下不讓步，無非兩種結局，一種是被推翻，一種是不垮台，前者製造出逆向篩選的環境，社會反而大倒退，後者會造成統治者加強鎮壓，原來想改革的也不敢改革了。

蘆笛另質疑“民主是普世價值”的說法，他指出，中國老百姓對民主或許沒那麼大的

興趣，因此民主是否一定在中國實現，是需要審視的問題，如果中國老百姓對民主沒有需求，至少應該推動中國的文明，文明化才是中國現在最主要的問題。

胡平則認為，中國人對民主的需要很高，再說，就算不高也沒關係。因為鼓吹民主，原本就是希望更多人有參與民主的意願。很多人倒是關心一旦政治開放，參與的人太多，參與爆炸，反而會很麻煩。中國離民主，說近也近，說遠也遠。要是抗爭的人太少，都等著上面自己變，那就離民主越來越遠。就此而言，胡平對中國短期的未來不感樂觀，預測還可能還會進一步惡化。

《明鏡月刊》記者旁聽了對話，根據錄音整理出對話初稿，又先後交給兩位對話者進行適度訂正和補充，所以此稿並非完全現場實錄。特此說明。



胡平（記者柯宇倩攝）

中國需不需要民主？

何頻（主持人）：最近人們說，當今世界，出現了“新文明四大古國”：古巴、北韓、伊朗、中國，只有這四國仍封鎖 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網站，連緬甸都開放了。也就是說，這四個國家是最著名的沒民主缺自由的國家。中國要不要民主，這個問題不需要討論，因為民主是一個國家文明或野蠻最基本的標誌，但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民主是否有品質，眾說紛紜。蘆笛之所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因為不少人都認為民主是爭取來的，但蘆笛認為民主需靠統治者的讓步，才能避免暴力革命又一次發生，蘆笛將此稱作“哥白尼革命”。

他的觀察似乎是，中國社會矛盾為什麼這麼嚴重，與其說是貧富差距，不如說根子在民智沒有開放。問題是，民主何時恩賜？如果掌權者不願恩賜呢？

我們今天主要討論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先請蘆笛把你的“哥白尼革命”清楚闡述一下。

蘆笛：何頻剛才說沒必要討論“中國要不要民主”，但我覺得這就是第一個問題：中國老百姓有沒有民主需求？民主是不是普世的？都不能當成定勢來說。什麼根據“歷史潮流”、“客觀發展規律”，“中國註定要民主”，用孫中山的話，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覺得沒這麼簡單。

第一，如果中國老百姓對民主沒興趣，該怎麼辦？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知識分子都要考慮這個問題。我覺得國內對民主的需求不如國外設想的那般強烈。我去年（2010 年）回國兩個月，與不同層次的精英知識分子接觸過，覺得老百姓沒這個意願；雖然少數知識分子很有意願，但一般知識分子不像 80 年代對民主化那樣渴望。儘管我只是走馬看花，但好些跟我

通信的國內網友都有一致的看法：別看國內網上鬧得厲害，實際上他們周圍的人都對民主很淡漠。

所以，民主是否一定在中國實現，是需要審視的問題。

第二，民主如何在中國實現？我並非不希望中國民主，但如果中國老百姓對民主沒有需求時，咱們不如至少去推動中國文明化。文明化是中國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我也不認為民主是文明化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內容。最起碼的文明化是要有個規矩，不搞惡性競爭，不是誰拳頭大就是老大，而應該建立一個良性競爭的基礎。這未必只有在民主框架下才能做到，就算在民主框架下，也未必能做到這點。中華民國早期就是惡性競爭，越下流就越能勝出，越守規矩就越倒楣。所以中國現在需要的最起碼的改革，應該是創造一個比智力、比才幹、比貢獻、賞善罰惡的機制。

第三，民主需不需要訓政？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不同，就是因為其身為精英的知識分子，知道何時止步。彼此相爭，鬥到某種程度就妥協，接著按法律行事，所以英美首先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現在說“反對革命”沒什麼意思，因為這在中國是不可控的，到時候人民起來革命，你有什麼辦法？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前也反過革命，但反了有什麼用？最後他的預言都一一應驗了。

如果革命真要來，不會因為我寫了文章就不來。社會發展是精英決定的，老百姓只是愚民，我希望中國知識分子逐漸成熟、理性、有信仰，形成一個精英階層，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像英美一樣，把西方最可貴的經驗拿過來，尊重彼此的基本權益，不要趕盡殺絕。很明顯，暴力革命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但形成這樣一個理性的精英階層，又幾乎做不到，所以我對此感到悲觀。

因此，是否需要訓政？今天老百姓什麼爛事都會幹，一場

革命後，會不會所有的人都變成聖人、都守法不鬧事，自動學會民主國家的操作程序？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所以中國需要訓政，但這又形成一個悖論：一方面需要統治者利用行政權威，訓練老百姓學會這種操作；但另一方面中國統治者又絕對不願意這麼做。一旦將來真發生社會制度的變化，這些沒經過訓練的民眾會是一個災難。原來是靠槍桿子鎮壓，現在壓力一去除，就像高壓鍋一樣，馬上爆到天上去了。

訓政要成功，唯一方式是讓美軍佔領——日本、德國原來都是專制國家，經過美國大公無私的訓練，給改造過來了。但這在中國顯然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訓練就搞民主革命，只會換湯不換藥。如果要訓政，誰來訓？這就是我個人解決不了的疑難，想請在座的高明指點。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民主革命來臨，假設“茉莉花”開遍全中國，共產黨乖乖下台，軍權交出，屆時中國會自動進入民主社會嗎？我認為不會——民國已經演示過一次了，反而會製造出一個龐大的逆向篩選場，淘汰優秀人士，最後比的是誰的良心更黑。袁世凱不如孫中山黑，所以抗不住；段祺瑞等北洋軍閥都沒有南方軍閥黑，所以蔣介石崛起了——動亂和暴力革命起到的就是這樣的作用，這也是中國最要避免的問題。

胡平：蘆笛說的問題，有些關係不大，比如中國有多少人具有民主需求，其實人不多也沒關係，不少轉型國家倒是更擔心，一旦民主了會出現“參與爆炸”——熱情投入的人太多，反而引出一些麻煩。看一個超級女聲比賽就知道，許多人那麼熱情投入，其實，哪個歌手評上超女，粉絲們又能得到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但他們就是想參與、想表達，可見一般人的參與願望表達願望有多強。如果真的搞起選舉，你可以把自己中意的人選上台，可以把自己反對的人拉下馬，可以制定出符合自己理想的政策，那該會激起中國人多大的熱情。可以想見，到那時，

人們會成立一大堆組織、舉大旗頭上纏布條掃街拜票，各種方式齊上陣，會熱鬧得不得了。有些人原本不關心的也會被捲進來。

所以我相信，第一，中國老百姓對民主的需求還是很強的。何況，不強也沒關係。我們倡導民主，本來就是希望更多人有民主的意願。

第二，就算有些人沒有民主的意願也不妨礙。密爾（註：19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說過，把人的腳鐐砸開總是好事吧，哪怕他不想走路。

但你說的很多問題我們有同感，很多事情很困難。

民主是否由統治者恩賜？

蘆笛：說到“哥白尼革命”，我的命題是這樣：中國人的一般觀念是，社會進步都是鬥爭來的，但我認為社會進步和文明化的必要條件是統治者的讓步，被動也好、主動也好，沒有讓步社會就不可能進步。如果鬥爭之下不讓步，無非兩種結局，一種是被推翻，一種是不垮台——前者製造出逆向篩選的環境，社會反而大倒退，只要比較一下，是中共壞還是滿清壞，我想大家都能得出客觀的結論。這個倒退，就是大家不懂這個道理造成的；而後者會讓統治者加強鎮壓，原來想改革的也不敢改革了。

我不是說不能鬥爭，而是該像英美一樣進行理性的鬥爭。鬥爭的目的，不是把統治者鬥倒，而是求得他們讓步。如果他們本來就在讓步或準備讓步，那就不要得寸進尺。中國的問題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很賤，鐵腕專制下噤若寒蟬，大氣不敢出，等到統治者主動讓步了，好，膽子立刻大得不得了，要“吾以吾血建中華”了（柴玲語）。惹得統治者翻了臉，馬上跑得比

誰都快，把爛攤子扔下，讓跑不了的人去承擔。這種鬥爭，鬥一次社會倒退一次，拜託還是少鬥的好。

當然，理性鬥爭也需要統治者的配合。如果統治者不配合，進行理性鬥爭者如劉曉波，統治者都有本事抓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只好聽天由命。中共與歷代統治者不同之處在於：它用一種最邪惡的教義教育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什麼事都能幹。所以，與共產黨鬥，以為能智勝它、愚弄它，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千萬不要以為你比共產黨狡猾，千萬不要以為它不敢鎮壓，這世上沒什麼事是它做不出來或是不敢做的。如果指望一步棋就將死它，只會引起它的過度反應，讓民眾遭到血腥鎮壓。所以，統治者不恩賜、不讓步，只好等著，尤其是海外的人要明白：你去鼓動鬥爭，承擔後果的是國內的老百姓。

胡平：民主是不是要靠恩賜？一個社會如果能平穩轉型，肯定某種程度上來自統治者的讓步，或者是統治者主動推行改革，或者是壓力之下達成妥協，但也有一些專制統治者寧可魚死網破，要不輸光、要不全贏，你勸說他半天他也聽不進去。（蘆笛：對！）我們想“雙贏”，讓統治者也沒有太大損失，但有的人就不幹，他們就是想充分滿足自己的支配慾，明知有風險也要一意孤行——獨裁者就是這種心理。

說民主是爭取來的，當然也沒錯——“統治者讓步”這個命題可做一個寬泛的解釋，把任何東西都包括進來，讓命題站得住腳：哪怕革命把舊統治者推翻，也一樣可回到“統治者讓步”的命題上，因為革命者也成了統治者；如北美殖民地民眾把英國人打跑、自己掌權後，馬上制訂憲法限制自己；如果共產黨不會讓步，哪天民主黨推翻共產黨，變成了統治者，理論上他們會定規則限制自己權力、承認老百姓權利，所以革命革成了、實現自由民主——這一樣可以解釋成是“統治者讓步”。

統治集團重要的是最初靠什麼理想聚集在一起。意識形

態不完全是虛的東西，國民黨再可惡，畢竟一開始承認憲政基本原則，所以哪怕在戒嚴時期都不敢太狠，但共產黨一開始就不承認這些原則，到今天還宣佈幾個“不搞”，讓黨內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處在非法狀態。民國初期，北洋軍閥雖然是武夫，不一定懂什麼民主憲政，但也不敢太亂來，所以在那時政治上比較寬鬆，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一套去反對憲政民主那一套，共產黨卻有一整套東西反對民主憲政，反對得理直氣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後，連梁啟超都認為西方文明已經破產，陳獨秀都說憲政民主該進歷史博物館，緊接著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列主義進入中國，憲政民主的道路是從這兒斷起的；沒有這樣一斷，軍閥鬧來鬧去也有限，到頭來今天中國可能早就走上民主憲政了。

現在沒有一套理論能替代自由民主憲政，所以不管哪派力量上台，都可對他們抱持一點搞民主的信心。一個政治集團總是靠一定的理念或意識形態集合起來的，上台之後，這套理念或意識形態對他們有很大的制約力。當初很多農民加入共產黨，圖的是革命勝利後能過上“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日子。老毛要“繼續革命”，這種人其實很不願意，但由於受那套理念和意識形態的約束，他們沒法理直氣壯地去抵制去抗拒，還只好承認自己覺悟太低，於是只有跟著走。有人說老毛就是想當皇帝，其實他要是只滿足於當皇帝那就省事了，那就用不著接二連三地搞政治運動搞經濟改造了，那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還少點。

共產黨到今天還有這麼大的統治力，那是由過去的歷史，包括早年的武裝革命，包括毛時代，也包括“六四”，等等，而形成的。現在共產黨雖然變得面目全非，但仍然保持了這個幾千萬人聽指揮的系統，繼續專制。未來的新的政治力量，哪怕是革命黨，由於沒有那些類似的歷史因素的因緣際會陰差陽

錯，不可能形成象共產黨那樣強大的專制力量，所以，那種“要推翻一個專制政權必須比它更專制”的理論是站不住的。用暴力革命把共產黨推翻，不需要比共產黨更強大的暴力力量；正像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黨並不比清王朝更強大一樣。而新的政治力量，哪怕是革命黨上台後，也不可能比共產黨更專制。

中共垮台，民主隨之而來？

胡平：我們都是在上個世紀 60 年代後期到 70 年代，開始對這個制度有很多反省和認識。記得當年讀《第三帝國的興亡》，我就在想：希特勒政權由於發動世界大戰而垮台；如果他當時不是那麼急於對外擴張又會怎樣呢？當時我痛感中國正處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又處在社會最下層，改變的慾望非常強烈，怎麼辦？

我不相信這種制度可以永世長存，一定會有個出口。

回過頭看中國 1989 年，以及蘇聯、東歐，都見到一個民族可以有很多問題，但有時候也會出現讓你很受鼓舞的局面：整個民族有特別想學好的心態，它就能學得好。蒙古是典型例子，證明學者們所說的實現自由民主化的種種前提條件其實都不重要，當時的蒙古沒有中產階級、沒有市場經濟，沒有成熟的反對力量、沒有對外開放、沒有自由民主傳統，在 90 年代說變也就變了，也基本上沒出大問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很多在第一次選舉時就下台，說明他們雖然掌握那麼多資源，但他們沒在選舉中作弊，連他們接受民主的態度也都是很真誠的。

1989 年民運期間，很多改革派的官員們也很真誠、對民主化的決心也很天真，台灣在民主轉型前，知識界人士也抱持天真態度。就是這種天真，才使得最初的幾步走得平穩，在

這種情況下，這個民族特別願意拋棄過去的東西、願意學習，如果這時出現巨大的歷史變化，就能表現得特別好，一般情況下不能轉的彎子也轉過去了。

1989年中國人追求過，但失敗了，那種好不容易攢起來的真誠心態一旦破滅，就比原來墮落得更厲害、更玩世不恭，所以現在的中國的情況很糟糕，比毛時代還糟糕！

毛無疑比鄧壞得多，但現在的人心某種程度上比上個世紀70年代還壞——因為現在是雪上加霜：毛時代加上鄧時代。毛時代後國人曾經有短暫的精神復甦，如果復甦過來就好了；但又加上鄧，固然鄧的惡小一點，可就像地震似的，先一個八級地震，還沒緩過來，又一個六級餘震，就成為一片廢墟了。所以若孤立看，鄧時代的30年肯定比毛時代好得多，但疊加的結果，使得現在的人心更沈淪。

蘆笛：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胡平說了幾層意思，第一，中國民主化不需要老百姓對民主的廣泛需求，反正如果社會轉型，就會出現參與爆炸，大家都會來相信民主了。是不是這個意思？

胡平：這裡有兩個命題：第一，我覺得中國人的民主需求非常高；第二，就算需求少一點也沒關係。

蘆笛：那不就是強迫老百姓？他們沒有精神準備……

胡平：我剛舉的例子：把腳鐐砸開後，你不想走沒關係，沒有逼著你走，給你權利的意思就是“可以”這麼做，但沒說“非得”這麼做啊。給你言論自由，不是讓你非得說話，給你投票自由，不是非得投票——沒有強迫的意思，但沒有投票權，誰都不能去投票。

蘆笛：給你選擇的自由？（胡平：對）那我寧願不自由，我去組織下一任領導，走上德國那條路，選出個希特勒來。他的競選諾言是：我上去就結束民主這個亂糟糟的體制，把整

個國家從深淵裡救出來，這就是德國走過的路。

胡平：既然那些人不關心民主，政治上很消極、覺得誰當選都無所謂，那麼這些人是不會去投票給希特勒的，因為投票給希特勒也需要一種積極的態度。

蘆笛：消極或積極是可變的，背後最大的驅動力是經濟。原來的經濟都由權力掌控，制度脫軌後，經濟肯定一塌糊塗，社會秩序也只會亂糟糟的，在老百姓對民主沒太多認識的情況下，希特勒式人物必然應運而生，人民只會把票投給能給他們帶來秩序或能提高他們收入的人。比如現在毛左積極分子說：我上去後，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在大多數老百姓對民主沒需求的情況下，突然改變社會制度是很冒險的，你說的“參與爆炸”不過是個靠不住的肥皂泡。結果如何可以預知。

我認為至少老百姓必須對民主有點需求，這也是我最大的苦惱：對中國的愚民來說，西方民主已經喪失吸引力。中國人在 80 年代對民主的熱情突然高漲，其實大家並不真正知道民主是幹什麼的，而是見到西方家庭都有大彩電，但我們還是黑白電視。現在的情況證明，在經濟上暴富並不需要民主制度，老百姓也就對民主喪失了興趣，所以你說要從積極變消極、再一下子爆發民主熱情，我承認會，但只會曇花一現。“文革”時，大家都參加戰鬥兵團，但其實都是胡鬧，沒誰真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為什麼慷慨激昂，甚至去送死。

現在西方遇到重大經濟問題，中國的老百姓養成了一種自得心態，覺得自己的制度比西方還優越。中國人追求的是金錢，不是自由，他們認為錢和自由是魚與熊掌的關係，寧可要錢不要自由，這是中國和西方百姓很大的區別。

你剛才也承認，道德已經崩潰到谷底，我基本同意。中共建國 60 年，前 30 年是教你怎麼做暴徒，用是否心狠手辣、殺人如麻的標準來檢驗人品素質，你越壞，獲得的評價越高。

我現在還牢牢記得紅衛兵毒打那些老師的景象！後30年不這麼教你了，改用金錢腐蝕你，教你怎麼貪婪。60年下來，人民變得既殘暴無情，又無比貪婪，還沒有廉恥。在這種情況下來一個大的社會制度動盪，我不認為會有什麼好事。把原來鎮住全局的大流氓推倒了，讓無數的小流氓跑出來自由行動，那才是最可怕的噩夢。

第二，如果我沒理解錯，你認為辛亥革命是個例外。如果沒有蘇聯向我們出口那套邪惡理論，北洋軍閥鬥來鬥去，中國今天可能就民主了，所以不能用後來偶然發生的事，得出一般結論：革命只能導致災難。這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我覺得一個社會的進化必須是平穩的。法國大革命時並沒有什麼邪惡組織用邪惡理論把憤青和知識分子都蠱惑進去，但它鬧出了什麼好事？造出了多少災難？害死了多少無辜者？此後又復辟，反反復復折騰了一個半世紀，才總算真正走上共和道路，所以，並不一定要有個什麼能欺騙蠱惑愚民的邪惡組織存在，革命才會越革越糟。

第三，你還說不需要一個更強大的暴力去推翻舊政權，或許如此吧。但你忽略了，舊式統治者操控人民的技術，與列寧、斯大林發明的那套相比，完全是小兒科，所以清朝失控是能夠想像的，共產黨也可能失控，但除非發生內訌，根本就不可能被人民推翻。即使發生內訌，大多數老百姓也只能旁觀。這種事可遇不可求。

即使共產黨垮台，也未必出現一個民主天堂。蘇聯就昭示了這點，因為原來的社會從上到下有一個權力骨架。制度可以變，但這個骨架不會變。這些人並非革命志士，不是什麼理想主義者，只是個既得利益集團，只知道在權力骨架內為自己謀求最大利益。原來實行公有制時，他們只有權沒有錢。社會轉型時，表面看起來天翻地覆，可以成立民主黨、社會黨，

但原來那個權力骨架還在、人馬還在，所以才會從過去的極權共產主義社會，變成了現在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政府現在鎮壓異議人士什麼理由都沒有，所以只能使黑社會手段；普京的黨也是如此，完全是當權派的黨，也是什麼道理都說不出來，只能用黑社會手段幹掉異議人士。

因此，你剛才反駁的那條不成立。轉型中的俄羅斯，沒有一套更高明的可以蠱惑老百姓的理論。按你說的，它的民主制度應該能夠很好地建立起來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它根本名不正言不順，什麼替代主義都沒有。這樣的社會比中國還糟，正因為它沒有道貌岸然的、能取得制高點的意識形態，所以只好亂來。一個異議分子在網上抨擊政府官員，就把你做掉，你說民權改善了嗎？我看未必。

從不同背景理解人民對民主的需求

蘆笛：另外，有關“統治者讓步”，我的意思是只有舊統治者讓步，社會才會進步。這兒的“讓步”，說的不是推翻了舊統治者的新統治者的讓步。推翻統治者一般不會帶來社會進步。所以，爭取統治者讓步才應該是鬥爭的目的。如果統治者讓步了，人民還要得寸進尺，要去把它推翻了，那就會造成社會斷層、權力真空，最後導致混亂。辛亥革命就是這樣。即使沒有蘇聯的干涉，因為喪失了國防能力，中國最大的可能是被日本和俄國瓜分。就算逃過了這命運也沒有什麼好下場，今天都還可能處在混亂中。當然有些地方，如江南一帶的人比較聰明，或許會自己成立一個獨立小國，像陳炯明的“聯省自治”什麼的，但整體來說不會有好結果。所以，中國經過辛亥革命後，即使沒有蘇俄介入，也不可能再折騰幾十年，就會自動變成一個美國式的民主國家，因為咱們沒有顧大局、識大體、維

繫社會的精英階層。所以，以後子子孫孫的任務，就是造出這樣一個階層，才能談可持續的社會進步。

我高度懷疑亂七八糟打下去就能自動磨合成民主社會的說法。人民總是討厭動亂的，在厭倦了長期動亂後，就會轉而支持能給他們帶來秩序的鐵腕人物。巴基斯坦的民主就是無政府主義、亂七八糟，大家都受不了了，軍界強人就上去搞獨裁，於是民心大快，因為相對於動亂來說，暴政似乎是更佳的選擇。“文革”就是這樣，儘管武鬥期間是公民最自由的時候，沒人來管你，但沒有社會秩序，大家忙著狗咬狗、忙著殺人打人。後來革委會成立，混亂被制止了，工宣隊專政來了，大家反而認為亂世終結、治世到來了。其實更可怕：公民完全喪失了自由！但老百姓就喜歡過那種雖然艱難、但可以預期的生活，討厭那種沒有確定性、危險無法預知的亂世。所以，沒經過訓政的國家，公民沒有雙贏概念，沒有法治觀念，更可能像巴基斯坦那樣，實行民主後就出現混亂，因為民主需要公民的自律、需要各對立面的合作才能驅動。社會混亂的結果，大家大失所望。最後一個軍界強人一統天下，大家很高興。接著軍界強人開始貪污，大家不高興了，又來一次民主……就這樣在以群暴易獨暴、以獨暴易群暴的民主與專制之間來回擺蕩，沒有脫出循環的希望。

胡平：其實我們的生活經驗很相似，對很多事的具體感受一樣，只是有時伸發的議論角度不一樣，就會顯得有分歧。你談到了很多問題，所以我接著也會談得非常發散。

蘆笛：沒關係，咱們就盡量發散吧。

胡平：八九民運那麼多人參加，是跟共產黨的全面失敗有關。並不是所有參加的人都把自由民主看得那麼重。有些人也許更關心生活的改善。民主牆時期流行一句口號“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我當時就指出這話並不那麼靠得住，沒有民主

也可能現代化。不是每一種專制都會把經濟搞得一團糟。只是當年共產黨那套經濟模式實在太糟糕。所有共產國家都把經濟搞得一團糟，和西方相比，一邊是民主加資本主義，一邊是專制加社會主義，對照太鮮明了。葉利欽當莫斯科市長的時候，受邀到美國訪問，他見到超市琳瑯滿目的商品就哭了。在那時，包括很多統治精英都有強烈的改革願望，是改革的最好時機。蘇聯東歐蒙古的共產黨領導人，面對民眾的反對，幾乎都是還沒鎮壓就讓步了，因為他們內心有愧。

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有多種可能性。生活中很多問題都有兩種說法，看上去都有理。“窮則思變”，說的是貧窮能促人奮起改變現狀；“人窮志短”，又是說貧窮會使人沮喪消沈。“衣食足而知榮辱”，說的是人在物質需求滿足時才會有道德心；“飽暖思淫欲”，又說人吃飽喝足才容易墮落。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的關係也是如此。有時候，人們的生活越提高，他們要求政治參與的願望越強烈；有時候，人們越是能發財致富，越是對政治參與漠不關心。有的人拒絕民主，什麼時候都有話說。在日子窮的時候，他說，飯都吃不飽，爭什麼民主？等日子富起來了他又說，有吃有喝，爭民主幹嘛？同樣的，要求民主的人也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下都提出爭民主的重要性。1989年時，改革已經進行了10年，大家的經濟狀況都有很大的提高，那時還沒有出現後來的貧富懸殊。民運的主力，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可正是他們帶頭搞民運，可見在當時，經濟發展是促進了人們政治改革的要求，經濟發展是政治民主的催化劑。“六四”後，一般人都害怕了，然後經濟改革深入進行，物質生活有很大改善，這時候人們追求政治民主的願望就低落了，經濟發展成了政治民主的替代品。“六四”後，西方還以為越是幫助中國經濟發展，就越是有利於推動政治改革，這種估計顯然是錯誤的。但要說由於人們

經濟上提高了，就沒有政治的要求，知識分子被收買了，這話也有問題，因為共產黨一直在高壓嘛。所以我們不能籠統地問經濟發展到底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人們對民主的需求，要看這種發展是在什麼背景下發生的。現在很多人由於日子過好了就對民主不感興趣，那是因為“六四”，因為 20 多年來持續不斷的政治高壓，顯然是壓力下的扭曲。

另外我們把“革命”解釋得太籠統了，哪怕是以嚴格的定義談“革命”，也不一樣，比如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太不一樣，從我們的價值觀，要說贊成革命，可能不會說贊成十月革命，要說革命不對，二月革命也談不上不對，要說二月革命給十月革命開了口子，也不一定，你剛都談過了，我們觀點差不多，就是肯定有聯繫，但不會如此密切。

你對革命最大的批評就是“以暴易暴”，我的觀點是：就是“以暴易暴”，都比“一暴到底”好。

“以暴易暴”比“一暴到底”好？

蘆笛：我對革命的定義是，用暴力手段推翻舊政權，進行一種社會改造。第一，它涉及政權鬥爭，而且是以暴力改朝換代，第二，它以暴力去推行一個社會理想、實行社會改革。這是最糟糕的，不管打著什麼旗號，一定製造災難，這就是革命。

胡平：我認為專制就意味著壓迫、迫害，這是我反對它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民主恰恰消除了這一點。中國的民主，我們為什麼不願意等？因為等就意味著讓壓迫和迫害繼續存在，我們肯定都不希望見到這種現象持續。從不要壓迫和暴政的角度談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的價值就很清楚了。

從這個意義來說，歷史上以暴易暴，都比一暴到底好，因為以暴易暴意謂懲罰了原先的壞人，哪怕之後的人未必更

好，那也總是一種對不正義的糾正。如果秦始皇政權一直延續到今天，國人就不可能有任何正義概念了，因為我們幾千年的生活，都是由邪惡來統治，邪惡永遠佔上風，永遠不受懲罰。有了改朝換代的先例在，好歹還能讓人對正義有點信心。所以後人總拿暴秦短命的歷史警告當時的皇帝不要胡作非為一意孤行。說過去的改朝換代只是“換湯不換藥”，但要是連“湯”都不換，那不是更糟糕嗎？

楊小凱（註：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很早就反對革命，他的角度跟你的很一致，他對壓迫人民的政權沒好感，知道革命者都是受壓迫者，他們要革命沒什麼不對，但他也認為革命起來會一塌糊塗，所以他說如果革命來臨，他會躲得遠遠的。但後來他的觀點根據奧爾森（註：Mancur Olson，美國經濟與社會學家）的理論有所修正，奧爾森說動亂是有好處的，如果沒有動亂，統治者尋租的行為將更肆無忌憚，所以卡扎菲垮台，儘管不少人對利比亞的局勢發展不一定看好，但大家仍認為值得高興。

回到中國來看，像李澤厚（註：中國思想家）的觀點就不太站得住腳，他認為再壞的政府也比無政府好。按這個邏輯，越是壞政府越不能反對，好政府倒可以反對，因為反對好政府不會導致社會失序，反對壞政府就很可能導致社會失序，所以越壞越不能反。這怎麼講得通呢？這就類似於共產黨說的“穩定壓倒一切”。按照穩定壓倒一切，權貴們天生是穩定因素，再錯也是對的；被壓制被剝奪的人因為想反抗，那就是在挑戰現行秩序，就是不穩定因素，再對也是錯的。這樣一來，善惡是非就全顛倒了。何況當代中國的歷史證明，暴政下受傷害的人，比在動亂下受傷害的人多得多，共產黨幾十年造成的人員傷亡，遠遠勝過辛亥革命到 1949 年這段期間，所以要討論革命，就得先下個定義，什麼是革命。你剛談的革命，定義下

得窄了點，革命就是用暴力推翻現存政權？

蘆笛：最重要的是，要有社會改革內容。要不就不是革命。

胡平：簡單來說就是改朝換代。

蘆笛：不是改朝換代。歷史上有無數的農民起義，但那是造反。我寫過一篇文章，專門區分造反和革命。革命必須有社會改造內容，辛亥革命是革命，中共革命也是革命，但以前無數次起義，都只是改朝換代、推翻政權，卻沒有強行用國家權力推行的社會改革內容，這些都不是革命。

胡平：要有社會改革內容，也可能完全不一樣，如果有毛的東西……

蘆笛：只要有社會改造內容就稱為革命，我的定義是這樣。

胡平：對，我完全接受。我的意思是，社會改革內容可以差別如此之大，有些價值我們能肯定，有些我們覺得非常壞，這樣我們就很難對革命有個籠統的態度。比如美國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就很不一樣，不能等量齊觀。反對革命的人，一般都不反對美國革命，因為美國革命代表的價值……

蘆笛：美國革命不能稱為“革命”，是獨立戰爭，英國也是民主國家，北美殖民地只是獨立出來，並不是改換社會制度。

胡平：這就是定義問題，有些人，例如阿倫特（註：Hannah Arendt，德國政治理論家），她只認兩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如果我們確定革命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現政權，同時對社會加以改造，顯然我們對革命的態度必須取決於：改造內容是什麼。

蘆笛：我是不管它有什麼改造內容，都反對革命。我在舊作中已經談了這個問題，每個革命的社會改造內容可以完全不同；二月革命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十月革命是建立歷史上、世界上最邪惡的政權，但都有社會改造內容，而且是用國家權力來推行；辛亥革命是建立法國式民主國家，動機很好，但不

管原來標榜什麼，只要是用國家權力進行突兀的社會改革，必將變質、造成災難，這就是為什麼辛亥革命、法國革命造出了惡果，因為手段決定結果，手段決定善惡。

為什麼？第一，我是文化決定論者，洛克（註：17世紀英國哲學家）說的話很對：制定法律時，必須為傳統留下足夠的餘地。革命就是急遽打斷文化傳統、打亂社會秩序，建立全新統治秩序，推行一套老百姓沒法適應的東西的過程。

胡平：有些地方也保留很多傳統啊。

蘆笛：OK，例外的就是英國的光榮革命……

胡平：有些革命的本質就是回到原點。

蘆笛：我唯一肯定的革命就是英國光榮革命……

胡平：所以哪怕我們把革命定義明確到以暴力手段推翻現政權，推行新的社會改革方案，顯然方案本身好壞是至關重要的。

蘆笛：方案好壞寫在紙上不作數的，袁世凱規定女性也有選舉權，當時是領先全世界的，英國還要經過許多女權主義示威才爭取到，但那又如何？完全是空話，民國婦女別說選舉誰了，連女奴買賣、童養媳等等都始終沒有廢除。我相信這些人一開始是真誠的，但老百姓沒有思想準備、文化傳統和操作能力，所以方案必然落空。原來的權威一打掉，除非像共產黨革命，本身就是暴力集團，能控制社會秩序，不讓權威真空出現，否則一定大亂，最後造成一個逆向篩選場，拿破崙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越是鐵腕人物，越能給老百姓帶來秩序和安寧，老百姓就最歡迎，他們都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

胡平：這很可議。

蘆笛：我堅信這一套。

胡平：首先，你把什麼叫作“老百姓”？“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才叫“老百姓”？肯定還有另外一些老百姓，

有很強的要求。

蘆笛：大多數的老百姓，咱們說草根階層吧，草根階層才不管誰統治，只要我能安寧寧的……

胡平：那不一定，我們都跟草根階層打過交道，我們知道草根階層有野心的、不安於現狀的、想改變的人多著呢。

蘆笛：那是極少數。

胡平：不，按比例嘛，一開始已經把草根階層打成一大片，在任何族裡頭當然都是少數了……

蘆笛：當然你要我拿出社會統計資料，我沒有。

胡平：不需要統計資料，肯定是少數，因為這個定義……

蘆笛：我覺得大多數人都願意過安寧的生活，哪怕苦一點、哪怕受專制，他不願意生命沒有保障，所以“文革”武鬥期間公民自由最徹底，因為沒有政府了，但老百姓膩透了這種日子，他們買不到油、買不到菜，國家不定量供應了，他們盼望一個鐵腕人物出來收拾亂局，巴基斯坦也是如此，這是放之四海皆準的。

胡平：嚴格說來，“文革”時的武鬥期間不算真正的無政府，當時分明有政府，是這個政府有選擇的在一些事上有作為，而在另一些事上故意的不作為。且不說到底有多少人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問題是這種人按定義就是消極被動的，對歷史的變革不起作用的。歷史恰恰是由另外類型的人創造的。首先，反抗壓迫具有正當性，這是正義，是人性。總有人會起來反抗。此外，這裏也有兩種情況，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結束。出來一個人或一派力量，建立起秩序，可以是好的秩序，不一定就搞得特別壞。

新政權是更邪惡、還是更民主？

蘆笛：都不可能很好的。為什麼呢？如果出現的是自發革命，接之而來的就是群雄並起的權力真空，比賽誰最黑。誰越下流、越能幹文明人幹不出來的事，誰就越能佔上風。二月革命之所以製造災難，是因為沒有二月革命，列寧就不可能從國外回來，西伯利亞的斯大林那些人就不能跑回彼得堡，不能勾結德國人。這不能說是偶然因素，所以二月革命當然要為十月革命負責。

革命無一例外地製造災難，推翻統治者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像共產黨革命，還沒拿到政權，就已經有了一個很大的權力組織、暴力機構，一上台就馬上接管全國，不會有權力真空，沒有大亂，天下太平。如果是這種情況，新的統治者只會更黑，因為它組織更完善，對人民的控制更嚴密。這種革命，無非是革命黨和統治者比賽誰控制百姓的能力更強，誰更強誰就能勝出，共產黨控制百姓的能力，根本不是其他人能比的，這就是它取代國府的最主要的原因。

另一種情況像辛亥革命，基本上是自發的，由多種力量參與，在舊政權倒台後突兀地造成權力真空。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群雄並起，形成一個強大的負篩選場，越下流的越能勝出。至於當初的革命理想，那與現實有什麼關係？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所以手段決定結果，手段決定善惡。就是共產黨人也罷，當初他們還是很真誠地相信共產主義天堂的。他們相信的那套，也確實是人類能設想的最美好、最優秀的社會，但因為背離人性太遠，實行起來結果必然相反，如同偉大領袖說的：走向反面了。所以，越崇高的理想實行起來越糟糕，走樣後比赤裸裸的邪惡還糟。

胡平：有幾點說得太籠統，第一，不同革命、不同革命黨所堅持的社會改革理念很不一樣，其中包括革命成功後他們想採取的手段，相當一些革命在顛覆舊政權時，不需要自己的權

力比對方更集中、更強大。

第二，一旦建立自己的政權，會實行比從前更寬，而不是更嚴的法律，因為他想推行新的理想，這理想包含對個人自由的承諾，所以不會違背個人自由。袁世凱提倡婦女解放，但他後來出的事與這主張沒什麼關係，並非婦女不想解放，他卻強行解放，由此引出亂子，他推行，底下可以不理睬，也不會有什麼壞處。“負篩選”的說法過於籠統。如你所說，共產主義的罪惡恰恰就在於它那套理想理念本身就是錯的，而不只是手段錯誤的問題。

蘆笛：我的意思是，革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革命家組織的中共式革命，一種是如二月革命的自發革命。自發革命的壞處是，不管革命黨人提出的概念多崇高，由於革命具有不可控的性質，所以把權威趕掉很容易，幹革命比維持革命成果簡單，但老統治者被趕走後，權威沒了，新統治者提出的社會綱領不可能立刻被老百姓掌握、化成生活實踐，這種情況下，大家都要自由，誰都不會服從誰，必然要進入無政府狀態。

胡平：不一定，東歐革命就不是這樣，它沒引起這麼大後果。所以裡頭還得有一條東西，二月革命，當年有個馬克思主義在流行，俄國有個布爾什維克黨，別的地方沒這個黨，就沒引出這種事。你說秩序鬆散，鬆散到最後也馬馬虎虎上正道了。

蘆笛：要是沒有二月革命，列寧怎麼會上台？恰好是革命為這些人鋪了溫床，驅使暴民參加自發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復仇情緒，而這必然為激進思潮流行打開大門，越激進的煽動家越能得到暴民擁護。羅伯斯庇爾就是法國大革命的兒子，這不是偶然的。

胡平：不光是那一小撮人，是整個社會當年在這個目標上就很迷惑，就像很多人對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憂心忡忡，因為有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掌權的獨裁者雖然可惡，

但仍親西方、壓制本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一開始對茉莉花革命的態度不鮮明，包括西方人，很多都擔心把原統治者推翻了，會不會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提供溫床。

像布爾什維克思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些東西不是任何變革時代都有的，而且它們還有潛在的社會基礎。有時候情況會倒過來，例如我們受專制政權的壓迫。

蘆笛：咱們現在說具體一點吧。假設中國明天發生民主革命，共產黨垮台、軍隊沒介入，對國內影響最大的是毛左。你既然要搞民主，就不能壓制它。他們出來競選，號召打土豪分田地，你該怎麼辦？海外的民運屆時回去造輿論——我本身不反對民運，所以我也回去鼓吹民主。你認為咱們有什麼說服力？有什麼感召力？我們的影響力會有他們那麼大麼？

胡平：肯定比他們大。

蘆笛：愚民總是愚民，他們才不會在乎你，只會覺得你的民主是騙人的，必然導致國家分裂，而人民個個主張大一統，他們不會聽你的理性邏輯分析。希特勒早就總結出來了：愚民是煽動起來的，不是說服的。

胡平：我不覺得，有些時候他們就是聽得進好話。

蘆笛：你沒經歷過“文革”？

胡平：我當然經歷過。

蘆笛：你沒見過老百姓是何等容易煽動？

胡平：我完全贊成，但現在情況很簡單……

蘆笛：真要煽動、獲取民心，民主派遠遠不是“烏有之鄉”的對手。

胡平：我肯定比他們有力量多，我就主張把官的不義之財分了，本來就應該沒收，那與打土豪分田地不一樣，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是用非法手段剝奪人家的合法財產，現在我們要用合法手段，剝奪他們的非法財產。

蘆笛：共產黨也是用“合法手段”啊，你要這樣幹，那就沒完沒了了……

胡平：當然完全不一樣，太清楚了，他那個肯定是強盜，搞土改式的，你有多少土地，你就叫地主，不管你怎麼來的，我現在的邏輯肯定不這樣，你的土地是靠官商官倒來的……

蘆笛：你真要論這個的話，那結果必然是冤獄遍地。你這是在象牙塔裡……

胡平：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是該不該。共產黨搞兩次搶劫，把財產關係搞的空前混亂，怎麼理順？歷史上都沒有先例，要理順確實很難，但我們總不能因此不去理順。其次，實際上，一旦開始清理，你只能粗不能細，不可能斤斤計較，有些只能大概齊，有的不那麼顯著的官商官倒可能都放過去算了，能追究的都是比較顯著的。再有，共產黨的這兩次搶劫確確實實太說不過去，不清理不行，你當官的憑什麼把老百姓的財產當作你們官家自己的財產？工人農民完全懂這個道理，長沙有個工人陳洪，博客閱讀量很大，他就說計劃經濟該改，該有人付代價，但計劃經濟不是我們工人發明的，是你們共產黨搞的，憑什麼你們不付代價卻要我們付代價呢？所以一定要清理，要考慮制定相關的法律和程序。這樣的人掌權後，可能要求當官的把錢拿出來，他並非因為你是資本家就要你錢，而是你怎麼當上資本家的，現在不是談原罪問題，民營資本家有什麼原罪不原罪？當然有些是官商勾結造成的。

其實當年共產黨搞土改時，很多貧下中農並不願意改，因為他們都承認私有產權，他們覺得人家的地就是人家的麼，種人家的地當然該給人家交租。一般人對私有產權的承認和尊重是根深蒂固。共產黨造成這麼大災難後，我們回過頭來告訴大家，產權是正當的事、當資本家賺錢是正當的，我們只問財產來路清不清白，我們不是仇富，而是仇財產來路不正的人，

所以這個問題不大。只是現在我們的聲音被壓下去了，大家就覺得毛左的聲音佔多數，怎麼可能？大家沒那麼傻，過去“文革”，大家都是毛那套的受害者。

蘆笛：你是不是從“文革”過來的啊？有沒上山下鄉過？

胡平：我當然有了！我是說，那件事恰恰變成一種教訓，所以一個民族在很短的時間內要犯相同錯誤，可能性很小。知青下鄉都發現，農民的私有觀念比我們強，起初以為農民比我們落後，後來才明白人家農民比我們有常識。

蘆笛：中華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從來不犯新錯誤，永遠在重複舊錯誤。你剛才說的，讓我想起你寫過一篇關於革命與暴力的文章，你說共產黨靠暴力革命上台，然後跟老百姓說：以後不許革命。你說，這可不公平，不合理。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胡平：不是這個意思，但你說吧。

蘆笛：你剛才說，共產黨用非法手段搶了人家合法財產，我對此毫無爭議。我家就是受害者，咱們都是黑崽子。但對暴力革命應該畫上一個終止符了，不能再試圖用暴力手段去解決社會衝突（胡平：是啊），要不中國永遠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為什麼從我們開始讓步呢？原因很簡單——共產黨掌了權，如果你要把它打下來，打土豪分田地，他就更不會讓步了。你這是加強它的恐懼，而不是爭取全民和解、讓中共逐步放權。所以，我覺得你的主張很不妥當，不能為了跟毛左爭取民眾，就提出勢必永遠讓中國處在以暴易暴的循環中的主張。以暴易暴就是一暴到底。英美就是為了終止這個循環，才走上了不用暴力為自己爭權的道路。

第二，你提出要清算官僚資本主義，那打擊馬上就會泛化，那是控制不了的。新政府又沒什麼權威，誰會聽你的？而且，中國有幾個身家乾淨的民間資產階級？幾乎沒有。沒有官方背景能發起來嗎？所以你一清算，範圍就大了，到時社會動

盪不安，最後肯定給毛左野心家鋪平道路，他們會趁機煽動：把富人都幹掉。這樣的煽惑力不大嗎？

如果明天中國發生民主革命

蘆笛：咱們都是受過工農兵教育出來的，咱們都吃大苦、耐大勞，揮汗如雨，我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覺得老百姓非常愚昧，中國老百姓尤其如此，非常容易衝動走極端。西方老百姓也是愚昧的，他們的社會先進，不在於老百姓，而在於精英階層是聰明的，咱們與他們的區別只在於精英階層，所以你不要指望老百姓能理解你；一個新制度的建立，如果沒有老百姓的合作，強行動用國家權力，必然要失敗，而民主法治的運行，不是靠國家權力威懾就能解決的。

同樣都是法治國家，也有區別。到英國地鐵裡，只聽見人的腳步聲，聽不見人講話；要過街，不會有人闖紅燈。到意大利，地鐵站熱鬧得跟市集一樣，過街得冒生命危險，一點規矩都不講，這就體現了國民素質和文化傳統的區別。德國原來法治就很嚴格，所以訓政後公民就都守規矩。法治國家的運行，很大程度上得靠老百姓自律。現在的中國老百姓根本沒有自律的概念，一下子搞起民主來，再也沒有誰用暴力管他了，肯定天下大亂。

所以也不可能像王軍濤講的，黑人自發進行民權運動、和平抗爭（註：詳見《新史記》第4期《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一文）。那是在美國，不是在中國。美國60年代的民權運動決定性的戰場在國會，黑人解放是靠白人打白人完成的。約翰遜總統的民權法案能通過，靠的也是白人參議員自由左派，當然黑人就沒有再鬧的理由了。所以，解決問題的還是精英階層，老百姓頂多跑跑龍套，呼應一下。

要是明天中國發生民主革命，別指望老百姓會明白毛澤東的危害，會知道你的好意。他們享受過毛時代經濟上的“平等”，以為那就是公平，不知道不准你發財才是最大的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公，他們更不知道西方民主是什麼意思。毛時代所造出的國民心態，就是“我窮沒關係，但你絕不能比我富”。

胡平：你說的是一段時間的心態，“文革”之後的老百姓不是這樣想。

蘆笛：這是硬幣翻過來，一回事。

胡平：不，當初改革之所以能發動，能改得起來，恰恰就在於大家都體認到毛的那一套，特別是文革那一套是錯誤的。今天中國流行的很多觀念和毛時代整個相反。例如富人炫耀自己的財富，因為那被認為是成功的標誌，如果是毛時代，他就不會炫耀。性關係也是，毛時代是何等的禁慾主義，現在中國性關係性觀念之混亂之開放，超過任何國家。

所以正因為有個毛時代，造成那麼大的反彈，才使得同樣的情況不太可能再次發生，今天中國的毛病恰恰都是相反的。當然，專制會留下很多壞的遺產，專制不是民主的預科班。我們確實會面對很多困難的問題。

蘆笛：對，這也是我的困惑。

胡平：所以我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對事的具體看法可能都一樣，都對中國現狀極其不滿，對整個中國老百姓素質評價不高，也知道素質不高很大程度上是現在這麼做的結果。這麼做下去只會越來越壞，如果來了革命，老百姓素質這麼低，肯定也會有很多問題，但持續下去只會更糟糕，所以還不如早點來革命。

你說的另一個問題我也考慮過，如果要清算人家，要他還錢，當官的更不願意，所以我很晚才提這個意見，因為我發現，他們自己明白得很，這就是為什麼幾百萬的官兒這麼團結、這

麼殘酷無情地壓制。現在當官的都是我們的同學，原來沒多壞，現在這麼壞，因為他們太自覺，所以如果我們假裝沒這回事也行不通，因為他們做賊心虛比你還明白，你說不計較，他也不會信。

蘆笛：這點我同意。

胡平：所以我能體會劉曉波為什麼說他沒有敵人，他站在第一線，想非暴力抗爭，希望早日結束暴政，但力量又有限，要對方讓步，就必須在給壓力的同時也給對方一個體面的出路，如果說：你是我的敵人，我和你們你死我活，那怎麼成？當你以非暴力方式反抗時，你需要做出承諾：如果你放下武器，我不會把武器接過來打你。如果你說：你今天不拿槍打我，等我贏的時候我來打你；那當然不行。

我們可以找一個卸包袱的辦法，如果明天民主了，假設明年1月1號大選，在此之前把不法之財交出來，就既往不究，不再法律追究，給你個台階下，他們也知道交出不義之財是應該的，而且交出之後還是能維持一種體面的生活水平。

蘆笛：靠這個就能勝過毛左的政黨了？

胡平：當然無法擔保，民主就意味著不確定，就像搞比賽你無法確定誰總能當冠軍。且不說我們反對派現在沒有很大的規模，其代表性有限，到開放民主時也無法肯定會贏得多少選票。假設反對派跟執政黨施加壓力，要求開放民主，並承諾既往不究，最後執政黨也開放民主了，如果第二天冒出一個復仇黨，要求清算，而他們贏得了更多的選票，那麼你原來的承諾也就不起作用了。

蘆笛：我完全同意。

胡平：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和平轉型民主，就是積累的仇恨不多，有人組織復仇黨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力，溫和派有更大的代表性，妥協比較容易。但如果目前這種狀況再繼續下去，

和緩的轉型就越加困難。

所以第一，我們沒法擔保民主開放後，毛左一定不會佔上風，第二，民主的、理性的聲音肯定與時間成反比。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候，理性的聲音比較有影響力，比如八九民運，不管我們怎麼評價方勵之，他總還是個知識分子，那時候他被大家崇拜，崇拜他總比崇拜別人好，就像現在如果劉曉波在國內真有很大的號召力，也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到底是理性的，但很可能理性的聲音在中國會越來越微弱，另一種聲音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我們很擔憂，20年前還沒這樣的擔憂。八九民運時，共產黨說學生搞動亂，但大家，包括很多官員都不以為然。因為在當時，大家對共產黨沒多大的仇恨，甚至對鄧小平還有一定的好感，對最反感的李鵬，頂多也就是要他下台，沒說要法辦，但現在一定比以前激烈，因為隨著時間推移，仇恨加深了，就是布羅茨基（註：Joseph Brodsky，20世紀俄國流亡詩人）的那句話：時間使邪惡增值。

所以我擔心中國情況會更壞，早點結束，固然有風險，但不確定性小一點。

蘆笛：我覺得有幾個問題：第一，專制制度就是邪惡的東西，什麼優點都沒有？

胡平：不一定，有時專制制度會自然軟化，蘇聯、東歐國家，斯大林一死都軟化了。但也有不軟化的。

蘆笛：你的意思是，主要問題是，專制制度越拖下去越糟糕，民憤越深，垮得越晚，造成動亂的可能性……

胡平：也不盡然，以今天中國特定情況來說，是這個樣子，別的不一定。

蘆笛：就說中國的情況，你的基本估計未必成立。專制制度也不完全做壞事。相對民主制度來說，專制制度有些地方

還挺優越的，像應對經濟危機的舉國體制；當然舉國體制是很扯淡的東西，賤賣資源、賤賣勞力，可是老百姓吃這套。西方政府迎合老百姓的最大滿足就是經濟改善，選民投票也是為這個，所以老鄧說：發展才是硬道理。

另外，共產黨也知道要收買民心。你的基本估計可能說反了，改革開放之初 80 年代，大多數人都不滿，那是跟西方比較出來的，現在我覺得滿意的人是大多數，所以你說越拖下去，民憤越沸騰……

胡平：我沒有這樣說，第一，如果拖下去，共產黨越來越有自信，那也有好處，那他就可能越來開明。但問題是現在的中共不是靠走正道而來是靠走邪道而來，所以它很難會越來越開明，很可能會越來越驕橫。

拿基層選舉為例，今天當局對基層選舉的打壓，遠遠超過 30 年前我們搞基層選舉的時候。說明共產黨的擔憂、恐懼、蠻橫都遠勝過當時。現在最糟糕的情況是，一方面，經濟成就巨大，另一方面共產黨知道，這都是我壓著，不壓著就翻盤。現在的問題是，它不改革好像也能繼續維持一段時間，但要改革倒可能馬上完蛋，這時它改革的意願最低。這是最難辦的。

如果說讓共產黨就這麼待下去，那也不行。這樣待下去整個社會情況只會越來越壞，因為它們清楚地發現，幾十年一路走來，別的共產黨專制都垮了，唯獨自己還沒垮，而且還發了，都成世界第二了，靠的是什麼？靠得就是我比別人更厚更黑。西方有什麼了不起啊，我們不是都快要超過你們了嗎？在他們看來，戈爾巴喬夫的做法就是傻嘛，我們才不那麼幹呢。這幾十年就是跟人類主流文明跟普世價值對著幹，關鍵時候從不心慈手軟，這就是他們自己總結的經驗，他們的哲學。

所以我認為，今後 10 年很關鍵。如果聽由中共這樣下去，必將是全人類的危害，必將是一場大災難。如今世界交流頻繁，

東方與西方不能各自孤立，互不相干，摩擦衝突在所難免，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

蘆笛：你剛才說的很準確，現在的共產黨與中國歷代統治者一點都不一樣，任何理想、主義都沒了，完全是一個利益集團、犯罪集團，壟斷國家資源化公為私。它們又很自覺，知道自己在幹爛事，所以生怕被報復，絕對不會鬆口、讓步。它現在的信念，就是與普世價值觀對著幹，那正是他們成功的秘訣，所以以後也堅持這套，這正是中國最難辦的事。

但如果因為這個情況，認為更有必要呼籲革命的話，根本沒有用處。

胡平：我不是說要呼籲革命，現在的問題是革命很難。我講過，在最該革命的時候往往不會發生革命，而實際發生的革命又往往是不必要的。所以為什麼對現已發生的革命有很多批評，就是因為它們發生在不必要的時候，例如辛亥革命，清政府都走那麼遠了；但正因如此才有個口子，反對派才有機會……

蘆笛：最該革命的是毛澤東時代。

胡平：對，所以從理論上討論革命，答案都最簡單，也總討論不清楚，理論上誰都承認，在某些時候就是該革命，但這些時候偏偏最革不起命，能革命的時候都是社會出現相當鬆動，統治者沒那麼壞沒那麼凶惡的時候，或許是統治者無能，或許是統治者想改革。所以從實際上談革命，總會眾說紛紜，因為不少革命都是不必要發生的，發生的革命也有不少是壞革命。現在的中國就很難革命，于建嶸提到一位湖南的農民領袖說，以現在中國的官民矛盾，要是放在冷兵器時代，早就揭竿而起多少次了。另外，中國這麼大，反抗格外難。象東歐北非，一個國家才一兩千萬人，一個突發事件，聚集起幾萬人十幾萬人，政府就支不住了，可是換到中國就不夠。

蘆笛：那針對這個國情，你的主張是什麼？

胡平：我們只能認識這件事，但沒有什麼現成的方案能手到病除。

蘆笛：那就只能等著。

胡平：不是等著，第一，我們要不斷批評，該幹嘛就幹嘛，儘管知道眼下不可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但人心不能死，第二，沒有一個統治者能做得天衣無縫，總會在某件事情上出問題，照這情況下去，不出 10 年。

蘆笛：這就是我不同意你的一條。我覺得你的估計太悲觀。大家都看到西方經濟一塌糊塗，但不知道中國也好景不長了。我上次回去看，覺得它已經到頂了，撐不住了，過度建設，只靠投資，所以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麼危險：10 年以後稱霸全球，普世價值觀就此被否定，沒有必要……

胡平：當然沒有，我只是說……

蘆笛：中共其實還是模仿美國的道路、物質主義、刺激消費。沒什麼獨創，以為物質滿足，就能給老百姓帶來安樂、幸福感，他們就會不要自由了。

胡平：不完全是，兩者有很大區別。

蘆笛：中共是動用國家權力把物質主義幹到了極端。因為資源都讓它控制了，於是賤賣資源、賤賣勞力，靠這換取世界工廠的競爭優勢。但這條路已經走到頭了，因為資源賣得差不多了。如果向西方強國學習，下一步就是到海外擴展市場、建立海外經濟帝國。但中國不具備這種智能，也不具備這種制度優勢。

國內資源用完後怎麼辦？需要進口資源；現在勞力開始不便宜，廉價勞力優勢也會逐漸喪失，10 年後可能是經濟停滯期。這對共產黨來說可不是好消息，因為現在中國的安定完全是靠買靜求安，社會沒有自穩的軟件，所以 10 年內可能沒什麼明顯變化，但 10 年後共產黨就會再也混不下去了。

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是功利上的，它是和平解決社會利害衝突的機制，這才是它偉大的作用。至於民治、民有、民享都是屁話，只是宣傳。當然民主制度也有弊病，西方發達國家從前是沒有民意代表就不交稅，現在應該倒過來，不交稅就沒有發言權。而且，民主制度和平化解社會衝突的能力也有限，像種族衝突、宗教衝突就化解不了，但對中國來說，要消除以暴易暴、一暴到底的國情，民主確實非常有必要。

儘管沒有一個客觀規律保證中國一定會進入民主，但這是全民的努力目標。其實咱們談革命、反革命沒有什麼意思，因為這不是咱們能控制的東西。梁啟超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對革命可能引起的惡果說得清清楚楚，後來都一一應驗了，但他就是沒法攔阻革命。我們這討論的意義，就是希望將來統治者準備讓步的時候，精英們不要賤民綜合症又再度發作，該革命時沒膽子革命，一到要改革了，膽子突然大起來了，要幹革命了。所以，希望將來中國的精英記住，當統治者混不下去時，不要再犯前人的錯誤，不要指望再一次“打土豪、分田地”。政府開始改革，就不要去鬧了，否則鬧垮了，又沒改革和革命的希望了，那中國就永遠也不能脫離這個怪圈。

但若說中國會威脅世界，這個可能性可以排除。第一，中國人都是內鬥高手；第二，中國人眼光都向內，沒有擴張野心。咱們是草食動物，洋人是肉食動物，缺乏人家的侵略性。中國現在搞登月，完全是為了滿足民族自信心，咱們沒有白人向外擴張、建立海外帝國的傳統，所以你過份抬舉共產黨了。

胡平：第一，“打土豪、分田地”的說法不太好，過去是非法剝奪合法財產，現在是合法剝奪非法財產，完全不一樣。第二，如果這事不是現在進行式，而是過去完成式，確實再過幾10年，也許時間就把這事漂白，沒法計較了……

蘆笛：“文革”死了那麼多人，你去算誰的帳？

胡平：我講過，殺父之仇易忘，奪財之恨難消。政治迫害當然更惡劣，但一代人過去之後，再追究就很難了，因為你不能讓殺人者的兒子來頂罪。但財產卻不同，因為父債可以子償。現代人壽命長，各種相關文字材料容易保存，所以在過去很多年之後，人們都還有可能要求進行經濟的清算。

另外下一次中國出現機會時，重犯過去辛亥或共產黨的錯誤，可能性不大。理由很簡單，因為大家都承認權威應該靠選票而不是靠武力。專制一結束，選舉馬上就會提上日程。就像現在儘管我們對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多大不清楚，但將來不管誰上台，都認為要靠民意、選票，所以關鍵是當年出了個共產主義，要是沒有它，就不可能出現後來的災禍；而現在我們看不見有另一種具誘惑力的東西，所以將來出大問題的可能性不大。（蘆笛：未必。）當然我不敢百分百擔保，只能說可能性不大。

蘆笛：南斯拉夫呢？

胡平：那是種族問題，先不討論。共產黨這幾年經濟搞得比較好，起到一定收買作用，但收買的前提是壓制，沒有壓制，收買也無效，連富人都可能與它對著幹，它對這點很清楚，這樣的估計也很有道理，如果它認為光收買有效，就不必連雞毛蒜皮的事都壓制。

另外，如果和台灣比，台灣在經濟起飛階段跟大陸一樣，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對外加工，也靠廉價勞動力。但是在台灣經濟起飛階段，貧富差距很低，因為政府怕出亂子，因此把更多錢分給窮人，後來經濟自由化，政府調節的功能少了，貧富差距反而拉開。

中國貧富差距有兩個形成因素，在第一級分配上利用廉價勞動力，窮人不能組織工會、不能討價還價，但更重要的是第二級分配，由於對外出口，錢都到政府手裡，政府手裡有那麼

多錢可以搞福利，卻只給官不給工人，它們根本不指望收買窮人，如此造成中國負福利的情況，越有錢的人福利越多。

如果政府把錢給工人，工資提高，廉價勞動力就沒了，所以它能把官員隊伍拉住，靠的就是給官員許多優惠。別人是劫富濟貧，中國是劫貧濟富，造成大陸與台灣都處在同樣經濟起飛的模式，但情況卻完全相反。

張木生（註：原《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改造我們的文化史觀》作者）說，中國採取對外加工，能不能一開始就從低端接軌，解決民生問題？他以前不敢說這個問題，現在能說：不能。因為這是中國唯一的優勢，否則中國雖然市場大，但購買力低，唯有勞動力便宜。所以無論如何要保持這優勢，而方法就是水漲船不高。共產黨也知道任何發展就是建立在欺負人之上，所以沒自信，但人總要討公道，窮人如果要造反，從道義上誰也阻攔不住，現在縣、區一級辦公大樓都豪華得不得了，成都市政府大樓給市長的辦公室就有 1000 平方米，全是民脂民膏，將來中國要出事，就不是佔領華爾街，而是攜家帶眷跑政府大樓住下了。

所以第一，今後中國政治改革不知道什麼方式出現，第二，一旦出現，肯定不會很太平。為什麼要歌頌戈爾巴喬夫？因為中國出了事，才知道戈爾巴喬夫是對的，他的作法避免了大的世界性危機。如果靠胡作非為結果轉型得很平順，那他們當好人真當錯了。如果共產黨對世界構成威脅還好辦點，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力量還能制住它，但這點我們都沒法樂觀。

這也給了民族太深的烙印。一個民族的性格與其經驗太有關，如果歷史經驗中好人打贏了壞人，這民族就很樂觀；如果民族經驗中，壞人過得好好的，好人過得差，加上中國人又沒有宗教信仰，無法在天堂裡扳平，大家只好學壞。

所以對未來的看法，我們都大同小異，現在能採取的抗

爭手段極其有限，對未來都不很看好。現在溫家寶到處講普世價值講政治改革，不管是真心還是作秀，多數人並不看好，因為在上層溫肯定是孤立的。現在溫家寶能到處講，中南海還沒封口沒趕他下台，一來是保守派對他還有點忌諱，二來是知道溫家寶折騰不起來。

我也假定共產黨能繼續下去，並且跟世界不發生大衝突，屆時中國無非成為地區霸權，台灣舉手之勞就要回來；就算它只管自己，停滯不前，要使後面的掌權者發起改革依然很難，因為積重難返，權貴集團會竭力阻止。

蘆笛：我補充幾點剛才遺漏的。第一，你說“以暴易暴”也強過“一暴到底”，第二，有暴力革命做威懾總比沒有好，第三，中國將來會成為起碼的地區霸權。第一條我不能同意。

胡平：當然不一定，有時後來的暴比原來的暴還壞。

蘆笛：不是壞的問題。以暴易暴，其實就是一暴到底（也可說是N暴到底），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中國從來都是暴力搶奪政權、維持政權到現在，這就是一暴到底，原因就是以暴易暴造成的，大家老覺得結束暴力只能用暴力。

胡平：這是另一種說法，不相衝突，我沒意見。

蘆笛：所以，知識分子必須完成基本的思想轉變，文明化最主要的一個改變，是知識分子先學會西方雙贏、妥協的大智慧，不要以為我把你的東西全搞光，我剝奪剝奪者，全面勝出，就是最高智慧的表現。辛亥革命開初其實搞得挺好，後來越搞越爛，就是因為沒有建立“不要趕盡殺絕、否則遺禍無窮”的觀念。將來知識分子起碼要在中共有改革跡象時，以協商的方式解決利害衝突。我相信中共政權總有混不下去、被迫改革的一天，屆時全民必須記取以前的教訓。

中共政權混不下去的原因：第一，經濟不可能永遠高速發展。現在完全是靠發展經濟維穩，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

靠民主機制化解社會矛盾。西方經濟一停頓，頂多就是佔領華爾街，而且還成了旅遊熱點，不會造成社會動盪。

那天有人跟我說，根據王朝的定律，一個王朝要維持幾百年，共產黨也算一個王朝，現已經坐穩，起碼要幾百年才會垮掉。我當時沒反駁，心想這兩者不可比，因為舊王朝有一整套軟件奴化老百姓，孔孟之道、因果報應、科舉制度等等，都是穩定軟件，但現在中共全靠收買，以為經濟發展了就沒事，只是這勢頭 10 到 15 年內一定會停止，一旦停止，局勢就開始不穩。

所以我相信，改革還是會提到議程上的，到時候不要又重演 1989 年、辛亥革命那一套，革命都是不必要的。必要的革命根本就不會發生。該革命的時候，比如毛澤東時代如果革命，我第一個報名參加，可是那會兒只有歌功頌德之聲，沒有武裝起義，到鄧小平改革開放時，大家反而膽子挺大，都起來鬧事了。

第二，共產黨現在並不是危機四伏的時候。共產黨最危險的時候是 90 年代初，朱鎔基上去大刀闊斧地惡性走資，將國有化企業都送給幹部的時候。我原來在的工廠就是這樣，原本公私合營、從資本家那搶來的國營企業，改制後送給了法人代表，以一兩百萬買下來。這錢本來就來路不明，買時還七折八扣的，到手之後光地價就賣了上億。我那些丐幫弟兄一下子墮入赤貧。老的還好，像我們這樣年齡段的就退休，交社保局，餓不死你，年輕的兩頭夠不著，沒法退休，一下子被扔向社會，其中一對青年夫婦很糟糕，窮到連電錢水錢都沒有，洗菜就到嚴重污染的池塘，天一黑就上床睡覺。

但我上次回去，這問題就基本消解了。中共雖然是不公平的政權，但整個經濟規模極大地擴大了，掙錢機會多，人民富起來了，極大消解了原來人為製造出的貧富不公困境。現在

的人並非海外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怨氣滿腹，社會也並非完全建立在掠奪弱勢階層上。中共狡猾的一點是，城市裡頭已經沒有工人階級，工人都是農村招來的，因此政府不用負任何責任。他們自己也覺得自己是第二職業，政府分地給你種，是你不願種跑到城裡來的。所以，如果因為經濟不好，在城裡丟了工作，政府不用負責任。所以共產黨的危機狀態還沒到來——經濟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問題，毛病才來。如果社會劇變，沒什麼好說。如果變化是緩慢地發生，先停滯，接著整個社會機構腐敗掉，就可能出現和平轉型的契機，到時咱們就得愛護這平滑過渡。

第三，中國稱霸的問題。我認為中共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自建國以來，除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從來沒有真正對外擴張爭奪領土，而是“什麼都可以談”、什麼都可以送，所以不會向南海、東海擴張。

中國真正要擔憂的，不是別國的人，而是自家人。中國的法西斯是土法西斯，不是洋法西斯。洋法西斯是對外擴張，咱們是專門幹自己人。如果將來在國民素質得到改善之前，就發生社會劇變，中國最可能出現的災難就是變成一個法西斯國家。南斯拉夫的米洛塞維奇怎麼上台的？就是靠煽動老百姓，社會出現種族衝突後，靠種族主義政綱宣傳使得選票暴增。所以，中共現在搞偽民族主義的欺騙宣傳，使得將來中國的災難，不會是威脅地區和平與世界文明，而是當政權崩解或急遽民主轉型後，弄一個米洛塞維奇上去，核爆台灣、大殺新疆人、西藏人。中共造的最大的孽，就是在馬列主義失去了凝聚力後，用大漢族主義宣傳作為替代國教。只要是漢族都信這套，將來肯定會引出嚴重後果。

所以，胡平說不管怎麼折騰都不會出現比現在更壞的局面，恕我不能同意：第一，他忘了，動亂可以造成比苟安下去更多的人命損失，尤其是在今天的核時代。“寧為太平犬，不

為亂離人”永遠是難堪的真理。當然，這種大實話只有我這共特才敢說。第二，托克維爾早就說過了，群暴猛於獨暴，暴民專制比暴君專制更恐怖百倍。第三，國內民主派的感召力根本比不上土法西斯與毛左，共黨真要垮台了，上去的只怕是那些人，根本輪不到民主派，而那些理想主義者只會比今日在台上的“犬儒”更可怕百倍。

“此時是中國最黑暗的時刻”

何頻：胡平你做一個總結性發言。

胡平：雙贏、妥協的觀念其實 80 年代就非常牢固，例如大學生上街遊行，中國什麼時候搞過這麼大規模的非暴力運動？沒人教他們，他們無師自通自學成才。八九民運是策略上激進，戰略上原則上一點都不激進，連開放選舉都沒提過，“六四”後曾有一段時間有些人比較激進，但馬上發現激進無法走下去，因為空間太有限，所以做了多少年牢的人都採取溫和策略，劉曉波就是代表人物。問題是現在的社會情緒不一樣，共產黨也把自己搞得沒什麼後路。20 年前說改就改，如果那時候選舉，儘管過去犯了多少錯誤，但至少沒有清算共產黨的問題，現在不一樣了，這份帳不算則已，一旦有機會了會怎麼算，就很難估計，別的不說，經濟上的清算總繞不開。

另外現在收買的因素很小，壓制的因素很大。這些年發財的人，要跟他談這些事，他們都很清楚，但他不願意跟你提，如果天下大變，這些人馬上會變一個態度，現在不提，因為他們覺得沒可能性，而且現在過得好好的，所以到時候他們的要求是否真能降到完全不計較、雙贏的程度，很難說，因為確實共產黨這些年做得太過份，一個政黨怎麼可能原來搞那麼野蠻的社會共產主義，之後又搞那麼野蠻的資本主義？要做到

這點，得無恥到什麼程度？肯定要非常黑暗才能維持。

隨著時間推移，就是經濟上停滯了，心態不改變，人們也不見得會上街抗議。長期以來總說中國如果出現經濟問題，人們就坐不住，其實中國已經出現過很多次經濟危機，但它就靠高壓，人們覺得自己站出來，肯定會受到打擊，而且日子也還過得下去，所以就不會站出來。一定要有一種更高程度的要求，或者是對對方反應抱持良性預期，人們才會這麼做。

現在的群體性事件，人少的時候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人一上千上萬，一定打砸搶，因為沒人相信能用和平方式得到理想結果，但人少時不敢鬧，人多了，法不治眾，誰也看不見誰，雖然知道打砸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可是只能趁這時洩憤，而且也沒有其他解決的辦法。所以大規模和平理性抗爭本身就很不困難。

從執政者角度來說，他們要進行改革的風險極大，收益則非常小，而且不改革也還能繼續混下去，所以更會傾向不改革；至於西方國家，劉曉波得諾貝爾獎後，胡錦濤訪美，奧巴馬在公開場合對這事一句都沒提，顯示已經退讓得相當過份，這情況是20年前沒法想像的，這還是美國，歐洲更不用說，他們還希望中國能幫他們一把；法國強調不會向中國投降，這就是掩飾，表明自己處在糟糕的劣勢中，他知道自己已經在讓步，只不過不願給人感覺輸得太多。

畢竟中國這麼大，廉價勞動力的資源還沒用完，所有西方國家的勞動力加在一塊兒都不如中國人多，而且對經濟危機，美國提不出一個解決辦法，或許西方經濟危機緩解了，但到頭來中國更強大了，因為西方沒有下決心怎麼對中國施加壓力，只想讓中國也保持穩定的狀態，才能使西方緩過經濟危機。

此時是中國最黑暗的時刻，共產黨搞到自己沒有後路，這種情況若持續下去，並不會變得更好，只會越來越壞，而且看

不出能如何轉變，所以除非中國出現一個大轉折，才有好起來的可能。中國既然已經走了這麼遠，最後發現放棄良心還能走得通，肯定會造成惡劣的逆向淘汰。

根據過去的經驗，暴力革命不一定會造成逆向淘汰，但現在這種情況則看不出怎樣不逆向淘汰，一個社會的正義本來需靠政府維持，懲惡揚善，但當政府不懲惡，且本身就在為惡時，底下的人就認為傻瓜才當好人，當大多數人都在違反規則時，能堅持道德感的人就會越來越少，中國人也缺少宗教信仰，這也是為什麼近幾10年來宗教在中國發展得厲害，不論是基督教、法輪功，因為有這種需要，法輪功原本是穩定力量，但他們人一多，中共又開始打壓你，使得這種社會穩定力量被極大地削弱。

由於目前中國走在錯誤的道路上，所以隨著時間的流逝並不會變得更好，中國離民主說遠很遠，說近也很近，拐個彎就到。現在的問題是上錯了路，要扭轉方向，需要大的轉捩。否則，就算好人上台了，也會發現要改革非常困難，能潔身自保就很不容易了。

吳敬璉（註：中國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就講，全國權貴私有化沒法解決，除非出現一個大的轉折，否則慣性就在那。大轉折如何發生無法預見，可需要各方面的人做各種各樣的努力，而轉折出現後是否更壞，不能擔保，但肯定的是，沒有大轉折中國好不起來。

“六四”後，有些民運人士一度主張不要打“六四”牌，就像台灣“2·28”之後，高雄事件之後，反對人士知道他們要是公開提出馬上就會被打壓，一點空間都沒有，但你若是暫時繞開不提，就可能打開一點空間。在大陸，很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就是用這種方式慢慢取得一些空間的，不過對於民運人士，對於“六四”的代表人物，你不提也不行，當局照樣打壓。

因為當局很敏感，他知道“六四”比“2·28”，比高雄事件更惡劣，他知道共產黨欠的債比國民黨多多了。

22年前福山（註：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政治經濟學家）寫《歷史終結》時多樂觀。那時候自由民主力量空前強大，有幾個人能想到20年之後世界格局會發生這麼大變化？

我之所以願意談這麼多負面因素，就是讓大家看清楚事情的惡劣程度，警覺的人會多一點，施加的壓力大一點，也許好的結果就多一點。如果大家都想搭順風車，以為這樣順著走，將來哪天情況就好了，那只會越來越壞，所以現在非得下決心，想辦法促進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或許我們不得不付代價，但是拖下去只會使抗爭更艱難，代價更高。

毛時代結束後，我最擔心的就是中國在經過文革這樣慘重的災難後還不能聚集力量衝破專制，而滿足於在繼續專制的情況下做有限的改進，那樣的話，以後若爭取民主就會更難。“六四”前我就寫文章說，如果沒有政治開放，沒有民主化，單搞經濟改革，中共官員們勢必會把他們幾十年決策錯誤的惡劣後果轉嫁給老百姓，同時又把老百姓幾十年來創造的財富挪到自己名下。92年鄧小平南巡後重新啟動經濟改革，那時我就覺得這樣下去肯定會權貴私有化。但起初我還沒怎麼明確提出這件事，也是希望妥協的餘地大一點。不過共產黨自己太自覺了。當然，就是在今天，一種比較溫和的妥協也不是全無可能。2008年，國務院曾出台過一通知，要求各級官員將不義之財交出來，如果幾個月後不交，再查出來，就必須嚴懲。可見它也知道不義之財是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礙，只是底下沒人理，所以若沒有極大的壓力，根本不會有任何的退讓。雖然中國發生良性轉變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但我們還是該為此努力。

蘆笛：我基本不同意你的看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

了天翻地覆的社會進步。

首先，毛時代公民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了，既沒有政治自由，也沒有經濟自由。而今天公民獲得了很大的經濟自由，私有企業產值已佔 GDP 的大頭，社會極大地富裕了，人民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公民享有的政治自由也絕不是毛時代敢想的、今天國內網上說什麼的都有。要在過去，早就被割了氣管槍斃了。

其次，社會結構也改變了。中國社會已經從一個一元化社會變成多元化的階級社會。毛時代的中國是奴隸社會，像太平天國一樣，人民不管職業如何，只有一個階級，都是奴隸，用馬克思的定義來說就是奴隸。但今天中國出現各式各樣的階級和利益集團，民間資產階級在短期內從無到有地冒出來，迅速長成龐然大物，實力遠比 1949 年前雄厚；多元化聲音也產生了，根本不是 80 年代一元化社會能比的，如今中國社會的自由度極大地提高了，到網上一看，我覺得很受鼓舞：什麼聲音都有，而且深思明辨，所以應該也看到社會巨大進步的一面，不能只看道德敗壞、統治者態度僵硬的一面。剛才說專制社會有多種多樣，確實如此，它是一個很複雜的集合概念，從開明專制到極權制度都可以籠統稱為專制，但內涵完全不同。香港原來是專制社會，它沒有實行民主，但它是個自由社會。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在向開明專制過渡。

第三，因為社會的多元化與物質主義化，中共已經從過去的邪教組織蛻變成了個世俗利益集團，其統治已經極大地弱化了，對人民的控制鬆弛了很多。在毛時代那種單一的奴隸社會中，要實行全面極權控制、剝奪人民的政治經濟自由很容易，但現在這套不靈了，統治者根本就管不過來。他們已經從毛時代的主動出擊、主動迫害人民、三天兩頭無緣無故變著法兒地收拾你，變成了如今的消極防堵。只要你不去找政府的

麻煩，它也就讓你安安靜靜地過自己的小日子，允許你發財致富，這也是在毛時代根本不敢想像的。這進步連彭定康都承認，記得他在跟大陸青年座談時說：“不問政治的權利也是基本人權。”確乎如此，毛時代咱們連不問政治做“犬儒”的基本權利都沒有。這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

這些都是不能否認的基本事實吧？出現了這一系列偉大的社會進步，到底是統治者主動讓步的結果，還是人民鬥爭來的？89年鬥爭了一次，鬥出了什麼好結果？死了那麼多人不說，原來計劃中的政改馬上就凍結了，到今天也沒解凍。

所以，不鬥爭，社會一樣會進步。

另外，如今的民智水平也不是當年可比的，現在出現的思想大腕、青年才俊，是80年代的蠢青、憤青能比的嗎？根本不在同一個水平。相對於80、90年代，現在的知識分子聰明瞭很多，如果按你的理論，咱們只會越來越糟。你還在用毛時代的眼光，以為凡是理想主義者都是好人，大家滿腔熱血，“八九”學運就是毛革命的自然延續……

胡平：完全不是，根本相反，我們是參與者很清楚。“八九”學運和毛革命太不一樣了。從79年民主牆運動，80年自由競選運動，甚至從76年的四五運動，中國的群眾運動就和毛革命根本不一樣了。這裡暫不多談。至於現狀，且不說“六四”過去22年了，至今這事還在壓著，也不說異議人士一直受打壓，就說層出不窮的群體事件，官員的跋扈囂張和腐敗，這種專制怎麼談得上開明呢。我引用過歐文·豪（Irving Howe）的話：極權統治有三個階段，1，烏托邦，狂熱；2，大規模的恐怖，人間地獄；3，狂熱和恐怖都被耗盡，於是人們變得玩世不恭，政治冷感。狂熱和恐怖不可能持久，就連毛本人到了晚年也說要安定團結了。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靠人們的冷漠而維持。因此，當人們滿足於可以不過問政治可以悶聲發大

財，那恰恰是專制者所需要的。不錯，今天中國有了很大變化。很多東西是可以看做擴張自由的基礎。但這些東西反過來也可以成為暴政的基礎。托克維爾講過：如果人們只顧自己的事情，不關心公共的事情，只追求物質的改善，只要政府還肯搞經濟，隨你政府還幹些什麼事，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他們都不聞不問，聽之任之；唯恐自由多了會影響他們的物質福利，一見騷亂就準備放棄自由，那麼，正是這種心態構成了暴政的土壤。

關於我和蘆笛誰樂觀誰悲觀的問題，我覺得是我對現狀更不能認可更不能接受，對現有的趨勢更不看好。我強調需要大的轉變。

蘆笛：簡言之，你施加壓力的手段有限，而且威懾作用也未必奏效，還不如自然變化引起的社會進步。

何頻：我最後說幾句。今天聊的，或許在10年、20年後也是非常重要的紀錄。蘆笛是現今海外網絡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胡平則毫無疑問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民主理論家，你們所爭論的，有的是經過你們深思熟慮，有的是點出彼此感到困惑之處，但嚴格意義上，談不上辯論，因為事實上，在價值觀上並沒有根本對立的東西。

但你們的描述有點出乎意料。一個主張民主是恩賜的人，反而見到許多希望；一個主張爭取民主的人，卻顯得比較悲觀。蘆笛說社會變化使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能動用的資源越來越少。你只是不承認，社會可能產生變革的積極因素，這個積極因素實際上是社會壓力造成，而不是當權者恩賜。

蘆笛：我說的讓步包括被動讓步和主動讓步，被動讓步不一定是人民鬥爭的結果，一個新發明產生，比如互聯網，從統治者主觀願望來說當然不願意，但他控制不了。

何頻：不論如何，你還是比胡平樂觀一點。你另一個重要觀點，是社會有機會產生良性變化時，社會和解力量應該成

為主導力量，你很擔心再來一次惡性循環。

不過，歷史和現實一個根本性的不同在於，社會條件不同，人民思想觀念也不同，再一次社會變革的基礎也完全不同，像利比亞雖然發生卡扎菲被殺事件，但此事並非得到所有人的歡呼，國際社會馬上對此事啟動調查，未來一個民主政權產生時，很難想像法西斯政權能再建立起來。

胡平顯得比蘆笛悲觀，因為胡平主張民主，在推進民主化過程中遇到的挫折比主張恩賜的大一些。但胡平這樣說，可能更在於點出這種擔憂：要改變這樣的局面，不僅中國民眾，而是整個國際社會都需更有警惕心。

我早些時候見了美國大學一位政治學教授，我說中國共產黨今天之所以這麼囂張，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政府太軟弱。人類社會最近兩次逆流，第一次，中國共產黨能在中國境內起來，與當年資本主義社會遇到困難有關，這次資本主義社會確實又遇到問題。

但我比較樂觀，美蘇對立最終沒讓蘇聯成功，就是因為在國際大環境下，兩國還是一個和平的競爭，時間稍長一些，共黨國家比不過。中國在一段時間內，很難形成足以威懾國際社會的力量，如果中國以意識形態侵蝕西方社會，西方社會也會進行反彈，時間稍長一些，中共是注定撐不下去的，所以未必要這麼悲觀。

或許 10 年、20 年之後，我們可以再來驗證這一次誰說得對一些。

一黨制度下解決腐敗更難

中國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老百姓抱怨連連，國家主席胡錦濤不僅多次要求“改善民生”，更親自考察民生，專家預估，中國通貨膨脹問題至 2011 年底恐怕仍在，中國政府為了“維穩”，不願大幅變動人民幣匯率，但民怨若未得到抒解，共產黨內高官藉機領導民怨，將相當危險。

廉租房政策遭質疑

新的一年到來，但中國老百姓的民生問題卻未翻開嶄新的一頁。為了深入瞭解民情，胡錦濤親自考察北京月租 77 元人民幣的廉租房，也向民眾保證，“黨和政府特別重視民生問題，已採取一系列措施。”

然而，胡錦濤的考察行動反而招來民怨，民眾指責 77 元的廉租房是“天方夜譚”，該區的房子其實房租高昂，網上更流傳該住戶郭春平是任職交警大隊的公務員，並不符合廉租房資格。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谷雁翔對《明鏡》解釋，與經濟適用房相比，廉租房房租更低，主要幫助買不



谷雁翔 (個人網頁)

起房子的低收入戶。廉租房只租不售，且房源較多樣化，並非都是新建房屋。

因此，谷雁翔表示，廉租房確實存在，但腐敗也存在。“大家對廉租房陌生，關鍵是真正到老百姓手中的廉租房比例太低，如果一個城市裡有10萬戶夠格住進廉租房，但實際上只有幾千人住進，其餘90%以上的人沒法住，大家會相信

有廉租房嗎？”

雖然中國政府對廉租房住戶資格的審查有一套標準，但有錢有權者仍可透過管道租到廉租房，住戶資格審查機制不到位。谷雁翔指出，想解決低收入戶租不到廉租房的問題，就要改善腐敗，但腐敗卻是一個暫時解決不了的問題，

“至少過去五年，很多人並不窮，卻弄到了廉租房，並利用這個項目賺錢，美國政府在50、60年代也有這樣的項目，也有相當有錢的人住進了廉租房，美國政府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才可說解決了腐敗和黑社會的問題，但中國和美國的制度不一樣，在中國的一黨制度下，要解決腐敗會更難。”谷雁翔對《明鏡》說。

利率調升可能性不大

廉租房新聞引發的民怨激昂，反映出“民生”確為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北京高層也意識到這項議題的重要性，胡錦濤不僅在元旦賀詞上強調民生工作，在官方最新一期《求是》雜誌上，以及其他場合的講話中也多次提及改善民生的議題，“保民生”看似為 2011 年的政府工作重點。

中國 2010 年出台的經濟刺激方案，雖然保住了經濟目標，但卻出現房價和食品價格飆升的情況，比起廉租房或是房價高漲的問題，通貨膨脹引發的食品與日用品高漲的問題，更是廣泛影響中國老百姓，且同樣累積了不少民怨。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元旦期間冒雪拜訪內蒙古時，當地民眾便抱怨了物價飆漲。

有分析預估，未來幾個月的通脹率可能高達 7% 至 8%，使得北京決策者不得不大幅調升利率。谷雁翔認為，利率會調，但大幅調升不太可能，中國政府不願意用利率緩解通脹，就是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太快，否則將損害有上千萬人就業的中國出口業。

“政府的想法是保持政治穩定，因為如果出口企業失去競爭力，幾百萬人失業，會造成政治不穩，所以政治穩定的代價要由廣大的存款客戶來付。”谷雁翔對《明鏡》解釋，不提高利率，許多存款人將得到負利息。“比如一年的利息是 1.5%，但通貨膨脹超過 5.5%，老百姓實際上得不到應得的利息。所以為減少失業，傷害了存款人，支持了出口業。”

若不解決存款縮水的問題，到頭來也會出現政治不穩的情況。谷雁翔表示：“這可能是一個潛在問題，所以政府不解決也不行，比較可行的是調升準備金率，調升這一項目的幅度也可能比調升利率的幅度大，用準備金的方法很有力量，可以緊縮貨幣供給。”

存款準備金為存款金融機構必須繳存中央銀行的法定準

備金，存款準備金率則是這筆金額佔該機構存款總額的比率，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將減少銀行的可貸款資金量，進而減少貨幣的供給量。

不過另一方面，若人民幣升值，將使中國企業更有能力收購外國資產，根據《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報導，愈來愈多中國企業開始在美國設廠，國際貨幣基金（IMF）預估，2012年中國海外投資將首度超越所吸引的外國投資。胡錦濤2011年訪美時，也視察了伊利諾州聘僱美國勞工的中國汽車零件公司“萬向”。若人民幣升值，將持續刺激中國的海外投資。

谷雁翔對《明鏡》表示，人民幣升值確實能提高中國投資能力，但是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把穩定放第一位，而非將“買便宜貨”放第一位。“問題在於，中國的進口企業可以在升值中得到好處，但是出口企業人員失業，會威脅政治穩定，這是更頭疼的大事。”

此外，進口企業並不直接關係到民生。谷雁翔表示，中國的進口品，直接到老百姓手中的不多，除了大豆、雞肉，以及對有車者影響較直接的石油外，其他的進口品主要技術相對高的機械，例如飛機。因此相對來說，出口更重要。

通脹問題危及政治穩定

谷雁翔認為，導致中國物價持續高漲的原因，主要有幾點：首先為前一段時間政府避免經濟衰退與高失業，大量注入貨幣，使得貨幣發行量過大；第二，民眾見到政府發行了這麼多貨幣，有通貨膨脹預期；第三，糧食價格上漲快速，民眾普遍緊張，進而囤積貨品，加劇物資緊張。

雖然中國政府著手抑制通脹，但收效不大，《華爾街日報》

指出，北京市政府針對通脹出台一項舉措，從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將最低工資從 960 元人民幣（145 美元）提高至 1160 元，或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物價上漲對人們帶來的影響，但同時也可能會煽動人們的通脹預期。高盛則指出，中國政府抗通脹一直慢了一步，要到 2011 年上半年即將結束之時，才可指望政策收緊和通脹形勢明朗化。

谷雁翔對《明鏡》表示，不只高漲的物價令民眾不滿，中國統計通貨膨脹的加權平均數，不能充分反映食品價格的上漲，引發了老百姓憤怒。“老百姓認為官方的數據報 3%、5%，但 2010 年年末糧食價格漲了 100%，政府說電視機的價格沒漲，但電視幾年才買一次呢？”

谷雁翔認為，如果老百姓的憤怒引發政治問題，可能會產生政治上的變化，讓中國成為 90 年代初的蘇聯和東歐，因此若政府不採取有效的行動，共產黨內的高官可能有人像俄羅斯前總統葉利辛一樣站出來，領導群眾的憤怒，藉機會站上政治舞台，甚至自己當起總統。“這會是很危險的事，因為不敢保證政權改變後國家會穩定，到時候和中國有主要投資、貿易的國家麻煩也大了。”

2011 年通脹仍是問題

北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表示，2011 年是進入“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短期內，宏觀政策的重點依然會以抑制通脹為主，而 2011 年的通脹壓力會比較大，上半年通脹壓力會大於下半年；下半年開始，通脹壓力會有所下降。

即使通脹壓力開始下降，谷雁翔也不認為 2011 年底通脹問題就能解決。“因為人民幣不可能大幅度升值，糧食也不可

能馬上增加，中國還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做農民工，想種地的越來越少，中國農產品從農民手中拿到城市的流通環節，短時間改變不了，從農民手裡拿來是一塊錢，流通要拿一塊錢，進入城市就變兩塊，因此想降低流通成本不是容易的事。”

谷雁翔對《明鏡》表示，政府沒辦法突然增加產品的供給，除非願意大量進口。如果通貨膨脹嚴峻，中國政府很可能從美國大量進口糧食和雞肉，但大量進口蔬菜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大量進口後，物價上升，國際糧價跟著上漲，因此想以進口來解決通貨膨脹，2011年年底恐怕做不到。

摩根史坦利前中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財新英文週刊”(Caixin)撰文指出，引發下一次金融危機最可能的兩大因素是美國的主權債務或中國的通脹。若只論中國的通脹，谷雁翔認為不可能引發金融危機，一來是世界各國都進入復甦狀態，二來是中國不管政府、企業、家庭，都沒有沈重債務，美國的金融機構和個人卻有很多債務，因此一旦出事，環環相扣。“中國通貨膨脹不會造成大家連鎖的崩潰，只會造成低收入的人憤怒。”

放眼2011年，谷雁翔對《明鏡》指出，復甦過程總是強一陣、弱一陣，因此現在大家看到的是復甦在減弱，但全球經濟復甦的大方向不會變。

難說中國一黨專制造成腐敗

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清廉指數的成績上卻不怎麼亮眼。除了制度層面亟待強化外，專家認為，中國人好面子、怕吃虧的心態也應摒除，從教育上培養倫理道德觀，“內外兼顧”，才是遏止腐敗的最佳手段。

一黨專制非腐敗根源

總部位於德國的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2011年10月底發布了“2010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新加坡、丹麥、新西蘭三國並列第一，中國在這份包括178個國家和地區的榜單中排名第78位，美國首次跌出前20名，列22位，香港則在第13位，台灣排名33，澳門排名第46，日本排在第17。倒數第一的是索馬里。

中國雖然經濟上得到極大的發展，但卻出現腐敗金額增大、腐敗層級往下延伸的趨勢。批評者指出，中國腐敗的根源為一黨專政，在“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情況下，權力過度集中，無法得到有效的制衡，濫用權力導致腐敗的現象因而產生。



孫雁 (孫雁提供)

但美國紐約城市大學 (CUNY) 皇后分校政治學教授、中國廉政研究領域專家孫雁認為，各個國家情況不一樣，很難說一黨專政確實造成腐敗。孫雁在接受《明鏡》專訪時指出，有的一黨專政國家，比如新加坡，廉政成績排第一，但有的國家並非一黨專政，例如印度，腐敗情況比中國還嚴重。“造成中國腐敗的原因是

綜合的，但最重要的還是經濟模式的轉變以及制度建立的腳步沒有跟上。”

雖然一黨專政與腐敗的關係尚無定論，但如果中國轉為民主制，貪腐現象是否會減少？孫雁指出，當前情況下，如果中國實施民主選舉，仍會出現貪腐，比如農村選舉辦了，還是將有錢有勢、腐敗的人選上了，而且不一定有了民主制度，貪腐就會少一些，甚至可能更嚴重，因為民主制度下，錢的作用更大了，富人與官員請得起律師，有辦法令自己無罪開釋，但若在一黨專政的共產黨統治下，一旦真的犯了罪，審判起來仍比較嚴格。

不過，民主制度也包括了言論自由與輿論監督，為打擊貪腐的助力之一。孫雁提醒，遏制貪腐肯定要做好外部監督，尤其是媒體監督，但不能將其理想化。媒體在西方比較規範、成熟，對打擊貪腐自然起到一定作用，但媒體在新興的民主體制下，往往會被黑幫、被金錢壟斷。

“例如東歐和蘇聯剛開始民主化時，幾乎都是黑幫壟斷媒體，如果誰要揭發腐敗，馬上僱黑幫把你殺了，許多媒體人員

因此喪命，其實中國已經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當地媒體報導了什麼，地方的土霸王、土官就把東西搜走或恐嚇，所以一旦中國真正自由了，這種情況會更多。”孫雁說。

全球化幫了腐敗的忙

中國《財經》在近日公佈的一份“23年來120名省部級高官腐敗樣本”中，總結了中國貪腐情況在不同政治條件下的時代特徵，報告指出，2003年至今（2011年），官方為了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管理和監督，於2006年印發實施《關於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要求官員報告個人及家庭的具體事項，包括出國移民等，但在當時沒有起到明顯效果。許多官員的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裸官”一詞應運而生。

孫雁指出，中國貪腐的手法已日益高明，數量日益龐大，如今全球化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貪官將貪污的錢轉到國外配偶或子女身上，可說“西方幫了這些人不少忙”。“他們一出事，就先把子女、親屬弄到國外，外邊的證件也弄好。政府的政策支持合法的資金流動，但在此情況下，非法的資金也容易流通，所以全球化讓這些人擁有逃離的戰略。”

在這一點上，孫雁認為中國應該加強與西方國家的溝通，瞭解西方的制度運作，才能消除西方的疑慮，合作查案，擬定遏止貪污的方式。

《財經》指出，2010年7月，《關於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重獲修訂，其中第三條明確規定：領導干部應當報告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然而，由於規定所要求報告的內容並不公開，公眾無從監督，執行力度有限，被認為治標不治本。

孫雁認為，想改善貪腐，法案當然要建立，但目前中國的

法案不嫌少，如果能把已有的法律徹底執行就已經很不錯，問題在於中國的法案建立了卻不執行。“現在不是通過一個法案就能解決問題，中國人一般不太守法，政府也查得不嚴，通過一個法，比如要官員公佈財產，下面的人辦法很多，可以將財產轉移掉、隱藏掉。”

因此，從制度面著手或許是好辦法。孫雁指出，打擊貪腐要多管齊下，循序漸進，但改善司法制度應該是首要條件，除了建立好的司法制度外，也要建立好的隊伍，執法要嚴格，不認情面，不靠關係。“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司法獨立，不讓地方黨部派遣，不擔心財政問題，獨立性強，執法的膽子就大。”

內外並行治腐敗

除了外部的制度外，也應考慮一個人內在的貪念與虛榮心。孫雁指出，中國文化中有許多負面的特質，比如從眾行為，見到他人有什麼，自己也想有一份，永遠不滿足，什麼都要最好、最大，舉凡送孩子出國留學、全家移民、找情婦、買豪宅，不管實際移民後的生活如何，不管房產買多了只是閒置，在怕吃虧、好面子的心理下，就是想模仿他人。

“這些人應該研究一下跟從的後果是什麼、到底有什麼好處，我看了很多留學生到這來生活其實很苦，他們的家人來了也不會說英語，只在中國城轉，好像待在監獄裡一樣，所以中國人這種貪、這種比較的心態一定要克服，為此犯罪沒必要。”孫雁指出，與中國比起來，有的美國人生活不如中國人好，但在美國大家不太追究名牌和面子，也就沒有很大的動力去腐敗。

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功利主義，也將道德感推到一旁。孫雁表示，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造成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否

則毛澤東當政時更壟斷，更不民主，但當時誰也不敢開後門搞腐敗，之後的市場改革經濟開了很多機會大門，國家的控制力下降，機會多了、金錢追求的刺激也大了，使得貪腐的胃口不斷增加、手法也比改革開放剛開始的前兩個十年要高明得多。

“現在非常功利主義，共產黨基本上放棄價值觀（的塑造）了，共產主義沒人信了，但也不找一個東西來代替，其實應該把傳統孔老美德拿出來，建立一套系統。”孫雁以美國為例，指出美國雖然也是經濟發達，但市場化、制度化程度高，政府參與得少，使得執行面上出現的腐敗現象減少，加上教育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灌輸倫理教育，在實踐上，例如選舉時，也相當重視候選人的品格。“制度是外在的，動機是內在的，如果沒有一個道德底線，內部問題存在，即使外在制度再怎麼改，還是會犯下罪去追求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

借鏡新加坡、香港

美國杜克大學終身教授史天健指出，從不同國家民意調查結果來看，厭惡貪官和不信任政府之間，並不存在強烈相關性。例如美國人在“水門事件”曝光後，對政府的信任下降，但主要是針對政府官員，而非整個制度。

孫雁認為，在中國來說，下層農村的人不太瞭解整個制度，看到的都是村官、縣官的作為，因此確實可能針對個人、而非制度。但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學者可能會看到更大的框架，都知道個人不是唯一的問題。貪腐也影響到中國政府的威信，不過，經濟成長等其他因素同時也將威信受到的損害抵銷，加上大家生活越過越好，越來越多人在私有企業、外企工作，這些企業的腐敗不常見，許多老百姓的住房是私企的開發商所開發，並非由政府分配，因此除了在公企工作以及有拆遷問題的

人，其餘的民眾和政府接觸不多，對腐敗的感受也沒那麼深。

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是中國多年來呼喊的一個口號，孫雁表示，反腐是政改和經改的動力，雖然政府在文化大革命後，循序漸進做了不少改革，但有的改革沒達到目的，孫雁認為，其中政改最重要的，或許是限制中宣部的權力、擴大人民說話的空間。讓人民說出不滿，是抑制腐敗的重要機制，也能促成政府做出更好的決策與更好的監督機制。

“這樣做不需要擔心社會不穩定，把怨言說出來，雖然問題沒解決，至少解了氣，社會反而可能更穩定。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就是以言定罪，現在仍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這是應該首先改掉的地方。”孫雁說。

因此，孫雁總結，想改善中國的貪腐情況，首先是賦予人民說話的權力，其次，讓司法和媒體獨立，第三，讓黨內不同派系公開競爭。

如果要以其他國家借鏡，孫雁認為最好的例子是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和香港的清廉排名很前面，而且他們都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他們能做到，中國肯定也能做到。”孫雁建議將新加坡和香港的退休人才調到中國，安排在各個省的紀委位置上，輔導反腐，由於這些人在中國沒有“關係網”，但有經驗、說中文，對中國的反腐很有幫助。

不過，在交出權力的過程中，肯定有人心有不甘。孫雁能理解這樣的心態。“一個國內的反腐人員恐怕不願意讓一個外來的人輔導你、佔你的位置、削弱你的功能，所以如果有一點中央權威反而好，現在國內很多查案查不下去，就是對方背景太多，但要他們獨立，在中國這種關係複雜的文化上又很難做到。”

孫雁也提醒，在改革過程中，應照顧失去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不是壞事，是很現實的事，因此也應顧及到在政治改革

中犧牲的人、失去利益的人，要給他們另外的出路，這樣才能為政治改革鋪平道路。”

中國權錢交易越演越烈腐敗滋生

中國的經濟改革成績有目共睹，但經濟改革是否也帶來了嚴重的貪腐？反過來說，貪腐是否威脅到中國的經濟發展？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前主任張煒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在沒有公權力干涉的平等、自由交換的市場中，不應該存在腐敗，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權勢經濟產生，加上政治改革沒有跟進，缺乏對權錢交易的監督與懲治，貪腐自然生成。但貪腐卻不一定絆住經濟的發展，只是長期而論，肯定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與矛盾。

以下為《明鏡》專訪內容：

經濟改革成貪腐溫床？

明鏡：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造下，誕生了一批利益團體，由於計劃經濟不能賦予他們壟斷租金、收取賄賂的機會，所以他們不願退回計劃經濟。您是否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確實造就了貪腐的溫床？

張煒：經濟改革造成貪腐的溫床，這個說法過於簡單化。

常有的情況是，兩件事情同時發生，但先發生的那一件事未必是另一件事的結果。從時間序列上看，經濟改革確實在先、貪腐在後，但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最重要的一點，是作為經濟體的組織在市場上是公平的、是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交換的。

從理論上來講，如果真是公平、自願的交換，不應該存在腐敗，所以要從另一個角度尋找腐敗的根源，在我看來，是權勢經濟，而不是經濟改革造成貪腐。過去在計劃經濟下，計劃部門的領導人手中有權，但由於沒有市場，他們的“權”無法轉化為“錢”，在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出現金錢、市場的概念，有了市場後，他們的“權”轉化為“錢”。

這是從表面來分析，往更深層看，實際上是政治改革沒有跟進，所以缺乏對權錢交易的輿論監督以及司法的嚴懲，使得權錢交易越演越烈，腐敗自然發生。

明鏡：您提到權勢經濟造就了貪腐，是不是能說，中國的集權制度加上未成熟的市場經濟，令腐敗滋生？

張煒：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可能存在貪腐，西方國家，尤其法國高層官員裡，也常出現貪腐情況，但貪腐面積遠不如中國這樣大，所以貪腐在兩種情況下比較嚴重，一個是過去計劃型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一旦政治改革不到位，沒有輿論監督，沒有獨立司法來懲處，貪腐一定會猖獗，從前蘇聯就可看出，貪腐者利用私有化過程大量侵吞國有資產，中國的貪官也利用價格、物資供應的雙軌制，大量將國家資產變為己有。

另一個情況，不存在經濟轉型問題。在完全集權的國家，如非洲、拉丁美洲國家，採用完全的市場經濟，雖然貪腐也會存在，但比在轉軌過程中的國家貪腐情況要小，主要集中在高層官員，而轉型過程中國家，從上到下的各級政府官員都有

貪腐情形。

明鏡：您提到一些集權、擁有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貪腐程度比較輕，我們知道，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短時間內能達成，經濟改革或許比較有希望。如果中國也進入完全的市場經濟，是否貪腐情況會減少？

張煒：沒有政治改革，貪腐肯定很難減少。上世紀 80 年代，貪腐成為中國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這也是 89 年六四群眾運動興起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對貪腐的不滿，80 年代開始，經過 20 年演進，中國市場經濟的範圍越來越大，計劃經濟越來越小，但中國的貪腐是否隨著市場經濟的份額擴大而減少？答案是沒有，反而是越演越烈。所以單有市場經濟，不構成消除貪腐的溫床，因為這樣的市場經濟在有權力干涉的情況下，不可能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

官員貪腐效率不一定低

明鏡：反過來說，貪腐是否威脅到中國的經濟成長？

張煒：貪腐與經濟成長沒有直線的關係。有人把貪腐稱為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在計劃經濟下，這些官員不辦事，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用金錢來“勾引”他們辦事，而且因為集權體制，官員辦起事來效率相對而言比較高，所以有的國家在貪腐情況下，效率不一定特別低。但權錢交易不好的一面，是利用自己的權力掠奪國家的資產。

看看當今的中國。中國辦起事來，速度還是比較快，但投資者要進入一個貪腐的國家，還是要權衡一下成本與收益，因為將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法律制度不健全，搞得不好會有身家性命的危險，但只要有高額利潤、只要買通官員就能讓事業迅速發展，將提高投資者進入這類經濟體的動力。



張煒（資料圖片）

從中國過去 30 年發展情況來看，中國的貪腐從某種意義上不是構成妨礙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來講，可能還起到促進作用，但這裡面存在嚴重的社會不公、更大的社會矛盾、未來成本更高的社會代價。

明鏡：所以即使短期看，貪腐不一定都帶來壞處，但長期來說問題很多？

張煒：肯定是這樣。而且有的企業家本來就沒有長期的規劃，採取短線策略，利用貪腐，買進市場准入、買進特權，賺了錢就跑，容易引起民憤。

明鏡：您提到金錢能促使官員辦事，您是否贊成高薪養廉？

張煒：如果政治不透明，高薪養廉就是一句空話，就算給了高薪也不能養廉。最近有一個研究，中國現在沒有表現出來的收入，大約佔國家所統計的國民收入的 30%，也就是沒有表現出來的收入都到了中國官員的口袋裡，中國官員的人數在總人口中只是一小部分，可見他們的收入很高，所以如果沒有政治透明，人的貪婪是無限的，拿到高薪也不可能廉潔，只有法律、輿論的束縛才能廉潔。

明鏡：所以讓官員財產申報公開的“陽光法案”有必要建立。

張煒：絕對有必要，但沒有真正的透明度，沒有獨立的監

督系統，“陽光法案”很難做到。目前中國政府主張官員的收入向上級曝光，而不向民眾曝光，這個作法不可理喻。中國官員害怕民眾瞭解實際情況，因為貪腐面太大、太廣，他們沒想出好辦法來赦免貪腐的“原罪”，比如過去十年家庭財產大大超過參加工作以來的合法收入來源，要如何去解釋超出的部分？如果曝光，老百姓就提出質疑，合法性就出現問題，中國政府就面臨如何向民眾解釋非法收入的局面，如果不曝光，收入永遠不可能變得合法，而公佈官員財產的法案就是一個沒有作用的法案。

百姓對貪腐無法長期容忍

明鏡：您講到官員財產向民眾曝光，其合法性可能出現問題，所以中國官方一直避免做一些令社會不穩定的事，您認為，社會穩定跟透明度之間有關聯嗎？

張煒：長遠來講，社會越透明，越穩定。透明後，老百姓知道事情真相，知道事件發展的方向，就不會那麼急躁。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沒有透明度，老百姓不但不認為官員好，反而覺得他們更壞，因為身邊見到的都是貪腐，所以老百姓會有嚴重的抵觸情緒，因此提高透明度有利社會穩定，而且官員們不得不有所顧忌、行為會收斂，能減少社會摩擦和矛盾，但現在共產黨將穩定當作一個藉口，他們講得是壟斷國家權力的穩定，這樣的穩定和老百姓要的穩定，不是完全沒有關連，但有差別，這點很多人不清楚，以為一談到穩定，就是對所有人都有利的穩定。

明鏡：有分析認為，老百姓的不滿只針對個別官員，只要老百姓生活改善、有錢賺了，他們就不太會去質疑國家的威權，您也這樣認為嗎？

張煒：這點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沒道理。確實一開始的時候，老百姓通常是質疑個別官員，但隨著時間推移，如果貪腐現象比比皆是，老百姓肯定會質疑整個制度。另一方面，雖然隨著經濟整體的增長，老百姓的收入能跟著增長，他們對貪腐的容忍度也會高一點，但不是說老百姓喜歡貪腐，而是害怕社會變動後，自己的收入下降，所以希望維持現有的狀況。

但這些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很高的環境損害為代價，分配也越來越不均，這情況與當前貪腐的政治制度有密切關係。中國已經有 30 年的經濟增長，已經是很大的奇蹟，未來增長速度一定會放緩，但貪腐的官員還佔據權位，貪婪心態不會放緩，屆時不同收入之間的衝突會越演越烈，老百姓的容忍度會大大降低，中國就會出現大問題。

明鏡：有專家認為，目前的全球化讓貪官將貪污的錢轉到國外配偶或子女身上，可說幫了這些貪官一個忙，您是否認為全球化的情況下，貪腐有了新“出路”？

張煒：全球化是官員用來貪腐的渠道，但全球化本身是個中性的東西，不太能說幫了忙，不過確實提供了這些人轉移資產、隱匿資產的方便，但如果真正做到新聞透明，在任何地方的資產都會被揭露出來，從台灣前總統陳水扁任期間的貪腐被揭露來看，就知道要查出貪腐並不是很困難，所以全球化在短時間內可能開闢一條隱匿資產的渠道，但真正做到訊息透明的話，就不會阻礙偵察貪腐、懲處貪腐。

輿論與司法獨立是制衡貪腐要素

明鏡：中國如果要遏止貪腐，應從哪些方面著手？

張煒：輿論和司法獨立是兩個根本的要素。中國的問題是沒有權力制衡。當然，如果輿論造謠的話，還有獨立的司法在

後面，這在西方有一套嚴格的法律，是人類在歷史演進當中不斷發展出的有效制度，很遺憾，中國現在在政治上拒絕這個制度。

其他技術性原因，還有如國家審計制度、會計制度需要改進，但我認為政治變革應該在先，技術細節總會跟上，現在西方已有現成技術可學習。

明鏡：您身在英國，英國有什麼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其他國家又有什麼是中國可以借鏡的？

張煒：英國的法律制度很完備，英國的輿論也完全不受政府掌控，而且在會計、審計制度上，相對而言比較嚴謹。

其他國家，有的民主，但沒有完全的輿論自由，比如新加坡。新加坡是小國，比較容易管，大家眼睛互相盯著，很清楚發生什麼事，所以在新加坡個人的影響力非常大，他們不是西方模式下完全的法治國家，但新加坡比中國進步，我相信隨著時間推移，新加坡會逐漸向民主國家發展，這是中國第一步可以學習的。

台灣也值得大陸學習。台灣正在實現政治制度的成功轉型，在民主發展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問題。民主剛開始發展的階段，貪腐現象曝光，可能會引發民眾的不滿，表面上可能出現社會不穩，但這是一個國家向民主社會、向對老百姓來說更公平的社會演進過程中，不可少的階段，只要對轉型當中的各種問題處理得當就行。

明鏡：有專家認為，中國的反貪腐法律不嫌少，問題在於中國的法律建立了卻不執行。您是否也這樣認為？

張煒：中國是根本的法律問題。一些比較細節的法律，如貪污罪如何判刑，這是有的，中國這方面的法律確實不弱，但更根本的法律，比如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制衡，對民主選舉、新聞自由的保障，像這種嚴格制約政府官員權力的法律，

中國是缺乏的。

政改應該全面啟動

明鏡：您一開始提到，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腳步，是造成貪腐的深層原因之一，對於中國的政改，您覺得最重要的項目是？

張煒：中國的政治改革很多人認為可以逐步來，其實是不能逐步來的，就像有些小病可以一步步的治，但要治心臟、要換肝臟，是不能一點一點換的。西方有很多很成熟的民主制度建設經驗，中國可以直接參考。

比如普選，我看不出普選在中國實行起來有什麼困難，除了對現有的既得利益者會產生制約外，不會有任何困難，那些老百姓文明程度比中國低的國家，像印尼，也是一個很大、多民族的國家，都能順利實行全民普選，沒有流血、沒有劇烈革命，中國除了執政者出於一己之利的抗拒外，沒有理由不執行。普選外，新聞自由、獨立司法制度我也看不出有何執行的困難。這三條要做，應該是採取激烈的變革，而不是逐漸的變革。

明鏡：所以沒有必要採取試點的方式？

張煒：完全沒必要。

明鏡：所以您認為政改的阻力主要是執政者的心態？

張煒：對，很多人說中國如果要劇烈改革，成本會比較高，但只要分析一下這些人的幾段論就能得知：他們認為，要進行激烈的改革就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就會反抗，由於他們處在有權勢的位置上，所以他們的反抗會引起劇烈的社會衝突，劇烈的社會衝突一旦產生，社會成本就很高，這說法聽起來似乎有理，但實際上豈有此理。

因為不去指責執政者抗拒社會變革的合理性，而是把執

政者的抗拒社會變革，作為一個理所當然的現象，要老百姓接受他們對改革的抗拒，這種作法是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

明鏡：但社會變革過程中，既得利益者不再擁有權勢了，是否也是個問題？如何照顧既得利益者？

張煒：有很多具體的方法可做。政治上來看，一些有過劇烈衝突、情況比中國複雜得多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和平變革的先例，比如南非。南非過去在白人統治時期，對黑人採取綁架、暗殺的手段，但在黑人取得政權後，沒有進行報復措施，給了過去權勢者安定的保證，因為人是理性的，我相信中國的民主力量和老百姓也是理智的，有些人過去深受專制制度所苦，對專制制度有深刻的仇恨，但如果社會菁英、輿論引導得當，相信人的本性還是希望社會能穩定平和、向前發展。

從經濟上來看，只需要限制當權者的貪婪，並不意味著對他們過去得到東西的全部剝奪，況且現在已經很難剝奪他們現有的財產，比如很多人的子孫後代變成私有企業家，已經沒法剝奪了，所以如果能尊重私有產權，也包括對他們子孫後代私有產權的尊重，這樣就應該不是大問題。

明鏡：總的來說，您如何看待中國政改的前景？

張煒：執政黨不會主動解決問題，需要老百姓、社會輿論、知識份子去抗爭，所以中國在未來五到十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因為兩年內國家領導人進行更迭（註：此文寫於2010年），新的領導人上台後怎麼做很重要。

相對於過去幾屆領導人，新領導人的權威性降低了，他們的競爭者越來愈多，民眾對他們的迷信也蕩然無存，這種情況下，他們首先面臨合法性問題，如果他們不採取政治變革的方式，很難建立合法性，如果沒有合法性，這一代領導人要維持社會穩定也不會容易，如果共產黨內的改革力量能順應民意，將使改革的成本更低。

中國已揭發貪腐案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領導人即將改朝換代，外界也持續熱議體制改革的話題。但《中國法律文摘》主編陳小平對新一代領導人下的司法改革不樂觀。他指出，中共將司法和黨的關係僅僅繫在一起，使得中國從立法、量刑到執行都向官員傾斜，司法制度無法遏止官員貪腐，民眾也不相信法律和法院，最終將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已揭發貪腐案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在“透明國際”最新公佈的“2010 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中，在 178 個國家和地區裡排名第 78 位，與其在經濟、軍事上取得的成績無法相提並論。中國《財經》也在近日整理了 1987 年中共十三大以來省部級及以上落馬高官的貪腐行為，發現近 20 多年來，雖然反腐力度有增無減，但貪腐行為卻與日俱增，中國的腐敗，無疑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大問題。

導致中國腐敗的原因，經濟、社會、政治、司法因素均有，若僅從司法角度分析，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生、《中國法律文摘》主編陳小平認為，應是中國現行的反腐敗法律對



陳小平（陳小平提供）

貪官相對來說輕判，造成了法律的反腐不力，加上司法體制無法真正制約官員的權力，使得反腐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往往讓法律功能更加打折扣。

陳小平在接受《明鏡》採訪時指出，根據統計，2006年對涉嫌瀆職、犯罪官員的處罰，免於刑事訴訟或宣告緩刑的達到95.6%，即使是2006年到2010年的統計數字，也高達85.4%，換

句話說，這些官員犯罪後幾乎不需負什麼法律上的責任。

只是，回顧媒體報導，其中不乏因貪污被判重刑者，若只論近兩年內的官員，便有獲死刑的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原江蘇省蘇州市副市長姜人杰，以及獲死緩的原郴州市市委書記李大倫、原北京海淀區區長周良洛，予人貪污官員獲重判的印象。

陳小平指出，省部級的貪污案不多，卻引起社會和媒體的重視，因為它涉及的官階高，確實是大案，但公眾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只要從統計數字就可發現，實際上有相當多的貪污者不需負什麼責任。“雖然我們見到幾位貪官被判處死刑，但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都有一個廢除死刑的傾向性，就我來看，若廢除死刑，最大得利者會是這些貪官。最近最驚人的死刑刀下留人的案例，就是中國石油原總經理陳同海，他貪污了兩

億（人民幣，下同），為半世紀來中共歷史中貪污最多的一人，但他沒被判死刑。”

2009年7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陳同海做出一審判決，雖然認為陳同海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論應判處死刑，但鑒於陳同海主動交代受賄事實等因素，最終判處死緩。

司法面前，官民不平等

中國官員不只貪污後受到輕判，與老百姓相比，受法律制裁的門檻也較寬鬆。陳小平表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規劃的《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中，曾提出一個問題，探討刑罰上老百姓和貪官之間的不平等。根據《刑法》，對於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受賄罪，要5000元以上才能定罪量刑，但普通老百姓的竊盜罪卻只要500元以上就要判刑，違反了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換句話說，老百姓犯罪，500元是個起點，但當官的要5000元才是個起點，而且我們還幾乎沒聽過哪個貪官因為5000塊被判刑的，如果將貪了5000塊以上、被抓到的貪官列出來，會發現他們貪的都是大得多、上億的數字，只有這樣才會被判刑。”陳小平強調，如果再真正數一數，中國有多少老百姓因為盜竊500元以上被判刑，毫無疑問這個數字會比5000多元以上被判刑的省部級以上高官要多得多，因為在中國，涉及到財產犯罪的搶劫、盜竊犯罪率是最高的。

“官員貪污的後果比老百姓盜竊的後果還要重。”陳小平表示，雖然貪污後果嚴重，但有多少官員犯了罪，又有多少官員被懲罰，外界一直不知道具體的數字，即使是已經曝光的案件，也不能反映真實數字，此外，被關入監獄的官員還能享有

特權，享受到常人不能得到的待遇，比如不用剃光頭、不必穿囚服。

《財經》便報導，用以關押省部級以上官員的北京秦城監獄中，“綠樹掩映、山嶺疊翠”，律師和被押官員可在“擺有黑色沙發和茶几，並安裝有空調”的房間中隨意交流，沒有隔離玻璃和鐵絲網，更不需要對講電話，被告人可以端著水杯會見自己的律師。

因此，陳小平認為，中國從立法、量刑到法律執行，都有點向貪官傾斜，當官者基本上都享有特權，所以中國的法律實際上沒有起到遏止貪官的作用。

應以重刑遏止貪污

目前的中國人大正在討論刑法第八次修正案，討論重點為重大貪污犯是否該判死刑。當前的法律規定，個人貪污受賄數額在 5 千元至 5 萬元間，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5 萬元至 10 萬元間，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0 萬元以上，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以死刑；目前許多貪污案數額動則上千萬，甚至上億元，對這些超過 10 萬元的案件，量刑標準不一。

陳小平指出，任何國家的法律都讓法官在一個幅度裡去量刑，中國現在的問題不在法官的裁量權有多大，實際上，目前最高法院的司法改革正在進行量刑的規範化，現在的問題是，貪官在多大程度上就構成犯罪，以及該用什麼方式懲罰這樣的犯罪。

雖然有部分聲音呼籲取消貪污罪的死刑，但陳小平支持用重刑遏止貪污。“現在中國官員的權力不受制約，相對於老百姓高高在上，在中國，對貪官免死，就是在縱容腐敗犯罪。”

對於貪腐案的審理，法律規定，貪腐案件移送起訴後，檢察院應當在一個月以內作出決定，重大、複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半個月。但陳小平指出，法律的東西都是表面的，不是審理案件的真實途徑。“這些官員的案子都是中共紀檢系統在做，而‘雙規’是沒有時間、沒有任何規章和程序的，但大量工作都在這個過程中進行，比如深圳市長許宗衡，從‘雙規’到現在什麼程序都沒見到，整個過程被黑起來，等最終移交司法程序時，只不過將證據交到檢察官手上，讓檢察官把刑事訴訟規定的程序走完，所以現在中國對貪官執行的司法程序沒有任何意義。”

陳小平認為，中國的司法如果要運作，必須是一個獨立的力量，但中國的問題，第一是司法並非分立的，第二，司法不是至上的，由於這兩個問題，中國的司法沒有權威，必須聽命於中紀委，但在反對腐敗問題上，中紀委的程序和司法的程序實際上是兩個軌道，中紀委認為此人要送交司法程序，法院就會做，中紀委如果不放手，法院就不會處理。

因此，如果中國想在司法上進行改革、想防腐敗，首先需要一個權威的司法制度，第二需要媒體監督，不能對媒體進行新聞審查，第三，黨不能享有任何司法權力，比如廢除“雙規”。

陳小平表示，整個中國法律制度中，立法這一塊是相對靠前的。“我不能說它很完備，因為刑法從 97 年到現在修了八次了，有很多問題，比如有些罪沒錄進去，因此不斷在修，但從宏觀上來看，中國法治的問題是法律定好後能否確實遵守，這個問題比立法問題要艱難得多。”

中國司法改革往前了又後退

而中國司法想要改革，阻力還是在當權者希望將黨與司法

體制綁在一起。陳小平表示，中共一直想把司法當成一個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的工具，這麼多年來，司法改革曾經想走專業化、職業化的道路，原來最高法院院長蕭揚就鼓吹這方面的改革，但這樣的改革讓中共上層很不放心，因此將蕭揚替換掉，如今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並非法律科班出身，而是屬於政工幹部，王勝俊認為法院講政治、黨的利益至上，不大主張法院的職業化改革，因此更是將司法和黨的關係緊密綁在一起。

不只王勝俊，2009年時，中國高院系統就有14位以前從未在司法機關工作的政工幹部上任。陳小平分析，中共上層對於司法改革確實有分歧，但這些年中，當司法制度稍微進步一些時，又給拽了回去。“我們看到大批政工幹部到法院當院長，不主張依照職業規則判案，而是主張法官到前頭去辦案，還要負責老百姓的思想政治工作，結果把司法的角色搞得很混亂。”

陳小平舉例，在2011年豎立的“全國模範法官”中，有一位是過去為淮劇演員的陳燕萍，陳燕萍並非法律科班出身，主要在基層處理民眾的家庭糾紛，處理的方式不是通過司法條例，而是通過個人感情的遊說，由於“為大局著想，為中南海沒有上訪的人著想”的思路，陳燕萍成為了模範法官，陳小平認為，從這套思路的取向來看，可知現在的領導人將司法看成非獨立的體制，是中共整個體制下的螺絲釘，必須按照整體機器來運作，但如此司法就不可能是權威、獨立的。

百姓對司法喪失信心

陳小平指出，如果中國的司法想改革，可參考的範本相當多。比如新加坡的優點在於嚴刑峻法，官員絕對不敢貪污，就是因為有強有力的制約措施，香港的優點則在獨立運作，廉政

署的權力很大，別人無法干涉。

反過來說，如果中國的司法不改革，陳小平認為，社會就沒有最後的一片綠地。“現在老百姓要求維權，維權原本還是相信法律、法院，但現在老百姓既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法院。文化大革命時，法院系統遭破壞，當時是沒有法院的，現在看來，法院在中國的作用也會是零。”

陳小平舉藝術家艾未未的話為例，有人曾問艾未未，會不會依據法律去維權，艾未未表示不會，理由是在中國維權，走法律道路的話只會帶來更大的麻煩。“這就是當今中國相信法律的人必須面對的一個後果。”陳小平說。

雖然中國推動司法改革的力量一直存在，但陳小平坦言對中國司法改革的前景非常悲觀。“推動司法改革的力量一直有，比如最高法院前院長蕭揚，但他的力量微弱。現在是一幫工程師在治國，沒有幾個人懂法治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新一代領導人中，名義上有幾個人有法律背景，但整個決策層還是一批工程師，體制內司法改革的動力明顯不夠。”

另一方面，陳小平表示，雖然民間的維權運動是中國這幾年來法律進步和改革的希望，但對維權、信訪的打壓，已經讓老百姓徹底失去對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剩下的是楊佳那樣的個體英雄，即使中國人佩服楊佳的很多，但學楊佳的不多。對司法喪失信心，將產生嚴重社會問題，對中國未來發展不利。

中國舉行中央級選舉 不比地方選舉困難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選舉體制的建立卻仍只是緩步前進，雖然中國已有基層選舉，但與真正的民主選舉還有段差距。《親歷民主》一書作者龔小夏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指出，選舉制度的施行與老百姓的教育程度和素質沒有直接關係，中國不開放黨禁、報禁，就不能算真正舉行了民主選舉。

龔小夏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碩士，1987年赴美深造，取得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長期在美國從事教學、研究、媒體工作，熟悉美國政府各個部門以及民間機構的運作，現為美國之音中文部主任。2001年龔小夏成為美國公民，2009年以共和黨候選人參份競選維吉尼亞州眾議員，將競選手記集結成《親歷民主》一書，2011年11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亞裔對地方選舉關注度低

自從成為美國公民之後，龔小夏對美國政治從關注逐漸變成了參與，“既然民主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參與也就是每個

公民的義務”。每當有總統和國會選舉，龔小夏總主動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發傳單、打電話、撰文宣傳，但由於擔心移民英語口音得不到選民的信任，龔小夏並未認真考慮自己參選。2008年，美國第一次選出了黑人總統，路易斯安那州選出了帶著越南口音的眾議員，見到美國社會組成發生變化，加上發覺亞裔在政府中沒有自己的代表，因此龔小夏利用2009年維吉尼亞州將選舉州長、副州長、司法部長、以及一百位州議員的機會，決定參選46選區的州眾議員一職。

支持婦女墮胎權，也支持同性戀平權的龔小夏會認同共和黨的理念，是認為政府權力不應該無限制地擴大，龔小夏對《大事件》指出：“布什和奧巴馬兩屆政府在擴大聯邦政府權力的問題上，都做得有點過份，我主張小政府大社會，相信美國社會的活力在民間，也相信自由市場、私人企業，覺得政治權力應該更多地歸於地方，而不是政府，因此加入共和黨。”

當年11月3日為維吉尼亞州的選舉日，將近一年的時間，龔小夏一邊選舉、一邊記錄細節，最終將該年參選的過程，包括基層黨組織如何運作、如何選前教育候選人、籌款方式、動員選民到投票日當天的情況，集結在《親歷民主》一書中。

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每當談起民主，好像就是一人一票這樣簡單的事，實際上做起來非常不容易。“我經常在想，如果中國今天民主了，要怎麼選？很多人心裡沒數。在西方生活的華人，雖然會去投票，但對於細緻的民主操作並不瞭解，也沒什麼經驗，所以我這趟競選花了很多力氣，把細節記下來，與中國讀者分享；中國如果實行民主選舉，應該怎麼做，也是我的書想回答的問題。”

龔小夏決定參選的當時，亞裔在參與政治的方面要落後其他少數族裔不少，投票率普遍低於其他族裔，但亞裔在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等方面卻高於其他族裔，一些亞裔在自己的居



龔小夏(龔小夏提供)

住集中地往往沒有自己的候選人。

如今，亞裔對政治的關心程度仍然不高。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少數族裔的參政度一向不如白人，並非因為人數少，而是長期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此情況在地方選舉尤為明顯。適逢選總統、聯邦級議員時，亞裔會出來投票或參選，但對於與自己切身相關

的地方民意代表就不夠瞭解，也不太會去投票。

龔小夏分析，原因除了語言隔閡外，也因為亞裔不清楚州、縣、市議會的功能是什麼。政府官員外，亞裔對於校董也不太關心。“其實地方上的職位特別重要，亞裔家長都知道為孩子找好的學區，但不會想參與校董會的競選、主動打造一個更好的學區。”龔小夏說，學區其實是由民眾選的校董會所管理，校董會能決定學校的設置、教科書的選擇。校董會有花納稅人錢的權利，有些地方，校董會有收費權，但亞裔想法較被動，較不會主動參與校董會事宜。

雖然目前工作忙碌的龔小夏不太有時間再出馬競選一次，但在推動亞裔參政度上，龔小夏仍會持續努力。

中國民主選舉首要開放黨禁、報禁

中國在 2010 年修訂《選舉法》後，規定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全國人大代表，並要求候選人與選民見面，可視為一種進步，但候選人的初步產生仍需經過上下級領導的“三上三下”過程，才會被列為正式候選人，使得中國基層選舉與真正的民主選舉還有段差距。

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民主社會大家參與、每人一票的制度特別重要，這一票是很有份量的，這是中國可學習的地方，其次，民主政治必須有秩序、法律做後盾。“中國經常有遊行示威，但往往不知道能遊行出什麼樣的結果，遊行也不能沒完沒了，所以在中國，老百姓如果有不滿，經常找不到方式發洩，但在美國，民眾要是不滿，可以組織委員會、可以投票，把理念與自己相同的人選到議會去。”

龔小夏解釋，在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下，地方參與可透過很多形式來實現，比如參與某個政黨、某項活動，也有說話和知情的權利。雖然一人一票相當重要，但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開放黨禁、報禁，沒有結社自由，就沒有其他政黨，沒有選擇權，而沒有言論自由，無法獲知訊息，人民也沒辦法參與競選，開放黨禁，選民便能組織後援會，為支持的候選人印傳單。

因此，在缺乏民主制度最基本要素的情況下，龔小夏認為中國現在的鄉村選舉不能說是民主選舉。“如果中國要搞民主選舉，第一件事就是要開放黨禁、報禁。我在書中提到許多這類的細節，甚至有讀者來信說書的內容有點婆婆媽媽。我就是要婆婆媽媽地寫，許多人就是不知道這樣的細節，否則一人一票的大原則誰不知道？”

擁護民主制度的龔小夏對《大事件》表示，她沒法證明中國未來的民主化一定會實現、又多久之後會實現，但她相信中國一定會實現民主，這是一種信念。到時候，中國的民主體



龔小夏(右, 龔小夏提供)

制會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但大原則應是一樣的。

“每個國家的民族性不同，會產生不同形式的民主，因此會有美國式民主、法國式民主，所以中國要實行類似英國的議會制，還是美國的總統制，要人民自己決定。但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選自己的領袖和政府，這樣的原則不會有差別。”龔小夏說。

那麼中國未來的民主選舉，是否該由地方到中央，一步步推行？龔小夏對《大事件》指出，其實從地方到中央的說法不太正確。“經常聽說選舉要先從基層做起，中國基層選舉做了20年了，也沒有繼續往上走。”龔小夏以自身經歷說明，在選民動員上，其實中央級的選舉不比地方級的選舉要困難。

“在美國，聯邦級的選舉投票率比較高，地方級的投票率很低，因為地方上不容易做宣傳，比如選總統，打開電視就能看到宣傳，但選校董會就較少人知道。”龔小夏舉例，她參

與競選的維吉尼亞州選區，在 2005 年的州長選舉投票率只有 35%，在 2007 年的議會選舉中，只有 12%，因此中央級的選舉，關鍵不在於是否該從地方先做起，而是肯不肯選。

對中國民主選舉的幾大迷思

反對中國舉行民主選舉的聲音裡，有一種普遍觀點認為民主選舉將把社會搞亂，影響中國的穩定，龔小夏認為專制才是動亂的根源。她對《大事件》表示：“這種說法無法證明，因為中國沒有搞過真正的選舉，況且現在中國也實行不少鄉村投票，也沒見把社會搞亂，台灣選舉也沒亂。”

龔小夏指出，放眼望向全世界，動亂最多的地方不是民主國家，而是專制政府壓制、沒有選舉的地方。民主制度下，因為各方爭論，有時候會產生動盪，但這是正常現象，因為每個人、每個團體的看法都不一樣。

沒有經費，候選人想一整年做廣告、想僱人或舉辦活動，都會成為困難。龔小夏在 2009 年競選時，花了大量心力親近亞裔社區，最終贏得亞裔的有力支持，其競選經費有一半以上來自亞裔社區。不過，許多人質疑富者是否會為了自身的利益，大量捐款給所支持的候選人、讓候選人更容易當選，使得最終選上的只是有錢人的代表。

龔小夏對《大事件》指出，有錢的候選人容易選上是個迷思，目前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的競爭便清楚反映出，人氣急速竄升的金瑞契（Newt Gingrich）所募到的錢跟另一位參選人、前麻州州長羅姆尼（Mitt Romney）無法比，但候選人能否激勵選民，讓人民覺得候選人能代表他們更重要，這就有賴參選者的溝通技巧（註：羅姆尼已正式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候選人能否將自己的理念清楚傳達給選民、鼓舞選民，

太重要了，里根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溝通者之一。”龔小夏表示，奧巴馬選上總統，良好的溝通技巧也是因素之一。

若中國未來舉行民主選舉，在籌款法規上也應有所限制，避免金錢控制政治的情況出現。龔小夏對《大事件》指出，外界對競選經費的籌募有許多誤解，最大的誤解是以為金錢控制了政治，實際上，美國的大公司不能直接捐款，候選人收到的多半都是 20、30 塊美金的小額捐款。

根據美國的選舉法規，籌募到的競選經費分為硬錢（hard money）和軟錢（soft money），硬錢指的是直接歸入候選人競選經費的錢，這類捐款的金額限制是個人不超過 2300 美元，組織團體不超過 5000 美元，每一筆捐款都是公開透明的。政黨從企業、工會和個人募集到的為軟錢，不直接給某一候選人，而是給政黨，這類的捐款沒有限制。由於軟錢引發的爭議較大，美國不斷修改法規完善體制。

“我自己要募到 6 萬塊已經很不容易，我感觸是，每一個給你捐過錢的人，哪怕只捐 10 塊錢，都覺得自己對你的選舉有份投資、會持續關心你，並對你有忠誠度，所以募捐本身是動員選民的過程，非常重要。”龔小夏說。

因此，對於聯邦政府出錢給各個候選人，如此更能達到公平競選的說法，龔小夏不以為然。“如果一個候選人不能動員選民、獲得支持，有什麼資格當領袖？”

在反對中國民主化的看法中，另有一派質疑中國有許多教育程度不高的農村人口、沒有民主概念，如何良好地施行民主選舉？龔小夏對《大事件》指出，西方國家開始舉行選舉的時候，人民的教育水平也不見得都很高，而民主選舉是選一個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一個人可能聰明、可能笨，教育程度可能高、可能低，但幾乎所有人對自己的利益是什麼都很清楚。

龔小夏希望讀者看完《親歷民主》後，對民主制度的具體

操作有了概念、不會過份理想化民主制度，以為民主了，什麼問題都能解決，但也不會覺得民主制度都是用錢收買來的。“其實許多事是民主解決不了的，民主只是能夠制止政府不會做太多壞事。”

龔小夏對《大事件》說，民主制度是對惡的本能的抑制；權力造成腐敗是必然現象，但如果權力沒有受到約束，將是更可怕的事。有了民主選舉後，人民就能很驕傲地說：“那是我們的政府！”

這次唱紅打黑以笑劇出現

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的事件引發千層浪，前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 3 月 9 日在記者會上丟出“用人不察”的言論後，15 日被摘下烏紗帽，入常之路生變。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指出，薄熙來下台，重慶模式不會再持續下去，但地方領導人以新的政策和方式在政治上推銷自己，還只是剛開始而已。

權力平衡不應該被打破

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的原因，至今撲朔迷離，根據網上傳出中國官員間流傳的初步調查報告，王立軍 1 月 28 日告訴薄熙來，正在調查一件與薄熙來家人相關的重要案件，有些調查人員壓力過大欲辭職，引發薄熙來的不滿。為阻止王立軍繼續調查，薄熙來免除王立軍公安局長的職務，事前未取得公安部的許可。

報告指出，王立軍被解職後，開始受到調查，王立軍自覺

人身安全受威脅，因而進入美國總領館尋求政治庇護。也有消息指出，王立軍在權力鬥爭中被薄熙來免去公安局長職務，因此與薄熙來決裂，向中央紀檢部門揭露妻子谷開來的腐敗問題，但不論哪個說法，都未得到證實。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明鏡出版社出版）

中強調，中共的權力轉移更多的是派系間的交易、暗箱操作，而不是選舉的結果；如毛澤東、鄧小平的強人政治時代已不再，集體領導的情況下，不免導致更多的派系鬥爭。

李成對《大事件》表示，中國過去 20、30 年間，在派系間交易多過選舉結果的情況下，中共確實也選拔了許多能人到領導位子上，但到最高位置上來的，仍舊不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更多的是派系的淵源，雖然不只在中國、民主國家也有此現象，但民主國家有選舉機制讓政治合法化，可是此現象發生在中國，其政權的合法性就會不斷受到質疑。這也是薄熙來事件對中共的最大挑戰之所在。

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前的敏感時刻爆發王立軍與薄熙來事件，對於中共內部政治鬥爭的猜測，自然甚囂塵上。李成對《大事件》分析說，薄熙來被拉下，對中共十八大表面上最大的影響，就是薄熙來當不了政治局常委，等於少了一個強勁的競爭



李成（布魯金斯學會）

對手，不過總體來說，政治局常委中的菁英同盟和民粹同盟之間的權力平衡沒有變化，接替薄熙來擔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的張德江本來就是太子黨、是江澤民偏愛的人，顯示中央達成某種程度的政治妥協。

根據《內幕》雜誌指出，張德江是徹底的江系人馬，張德江深得江澤民喜歡，被江從吉林、浙江、廣東一路護送到十六大政治局委員的職位，十七大更是擔任副總理之職。張德江是江澤民佈局後江時代的重要棋子，所以，江會力促他升上常委之位。

李成對《大事件》預測，由於中央領導層在此問題上得到共識，權力的平衡不應該被打破、不應該贏家通吃，因此原本就勢均力敵、互相牽制的兩個同盟，在薄熙來事件後仍舊保持著權力平衡的狀態。

李成認為，即使沒有薄熙來事件，張德江也會入常，未來政治局常委裡填補薄熙來位置的，也會是同一派系的人，最有可能獲益的人是張高麗和俞正聲。

如何處置薄熙來是關鍵

薄熙來被免職後，如何處理此事件，成了中央需仔細思量的問題。李成對《大事件》表示，如何處置薄熙來有其難度，因為首先，薄熙來的特點是不認輸，其次，薄熙來有其社會基礎，他不僅代表自己，還代表許多人，包括不少中國左傾的知識份子，一部分民眾也都認為薄熙來能力強，能兌現許多事。

薄熙來的不認輸，多少反映在3月9日的記者會上。當日薄熙來表示，自己沒想到會發生王立軍事件，他對此感到痛心，薄熙來坦承用人失察，但王立軍是孤立事件，不應將事件無限誇大，薄熙來也為自己的重慶模式辯護，表示不能否定重慶的

“打黑”工作，唱紅也沒錯。薄熙來還指出有關他辭職的傳聞是“子虛烏有”，他並沒有遭到調查。

薄熙來的唱紅打黑與高喊均富，在近年受到左派的熱捧，薄熙來被免職後，左派大為不滿，公開為薄熙來叫屈，在網上的口水戰打成一片。北京知名的極左網站“烏有之鄉”靈魂人物、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便把薄熙來稱為現代岳飛，怒斥美國動態網幾十家媒體題全部妖魔化薄熙來，並指出薄熙來被美國及反華勢力仇恨到這個份上，“共產黨看真是命懸一線了”。幾個左派網站，包括“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民聲網”等，網頁曾一度無法開啟，有消息指原因是中宣部和國新辦發出通知，要求這些網站暫時關閉，避免左派在其上煽動聚眾鬧事。

李成對《大事件》表示，雖然薄熙來還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但可能只是暫時的。在秋天召開中共十八大前，王立軍和薄熙來的案子應該會有個交代，李成認為，中央可能正對薄熙來進行調查，並且對薄熙來、對王立軍，都可能有不同的指控。

但李成表示，如果薄熙來的罪名只是腐敗，可能民眾不認為有什麼了不起，畢竟腐敗可說是普遍問題。“只把薄熙來的腐敗捅出來，民眾還可能把他當成一個英雄。”因此如何處置薄熙來，會是中央要思考的問題。

王立軍與薄熙來的事件不只牽涉腐敗、叛國，可能還包括暗殺、虐待等令人訝異之事，李成對《大事件》指出，有可能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與台灣的“江南案”一樣，會是一個政治上的轉折點。

發生於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案”，為筆名“江南”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在美國遭黑道份子刺殺身亡的案件，當時，台灣竹聯幫首任總堂主陳啟禮率吳敦和董桂森二名殺手，找到住在加州的劉宜良，持左輪手槍朝劉宜良頭部、胸部、腹部開槍。

劉宜良死亡後，中華民國情報局被爆為幕後主使者，美國因為自身公民遭國外情報機構派殺手到美國本土刺殺而勃然大怒，台美關係緊張，要求台灣政府交出幕後元兇，當時時任總統的蔣經國次子蔣孝武被指涉案甚深。

1985年1月，蔣經國下令逮捕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並取消國防部情報局。李成對《大事件》表示，“江南案”最終讓蔣經國意識到，必須解決黨禁、報禁的問題，因為國民黨在此事件中已經失去了道德的制高點，政府也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

“台灣政治的一個轉折點就是江南案，重慶事件可說比江南案嚴重得多，也許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也是這樣的一個轉折點，所不同的是中國經濟目前面臨很多問題，而且謠言滿天飛，所以中國最高領導層在處理這問題上有難度，但是給人民一個交代是必須的。”李成說。

重慶模式不會持續

薄熙來下台後，他一手打造的重慶模式能否繼續？李成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把重慶模式看作打黑唱紅，由於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這個模式已經失去它的信賴度和勢頭。”李成對《大事件》補充，雖然唱紅打黑已經結束，但中國政治菁英不斷尋找機會、不斷出現自發性的政治宣傳模式，這樣的趨勢不會改變。“地方領導人在政治上推銷自己，尋找新的政策和方式，這種模式還只是剛開始。”

薄熙來展開唱紅打黑後，便不斷有說法指中央高層對薄熙來的“文革”路線持否定立場，此次薄熙來被拉下馬，難免有人揣測是否中央有人製造這一事件。李成則持不同看法：“薄熙來的失敗不是中央決定的，更多的是這個戲劇性事件的發生，

才造成重慶模式的失敗。”

馬克思在 1852 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寫道：“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說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笑劇出現。”李成對《大事件》表示，馬克思的這段話用在重慶的唱紅打黑上再貼切不過了，唱紅打黑本身就是對法治、法律建設的蔑視，與歷史的潮流相違背，而文革第一次出現時是悲劇，第二次再出現就是笑劇。

李成認為，王立軍事件反映中國政治的遊戲規則發生很大的變化：更多部門會將觸手延伸至公眾領域，尋求他們的支持，這些部門也會打出一些蠱惑人心的口號。而重慶的打黑本身是對法治的一個極大挑戰，但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必須緊密聯繫在一起，尤其是中國的憲政建設。

李成對《大事件》說，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會停止不前，而是不斷會有新的變化，並非一些人說的 20、30 年後才能見到轉變。“我同意何頻先生的觀點，變化應該就在未來的 10 年，那本書《可以確定的中國未來》，明鏡出版社出版）寫得非常好，社會變化了，中國的政治結構變化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政治地位變化了，人心也變化了，這是誰都阻攔不了的。”

劉宜良死亡後，中華民國情報局被爆為幕後主使者，美國因為自身公民遭國外情報機構派殺手到美國本土刺殺而勃然大怒，台美關係緊張，要求台灣政府交出幕後元兇，當時時任總統的蔣經國次子蔣孝武被指涉案甚深。

1985 年 1 月，蔣經國下令逮捕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並取消國防部情報局。李成對《大事件》表示，“江南案”最終讓蔣經國意識到，必須解決黨禁、報禁的問題，因為國民黨在此事件中已經失去了道德的至高點，政府也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

“台灣政治的一個轉折點就是江南案，重慶事件可說比江

南案嚴重得多，也許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也是這樣的一個轉折點，所不同的是中國經濟目前面臨很多問題，而且謠言滿天飛，所以中國最高領導層在處理這問題上有難度，但是給人民一個交代是必須的。”李成說。

重慶模式不會持續

薄熙來下台後，他一手打造的重慶模式能否繼續？李成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把重慶模式看作打黑唱紅，由於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這個模式已經失去它的信賴度和勢頭。”李成對《大事件》補充，雖然唱紅打黑已經結束，但中國政治菁英不斷尋找機會、不斷出現自發性的政治宣傳模式，這樣的趨勢不會改變。“地方領導人在政治上推銷自己，尋找新的政策和方式，這種模式還只是剛開始。”

薄熙來展開唱紅打黑後，便不斷有說法指中央高層對薄熙來的“文革”路線持否定立場，此次薄熙來被拉下馬，難免有人揣測是否中央有人製造這一事件。李成則持不同看法：“薄熙來的失敗不是中央決定的，更多的是這個戲劇性事件的發生，才造成重慶模式的失敗。”

馬克思在 1852 年的《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寫道：“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說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笑劇出現。”李成對《大事件》表示，馬克思的這段話用在重慶的唱紅打黑上再貼切不過了，唱紅打黑本身就是對法治、法律建設的蔑視，與歷史的潮流相違背，而文革第一次出現時是悲劇，第二次再出現就是笑劇。

李成認為，王立軍事件反映中國政治的遊戲規則發生很大的變化：更多部門會將觸手延伸至公眾領域，尋求他們的支持，這些部門也會打出一些蠱惑人心的口號。而重慶的打黑本

身是對法治的一個極大挑戰，但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必須緊密聯繫在一起，尤其是中國的憲政建設。

李成對《大事件》說，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會停止不前，而是不斷會有新的變化，並非一些人說的 20、30 年後才能見到轉變。“我同意何頻先生的觀點，變化應該就在未來的 10 年，那本書(《可以確定的中國未來》，明鏡出版社出版)寫得非常好，社會變化了，中國的政治結構變化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政治地位變化了，人心也變化了，這是誰都阻攔不了的。”

兩會期間 中央曾給薄熙來兩次機會

薄熙來下台，僅是因為被王立軍抖出貪污情事？台灣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楊開煌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分析，薄熙來選擇投左派之所好、與中央抗衡，又在打黑運動中撼動他人的利益，中央或趁著王立軍事件的爆發免去了薄熙來的職務。

重慶市前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突然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以及之後的薄熙來落馬，為近日中共政壇的兩顆震撼彈；王立軍為何進入總領館？薄熙來下台前，中央與薄熙來之間如何“較勁”？此事又如何影響中共十八大人事？《大事件》就此事件專訪了楊開煌，楊開煌為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銘傳大學大陸教育交流處處長、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專長兩岸關係、中共政治、社會主義傳播理論、中共談判策略研究、中共宣傳政策等。

以下為專訪內容：

“薄熙來樂得被當成左派的希望”

大事件：對於王立軍事件的起因目前仍眾說紛紜，就您所知，王立軍為何從重慶“打黑英雄”變成一個“叛國者”？

楊開煌：整件事的背景應該要從大陸前年開始的社會左右路線之爭談起，薄熙來在其中陰錯陽差地被當成左派的希望，他自己也為了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為了安穩地入常，樂得被當成左派的希望。

但事實上，薄熙來不左，他在大連、遼寧都沒有唱紅的經歷，他在重慶也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經營，例如國有企業改造，雖然是黃奇帆主其事，但必須由薄熙來批准此事。

薄熙來被認為是左派的希望有幾個原因，第一，他在高位，第二，他是太子黨，第三，他唱紅。我認為他的唱紅是投機行為，為了投左派之所好，如此又讓左派更加依賴薄熙來，兩者可說相互利用，這讓薄熙來更感驕傲。

本來中共太子黨、官二代就有較高人一等的心態，尤其是文革時受迫害不大的太子黨。一般人從基層開始奮鬥，相較之下太子黨可說含著金湯匙出生，而薄一波在財金方面又深得毛澤東的信任。

王立軍事件就是“打黑”問題，海外也有人將“打黑”稱為“黑打”，因為它不守法、擴大打擊面。本來“打黑”本身沒錯，我自己去過重慶很多次，重慶市民自己覺得日子確實過得比從前舒適、安穩，以前重慶不只文強，還有黎強，把持重慶市的公車，他猖狂的程度，可以將自己汽車公司集團的車開到市公車的前面，以更低的價格將乘客搶走，使得市公車滿街跑卻找不到客人，而黎強也不會長期吃虧，等乘客招攬到了，就抬高價格。這在共產黨社會是不可思議的事。

文強更不用說，曾帶人到酒店殺人，造成老百姓心裡不安，因此“打黑”本身沒問題，但任何一種政策如果用運動的方式來進行，企圖短期內博得人們的喝采，從而成為一種風氣的話，這風氣一定會走偏，因為它不是一個客觀、理性、具有法治基礎的政治行為，它只是利用民眾的熱情，會讓民眾把自己的私人恩怨也參雜進去。

“打黑”變成一種運動後，一定會涉及到別人的利益。如果打到有中央關係的，例如與前幾任市委書記賀國強、汪洋等人有關係的，就可能出問題。賀國強、汪洋都還在位子上，所以被打的人會想投訴，如果投訴汪洋，還可以叫你到廣東來，但如果打到賀國強所培植的人呢？他當然不高興，而薄熙來又比較驕傲，仗著自己根正苗紅，前頭的人更不會甘願。

但逐漸的，薄熙來或許發現“打黑”會影響自己的仕途，因此必須找一個替罪羊。如果找小的，別人不會善罷干休，所以要找一個能讓人覺得薄熙來給足面子的人，在此情況下，王立軍就被犧牲了。王立軍本身是否很乾淨，我們不曉得，不過王立軍說有人花 500 萬買他的人頭，因此對王立軍來說，沒有公安頭子的頭銜來保護，就是暴露在鱷魚群之中。

薄熙來這樣的太子黨還多半認為那是人家該得的，對此毫不留情，王立軍或許認為當初幫薄熙來賣命，現在薄熙來卻不肯回過頭保自己的性命，當然要讓薄熙來也被牽連其中。我相信外傳的谷開來、薄瓜瓜的貪污都是小事，否則要貪多少，才能像中央處理陳良宇那樣？陳良宇案、陳希同案背後本來就是權力鬥爭，貪污永遠是領導要整肅你的一個藉口，它不會是得罪別人的最主要罪狀，而且以薄熙來太子黨的身份，加上退下後仍保有政治局的待遇，實在不需要做貪污之事。

兩會期間中央曾給薄熙來兩次機會

大事件：所以薄熙來下台的主因是？

楊開煌：我認為王立軍手上掌握的材料不是貪，而是當初他跟薄熙來很要好時，聽得了一些政壇的事，可能王立軍也知道必須握得一些證據來自保，所以錄了音，比如據說薄熙來很瞧不起胡錦濤總書記，從來不稱“胡”，而是稱“古月”，所以海外才傳言薄熙來對中央領導人不服，以及有拿下習近平的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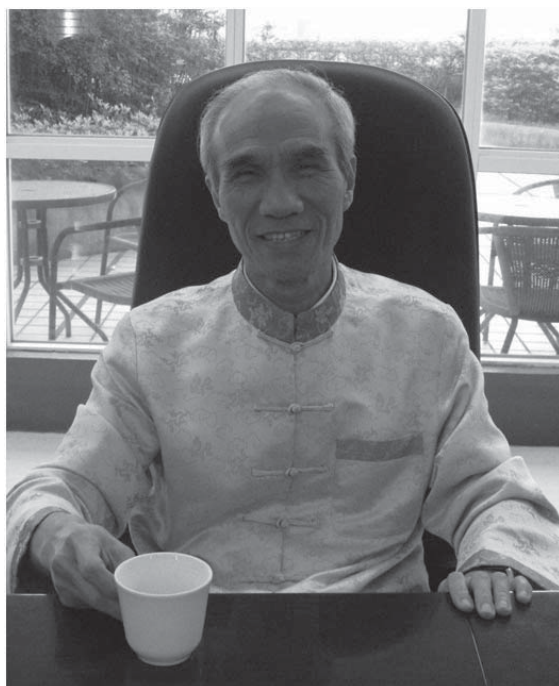
胡溫得知薄熙來的言行後，肯定不高興，但不高興還不至於快速把薄熙來處理掉，中央首先希望薄熙來認錯。

大事件：有說法認為溫家寶在3月14日召開記者會前，中央就已經決定免去薄熙來的職務，您的看法是？

楊開煌：雖然中央暫時不動他，但我相信中央在人大兩會開會前，已經做好決定，只是如果在薄熙來還在重慶時，就到重慶宣部免職，可能會引發一些騷動，所以兩會期間中央又給了薄熙來兩次機會，一次是賀國強探視重慶代表團的時候。

賀國強在重慶人大代表團的講話多次提到中央歷來對重慶的關懷與愛護，也提到過去胡錦濤到重慶人大代表團參與分組討論時所提出的四點要求（314指示），之後薄熙來也表示，314指示與溫家寶的國務院三號文件都是重慶發展的“寶貝”（《重慶日報》將其修改為“法寶”），不過薄熙來那天沒提到中央，甚至暗中與賀國強較勁，表示現在重慶所做的，都是歷任書記、特別是賀國強當時要做的事，如平安重慶、綠色重慶，最後才勉強提到胡溫的指示與文件，這表示薄熙來不肯屈服。

媒體注意到第二天所發佈的訊息，照片與內文不太一致，這樣的會議，一定是賀國強跟薄熙來的握手照，但發出的照片卻是賀國強與黃奇帆的握手照，薄熙來站在一旁，這是違反中國大陸新聞處理常規的，代表中央不認可薄熙來在當天的講話。



楊開煌。(記者柯宇倩攝)

待 3 月 10 號 薄熙來開記者會，他的態度就更清楚了，薄熙來指出有人對自己家人潑髒水，又說胡錦濤終究會到重慶看一看，等於將了胡錦濤一軍，因為如果沒有經過授權，部下怎麼能說長官一定會到重慶？隔天中央的報紙都沒提薄熙來談及王立軍事件的內容，這個記者會，也是中

央給薄熙來的第二次機會。

大事件：溫家寶在 3 月 14 日的記者會上，最終“等”到路透社記者提出與王立軍事件有關的問題，該記者詢問溫家寶如何看待這個事件，以及這一事件會不會影響中央政府對重慶市政府和市委領導的信任，溫家寶則認為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且提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且經受住歷史和實踐的考驗。”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一番話，如何反映中央對薄熙來事件的態度？

楊開煌：用中央的術語來看，薄熙來就是“死不悔改”，25 個政治局委員都知道彼此的恩怨，如果這時還處理不了薄

熙來，別人會怎麼看？所以逼得中央在人大結束的第二天就要處理這件事。我認為中央安排了路透社記者向溫家寶發問，溫家寶也講了兩段非常重要的話，第一段是希望“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等於當著大家的面打了薄熙來一個耳光，有時打耳光只是打給眾人看的，但溫家寶這段話深切反映出“這個人我不認”的意思，接著溫家寶又說了關於改革開放的話，代表中央的路線是中間偏右，不是薄熙來左的路線。

溫家寶的話等於給薄熙來定性，第一，你沒有深切反省，第二，你我之間的矛盾是路線之爭，是中國要往何處去的問題，中央當然要處理，否則中國的力量就分散了，如何崛起？

王立軍的唯一生路：將事情鬧大

大事件：您覺得王立軍除了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外，還有其他路可選擇嗎？

楊開煌：貪污治不了薄熙來，左傾路線也治不了他，因為它抬的是毛澤東的旗幟，如果明目張膽說左傾路線是錯的，中共就會像駐英大使（劉曉明）說的一樣：“中國不能稱作共產黨國家，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況且現在中國大陸的整個社會氣氛也沒辦法立即做這樣的調整，否則可能幫助左傾者成為新的反對派，如果此反對派再與其他勢力合流，對中央的政權和穩定性都有很大的威脅。

所以王立軍要如何做？就是得鬧大，現在看起來，王立軍非常聰明，他只有一條路可以魚死網破，就是到美國總領館，只要把這事變成政治事件，國際媒體就會相當關注，中共也壓不下來，說不定中央本來就要整薄熙來，正好趁此機會。

不過中央對薄熙來的作法是“免兼”市委書記，但王立軍

是“免職”，王立軍也算是中共的高幹，做這種事是政治錯誤，真的讓中共很沒有面子，我相信王立軍一定知道，到美國總領館要不到政治庇護，但我認為他也沒有要，因為他既不是政治異議人士，也不是政府要迫害的對象，只是被調職，美國怎麼可能給政治庇護？所以這件事與人權完全無關。美國也不會願意捲到中共的權力鬥爭中，成為被利用的工具。

大事件：薄熙來是1995年以來第三個去職的政治局委員，您認為陳良宇案、陳希同案背後本來就是權力鬥爭，薄熙來案與這兩案有什麼不同？

楊開煌：陳良宇、陳希同案與薄熙來案的狀況完全不一樣，雖然都是中央整諸侯，但陳良宇、陳希同案的權力鬥爭因素比較多，而薄熙來則是有可能從“經濟諸侯”發展成“政治諸侯”，所以中央一定要明快的處理。“政治諸侯”就變成唐朝的藩鎮了，這是不得了的事。

薄熙來下台，左派勢力被壓制

大事件：之前已經有中央不滿薄熙來發動新文革的說法，從這件事可更加看出中央反對文革路線的態度？

楊開煌：當然，像“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這樣左派的網站，已經使用“毛黨”、“鄧黨”的字眼，認為改革開放後都是“鄧黨”，不是“毛黨”，只有他們才是忠於“毛黨”，這是很嚴重的事，薄熙來如果知道這事情的嚴重性，就應該立刻撇清，甚至痛打左派一巴掌，他的地位反而能穩固，因為左派就沒有人靠了。

其實薄熙來有一陣子說唱紅是發揚延安精神，與文革沒有關係，但後來沒有繼續，這也是薄熙來身邊的人沒有幫助他。現在薄熙來的作法讓大陸的改革右派無法同情。其實講白了，

中央的學雷峰跟唱紅有什麼兩樣？紅歌的精神可以恢復，但不需去唱。

大事件：薄熙來下台後，左派勢力是否會消退？

楊開煌：會被壓制，中共政權經歷 60 年，左派總會有，但思想體系會逐漸轉變，左派的匯集力量也會被一次次地打消。但我不認為因為左派的消失，中國大陸就會成為像西方世界那樣的右派，中國大陸應該循著一條中間偏左的道路前進。

大事件：現在重慶市委書記由張德江接任，這只是暫時的安排嗎？

楊開煌：當然，張德江是以高兼低，他本來就會進常委，讓他兼重慶市委書記，是因為還沒有找到完全適合的人選，這個人選未來一定會進政治局，我認為周強（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希望蠻大的。

大事件：薄熙來走後，誰進入政治局常委的機會增加了？

楊開煌：常委原本是 11 爭 9，現在是 10 爭 9，剩下的是俞正聲和劉延東。對中共常委的晉升來說，年齡是一個蠻重要的關卡，所以如果不讓張高麗入常，那入常的就一定是俞正聲和劉延東，俞和劉的尷尬在於，2013 年就都到 68 歲，都在可提或不可提之間。

劉延東的優勢在於她處在一個提倡男女平等的風氣下，但弱勢是她沒有地方經驗，最近的常委，沒有一個缺少兩個以上的地方經驗，除了溫家寶。所以未來的趨勢，年齡是其一，第二是地方和中央的經驗兼具，沒有這樣的訓練，就不足以統合整個大國家。

俞正聲就完全沒有問題，他在湖北和上海都做過，又曾擔任建設部部長，有中央經驗，所以入常的機會應該蠻大。至於胡春華、孫政才、周強等人，就不太可能了，但這三人這次應該會進政治局，下一次，其中兩人應該會進常委。

大事件：薄熙來下台，重慶模式是否還會持續？

楊開煌：從溫家寶和賀國強的講話來看，其實是一分為二，一方面肯定重慶人民和重慶這幾年的貢獻與成績，這讓左派不會有太大的反彈。另一方面他們反感唱紅，反感薄熙來的作風。

重慶做了很多相對來說讓中央覺得不錯的事，例如第一，國有企業改造，使得重慶沒有太多失業的員工、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二，打黑，安定社會、穩定人心，第三，戶籍制度的改革，讓幾百萬人進到城裡，這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來支持這些人的醫保、教育，所以薄熙來和黃奇帆還是有其貢獻。

但薄熙來的做事風格、對抗中央領導的態度，都讓中央反感。江澤民時代還有鄧小平，現在沒有這樣的人，如果自己不出手整頓，就沒有人聽你的。

所以未來的重慶模式應該會繼續吸納好的東西，張德江也說了，將繼續推動重慶的改革開放，保持、完善對外開放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薄熙來下台 對十八大常委的影響

薄熙來被中央免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入常夢破滅，但對其餘常委競爭者而言，入常的機會理應增加。英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國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所長曾銳生在接受《明鏡》採訪時提醒，薄熙來事件後，除了幾名大致確定的人選外，更無法去猜測誰會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距離中共十八大召開只剩幾個月的時間，但在政治上，幾個月已經是很長的時間。

曾銳生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當代中國研究教授，曾任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政治學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台灣研究項目主任、查良鏞榮譽學人。曾銳生畢業於香港大學，於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東亞的政治與外交。

要再動張德江很困難



曾銳生(資料圖片)。

薄熙來被拉下台，傳是總書記胡錦濤不顧一批太子黨和薄支持者的反對，決定拿下薄。其實早在前重慶副市長、公安局長王立軍被調查時，就已有薄熙來批評胡錦濤的傳聞。根據博訊的報導，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庇護未果、遭中央秘密調查時，向當局供出薄熙來罵胡錦濤是“漢獻

帝”、國家前主席江澤民是“現代慈禧太后”、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是“劉阿斗”的錄音。

有分析指這次薄熙來的出局，是習近平與胡錦濤聯手的結果。也有評論解讀，讓薄熙來下台，是胡錦濤為了穩住局面，並且對下一屆領導人“扶上馬、送一程”。

2012年4月號的《外參》披露，兩會剛開始的時候，政治局常委們對如何處理薄熙來還沒有共識，甚至保薄的一方佔了上風，使得薄熙來囂張起來；3月9日的重慶代表團開放日上，薄熙來一番“深信總書記會去重慶”的言論激怒了胡錦濤，因此胡不顧一批太子黨和薄支持者的反對，決定立刻拿下薄熙來，才有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砲轟和薄熙來被免兼職務的消息。

不過，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曾銳生認為，要讓薄熙來這種具影響力的高官下台，對中共來說是個非常痛苦的決定，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特點就是協商式列寧主義，由於黨內存在派系和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在決定像薄熙來這種人的命運之前時，任何的協商與平衡都是必做的，光憑胡錦濤和溫家寶都不能把薄熙來拉下馬；這不是胡錦濤或溫家寶說了算的事。

張德江的接任，也是為了保持這樣的平衡，反映出各方妥協的結果。曾銳生對《明鏡》表示，張德江接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的位置，代表胡溫無法對這件事拍版定案，否則他們大可安排自己團派的人去接薄熙來的位置。“這件事還在談判，談到一個共識後才能決定，所以才會找張德江這樣的人到重慶。”

分析指稱，在以低調為主的中國官場中，薄熙來的高調作風為自己招來知名度，但也引來一些中央高層的不滿與擔憂。曾銳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被免去職務，是因為他想坐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而有部分中央高層不完全同意這件事，正好發生了王立軍事件，應該可以藉此事制止薄熙來的野心，至於薄熙來透過妻子谷開來開設的律師事務所貪污的傳聞，曾銳生不認為是導致薄熙來下台的原因。“如果貪污是原因，那中國官員有幾個不下台？”

從王立軍到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尋求政治庇護開始，外界都知道薄熙來的麻煩來了。當薄熙來缺席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會場上也未預留他的座位和名牌時，對薄熙來政治前途的猜測更是沸沸揚揚。3月9日，薄熙來在重慶團開放日上現身，大力為自己辯護，而溫家寶也毫不客氣地在任內最後一次的兩會結束記者會中，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

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並嚴正指出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對王立軍事件反思。

曾銳生認為，溫家寶的文革談話等於是拉薄熙來下台的訊號；薄熙來是 1997 年鄧小平過世後，唯一真正有領袖魅力的中國高層領導，只有像他這樣具影響力的人才有機會發動類似文革的運動，亦即透過調動、利用廣大群眾來為自己爭得政治權力。溫家寶正是向其他黨員提出警告，如果允許薄熙來繼續留在位子上，他可能帶來破壞。

早前，曾傳出胡錦濤人馬、2010 年 4 月接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周強將到重慶取代薄熙來的消息，傳聞指出，2011 年底到 2012 年初，周強身邊的人已經知道周強將調任重慶。《外參》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張德江接任重慶市委書記，只是個過渡性的安排，之所以派張德江到重慶，是因為他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一個人選，張德江是江澤民所提拔，也是溫家寶底下的大將，和胡錦濤關係不錯，與習近平的淵源更是不短。

知情者對《外參》表示，張德江出掌重慶可能只有幾個月的時間，胡錦濤等於留下一個很大的空間，未來一旦局勢穩定後，仍然可以指派他所信任的人馬來掌管這個西南重鎮。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楊開煌也認為張德江只是個臨時的市委書記，他對《大事件》表示，張德江本來就會進常委，如今讓他以高兼低，是因為還沒有找到完全適合的人選。

不過曾銳生對《明鏡》分析，不論剛開始只是想張德江做個過渡性的市委書記，或想讓他長久做下去，要再動他都不容易，因為既然中央高層做出了一個妥協，推他出來，要再改變這樣的妥協有其難度在。“上層要做的妥協很多，現在要顧的主要是十八大的事，重慶只要穩定，對他們來說就

不是個問題。”

如何處置薄熙來中央還沒共識

《經濟學人》的文章指出，薄熙來的下台明白顯示中共領導接班的過程並不是毫無波瀾，如果薄熙來被起訴，將是又一次背離傳統的情況，因為像薄熙來這樣有家庭背景的人，通常不會遭到這樣的對待，這將代表中共高層出現嚴重的裂痕。

曾銳生認為，如何處置薄熙來，不只是中共高層以外的人，甚至可能連中共高層的人都沒有答案，這還需要黨領導的協商、交易，可能未來幾週會討論出結果，但這仍不會是整件事的結束，薄熙來事件牽涉到的不只是他的命運，還有黨高層位置的爭奪。

曾銳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下台前，已經是一個地方大員、政治諸侯，而且他還要朝中央再更上一層，走到最高的一層樓，問題是胡溫不希望他上來。

“胡溫可能跟習近平也有些矛盾，但在薄熙來事件上，習近平和胡溫有共同利益，習近平也不希望薄熙來冒上來。”因此，曾銳生認為，不能將薄熙來事件簡單說成是團派與太子黨之間的對抗，就算同為太子，也有不同的立場。

“其實沒有太子派系，只有太子背景的人，這些人有自己的利益，對薄熙來也不全是同個看。”不過，曾銳生對《明鏡》分析，通常有太子背景的人不希望像薄熙來這樣出生的人被打下後，被修理得太慘，因此曾銳生認為現在還有人在保薄熙來，所以中央才沒有明確表示如何處理他。

身為一名政治學教授，曾銳生表示，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這件事最好的處理辦法只有一個：依法辦事，其他勢力不能干預，但中國的政治現實卻不是這樣。

誰會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將更難預測

溫家寶在3月14日的記者會上，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被視為強調中央的路線是中間偏右，而非薄熙來左的路線，因此薄熙來下台，有分析認為不只是權力鬥爭，還是路線之爭。

曾銳生對此抱持不同看法。“誰能明確指出什麼是偏左的路線？跟胡錦濤比起來偏左？所以這是相對的，你說重慶模式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毛澤東模式的話，那其實胡錦濤已經做過了，只是薄熙來做得更多、更遠，而且薄熙來靠此壯大自己的政治版圖。”

曾銳生對《明鏡》解釋，所謂的偏左，只是薄熙來對毛澤東的東西多用了一點，但中共從來沒有根本上全盤推翻毛澤東的政策和權力謀略，而且如果是使用權力謀略，也不表示是政治路線的分別。“從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來看，什麼是左、什麼是右？你在我的左邊就是左，在我的右邊就是右，我可以站左邊，也可以站右邊，沒有一個公正客觀的標準，所以薄熙來事件是否真的牽涉到路線鬥爭，說不出來。”

不過，對於如“烏有之鄉”一類的左派力量可能因為薄熙來的下台而減弱，曾銳生認為是好事。“這些所謂的新左派，有沒有把自己自改革開放以來獲得的利益交出來，將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當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享受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物質條件和談話空間，同時又壓縮別人自改革開放以來享受到的方便，他們口頭上說的是左，生活方式卻是右，這樣很虛偽。”

相對來說，曾銳生也認為沒有真正的“重慶模式”和“廣

東模式”。曾銳生對《明鏡》表示，一般指稱的“重慶模式”只是薄熙來為了上到政治局常委而做出的行動，但唱紅了真的會讓那麼多人愛毛主席？打黑後重慶就沒有黑社會？不過，薄熙來走後，曾銳生認為唱紅打黑應該會消失，因為第一，這是薄熙用來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誰還敢繼續唱紅打黑？第二，打黑的工作主要是王立軍在做，現在王立軍已經黑了，怎麼去打黑？

至於所謂的“廣東模式”，曾銳生表示，也只是改革開放後的一種主流發展方向，只是以廣東為先鋒、走得比較前頭。

1979年開始，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就先走一步；廣東人民的思想也跑得較前頭。在中國政改議題多停留在口頭談論的時候，廣東烏坎村已實現村民民主選舉村委會成員與村民代表，不過，曾銳生對《明鏡》表示，烏坎事件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並非事情發生後，廣東全都走上烏坎路線，至今也見不到這個路線被複製到其他地方，因此烏坎事件的影響力很有限。

“而且政府也未給烏坎一個完全自主的空間，只是因為地方官僚將這件事處理得太糟糕，而汪洋又有實力給這件事一點處理的空間，最終黨的影響力還是會回到烏坎，需要時間而已。”曾銳生說。

曾銳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事件最大的問題是黨中央是否可以回到原本統一合作的平衡中。而薄熙來事件後，更無法去猜測誰會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雖然有一部分人要入常大概已能確定，如習近平、李克強應該不會有意外，在年齡的規則下，誰會下大概也可以得知，但其餘的人誰能入常就更難說了。”曾銳生認為，距離十八大雖然還有幾個月，但在政治上，幾個月已經是很長的時間。

曾銳生說，到中共十八大之前，還會見到許許多多的謀略，薄熙來的常委夢已經結束，但他的命運如何將影響到其他人的政治前景，以及中國在未來 10 年的治理方向。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的再改革

蕭功秦是湖南衡陽人，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中國的大轉型》等書，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台灣大學《政治學論叢》編輯委員，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多年來，作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海內外所知曉。

2012年5月，蕭功秦拜訪紐約，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重慶模式作為中國的多種嘗試之一，仍有其價值。他說，海外傳媒雖然很發達，但好像很少聽到中間派的聲音，他也就作為中間派談談自己的看法。

對重慶模式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薄熙來事件引發中國政壇大震盪後，蕭功秦趁本次去賓州大學開會，回國路過紐約的機會，對《外參》記者等人再度闡述自己對重慶模式的觀點，以及從新權威主義角度，對中國未來走向民主憲政五步邏輯的分析。

蕭功秦說，薄熙來事件發生以後，社會上存在著對重慶這些年來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傾向，凡是有自由派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慶模式，凡是左派傾向者都支持這一模式，這種兩極對立並不正常，他認為，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不能用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只有全面地認識重慶，客觀地肯定其成績，批判其左的錯誤，才能讓廣大重慶民眾與官員避免受極左派挑撥與煽動，後者總是要號召底層群眾為薄熙來叫屈，進行反攻倒算。

蕭功秦說，他並不是左派，也不是重慶模式的簡單的擁護者，相反，他是國內最早對重慶模式提出質疑的學者之一，早在去年5月，他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重慶模式研討會，當時他是唯一在大會上發言對重慶模式提出批評的人。蕭功秦在那次會上發言，所提的第一點質疑是，由於毛的極左文革與中共革命傳統共享了紅色，籠統唱紅是否可能造成“唱左打改（革）”、“唱毛打鄧”？其次，重慶模式是透過強人政治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公民社會的發展來解決社會矛盾，會不會使本



蕭功秦2012年5月在費城會議上（蕭功秦提供）

來應該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的發育受阻並退化？第三，以非法治的方式打黑，會否造成程序正義受到破壞的嚴重後果？第四，強勢政府通過“理性的工程設計”推行大幅度城市換戶口的改革，萬一經濟蕭條，那麼多民工既無工作，又回不了家鄉怎麼辦？人的理性能力畢竟有限，如何避免建構式的理性設計變成烏托邦式的大災難？

在去年下半年，重慶模式在國內炒得最火熱的時候，他就在中國主流媒體上連續發表了三篇質疑重慶的文章。他說，在當時的語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他頗以此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論壇》上的文章標題就是“與其唱紅，不如提倡新文明”。蕭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紅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時代精神內涵。新文明應該包括傳統儒家文化的和諧價值，中共革命文化中的責任意識，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創新精神與法制權利意識，這種價值多元性的結合才是時代進步的方向，這是重慶單純的唱紅所不能概括的。他還提出，重慶的唱紅，會給極左派攻擊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為如此，中國既要防止所謂的“顏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紅煽起左的原教旨主義的“黑色革命”。

蕭功秦認為，他對重慶的認識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參觀重慶之後。蕭功秦利用到重慶參與學術研討會的機會瞭解實情，還與多年未見的重慶老朋友進行私下交流，他發現，重慶利用政府威權體制的動員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還不錯。對於重慶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設頗為贊賞。“我們參觀了市區最成熟商業地段的民生小區，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約500元，按重慶計劃，最後的目標是達到200萬人居住。有三種人符合居住資格，申請後可搖號，搖到號可入住。第一種人是外地來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經歷，第二是外地到重慶就業的大專學生，須持有

單位證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費在 3000 元人民幣以下的家庭。”

蕭功秦說，重慶老百姓對公租房感到滿意，這個方式也確實能解決市場經濟下的現代化產生的兩極化問題。當他親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滿意神情，蕭功秦內心也頗為之感動，阿拉伯酋長國和新加坡的參觀者都覺得相當不錯，不過他們說他們的國家做不到，事實上，中國地方政府在發揮統籌能力方面是有優勢的。在建設民生工程方面，重慶走在全國前列，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後來，在 2011 年 12 月下旬，在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所主持的“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研討會上，蕭功秦系統地提出了對重慶模式的新認識。之後發言內容整理成“超越左右兩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一文，受到很大的關注。

另一方面，蕭功秦在發言中也提到對重慶左的方面的批評，提出對重慶模式的三點期待，其實就是三點擔憂的委婉提法：第一，重慶模式把強人政治發揮到極致，然而，單純的強人是無法保持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的，薄熙來已經 62 歲，不可能到 75 歲還在重慶，為了避免“人走茶涼”。關鍵的因素就是培養公民社會，讓民間力量活躍起來、讓公民社會為重慶源源不斷提供人材與活力，成為利益集團和政府溝通的橋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強人政治的短期效應。

其次，蕭功秦在那次會上還建議，重慶應該與左的東西進行切割，他指出紅色文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傳統，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極左文革錯誤也同樣分享了紅色的符號，如果唱紅沒有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劃清界線，籠統唱紅，就等於在沒有進行撥亂反正之前大談“毛澤東思想”，讓社會上對改革開放不滿的極左派趁勢而起，如何能防止極左份子利用唱紅的合法性，來鼓吹文革？

用非意識型態的方式解釋重慶模式：一種帶有左派色彩的新威權主義

蕭功秦曾在這個會上的第三點建議，是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而不是意識形態來解釋重慶模式，更為合理，蕭功秦指出，有些中國官員認為重慶的成功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功，說什麼資本主義都是搞兩極分化，而重慶沒有兩極分化，因而來說明它是社會主義。“我委婉地質疑了這點：恰恰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兩極分化的程度，比中國遠遠小得多，例如亞洲四小龍，由此可見評價兩極分化的標準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我建議用非意識型態的方式作總結。”“重慶模式的成功，可以沿著新權威主義的角度來思考、用新權威主義的理論重新概括它，或以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來概括重慶模式的運作機制，就更加合理了。”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似乎比韓國、台灣的“凝聚性資本主義”還要更強勢，在經濟上與國際市場經濟打通，大進大出，是一種“政府動員——市場競爭”相結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動員力強的優勢，例如重慶國營企業，必須承擔將三分之一的利潤拿出來，為“三通一平”的基礎建設與“五個重慶”建設負起責任，與許多地區的國企的自利主義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眾所周知，東北有家製藥廠其辦公室豪華裝修比凡爾賽宮有過之無不及。

蕭功秦把他的觀點概括為，重慶探索與薄熙來事件並不是一回事，他認為，只有作這樣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貢獻也予



蕭功秦在西康瀘定橋（蕭功秦提供）

以全面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他說，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對重慶的探索，也應該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自從薄熙來事件後，社會上把重慶人所做的一切，簡單化地理解為薄熙來的陰謀奪權的手段與伎倆，因此不值得學習與借鑒。自由派知識份子認為，因為有了薄熙來這樣一個“壞人”，從他的動機上可推導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自己野心與陰謀服務的，既然從道德上看他充滿道德污點，所以重慶模式整體來說也就沒有價值，把重慶所做的對普羅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時予以否定了。

蕭功秦認為，這樣做會產生另一種後果，那就是，極左派會挑撥重慶民生建設中受益的普羅群眾，來反對中央政府對薄熙來事件處理，以此來達到東山再起。事實上，他們現在正在這樣做。蕭功秦說，早在薄熙來事件在媒體上傳出以後，

許多人認為自由派勝了，但他認為，現在左右之爭遠沒有結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階段。他說他的估計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來出事後，勢力一夜之間被打弱，蕭功秦認為，左派有個思維上的嚴重誤區，左派認為他們需要一個奇理斯馬式的救星，這個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領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與否，是與這個救星具體聯繫在一起的，當救星本身被發現是個與刑事案件有牽涉的陰謀家後，左派也就失語了。現在左派總是宣稱薄熙來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為他鳴冤叫屈，可以說是一種不明智的駝鳥心態，就是出於這種糾結而擺脫不了。

地方一級的多元試錯的經驗，對於中國特別重要

蕭功秦表示，重慶模式是中間偏左，政府參與力度大一些，社會力量小一些，廣東模式是中間偏右，社會組織發展多一些，公民社會力量大一些，這種不同的嘗試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要走出困境，絕對不能單靠領導人在辦公室裡制定方略與設計，而是應容許地方與民間有更多嘗試的空間。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比中國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試錯機制比中國發達 256 倍，因為日本由 256 個小的自主共同體構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試錯選擇只決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 5 個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咸豐皇帝、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最後是攝政王，可以說，近代中國是一元試錯，日本是多元試錯，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肯定重慶模式的探索。決不能因為薄熙來事件，而給地方當政者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地方嘗試就是與中央分庭抗禮，搞獨立王國，似乎回到大一統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實，最高當政者應該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嘗試的。

如何看待薄熙來事件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本身是獨立的，它和“陰謀家”沒有必然的關係，這就如同這個“陰謀家”出現在廣東，也不能就此徹底否定廣東模式一樣。中國人習慣於把政治事功與道德混為一談。這個問題在西方早就解決了。

“薄熙來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有點像歷史上的曹孟德，在危機時代特別容易脫穎而出，這樣的人膽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遵守體制內遊戲規則，有時目空一切，做事不擇手段，但也確有想像力，往往能別開生面。”蕭功秦認為，在社會尚未出現危機的常規時期，這種人往往容易被官僚體制邊緣化、受到體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類人往往在社會或官僚體制出現危機時，特別能得勢，一旦得勢，就會為所欲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曹操和薄熙來就存在某些相似處。

薄熙來下台前，在重慶老百姓中有相當的支持度，蕭功秦指出，薄熙來出事，重慶人感情上覺得薄熙來仍是不錯的，一方面，薄熙來用特立獨行的方式把重慶搞大，另一方面，薄熙來與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認的關聯，所以重慶普羅大眾也陷入兩難。

“說實在話，薄熙來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說他掌了權就會有計劃地搞文革復辟，那是言過其實，人們之所以有這種印像，實際上也是薄熙來所信賴的極左派如張宏良、孔慶東之流‘害’了他。”

但問題的關鍵是，薄熙來已經習慣了用“左”的手段借力發力，習慣用左的方式來提升人氣，獲得權力，從大搞廣場式的形式主義的唱紅就可以看出來，正因為如此，在未來權力道路上，當薄熙來遇到許多阻力時，為了打破阻力，是否會習慣

成自然地用過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來達到目標？既然以左派姿態上台，也自然會去滿足左派對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態上也已經被左的那一套辦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擔心一旦薄熙來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導彈一樣，越來越左，來一個打遍天下無對手，所向無敵。中國剛從文革災難中走出來，再也不希望出現另一次文革災難。人們對薄熙來未來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這也是有道理的，這正是問題的關鍵。

人們說，薄熙來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也消除了一個隱患。蕭功秦認為這話也有道理，雖然薄熙來未必就是搞真左，而是以形式上的左作為動員手段，來獲得權力，但這就會如同打嗎啡上了癮一樣，形成對左的路徑依賴。這是我們從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毛澤東晚年也是如此，這是理解薄熙來事件揭示的歷史意義所在。

威權政治到民主制度的過渡要經過五步邏輯

當談到重慶模式本質上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模式時，蕭功秦認為，可將其理解為從改革以前的全能主義轉化過來的特殊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這個資本主義利用了市場經濟，而國家在其中又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它更接近於東亞集權政治與競爭市場相結合的“凝聚性資本主義”，但在國家對經濟的整合程度上，在組織資源以實現國民經濟重大目標的能力上，在國家與企業家合作的程度上，國家顯得更為強勢，這與中國從全能主義國家轉型的歷史背景有關。強國家——弱社會是它的特點，它的優點與缺點均與這種結構有關。

關於權威主義如何過渡成公民社會的問題，蕭功秦解釋，如果權威主義有一個向民主過渡的理性目標，它就是一個良性的威權體制，它就有一種理性選擇的可能性，這種選擇可以

概括為五步邏輯。

第一步是改革者掌權，這是鄧小平撥亂反正已經做成的事，第二步是經濟轉型，也就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並進而導致經濟起飛，這是江澤民、朱鎔基時代做的事，第三步，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上，利用國家的財富收入進行民生建設，以克服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兩極分化與貧富不均，胡溫體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事，重慶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第四步就是讓市場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多元利益團體自我組織起來，發展公民社會團體，這種社會的自主組織力量，用他的話來說，是一種政府以外的多元整合能力。作為政府善治的一個補充。他希望習近平時代能開創公民社會發展的新局面。

由於在民生建設方面打下基礎，讓貧富分化得到抑制，公民社會的建立不會變成革命的爆破筒，人們會更多地關注自身利益的表達，公民社會的成熟發展，才能有效地克服民粹主義。到了第五步就是憲政民主。

概括地說，中國改革開放，從邏輯上講，要經歷改革者執政、經濟轉型與起飛、民生建設、公民社會、到憲政民主，應該是中國作為後發展國家向民主過渡的五個階段。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的基本實現為條件，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當今中國，實際上正是處於這一邏輯發展的第三步階段。即從大規模民生建設向公民社會發展的階段。

而為什麼民生建設與公民社會是憲政民主到來前的必要條件？蕭功秦表示，如果沒有公民社會，一人一票的民主就必然變成劣質的民粹主義民主。由於中國建國以來始終沒有社會自治的傳統，一旦實行選舉民主，就是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強烈的民粹主義“井噴”狀態，這絕對是社會大災難。這也是現在特別要強調中道理性主義的中間派立場的關鍵意義所在。“沒

有在公民社會中受到民主自我訓練的大眾，很容易受政客煽動，這樣的民主是劣質的民主，比較而言，優質的民主是透過公民社會，讓人有更理性的判斷力、自治能力、妥協能力，能進行更有理性選擇。”

蕭功秦認為，如果從這一階段論來判斷後發展國家的威權政治，可以把威權政治分為兩種，一種是良性的威權政治，它具有開明的民主導向，能夠按照五步邏輯漸進地發展，通過威權政治為憲政民主建立各種必要條件，從歷史上來看，蔣經國、全斗煥、樸正熙的政治，基本上走這條路。那麼良性威權政治是如何來的？蕭功秦解釋，良性威權政治也是從歷史經驗中概括出來的，它並不完全脫離歷史經驗、是理性分析的結果；東亞和南歐西班牙模式是相對來說比較良性的威權政治。

事實上，歷史上也有大量劣質的威權政治，蕭功秦解釋，這樣的威權政治利用統治權力的集中，引進了一些外國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經濟獲得發展，但整個體制結構仍具有權錢勾結、朋黨政治的色彩，劣質化威權政治就是退化了的家長制；此類威權政治在二十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上不勝枚舉，拉美的海地政權，中東的卡扎菲政權，亞洲的菲律賓馬科斯政權、印尼的蘇哈托，都是如此。政治學上稱之為“蘇丹化政權”，此類威權統治者把統治區視為一己私產。

至於毛澤東的文革體制與計劃經濟，蕭功秦認為是建立在平均主義烏托邦理想基礎上的全能主義體制，與威權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政治類型，“他是農業社會主義加上個人的專制，秦始皇加馬克思。對於實現中國現代化則根本是南轅北轍。”

中國的特殊威權政治

若要分析鄧小平的一套，蕭功秦認為鄧小平走的是新權威主義，是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開明專制。“他的第一步就是改革者掌權、撥亂反正，排除黨內保守派的干擾。”蕭功秦說，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概括相當客觀，趙紫陽多次提到，鄧小平只堅持兩點，第一點，共產黨的領導，這點絕不能挑戰，第二點，鄧小平不關心所有制，怎樣改都可以，只要經濟好起來就行，因此鄧小平走的就是新權威主義。

“八十年代後期，趙紫陽曾經和鄧小平介紹過新權威主義，說知識份子中有個一個新權威主義的思潮，它的主要觀點是，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不能立即實行民主，先需要經過一個權力集中階段，通過經濟發展，民主才能實現。鄧小平對此的反應是，他說自己就是新權威主義，不過這個詞不好，可以換另一個詞。”

蕭功秦認為，中國從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新權威主義通過鐵腕建立了威權，南方講話則進一步與左派劃清了界線，從這個意義上說，脫胎於共產革命體制的鄧小平模式，到九十年代前期才正式成形，但這一“後革命體制”的新權威主義的發展和一般的威權政治有個不同點，它是在一個共產主義革命體制的背景上發生的轉型，客觀上，鄧小平是要走的正是威權政治的路線，因為威權政治就是政治集權與市場競爭相結合。

但這樣強國家弱社會、後共產主義的威權體制，蕭功秦認為也不能說沒有優勢，其優勢特別表現在國有體制轉制的過程中：“四千萬工人下崗，用一位親歷的管理者的話來說，‘既是殘酷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了工會，當時決不可能邁過這一門坎，然而，也正因為威權體制下能邁出了這一步，意外使得經濟私有化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中國經濟確實柳暗花

明，工廠生產效率大為提高，銀行也不再成為製造壞賬的無底洞。再加上此後中國又成功加入WTO。產權明晰化，高效率勞動力，人口紅利，這些因素使大量訂單進入中國，形成了極其強勢的競爭力，因此出現經濟的大發展。中國在新權威體制下，從此迎來了百年未遇的良好發展時代。”

但另一方面，問題又反了過來，由於是強國家弱社會，弱社會無法對強國家進行制衡，因此蕭功秦指出，權力腐敗的情況會很嚴重，由於上層又特別擔心民眾挑戰自己，於是就形成了大維穩的模式，用維穩的“不變應萬變”，以代替漸進改革，形成如下惡性循環：腐敗與社會不公——社會不滿與群體事件——大維穩代替改革——矛盾進一步加劇，這是一種不斷重複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形成後，腐敗更嚴重，腐敗官僚又害怕人民對他在經濟上進一步的清算，因此更加收緊控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變成良性的威權政治而不是變成劣質的、退化的威權政治，還有許多路要走。

對十八大抱有期待：走向共和國的新文明時代

蕭功秦認為，中國發展雖然大有成就，但在應對積累的矛盾方面，已經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中國是否陷入由此而形成的危機？蕭功秦指出，十八大以後是一次“抄底反彈”的機會。如果僅僅用維穩來代替改革，當路徑依賴、矛盾越來越大時，再來改革，就可能陷入所謂的“急診室效應”中，這就如同急診室當中有兩派醫生，有人認為必須大改革、大手術，才能解決問題、延長病人的壽命，另一派認為，病人都要死亡了，動大手術只會死得更快，所以不能動手術。兩派都是合理的，但卻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在陷入急診室效應以前，最好的辦法就是開始進入改革階段。

蕭功秦對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並不感到悲觀，他解釋，原有的維穩模式已經無法應對越來越深的社會矛盾，這已經成為國內各階層與官員的共識，改變的方向，至少不是向左轉，更多的應該向寬鬆的方向發展，現在政府面臨社會要求改革的壓力比十年前大多了，好在現在中國大多數人並不激進，中間收入階層和穩健思想者仍佔多數，因此還是有相當的希望。一旦錯過了這個階段，激進主義就會膨脹起來，那時政府就會陷入兩難：不改，社會壓力太大，改革，則陷入急診室效應。如清末攝政王時期就是如此。

對於十八大後的中國，蕭功秦也覺得總體上應該會比現在更有希望，他認為，十八大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與準備，中國應會更加開放。他預測，一開始，一般而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可能會要打一下“左燈”，以強調自己的正統性，這是中國當代政治的傳統邏輯，他對此有思想準備，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相信會走向政治上的改革開放。新政治精英要擺脫困境，並獲得民眾中的合法性，捨此沒有其他路可走。當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過急，此前應該有一個公民社會與社會自治組織健康發展的階段，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民主化後民粹主義惡性泛濫。當然，這種設想也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他還說，他不能保證，在面對強大社會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的政治精英會不會急劇向左轉，其結果會陷入新的惡性循環，會很可悲。

他希望未來的中國政治家在文化發展上也應該有想像力一些，不能只講“學雷鋒”，其實，有許多可供選擇的文化創新提法來凝聚人心。例如“創建共和國的新文明”這樣的提法，前者（共和國）是繼往，後者（新文明）是開來。繼革命之往，開民主之來，他對官方提出“學雷鋒”，學習延安講話精神，“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文化創新更為重要。

蕭功秦認為，未來無論中國哪個領導人上台，都只是長期試錯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人的理性設計能力是有限的，中國只有在經驗與嘗試中才能找到擺脫困境的路徑，胡溫體制雖然做了一些相當不錯的事，但“大維穩”來代替改革的模式確實造成很多問題，這就意味，一個新的試錯階段還會出現，如果當政者在“左”的方面嘗試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現“右”的試錯過程，之後“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會向左的方向轉一下，這種不斷調節過程，也許要以10年為單位，才能看到一些試錯的成果。對此蕭功秦還是抱持樂觀。他相信中國人與中國的政治精英有足夠的聰明與智慧。

此外，中國地方性的試錯也還不斷在進行，蕭功秦表示，地方性試錯和中央的試錯結合起來，社會已經產生相當的變化，經濟的發展，一定會促成經濟利益多元化，進而出現社會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來看，中國的社會問題很嚴重，但社會進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發展。

蕭功秦說他很少來美國，但願下一次來美國時，能把國內令人鼓舞的發展與各位分享。都是中國人，誰都希望中國進步。

美國律師詳細解析 王—海—薄案疑點

中共官方至今未公佈王立軍、海伍德、薄熙來案的內情，坊間的傳聞也從未停過，但王立軍是否真的自願走出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海伍德是否確實是氰化鉀中毒？谷開來真有可能親自殺人？美國紐約律師高光俊向《大事件》詳細分析了案件的各項疑點，讓讀者對案情有另一層面的思考。

熟悉中國公安體制

高光俊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察系，西南政法學院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所重點法學院，有中國的黃埔軍校之稱。1979年高光俊進入西南政法學院時，正逢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招收刑事偵察專業學生，因此許多人在進入西南政法學院前，不知道有此專業。

“我們原先都是報法律專業，進去後，約100個人被選入刑事偵察專業。”校方給與學生一個月的選擇期，有人回到法

律專業就讀，有人則留在刑事偵察專業裡，高光俊和現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何挺都屬於後者，也有人從法律專業轉到刑事偵察專業，現任的公安部副部長楊煥寧就是從法律轉刑事偵察。

刑事偵察專業的學生畢業後由公安部統一分配在全國公安系統工作，高光俊 1983 年畢業後，公安部從 97 名畢業生中挑選 11 人到北京公安部，高光俊是其中一人，他被分發到北京中央人民公安學院（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公安二室（現偵察系），教授刑事偵察，期間高光俊曾參加中國公安統編教材委員會的系統教材編寫，且有近一年的時間在北京公安局工作。

1989 年的 64 天安門事件中，高光俊因為策劃北京警察上街遊行，於 1991 年被逮捕，之後成功逃脫，1993 年抵達美國，繼續攻讀法學碩士，之後考取紐約執業律師執照，從事法律工作至今。

由於西南政法學院許多學生畢業後都服務於中國的重要機關，高光俊在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培養出的學生，如今也幾乎都在中國公安系統工作，因此高光俊所認識的中國法學界，特別是公安系統人士較多，加上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的發生地，正是高光俊求學之地，重慶的公安法司人員有八、九成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因此高光俊對薄王案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王立軍事件疑點

1. 王立軍主動走出領事館？

目前高光俊經手的移民案較多，特別是政治庇護一項，高光俊本身也是透過政治庇護的方式移民美國。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目的就是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但 30 小



高光俊（記者柯宇倩攝）

時候，王立軍離開美國總領館。

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王立軍尋求美國政治庇護一事，美方說法是，並未明確拒絕王立軍，而是王立軍主動離開，這說法不大可信，因為王立軍已感覺到生命

受威脅，他從重慶跑到成都，就是希望得到美國的保護，且外頭有大批軍警包圍、前途未卜的情況下，王立軍即使被北京帶走，也肯定被關入監獄中。

高光俊認為，王立軍帶了方方面面的資料進入美國總領事館，就是作為交換政治庇護的條件，而重慶有 10 多家外國領事館，王立軍選擇美國，而不考慮其他國家，可能原因就是美國更有影響力，更有能力與中國打交道。將希望全寄託於美國總領事館的王立軍，如何會主動走出領事館？

2. 美國領事館沒有接受政治庇護的義務

“我覺得美國沒有給王立軍政治庇護，是完全正確的決定。”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按照美國領事館的管轄範圍，領事館沒有接受政治庇護的權限。美國規定，申請政治庇護者，人必須在美國境內，美國領事館或許能勉強稱為美國領土，但條約也明確指出，領事館並沒有接受外國公民政治庇護的義務。

當牽涉到兩國政治、外交關係時，美國的法律規定也可以有例外，高光俊說，方勵之事件就是一例，但當時美國總領事

館並未直接給與方勵之政治庇護，而是等方勵之抵達美國後，美方才完成政治庇護的手續，且當年國際間給與的人權壓力也不同，美國政府願意不惜代價達成許多協議。

高光俊對《大事件》解釋，現在於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申請通過後，如欲讓家屬也到美國，美國領事館的作法是給與家屬兩個包裹，一個包裹給中國的海關看，名義可能是到美國訪問、探親，另一個包裹是給美國海關看，顯示其為政治庇護者的家屬。

如國不能申請政治庇護，又想尋求美國政府的保護，第二條途徑就是申請難民。“難民是聯合國制訂的計劃，美國也參與其中，聯合國在泰國設有難民辦事處，但成都沒有難民辦事處。”高光俊解釋，雖然美國領事館有時也是保護難民、政治人物之地，但極少發生這種情況，多半為戰爭時期，如越戰時，大量南越難民逃到美國領事館中，美方甚至派飛機將難民接到美國，但這些人也是抵達美國後才完成法律手續。

3. 王立軍不符政治庇護條件

更關鍵的問題是，王立軍不符合申請政治庇護的條件。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申請美國政治庇護，首先是因為受到政治、宗教、種族等方面的迫害，生命受到威脅，這點王立軍勉強說得上，但還有一點，如果申請者曾經參與迫害他人，則美國不會給與政治庇護。

“王立軍是公安局局長，尤其在重慶的3年零8個月期間，在其手上受迫害的人、發生過的命案不計其數，美國怎麼可能給這樣的人政治庇護？”在高光俊接手的案子中，也有位20多年經驗的派出所警察，雖然並未親自參與迫害人權之事，但因為他擔任戶籍警察，在申請政治庇護的法庭上，法官問：“你做戶籍警察時，遇到計劃生育超生者怎麼辦”時，被告知必須

如實回答的這位警察，答道：“如果遇到超生，會將名額上報”，因此被法官和檢察官認定此人參與迫害之事，拒絕其政治庇護申請，此案目前還在上訴。

不只從法律規定上來說，美國不能給王立軍政治庇護，從外交上來說也不合適。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當時習近平就要訪問美國，美國沒必要因為此事得罪中國政府。

從實際情況來看，王立軍在領事館停留時，領事館外也被大量軍警包圍，高光俊認為，中共不致於闖入領事館內搶人，但美方可能一方面安撫王立軍，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政府達成某種協議。“從後果來看，我相信這件事中國政府更應該感激美國領事館的作法，因為成都總領事館始終都沒有暴露太多訊息，也沒有將王立軍硬收在領事館中。”

部分美國國會議員批評奧巴馬政府所做的決定，認為應該給王立軍政治庇護，因為王立軍可能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信息，如海伍德死因、中共內部運作機制等。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王立軍對國家安全情報的作用不是太大，他只是地方的公安局長，並非安全部官員。

從以上幾點來看，高光俊認為美國拒絕王立軍的政治庇護是很自然的事。

4. 王立軍其實有其他選項

有人認為，王立軍進入總領館是自保的唯一的方式，因為唯有將事情鬧大、引發國際關注，才有保命的機會。但高光俊說，其實王立軍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王立軍對國際關係與法律沒有深入的研究，他並未考慮清楚走進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後果。”高光俊對《大事件》列出幾項更佳的選擇：

第一，王立軍做了二三十年公安，應該想到，既然可以化

妝逃出重慶，他也可以逃出中國。據悉，薄家“三大臣”：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前軍情系統人員于俊世、華彙人壽董事局主席馬彪 2 月 5 日已先乘坐飛機從重慶逃往香港，後轉到澳洲，直到兩會前才回到中國，雖然王立軍可能目標較大、被監視的情況更嚴重，但仍可化妝逃出中國，例如從重慶進入聯合國在泰國的管轄範圍，再與美國政府接觸，這時美國的態度可能不同，因為此時美國不必正面跟中國政府發生衝突，也不用擔心王立軍如果留在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幾年後都送不出去，等王立軍人到了美國領土後再申請政治庇護、考慮各種在中國參與迫害人權的辯護措施，機會都比較大。

第二，王立軍不應該直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而是可透過各種間接方式先與美國領事館人員取得聯繫，會比最後軍警在領事館外對峙的情況好得多。

海伍德案疑點

1. 家屬同意不驗屍就火化？

由於中國政府並未公佈海伍德案詳情，因此對此案的推斷主要根據目前外界流傳的版本，這些版本也有許多值得質疑之處。

高光俊對《大事件》解釋，發現海伍德於重慶市死亡的那一刻，負責重要案件的重慶公安局刑偵總隊第一大隊就會接到通知，開始做犯罪現場勘查，之後做出初步判斷，看死者是正常死亡或他殺，如屬於謀殺，會接著展開進一步調查，如屬於正常死亡，將通知死者家屬，家屬簽字後，再進行火化、埋葬。

此案一開始稱海伍德死於心臟病，之後由海伍德妻子王露露簽字，將海伍德遺體火化，海伍德其他在英國的家屬則沒

有發表相關聲明。高光俊表示，另一種方式是，即使家屬並未簽字，但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也可強行火化。

此外，海伍德和王露露是在谷開來介紹下才認識的說法，高光俊也認為不準確。“王露露是大連人，一種說法是，谷開來把王露露介紹給海伍德認識，現在看來，其實是王露露和海伍德先結婚，之後才認識谷開來。”

2. 海伍德死於氰化鉀中毒？

致海伍德於死地的氰化鉀，是現場初驗時就能發現的化合物。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氰化鉀是一種無色或白色的晶體，有杏仁味，在工業上使用時，有時會刻意在氰化鉀中添加刺鼻的味道，讓人提高警覺。氰化鉀熔點 600 多度，一般人體涉入超過 100 毫克的氰化鉀，就有致命危險，能幾分鐘內造成死亡。

高光俊解釋，攝入氰化鉀者首先會進入刺激期，有頭疼徵兆，接著是呼吸困難期，將感到胸悶，第三個階段會產生痙攣、瞳孔放大等症狀，第四步是麻醉期，人會昏迷、大小便失禁，最終死亡。

氰化鉀中毒的特徵之一是嘴唇、指甲發乾，顏色烏黑，高光俊認為，雖然氰化鉀容易溶入身體的各部位，因此比起一般毒品，氰化鉀的化驗要難一些，但對於有法醫、偵察經驗的人來說，要查覺出氰化鉀的存在仍非常容易。

高光俊相信接到海伍德案的報案時，王立軍也到了現場，雖然公安局長親自到現場並非普遍現象，但由於死者是海伍德，高光俊相信辦案人員瞭解死者的背景，會通知王立軍到現場。王立軍應也能很快看出死者是氰化鉀中毒。

但氰化鉀是管制品，一般人無法取得，雖然工業用氰化鉀相對容易得到，但氣味濃烈刺鼻，容易被察覺出異狀，因

此海伍德是服下氰化鉀死亡的說法，高光俊也持保留態度。

3. 強迫王立軍吞下氰化鉀？

坊間流傳的一個版本是，海伍德先喝下有毒飲料後吐出，接著被兩人按倒、強灌氰化鉀致死。高光俊認為這個版本不太可信。“海伍德是將近 1 米 8、正值 41 歲的壯年，張曉軍個子 1 米 7 左右，一直給薄一波當個警衛而已，壓制海伍德，絕對不是張曉軍做得了的，一定是很多人一起才有辦法做到。”

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氰化鉀一大特點就是，容易害別人，也容易傷害自己，若一不小心吸入，對自身也有危險，因此使用氰化鉀的人都非常謹慎，且有一定的技術在，如國際高級間諜。德國納粹的二號人物戈林（Hermann Goring）被捕後，在被判處絞刑前兩小時服下氰化鉀膠囊自殺，希特勒情婦愛娃（Eva Anna Paula Braun）也以氰化鉀自殺。

此外，高光俊說，若海伍德生前曾有過掙扎、喊叫，儘管處在旅館房內的私人空間，仍可能讓外頭的服務員察覺到不對勁。

4. 谷開來煲湯讓海伍德喝下？

另一個版本是，谷開來以過生日為由，要求和海伍德在賓館房間內獨處，谷開來接著帶了摻有氰化鉀的湯前往賓館，讓海伍德喝下後，眼看著他斃命再離開。

高光俊對《大事件》分析，如果是這個版本，則湯汁的殘留物、海伍德的排泄物、谷開來親自作案等，都可能為此案留下許多證據。

選擇賓館作為作案地點，也是疑點之一。高光俊說：“現在中國好一點的賓館，幾乎都有 24 小時監控錄像，我不相信谷開來連這點都不知道，她會自己把湯罐送進去、又最後一

個離開？”

5. 海伍德的真實身份

海伍德已被證實，曾為位在英國倫敦的企業情報諮詢公司哈克路特（Hakluyt & Company）工作，哈克路特是由前英國軍情六處（MI6）特工與他人創辦，僱用許多前軍情六處情報員，也與軍情六處保持密切關係。

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海伍德在中國待的時間超過10年，但從沒有一個固定發給薪水的單位，海伍德有妻子，有兩名孩子，又經常來往世界各地，開銷不小，他的資金來源為何？

“如果海伍德有間諜背景，他在中國這麼長的時間、與政治局委員及其家屬的關係如此密切，中國的安全部門不會一點風聲都沒有接收到。”高光俊解釋，中國安全部門的一個任務是，部長級官員接觸的外國人，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掌控，更別說是政治局委員接觸的外國人。

如果中國安全部門對海伍德的身份有所懷疑，如果海伍德並非只是個英國商人，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背後的故事將更多。

6. 英國政府反應遲緩？

海伍德早在2011年11月15日便死亡，但英國方面直到2012年3月才開始重視，引來英國政府是否因為海伍德的特殊身份而刻意淡化處理的猜測。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英國公民在海外死亡，英國領事館有義務掌握訊息，美國也是如此，如有美國公民在海外死亡，必須24小時內通知美國政府。

“英國政府和海伍德的家屬對於海伍德的死亡，都沒有任何反應，直到四、五個月後，王立軍事件發生，英國外交部才要求中國政府調查，這點很奇怪。”高光俊說。

7. 王立軍發現海伍德死亡，割肉當證據？

根據坊間流傳的版本，王立軍奉命前往南山麗景渡假酒店處理海伍德命案，在調閱監視器時，發現谷開來最後一個離開海伍德房間，留了點心機的王立軍，刻意讓法醫切下一小片海伍德的皮肉化驗，此物或許成為後來谷開來認罪的證據。

高光俊對此提出質疑：要保存取下的肉，是否需要特殊容器？保存地點為何？而且王立軍有很多其他取證選擇，如海伍德的指甲、頭髮、血液，甚是排泄物都比一塊肉好保存。因此高光俊認為這項傳聞不太可靠。

8. 因為兩億英鎊殺人？

海伍德究竟是為了什麼遭到殺害，也一直未有定論，新華社稱，谷開來及薄瓜瓜與海伍德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覆查，現有證據證明海伍德死於他殺，谷開來和張曉軍有重大作案嫌疑。

許多坊間版本也都指向谷開來與海伍德之間的金錢糾紛，有稱谷開來不願意支付海伍德約兩億英鎊的佣金，因此海伍德開始蒐集薄家海外洗錢的證據，從此種下殺機。

“我不大相信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妻子會只因為兩億英鎊殺人。”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谷開來與薄熙來可能牽涉的海外資產就是幾十億人民幣，比較有可能的是海伍德拿不到錢，準備公佈對薄熙來不利的消息，才引發谷開來的殺意，但高光俊指出，中國有句話：凡是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如果谷開來確實與海伍德的謀殺有關，一定有比錢更重要的動機。

高光俊表示，做刑事偵察的人都知道，殺人案最好破，因為動機明確，很容易找出兇手，如果谷開來殺害海伍德，第一個可能的動機是情殺，但傳谷開來的情人眾多，因此情殺可

能性不大，第二個可能的動機就是源自海伍德的間諜背景，這對整個薄家都是非常要命的，高光俊相信海伍德的死與第二個因素有關。

9. 把谷開來稱為薄谷開來？

新華社在宣佈調查谷開來的專稿中，不尋常地把谷開來稱作“薄谷開來”，新華社指出：“據警方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移送司法機關。”

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許多分析都認為新華社此作法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暗示谷開來有外國身份，第二中原因是顯示谷開來與薄熙來之間的關連性，兩種都有可能。“這種官方發出的稿子是審查又審查的，不可能是打字錯誤，應該是有意的。”

10. 谷開來可能的判刑

按照中共規定，如果涉案者是黨員，則由中紀委來處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就由司法部門處理，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後者依照案件的發生地點來判定哪個單位對此案有管轄權，因此谷開來和張曉軍案應該由重慶市公安局處理，但由於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自己都有案在身，因此案件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刑事偵查局直接處理。此外，谷開來也牽涉到發生在其他省分的案件，因此必須由公安部來協調處理。

至於谷開來可能的刑期，高光俊認為可能輕判。高光俊說，按照中共法律規定，有時殺一個人都會被判死刑，如果谷開來牽涉好幾條人命，照理是判死刑，但中共的“刑不上大夫”

觀念仍很濃重，因此司法部門還可能找其他理由對谷開來寬大處理，谷開來最嚴重應只會被判死緩。

薄熙來案

1. 可能送交司法處理

薄熙來案就先交由中紀委處理。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中紀委無法直接判刑，最多只能雙規、開除黨籍，有時雙規、開除黨籍都不足以懲罰某個人的罪刑，就可能將此人交由司法機關處置。

薄熙來是中共高官，也是黨員，因此先交由中紀委調查，接下來，高光俊相信薄熙來必然會被開除黨籍。目前還未完全認定薄熙來涉入刑事案件，一旦對薄熙來涉入海伍德案和貪腐案的程度有所掌握，高光俊相信薄熙來案也會轉由司法機關處理。

2. 專案組組長是周永康？

中共中央對薄熙來立案調查後，據傳中共內部已成立一個專案調查組，由周永康擔任組長，但也有分析認為周永康因與薄熙來“謀反”，也成了被調查的對象，因此不可能擔任專案調查組組長。

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政治局常委都有明確的分工，很多常委都是堅守自己的陣地，不容他人踏入，而中紀委的任務就是監察全國的黨員，因此薄熙來案自然是周永康的職權範圍，胡溫沒辦法不讓周永康處理此案，除非周永康自己也涉入案件中，至於胡溫會不會名義上讓周永擔任組長，暗中卻安插入自己的人馬，高光俊認為有此可能。

周永康與薄熙來關係密切，由周永康擔任專案調查組組

長，高光俊認為周永康暗中挺薄熙來是有可能的，但一個部門的決定無法完全由一個人作主，公安部雖然是周永康的起家之地，但高光俊相信並非每個人都忠於周永康。

3. 王立軍、薄熙來竊聽高官談話？

據報導，薄熙來為了鞏固自己的黨內地位，下令王立軍安裝竊聽器，對中共高層官員展開大規模的竊聽行動，其中包括胡錦濤。

高光俊對《大事件》解釋，中國基本上只有兩個單位擁有竊聽權，第一是總參三部，此單位擁有大量優良的竊聽設備，第二是國家安全部與底下各廳局。

高光俊說，公安局的國保偵察監聽系統也能執行竊聽行動，但其權限有限，只能竊聽對國家政權有危險的中國公民，如果監聽國家領導人的談話，就是越權行為，但高光俊相信，如果有薄熙來在背後支持，王立軍確實可能做出竊聽的舉動。

“但如果這是真實的事，也反映現在對中共國家領導位置的鬥爭已經沒有底線了。”高光俊說。

薄瓜瓜在案件中的角色？

在薄熙來、谷開來案沸騰之際，媒體也不斷揭露薄瓜瓜的醜聞。高光俊認為，薄瓜瓜應未參與薄家的貪腐情事，“他一直在讀書，不像一些高官子女，已經在經商，因此會直接涉入腐敗事件中。”

至於谷開來的殺人案和薄熙來的政治鬥爭，高光俊更不相信薄瓜瓜涉入其中。高光俊對《大事件》說，將薄瓜瓜推到風口浪尖，無非是人們對這樣的官員及後代有相當程度的憤怒和不滿。“薄熙來一天到晚喊著均富、反腐，也在重慶建了許

多平租房，結果自己卻涉入腐敗、洗錢案。薄熙來要學生唱紅，卻讓自己的孩子從小到國外唸書、上最好的學校。人們自然要把薄瓜瓜扯出來。”

腐敗和謀殺是中國官場普遍現象？

對一般中國老百姓來說，官員的貪污腐敗、情色交易，可能不是希罕的事件，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其實中共官場中，普通謀殺案也經常發生。“只要一個人在政治上沒大問題，他所涉入的殺人案都會被遮掩過去。許多高幹的保姆、傭人死亡原因離奇，一看就是有問題。如果谷開來確實犯謀殺罪，這或許也能解釋她為什麼會一再殺人。”高光俊指出，如果不是因為王立軍，海伍德的死亡案將不再被提起，且未來死亡的人數可能還會增加。

高光俊 80 年代在北京工作時，就遇過一名退休回到北京的原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家中發生保姆死亡案，這名保姆 20 歲不到，當北京市公安局到現場勘查時，此退休副司令員完全不理會公安局人員，副司令員妻甚至要公安局人員“滾”出家門，但為了做個交代，高光俊同事需照張相，同事發現死亡女孩的脖子有勒痕，明顯是不正常死亡，但也只是照張相就離開。

“想想還有多少政治上沒倒台的人，兇殺案還藏在裡頭？”高光俊問。“而且很多公安就是因為得到這些把柄，才一步步往上爬，王立軍、陳希同都是典型例子。”高光俊相信，如果將來有另一個中共高官倒台，細查下去，可能也會發現殺人案。

單純政治打擊只會讓 大大小小薄熙來繼續往上走

“如果薄熙來案的審理只是單純的政治打擊，會讓大大小小的薄熙來繼續往上走，接管國家的各個層面，使得將來共產黨的政治博奕更殘酷血腥，社會制度和公民更不安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異議人士王軍濤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近 10 年間中國從制度建設到人事選拔再到社會管理全面黑社會化，如果薄熙來案要用黑幫清理門戶式的政治手段了結，會讓中國社會繼續黑下去，但如果能把這個案件作為起點，建立一個新規則，讓獨立司法，讓媒體、民眾監督，則能夠堵住貪腐暴政惡化的趨勢。

王軍濤為北京大學原子核物理學士、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碩士，1989 年 64 事件後被捕，1994 年以保外就醫名義前往美國，2006 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

薄熙來案關係中國未來走向

有鑑於文化大革命為中國社會帶來的混亂局面，1978年開始審判“四人幫”時，鄧小平曾欲通過此案建立法治社會、舉行公開審判，提升中國人民的法治意識。這是他所代表的一大批剛從政治迫害中回歸領導崗位的領導人的共識：以法制為今後政治生活中不再發生殘酷的政治迫害建立安全底線。

王軍濤對《大事件》指出，鄧小平審“四人幫”時，本意雖然還是想懲罰政敵，但選擇司法審判方式進行政治處理，是想規範此後的政治鬥爭，提升其文明程度並防止再出現文革中普遍發生的惡性迫害。當時的審理中，其做法是，最高政治當局制定特殊程序和選擇法官，最高當局為被告指派律師，辯論內容、進程和結果也事先規劃好，並將不相干的案件放入一同審理。雖然從法律上來看，這樣的做法很可笑，但鄧小平至少有用司法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念頭，在用意和做法上比毛澤東有進步。即使當時中共想把對“四人幫”集團和“三種人”的案件辦成司法上合格的案件，現實中也做不到；除最高當局用意還是政治報復外，中國社會當時對法治文明的各項要素缺乏認識，沒有必要的制度設施，也沒有相應稱職的人才。

王軍濤認為，今天看中國政治鬥爭、司法現狀並回顧司法建設過程，會發現鄧小平開創的這些努力很失敗。中共最終不但沒達成法制建設的目標，即：不僅為社會生活中的公民建立正常秩序，而且為政治鬥爭參與者建立安全規範，而且中國的道德底線還不斷被破壞，如今處都是違法事件。“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制定了一些較為文明的規則，如重建法治、規定文明的底線，89年鎮壓時，共產黨已經先破壞了民間的管理規則，89年對我們進行審判時，雖然審判本身是政治迫害，但共產黨還想裝得很文明，現在這些東西完全沒有了。”

王軍濤對《大事件》表示，近幾年對律師、維權人士的打



王軍濤（記者柯宇倩攝）

擊，就是文明底線不斷在基層被破壞的證明，如今中共處理薄熙來事件的手法，則完全見不到法治的機制。

薄熙來被拉下馬，許多人認為是維穩派的勝利，毛左勢力的削弱，也令許多自由派人士大受鼓舞，但王軍濤提醒，薄熙來案的重要之處，就是關係到中國未來的走向、政治博弈規則和中國將來的社會安全。

“很多人都只看到薄熙來一旦當上中國領導人，會很危險的這一面，我相信薄熙來是很危險的人，做得出殺人越貨這種事，但胡溫把薄熙來拿掉，照這樣處理，就是將文化大革命後的政治底線都破壞，所以如果考慮到這件案子對中國法治的影響，也會對中國國家社會秩序帶來危害。”

王軍濤對《大事件》解釋，中國在胡溫下台後，上來的就是紅衛兵一代，這一代人經歷複雜，思想來源多樣且不穩定。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時原來真誠地相信過共產黨，並以理想主義的狂熱自我奉獻和犧牲以追隨領袖，卻給社會和自己都帶來巨大災難；後來經歷上山下鄉，理想徹底的破滅，在叢林規則支配的社會中於最底層掙扎；80年開始，這代人進入學府，反思文革教訓並有機會接受西方的思想，在新知識和思想基礎上重新恢復一些理想，但89年又經歷了天安門事件，90年

代則處在完全沒有道德理想和底限的環境中，追求最大化個人利益和無節制地滿足個人心理各層次的慾望。

紅衛兵一代崇尚野心、暴力和個人突破成規、建設成就，這一代或在小學，或在初中、高中階段遇上文化大革命，有的成日拿著軍刺、武裝帶上街打人，王軍濤指出，這一代裡，薄熙來並不是異數，他只是太過張揚，挑戰到中央，因此惹禍上身。

2005年，河南副省長呂德彬僱兇殺害妻子，2007年，山東省濟南市人大主任段義和在汽車內安裝炸藥，炸死情婦，2010年，武漢華中科技大學附屬醫院泌尿外科研究院院長肖傳國，因為買兇毆打“打假鬥士”方舟子被判刑，王軍濤對《大事件》表示，中國亂像頻生，今天揭發出的薄熙來，只是多數中的少數。

胡溫執政以來，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口號，但王軍濤認為，近10年間中國官場乃至上流社會其實是全面黑社會化，如果薄熙來案要用披著司法外衣其實是踐踏司法的政治手段了結，會讓中國社會繼續黑下去，相反的，如果能把這個案件作為起點，建立一個新規則，讓獨立司法，讓媒體、民眾監督，則能夠堵住貪腐暴政惡化的趨勢。

王軍濤表示：“薄熙來在重慶實施嚴厲鎮壓異己的恐怖治理，是人類當代政治史上少有的暴政；因此，打掉薄熙來我贊成。但是，如果薄熙來案的審理只是單純的政治打擊，那麼不過是為胡溫剪除一個政敵，為習李掃除接班路上一個絆腳石，為中共官場肅清一個不安分守己者，但還會讓大大小小的薄熙來繼續往上走，接管國家的各個層面，使得將來共產黨的政治博奕更殘酷血腥。”

王軍濤指出，80年代中國開始搞經濟改革，紅衛兵一代進入民間公司，民間公司內鬥得一塌糊塗，90年代這批人進入地方官場，地方則亂像叢生，現在他們馬上要進入中央，之

後中國會有 10 到 20 年的時間，在這個年齡層的領導下。

“讓這樣缺乏忠誠信仰和個人道德底線的一代執政，西方在中世紀後期也曾經有過，那時西方局部地區和時間的政府、上流社會和社會精英也很混亂，他們就是靠憲政和法治，一步步走向清明。”王軍濤對《大事件》說。

因此，王軍濤認為，如果薄熙來案能公開審理，在中國建立一個法治制度，等到紅衛兵一代進入中國各崗位後，人民還有法律的保護，如果法律成為紅衛兵一代手裡操控的工具，將是非常危險的事。

查薄熙來是政治需要

有人認為，“刑不上大夫”、不判高層領導死刑，已是中共官場的潛規則，但薄熙來事件顯示了中共官員不能有“刑不上大夫”的僥倖心理。不過王軍濤對《大事件》表示，查薄熙來，還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絕對不是因為薄熙來犯法。查處薄熙來不僅不會嚴肅法紀，還是為幫派清理門戶，這是對法紀的政治踐踏。

王軍濤指出，最初傳言薄熙來出問題，首要原因是王立軍出事，高層為了離間薄熙來和王立軍的關係、斬掉薄熙來的爪牙，因此讓中紀委調查王立軍繼任者、鐵嶺市公安局原局長谷鳳傑，在谷鳳傑因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處理掉”後，中紀委的矛頭對向王立軍，王立軍原希望薄熙來保自己，但薄熙來不但不保他，還躲到昆明，因此王立軍與薄熙來決裂，跑到美國駐成都總領館，若按此版本的說法，薄熙來是受到王立軍的牽連，中央原本也想讓薄熙來軟著路。

但人大期間薄熙來的發言被視為“毫無悔改之意”，王軍濤一番“薄熙來還可能東山再起”的言論也受到重視，王軍濤說，

一旦薄熙來捲土重來，對中央是很大的威脅，因此中央決定對薄熙來下殺手，只是怎麼整薄熙來仍有分歧。這裡有路線、政紀和法治三種思路提出可供選擇的方案。

薄熙來唱紅打黑，雖然可用路線鬥爭的問題處理薄熙來，但只能拿掉他的路線，卻無法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如果薄熙來繼續活動，仍有很大的影響力，王軍濤舉例，如薄熙來在毛澤東誕辰日參觀毛主席故居，全國可能有上百萬的左派也會到場，薄熙來一下子就能成為左派的領袖。胡錦濤本人也不贊成用路線手段處理薄熙來。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警察的警用標志、制式服裝和警械，由國務院公安部門統一監制，會同其他有關國家機關管理，其他個人和組織不得非法制造、販賣。但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改變女警制服和警車樣式，並傳建有 46 人的私人衛隊。

薄熙來的上述違規事項，讓處理薄熙來的方式有了第二種選擇：違紀。王軍濤對《大事件》說，薄熙來讓重慶只知道有薄熙來，不知道黨中央，因此還可以違紀處理，但這樣做不但整不死薄，牽連面還很大，畢竟曾有六個常委到重慶給與讚揚，許多中央部門也給薄熙來開過綠燈。

“所以他們給薄熙來弄刑事罪。”王軍濤指出，刑事罪並非全無問題，雖然很容易查到薄熙來犯刑事罪的事實，但共產黨員中犯類似刑事罪的人太多，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只針對薄熙來查一件事，所以為什麼中央不查李莊案或其他與薄熙來有關的爭議事件，原因是這些事件牽涉到其他人。“如果平反了一個案件，其他人也要求平反怎麼辦？別的地方的人也向中央上告的話怎麼辦？”

坊間傳聞薄熙來涉入的案件除了海伍德的死亡外，還有導致 112 人喪生的大連空難、向國外轉移高達 80 億美元資產、



哥大頒發學位給王軍濤（王軍濤提供）

與 100 多名女子有染等等，“好萊塢片的四大元素：陰謀、暴力、色情、金錢全有了，就是要把薄熙來搞臭，中共中央並不想透過薄熙來案來維護法治，就是想剪除一個政敵，所以透過政治方式剪除，甚至有意識地利用小道消息、境外媒體。”王軍濤對《大事件》表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或許都

有辦案的意思，但查薄熙來主要還是政治需要，政治需要與法律需要辦案最大的不同處在於，除了要辦掉這個人外，更重要的必須讓此案不牽扯更多的人；因此不是根據依法調查和懲處犯罪，而是根據事先規定要達到的效果剪裁和炮制案件。

“現在這樣搞只會讓人覺得是在整人，我不明白胡、溫、江開了這樣的先例，將來自己的安全何在？將來政治上也會有其他入整你，誰家不能查出一堆事？”

王軍濤認為，目前這種做法打不倒薄熙來，因為薄熙來是應運而生的。人們感到需要薄熙來，需要他解決貧富差距、腐敗、黑社會，需要他蔑視和突破官場規則的魄力。只要這些問題嚴重存在，人民就擁護薄熙來。即使人們知道薄熙來有問題，也認為這是以毒攻毒。如果真想打掉薄熙來，只有一個路子，就是搞政改，建立法治社會，不採取薄熙來的方式，但更好地解決薄熙來聲稱要解決的問題，讓人民不再需要薄熙來。“就像華國鋒、四人幫，他們後來為什麼就算活著也不能東山再起，

就是人民不需要他。”

時評家陳破空曾撰文指出，文強據知犯下四樁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包庇和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姦罪，文強最後被處以死刑。如今，對比文強與薄熙來，可說小巫見大巫。“總計文強受賄和不明財產，不及薄熙來轉出金額的一個零頭；論淫亂，對照薄熙來的‘輝煌業績’，文強應自歎弗如；說到黑，還沒有弄出人命的文強，又豈能望薄熙來之項背，對薄而言，殺一個人，輕易得如同掐死一隻螞蟥。”

陳破空寫道：“以當今中共官場腐敗規模計，文強只能算小貪，薄熙來才堪稱大貪、巨貪。不論三樁罪、七樁罪、還是十樁罪，薄熙來之罪，都是文強之罪的百倍、千倍、萬倍。薄熙來故事，不過是文強故事的高級翻版……小貪官文強被大貪官薄熙來拿下，本身就是中國官場的巨大反諷。”陳破空質疑：糜爛透頂的中共官場，還有多少個文強、多少個薄熙來？

王軍濤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查文強都如此，現在查薄熙來的人，會不會比薄熙來還黑？“現在溫公子和胡公子的錢，傳說超出薄家，更不用說江澤民這些人的家產。”

王軍濤回憶，對於維權運動的發展，于建嶸和莫紹平曾有爭論，莫紹平認為，維權運動往前發展下去，能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矛盾調節機制，但于建嶸認為，在目前政治體制架構中，法治解決不了問題，最後還是得由黨政來解決，因為中央只是想拿維權人士做體溫表，由於從上往下查案查不出，因此讓受害者找維權律師，將事情鬧大後，中央再來追查。在這樣的治理社會思路中，維權是診斷病情的一種手段，不是治病的方式；而給誰看病、診斷什麼病情和如何治病、治到什麼程度，都是黨政權威決定和掌控。

“現在看來，中央連體溫表都不讓你做。這不僅是‘體溫表’總想自做治療方式，而且因為中央也知道病人膏肓，

無藥可治了，因此回避看到真實病情，還要打壓任何治療手段。”王軍濤對《大事件》指出，如果薄熙來案依法處理，訴訟應該一開始就該是透明的，訴訟過程也應該獨立於任何政治力量之外，同時充分尊重被告的權利，採用無罪推定原則，並將最後的陳述權留給被告，關鍵的證據則必須公開舉證，讓雙方律師辯論。“如果薄熙來犯下的罪是真的，依法處理只會把時間拖得久一點，但他一定會被定罪。有了這樣的機制，才可以在未來保護好人，並抓出類似的貪官。”

專案組精心打造薄熙來事件

只是，王軍濤認為目前中共專案組對薄熙來案採取的是“既枉又縱”的方式，所謂的枉，就是出於政治需要，將在法庭上不能證明的一些猜疑性的內容也栽給薄熙來，所謂的縱，就是放過薄熙來真正犯下的案子。

王軍濤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在進入重慶前，已涉入許多爭議案件，如蟻力神案，但這些舉報者有名有姓、證人也都在世的案件，卻沒有一件在查，如今查的是受害者已經死亡、家屬也都接受結果的外國人海伍德案，而證人是另一個“壞人”王立軍，也沒有經過法庭的公開審判。

“要定一個罪名，就要有事實，事實下面要有證據來證明，而且對證據的來源要查明，現在連證據都很成問題。在英美司法獨立的法庭上，如果讓王立軍做污點證人，律師必須反覆盤問，因為他有很強烈的動機打垮薄熙來，讓這樣的人作證，必須懷疑，你可以指望他對薄熙來有什麼問題就說什麼，但他很可能還會往高裡說，會誇大其辭，會將猜測和親眼所見混在一起說。”王軍濤說。

目前頻頻爆出薄熙來、海伍德案件內幕的海外媒體主要有五個：美國《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華文媒體的明鏡網和博訊網，王軍濤分析，這些都是中共專案組投放消息的渠道，英國《衛報》、BBC 都在做獨立調查，但不是中共消息投放的主要對象，至於為什麼選擇西方媒體，王軍濤認為是西方媒體有其信譽在。西方媒體不在乎搶新聞，一般不會拿到消息就發佈，只有在拿到第一手資料時，才會馬上發出。現在西方媒體幾乎是拿到消息就發，說明消息是他們確信的第一手資料。但來源只能是最高領導、專案組或者他們的親信。

王軍濤提醒，所有上述的消息來源其實都是一家之言，都是根據政治需要而洩漏出的內容，因此可信度要打折扣。“專案組的重點就是該枉就枉，該縱就縱，專案組決定如何操縱人心、如何投放訊息。”

王軍濤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的案子一開始就要辦成一個鐵案，辦案者精心裁減出一個案件，準備徹底毀掉薄熙來，不讓他東山再起，同時又不能影響黨國的利益、穩定和形像，不讓牽連面擴大。

但老百姓對薄熙來仍有份支持度在，王軍濤形容，官就像貓，貓偷吃魚就像腐敗，貓抓耗子就像做事，老百姓最喜歡不偷吃魚只抓耗子的貓，但找到這樣的貓太困難，所以老百姓寧可要偷吃魚又會抓耗子的貓，老百姓不喜歡既不吃魚也不抓耗子的貓，就像中紀委，更討厭只吃魚不抓耗子的貓，就像貪官污吏。對薄熙來也是如此，老百姓認為只要薄熙來能幫他們把壞人除掉，哪怕他黑一點也沒關係。

“我相信人最終是有良心的，只是人心有時很軟弱，就像六四剛完大家同仇敵愾，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大家嚐到實惠，就把六四忘了，這幾年六四又成為話題，就是發現六四要解決

的問題，現在給人們帶來危害。”王軍濤說。

海伍德案疑點重重

由於政治力量、政治需要和政治操縱明顯可見，王軍濤對《大事件》表示，除非將海伍德案交給西方的獨立司法過程辦，否則他不相信調查結果。“本來海伍德死亡，從司法管轄權來看，英國可以要求與中國聯合辦案或觀察中國辦案，因為這個捲入私人經濟和情感糾紛的謀殺案不涉及國家機密。剛開始，英國曾經表示要派兩個律師到中國，但中國可能不接受。現在英國政府也有來自反對派的壓力，所以中國政府給出什麼答案，英國也準備接受。”

王立軍背著薄熙來跑到美國總領館，有一版本是王立軍打黑時發現谷開來涉案，因此薄熙來對王立軍起了殺意，王軍濤不相信這個說法。“現在與薄熙來有關的壞事，有一半是王立軍幹的，幾乎所有重慶黑打鬧出人命的壞事都是王立軍的惡行，他為薄熙來殺人越貨，幹這麼多壞事，怎麼後來良心發現，打黑打到薄熙來頭上？所以我不太相信王立軍是因為谷開來的事跟薄熙來鬧翻。”根據第一個薄王反目的版本，薄熙來不願包庇王立軍在東北犯下的罪行，導致王負氣出走，王軍濤對中國專案組的做法感到很可笑，因為王立軍從薄熙來相關案件的罪犯，變成揭露薄熙來罪行的打黑英雄了。

對於坊間流傳谷開來親手下毒殺了海伍德的說法，王軍濤也認為不可全信。“除非她腦袋糊塗了，否則可麼可能選在生日當天，地點選重慶，人員選家丁，又選一個任何法醫都檢查得出來的氰化鉀，殺死後又扔在現場36小時不處理，最後王立軍到場，還看到谷開來在現場？也有謠傳說王立軍取了一片肉，這只能說明海伍德氰化鉀中毒，怎能證明是谷開來下的

毒？而且說谷開來與張曉軍一塊殺海伍德，谷開來是女性，海伍德是高大的老外，可能嗎？”

王軍濤對《大事件》指出，山西煤老闆殺人，都知道事後拴根繩子和石頭，把屍體丟到河中，現在在中國要殺人，到處都能買兇，而全中國那麼大，卻要挑在自家門前？“谷開來在官場混這麼長時間，如果她真的也背負其他條人命，更應該知道怎樣謹慎處理海伍德的事，這個故事破綻太多。”

查案單位也是疑點所在。王軍濤指出，王立軍最後是被安全部的人領走，曾一度傳言中紀委想搶王立軍都搶不出來，如果相信這則傳聞，則就算周永康是薄熙來案的專案組組長，也得聽胡錦濤的指示。“如果王立軍專案組不是薄熙來專案組的管轄範圍，那薄熙來專案組就是受王立軍專案組的控制，薄熙來專案組怎麼查，都是根據王立軍專案組來定。”

薄熙來被查，有一說法是江澤民在清理門戶，王軍濤認為有此可能。“就像陳良宇案，很多人說是團派給上海幫的打擊，沒這回事。陳良宇下台後，上海還是在江系手中，薄熙來下台後，張德江接管重慶，張德江還是江系人馬，胡錦濤並沒拿到重慶。所以有說江澤民把周永康罵了一頓，周永康就轉向了，有這可能。”

外界傳言中央下一個要辦的對象就是周永康，王軍濤認為，周永康即使有事，也是軟著陸，只要他的常委位置不落到江系以外的人手中，就沒必要處理他。

海伍德的身份也是疑點之一，由英國前軍情六處人員建立的情報諮詢公司 Hakluyt 表示，海伍德偶爾為他們工作，但在海伍德死前幾個月雙方的合作關係已經結束，英國外相夏偉林（William Hague）罕見地做出澄清，稱海伍德並非英方間諜。

王軍濤對《大事件》表示，他的理解是，海伍德並非職業間諜，只是拿到情報就做一筆生意，而其最後一筆交易是死前

幾個月完成的，如果海伍德有間諜背景，就可說明為什麼王立軍是被安全部的人領走，也可能因為海伍德的間諜背景，所以英國政府和家屬一開始也都接受海伍德死亡的事實。

最先披露海伍德死亡消息的，是《南方週末》記者褚朝新，他在2012年3月份於微博中留言：“2月15日凌晨5時，與王麗娟（諧音“王立軍”）單線聯繫的號碼上收到一條短訊，大意是：英國人海伍德在渝被害，王麗娟破案劍指薄夫人，於是被休假、入美領館。”此則微博一開始被認為是網路謠言，後來被刪除。

王軍濤認為，褚朝新的微博只說了一句“英國人海伍德在渝被害”，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海伍德是誰，事後事情鬧大，說明有人一步步刻意在炒作，所以這案件就是真有人死亡，也是一個炮製出來的案件。

最後，王軍濤對《大事件》總結說，中共中央對薄熙來目前的處理是執行幫法家規的清理門戶行為；所謂司法判決是想既徹底摧毀薄熙來、又控制其政治後果不殃及黨和其他各級官員的利益及維穩大局；這種做法勢必要踐踏獨立司法、司法透明和公平訴訟原則（尊重嫌犯訴權），以政治需要精心剪裁和炮制案件，操縱司法過程甚至輿論，因此這種案件基本上不可信；這種做法的惡劣性在於進一步破壞了共產黨文革後一度想搞的司法建設和政治博弈規則，從而使得未來政治鬥爭更加野蠻和無底線；考慮到具有馬基雅維利政治心態的紅衛兵一代正在全面接管國家治理的各個層面領導職權，這種破壞導致高度集權的黨國機器的治理方式會進一步頹敗，使得制度建設、社會衝突博弈和公民安全都更無保障；同時，這種做法也打不倒薄熙來，因為惡化薄熙來所聲稱要解決的問題只能讓人們感覺更加需要薄熙來，即使薄熙來踐踏法律但也傷害的是少數權勢者，人們

寧願選擇以毒攻毒的方式解決政府腐敗、貧富不公和社會秩序混亂等問題。王軍濤說，只有憲政民主才能真正懲處和解決薄熙來問題，並為未來中國的所有人建立政治設社會生活的安全底線。

案件的發言權在調查人員身上

“經複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此為新華社至今對海伍德案唯一發出的文稿，但究竟證據是什麼、重大作案嫌疑又為何，官方一直未做出說明。紐約律師李進進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這類案件的消息，必須由刑事部門或檢查部門發佈，案件的發言權在調查人員身上，應該由掌握第一手資料的人做決定，而不是根據上級命令來行事，政治干預調查人員的判定，是目前中國法治發展最落後的環節。

李進進 1977 年擔任武漢市公安局九處刑警，1978 年入讀湖北財經學院法律本科，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一批法學院學生。1982 年進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攻讀憲法專業，畢業後到中南政法學院講授中國憲法。1987 年取得 1987 年法律博士學位，1993 年赴美後，1998 年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同年取得紐約州律師資格，目前為紐約州律師，處理各類民事、刑事案件。

應由在前線調查的人員做決定

2011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紐約肯尼迪機場被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官員帶走，並移交給警方，之後紐約警方宣佈，以三項罪名正式起訴卡恩，理由是他涉嫌對一名酒店女佣“性侵犯與強姦未遂”。幾個月來，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調查了包括卡恩與指控者迪亞洛（Nafissatou Diallo）等人，最後檢方考慮到迪亞洛的可信度存在嚴重問題，做出撤訴請求。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若比較海伍德案和卡恩案，可看出中國的作法和西方法治國家的作法有明顯差別。一個在美國如此大組織的主席涉案，是由最基層的分局，等同中國的派出所來處理，而不是由FBI或其他大組織出面，雖然FBI或許會派員協助或需要掌控消息，但案子的主要調查、起訴、逮捕等，仍是由分局在辦、讓基層法院受理。

反觀海伍德案，李進進認為，顯然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由基層警察來辦案。“根據法治國家的程序，不管什麼身份，即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涉及刑事案件，也應該將由基層警察處理，換句話說，海伍德案應該交由王立軍手下的區級警察辦理，並由區級法院審理，但現在中共不是按照法治原則，而是政治原則處理薄熙來、谷開來案。”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諸如此類涉及殺人，最後可能判死刑或無期徒刑的案件，應交由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處理。“中國的大問題是，沒有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公安機關沒有獨立的執法部門，政治力量干涉太多。”

王立軍先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根據外傳消息，海伍德死亡之後，王立軍曾試圖指示部屬隱瞞真實案情，如今王立軍已被免去公安局局長頭銜，此時將海伍德案交由重慶基層警察處理，是否恰當？李進進認為，王立軍出了問題、無法處



李進進 (李進進律師事務所)

理案件，這不成問題，因為王立軍的手下仍應該依照法律辦事，而不是聽局長的吩咐。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除非是案件的調查方法、調查方向，基層警察可聽局長的建議外，其他諸如毛髮、血液的來源、谷開來是否殺人等問題，局長並沒有發言權，發言權仍在調查人員的身上，不能因為薄熙來、谷開來或王立軍有政治影響

力，就干預調查人員的判定，政治干預，是目前中國法治發展最落後的環節。

李進進說，一個案件，應該由掌握第一手資料的人，也就是在前線調查的人來做決定，而不是根據上級命令來決定。“台灣跟中國大陸相差極大的地方，可從台灣司法處理陳水扁案的方式看出，台灣從逮捕、關押禁見，到保釋等，任何的政治機關都無法干預辦案，完全按照法律程序，由檢察機關獨立處理，現在的台灣可說走在世界法治的前頭。”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海伍德案明顯反映出中國法治並沒有建立起來，案件仍在中央幾個人的控制之下，這些人根據政治需要，利用司法途徑對另一些人進行政治處罰，造成中國社會的混亂。

根據目前透露出的消息，海伍德的屍體被發現後，到現場的辦案人員在查看後已經知道海伍德是被謀殺，謀殺的手法

是毒殺，而使用之毒物若為氰化鉀，現場判定時也不難看出，李進進指出，現場勘驗只是初步的，如果有任何疑點、要得到最後結論，還必須進行解剖，但海伍德的屍體並未解剖，而是直接火化，本身就有問題。

路透社報導，王立軍的4名手下懷疑海伍德是中毒而死，拒絕在海伍德死亡報告上簽字，王立軍曾向薄熙來透露此事，數日後薄熙來擅自解除了王立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職務，王立軍也曾為了自保，安排手下竊聽重慶官員的電話，並祕密錄下自己與薄熙來對話，但在王立軍發現自己的祕書、司機、祕書、執行竊聽人員失蹤後，擔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據報，王立軍5名心腹和司機被薄熙來祕密抓捕，其中2人遭刑訊逼供致死，1人被逼供後自殺。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海伍德案到了王立軍手中變成飲酒過量死亡，底下的勘查人員、法醫人員還被迫要簽字，這是政治干涉司法的最典型例子，若2人被逼供致死的消息屬實，代表中國的法治和人權狀況非常堪憂。

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反映出公安局長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李進進認為，如果王立軍底下有人認為海伍德是被謀殺，而非飲酒過量死亡，有一天此案還會被翻出來，到時王立軍位置難保；謀殺案通常很難瞞得住，王立軍可能考慮到紙包不住火，因此找薄熙來攤牌。

李進進指出，王立軍跟薄熙來攤牌，就是希望薄熙來可以保護自己，但薄熙來不但不願伸出援手，甚至放話指王立軍有精神病，造成王立軍的恐懼，因此王立軍只有往領事館逃跑。

應對案情消息抱持懷疑態度

對於海伍德案，目前並未有官方的確切資料，唯一算得上

官方聲明的，只有新華社所發佈的消息。新華社4月10日報導，從有關部門獲悉，“2月6日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復查組，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依法進行了復查。

據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

經復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

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司法機關。

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不論涉及到誰，只要觸犯法律，都將依法處理，決不姑息。”

李進進質疑，新華社是根據什麼來發佈訊息？新聞來源是？“這類案件的消息，不應該來自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不是搞刑事偵查的。”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這樣的消息必須是刑事部門或檢查部門來發佈，即使只是“發現重大證據，會在適當時日公佈”，都比新華社有說服力。“為什麼中共中央不要專業人士發佈新聞？所以我們對所有消息都應該持懷疑態度。”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世界各法治國家，不論是美國、歐洲，不只司法審判獨立，警察執法時也是獨立的。從美國法律觀念來看，政府有舉證的責任，說谷開來殺人，就必須舉出證據，再讓辯護律師來反駁這些證據。

“如果我是谷開來的辯護人，一定要鑑定海伍德的死亡時間、地點，以及錄像的時間、地點，否則這些都不能算是鐵證，谷開來應該在第一時間獲得律師的幫助，而且到目前為止都應該推定為無罪，但現在看不出來這個案件是這樣處理的。如

果要依法治國，谷開來也應受到公平對待。”李進進說。

如果谷開來承認殺人，李進進指出，她就應該被判死刑，並且因為故意殺人、情節嚴重，立即執行死刑，“這是中國一般對故意殺人犯的判決，雖然有時也會判出死緩，但如果同樣情況下，最後判谷開來和張曉軍死緩，就代表其中有問題，司法部門就應該給一個交代。”

李進進對《大事件》補充，對於類似這樣的大案，最後判決如果是死緩，通常的考慮是證據不足，但這也是中國法制落後的表現，因為如果證據不足，死刑的罪名就不應該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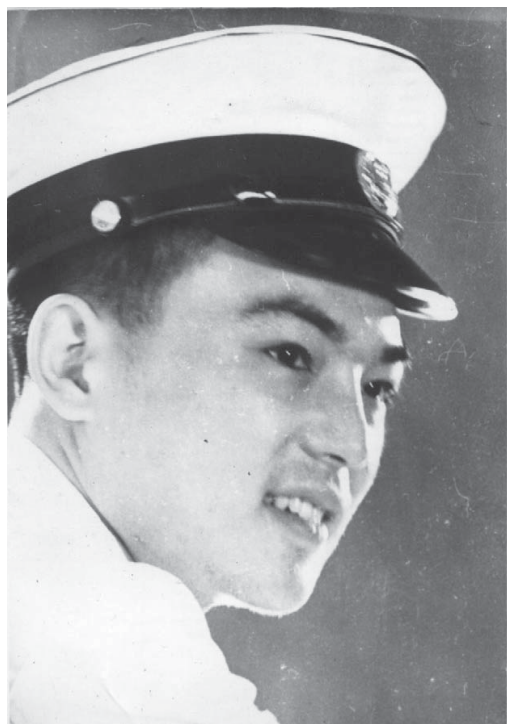
至於如何處置薄熙來，則必須看他在各案件上的涉入程度，李進進說明，首先該看他有沒有捲入海伍德死亡案，如果有，他應該被起訴，第二，如果薄熙來沒有直接參與案件，但卻知情的話，作為一名市委書記，他犯了瀆職罪或協助掩蓋犯罪，此外，薄熙來也可能涉及貪腐問題、往海外非法轉移資產，最後這點的可能性最大。

有關黨的處分，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幾乎可確定會被開除黨籍，但判刑方面，薄熙來被判死刑的可能性不是特別大，最嚴重可能就是死緩，不過判刑多重，還得看中共內部的政治鬥爭結果，無法從法律上進行評斷。

海伍德 2011 年 11 月就已死亡，2012 年 2 月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事件才抖露出來，可能原因除了薄熙來、王立軍企圖隱瞞事實外，也有人認為海伍德具有間諜身份，因此英國政府也不願將事情鬧大，才對中方的說法全盤接受。

李進進認為，薄熙來、王立軍隱瞞實情，應是海伍德案過了 3 個月才爆發的主要原因，英國方面則尊重中國有法律管轄權，如果中國認定海伍德是飲酒過度猝死，英國也沒有證據挑戰這樣的判定，除非英國掌握了新的證據。

對於海伍德的死亡原因、死亡過程、涉案人員事後的反應，



李進進1977年擔任武漢市公安局九處刑警照(李進進提供)

坊間有著各種各樣的版本,李進進對《大事件》說,目前所有資料都是媒體爆料、民間流傳、或通過特別渠道洩漏出來,因此沒辦法對案情做出評斷。“我們沒法在一個不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出牌的專制獨裁國家評價法律問題。”

發現海伍德死亡後,有一說指王立軍親自到場處理案件,李進進指出:“一個普通殺人案,為什麼由王立軍親自處理?第一個到場的應該是

派出所的員警和偵察人員,這些人根據現場情況提出報告,王立軍聽取報告,並協助他們破案,我們不知道王立軍是什麼情況下聽到並插手這個案件。”

時評家江春男在台灣《蘋果日報》上指出:“中共權力鬥爭很殘酷,可以隨時把人鬥臭鬥垮,但不會對其子女家人下手,這是中共內鬥的潛規則。他們對失勢領導人的後代,反而特別照顧,和太子黨一樣升官發財,中共內部沒有世仇,沒有仇殺,沒有冤冤相報,否則無法維持一黨專政。”

李進進則提出不同看法。他對《大事件》表示,中共內鬥還沒有這種“不會對其子女家人下手”的潛規則,在中共歷史上的政治鬥爭裡,家屬被打、被殺、被判的都有,“這類事大多取決於政治鬥爭的結果,政治鬥爭需要判刑就判刑,需要

解救他們就解救他們，而非取決於犯罪的事實和嚴重程度。”

保護、不保護，美國有道義考量

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最後並未成功，3個月後，中國維權律師陳光誠也躲入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雖然陳光誠表示，他並未尋求政治庇護，並在幾日後由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陪同下離開使館，到達北京市朝陽醫院，但美方主動關切情況，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陳光誠通了電話，保證會一直關注陳光誠，美方對待陳光誠與對待王立軍的態度顯然不同。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從法律上來說，美國不給王立軍政治庇護是正確的決定，美國的考慮有兩點，第一，在國際法慣例上，一個國家的領館給另一個國家的人政治庇護，是非常少見的，方勵之事件是罕見的例外。

第二，美國不會給與迫害者（persecutor）政治庇護，如果申請政治庇護者在擔任公安局長時對他人嚴刑逼供，或因為別人的觀點而予以逮捕，都屬於 persecutor，而王立軍顯然是迫害者。

“方勵之事件，實際上不是可用國際法嚴格說明的事件，而是臨時給出的一種保護，最後中美間達成一種政治協定，讓方勵之出國，先到英國半年，再到美國。”李進進說。

李進進對《大事件》指出，陳光誠一事也屬於例外，但從國際法中保護人權的角度來說，美國所做的符合人道主義的作法，它給與人權基本的保障。“美國雖然是一個世界警察，有時可能採取一個比較霸道的方式，但美國做事基本受到國際法規範，也有自我約束的地方。從政治上來考量，如果王立軍留在美國總領館，美國或許可以將王立軍當作一張牌來打，迫

使中國在一些方面做出讓步，但也可能造成中美關係的緊張，相對來說，放了王立軍，保持了中美關係的穩定。”

有美國官員批評，奧巴馬政府對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一事處理不當、低估了王立軍的情報價值。李進進認為，從美國自身的利益來看，王立軍的情報價值確實無法計量，王立軍作為中國四大直轄市中省一級的公安局局長，對於官方的辦事程序、中央事務、高層人脈，都有相當程度的瞭解，美國如果留下他，自然有很大的價值，但從美國的外交角度來說，它也無法完全無視國際法的規範或人權方面的考慮。

“政治都是投機行為，所以不管是扣留王立軍或放了王立軍，都會有政治考量在，美國會從中找一個最佳選擇，但美國在做政治決定時，有一點非常清楚，那就是背後一定有某程度的道義規範，不管這規範是國際法律規範，或人道普世價值的規範。顯然在保護王立軍或保護陳光誠之間，明顯可看到這種道義規範在其中的作用。”李進進對《大事件》說。

“鄧頭毛身” 是薄熙來事件的土壤

旅居美國的中國現代史學者高文謙認為，薄熙來事件發生的深層制度原因，是中國目前的“鄧頭毛身”金字塔政治結構——官方主流意識形態是鄧小平的治國思想，但制度基礎還是毛澤東 1949 年建起來的集權體制，這是黨專權體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即權貴資本主義，薄熙來就是這種畸形分裂的體制產生的怪胎。

高文謙 1953 年生於北京，是周恩來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著名專家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1980 年代參與編寫中國官方的《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等書。1993 年赴美國，曾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華盛頓伍德·威爾遜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現居美國紐約，著有《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等書。

胡溫不作為是薄熙來事件的萌芽土壤



高文謙（維基百科圖片）

薄熙來落馬，撼動中國政壇，高文謙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表示，薄熙來可說已構成一種現象，之所以發生這種現象，要從根源上談起。高文謙說，產生薄熙來事件的土壤，就是中國現存的權貴資本主義，中國目前的政治結構，是個“鄧頭毛身”的

金字塔結構，頭部是鄧小平的治國指導思想，亦即中國現在當權者的主流思想，但制度還是毛澤東 1949 年建起來的集權制度，這樣的結合，可說是掛著羊頭賣狗肉，掛著社會主義的招牌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是一種最糟糕的資本主義，薄熙來就是此制度下產生的怪胎。

高文謙指出，具體地說，薄熙來事件的發生，是與胡溫當政空轉 10 年不作為分不開。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當政的鄧小平不想從根本上觸動一黨專權的毛體制，而是採取實用主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有一句名言是“兩手硬”，亦即抓經濟、抓政治都要硬，所謂抓經濟硬，就是遵行“發展是硬道理”，抓政治硬，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鄧頭”的核心就是“兩手硬”，就是“經濟搞活、政治管死”。

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這種跛腳鴨式的改革，成為30多年來中共官方的治國方略，其惡果已經凸顯出來，使得中國社會嚴重失衡、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兩極分化，長期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已經逼近全面爆發的臨界點，整個中國社會就像一個火藥桶。

高文謙認為，鄧小平這種片面發展的思路在六四鎮壓後，成為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其與原毛體制的內在矛盾，被鄧用一句“不爭論”壓了下去。在權力不受監督的情況下搞市場經濟，很快形成權力腐敗，在現今中國造成一個龐大的權貴集團，經濟發展的成果多半被他們所享有，而普通民眾則成為犧牲品。這種惡果江澤民時代已經顯現出來，到胡錦濤時代已經非常嚴重，民怨日甚，但權貴集團已經坐大，胡溫當政十年不作為，就是被權貴集團所綁架，動彈不得。這些年來，朝野各方都意識到中國原有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亟需轉型。這就是薄熙來推行的“重慶模式”應運而生的社會原因。

薄熙來落馬前，“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已成為中國發展道路上兩個最具代表性的模式，引發各界熱議。高文謙指出，簡單地說，這兩種模式，就是先做大蛋糕，還是先分好蛋糕的問題。“廣東模式”仍是延續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思路，強調做大蛋糕；而“重慶模式”則試圖糾鄧時代的偏，主張要把蛋糕分好，讓老百姓得到一些實惠，緩解民怨。

高文謙對《大事件》解釋，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有三個要點：一是“唱紅”，二是“打黑”，三是民生工程。誰都知道，“唱紅”是唱不出生產力的，“打黑”的爭議也很大，得到較多民眾擁護的是民生工程。而這恰是胡溫當政10年中沒有做的事，“重慶模式”形成是向中央的挑戰，讓胡溫很難堪。

溫家寶在3月14日的兩會結束記者會上，表示：“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

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溫家寶表示，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高文謙指出，薄熙來是有政治野心的，可以說是個“外紅裡黑”的當代奸雄，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暗指薄熙來搞文革一套，違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是一種誤導。“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薄熙來才是鄧小平的真正傳人。‘重慶模式’實際上體現了鄧小平的兩手硬’。‘唱紅’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同時重慶抓經濟這一手也很硬，引進外資，推行各種社會改革的試驗，政策向民生傾斜。這也是薄熙來有民意基礎的一個重要原因。”

高文謙強調，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是試圖挽救共產黨的危局而嘗試的一種路徑選擇。其實質是試圖調和“毛身”和“鄧頭”的體制性矛盾，將毛左和鄧右結合起來，既堅持黨天下的體制，同時又緩和一下社會矛盾，“重慶模式”就是這樣一種集毛鄧於一身的怪物。

雖然國內左派將薄熙來視為精神領袖，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這恐怕有些一廂情願，實際上並不能認定薄熙來骨子裡就是左派，薄熙來“唱紅”，是為了奪取上位，作為十八大入常的敲門磚，薄熙來上台後會究竟是左還是右，很難說。

高文謙認為，薄熙來最大的問題不是“唱紅”，如果要追究中國整個政治氣氛向左轉的責任，始作俑者不是薄熙來，而是胡錦濤。

“胡錦濤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到西柏坡朝拜革命聖地，又提出要學習古巴、北韓，又在建國 60 週年時推出毛澤東思想方陣，就在薄熙來垮台前一兩個月，胡錦濤提出學雷鋒。學雷鋒與唱紅究竟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高文謙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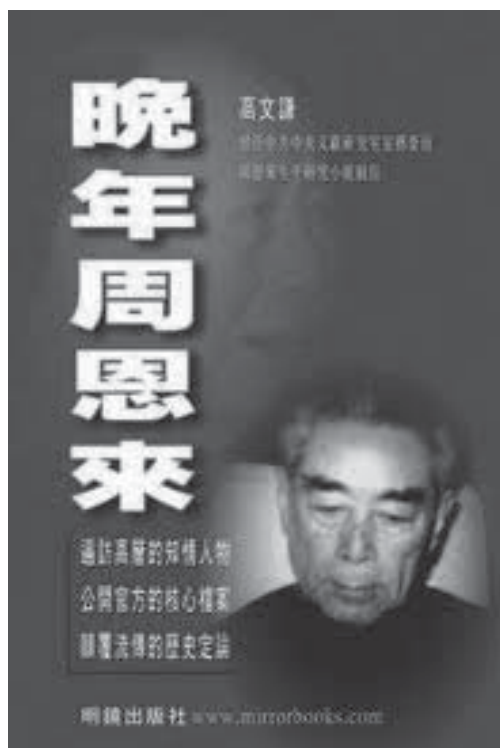
“打黑”則始於薄熙來。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重慶“打黑”涉及的冤案非常多，薄熙來“打黑”與其說為了老百姓，不如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殺人立威，而且是有選擇性的，凡是不聽話的就打掉，再將得來的錢與下面一幫人瓜分，所以是“黑吃黑”，是“黑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薄熙來本人現在也嚐到了“黑打”的滋味。

雖然官方還未公佈有關薄熙來案情的確切消息，但高文謙認為，薄熙來涉及的貪腐、谷開來捲入的命案，恐怕不是空穴來風。“就從他把薄瓜瓜送到歐美名校、出手闊綽來看，就可以知道他內心的真正想法。如果他把薄瓜瓜送到農村，與普通民眾同甘苦，我就相信薄熙來左的那套是真的。但他要老百姓‘唱紅’，卻把自己的兒子送到西方的花花世界，叫人怎麼相信他？”

處理薄熙來，寬嚴皆誤

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胡溫雖然聯手扳倒了薄熙來，贏了第一回合，但如何處置薄熙來已成為手中的燙手山芋，可以說寬嚴皆誤，既不能下手太重，也不能處理得太輕，陷入兩難境地。

高文謙解釋說，薄熙來與陳希同、陳良宇不一樣，如果輕輕放過，在社會矛盾激化、久拖不決的情況下，薄熙來可能東山再起。“薄熙來在黨內經營多年，又身為太子黨，在中國官場中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薄熙來在軍中也有很多太子黨的關係，這些人手上握著兵權。更重要的，薄熙來已經在政治上成了氣候，是國內左派的精神象徵，如果打蛇不死，可能反被蛇咬，薄熙來一旦捲土重來，胡溫的下場恐怕不妙，所以對薄熙來寬不得。”



高文謙著作《晚年周恩來》

但處理得嚴也有很大的問題。高文謙指出，如何處理薄熙來，牽動太子黨與團派的權力平衡，胡錦濤本人缺乏實力和權威，必須與黨內各派協商，薄熙來有民意基礎，已經沒法用毛時代的路線鬥爭予以處理，如果用此方法，勢必引發黨內激烈的辯論，導致十八大無法如期召開，甚至弄翻共產黨這條船。這是黨內各派無法承受的。

但如果僅僅用貪腐問題懲辦薄熙來，高文謙質問：當今共產黨高層中又有哪一個人是乾淨的？可以說，中南海除了新華門前的那一對獅子外，沒有一個人是乾淨的。陽光法案遲遲不能出台，原因也在於此。所以，用貪腐的罪名並不能令人信服。

薄熙來出事後，廣州天河區4月1日出現十幾位青年，高舉支持溫家寶推進政治改革的牌子，並要求公平、正義、自由，呼籲胡錦濤帶頭公佈個人財產，引來大量市民圍觀，廣州市青年肖勇用手機拍下集會照片，發到騰訊微博，4月2日立刻被警方帶走，並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刑拘了肖勇，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當局的這種反應，說明黨內高層身上都不乾淨，沒有人敢帶頭公佈自己的家產。

既然用路線鬥爭、貪腐的方式處置薄熙來都不恰當，最

後只好拿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涉嫌洋人命案來做文章，因為這樣牽連最小。高文謙說，但這樣做也有問題，一旦作為刑事案處理，殺人要償命，做實以後，就沒有辦法法外施恩了。薄家可能有人要上斷頭台，即使上不了斷頭臺，也會判成死緩，囚禁終生，這樣仇就結大了。

高文謙表示，薄熙來的同情者，不論在朝、在野都眾多，見中央下手如此之狠，斬草除根，將來一旦這些人有機會，下手會更狠，他們一旦得勢，絕對不會輕饒胡溫。

所以，高文謙對《大事件》說，如果嚴厲懲辦薄熙來，只會讓中共今後的內鬥更加沒底線、更加血腥殘酷，官場的人經過這一課的教育後，以後在權鬥中都會先下手為強。陳雲在文革後曾不同意將“四人幫”判死刑，提出黨內鬥爭不宜採用肉體消滅的方式，薄熙來案恐怕會打破這條潛規則。

中國今後的三種路徑選擇

將左派擁戴的薄熙來拉下馬，加上溫家寶在兩會記者上的一番言論，令外界猜想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否即將啟動？對此，高文謙認為中國今後有三條路可走，實際上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 30 週年的長篇講話中，已經談到這一點：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這次薄熙來落馬，堵住了復辟文革之路，但當政者也不想往前走，認同普世價值，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而只想維持現狀。原因就在於從江澤民到胡溫時代，已經完全被權貴集團所綁架，任何改革方案，只要觸犯到權貴集團的利益，就沒了下文。為什麼很多人說改革已死，就是改革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完全成為權勢者攫取私利的工具。現在有人調侃，

鄧小平當初說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是‘摸著石頭不過河’。”高文謙對《大事件》說。

“權貴集團不想回到文革時代，因為沒有機會發財，還會被當成走資派清算，他們也不願意推行政改、擁抱普世價值，因為如果推行政改，他們用權、錢交換來的利益就沒了，所以他們只想維持現狀。”高文謙說，這群人被稱為“維持現狀派”，也叫做“維穩派”。現在中國“維穩派”的最大代表人物是胡錦濤。

問題是，現狀無法繼續維持下去。高文謙表示，當前社會矛盾十分尖銳，不可調和，按照憲法，工農是國家的主人、是政權的基礎，但實際上工農淪為弱勢群體；每年開兩會時，都是官商聯袂登場，一片珠光寶氣，兩會成了炫耀財富的大會。薄熙來推行“重慶模式”，也在某種程度上得罪了權貴集團。

“不過，我不認為薄熙來這條路能走很遠，因為現在已經爆出消息，指重慶的財政早已破產，薄熙來搞民生工程本身是寅吃卯糧，無法持續下去。如果‘重慶模式’可以持續，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也就不會失敗了，鄧小平也沒有必要搞改革開放了。文革時期，或許有某程度上的社會公平，但還有更大的不公平，毛澤東掌握生殺大權、為所欲為，把整個國家帶入浩劫，是歷史的罪人。”

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是敢作敢為的人，是不少老百姓心目中所中意的中國未來領導人，但薄熙來最大的問題是做事心狠手辣，翻臉不認人，說一套、做一套，“外紅裡黑”。

高文謙認為，薄熙來落馬會牽動團派和太子黨之間的脆弱平衡，實際上，太子黨並非真正統一的一派，太子黨內各種利益、想法的人均有，而胡錦濤想拿下薄熙來，必須先跟江澤民商量，江澤民之所以與薄熙來切割，也有他的考慮。

“薄一波在兩次關鍵時刻曾有恩於江澤民，因此江澤民投桃報李，提拔薄熙來進入政治局。”高文謙說，但薄熙來野心

勃勃、能力強、做事沒有底線，共產黨內誰都怕他。共產黨喜歡按部就班的人，一旦薄熙來當上政法委書記，掌握生殺大權，權貴集團的人晚上恐怕都睡不好覺，不知哪天就被黑打。況且薄熙來還有取代習近平的野心，這是江澤民也不能答應的，一旦為此內鬥起來，共產黨就要翻船。

薄熙來出事後，民間已有“為什麼像薄熙來這樣的人，可以在共產黨內成為政治局委員和地方大員，且幾乎要進入中國最高領導層”的質疑，高文謙說，薄熙來如今是牆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槌，被人潑了不少污水，沒有任何辯解的權利，成為他所力挺的一黨專權體制的犧牲品。但人們也由此聯想到，那些至今還在台上的人是不是也和薄熙來一樣如此不堪？因此，薄熙來事件對共產黨來說，是一次全方位的醜聞和危機。

高文謙認為，如何處理薄熙來，將是歷史給予共產黨改過自新的最後機會，但目前看不出來胡溫有任何改絃更張的意圖。“如果真要取信於民，把這件事往命案上定，就應該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按照司法程序，公開審理此案，但共產黨做不到這一點，薄熙來也不會配合當局演這齣戲。”

黨天下無法治可言

1978年開始審判“四人幫”時，鄧小平曾指示要依法審判，當時因此贏得不少民意。不過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審判“四人幫”並不是真正的司法審判，而是政治審判，鄧小平沒有建立一個法治社會的想法，因為他不願意放棄一黨專制的制度，仍想維持黨天下，而非建立一個主權在民的國家。“不錯，打倒四人幫是得到民眾擁護的，但本質上仍是一場宮廷政變，最後用法律手段定案不過是演戲，並沒有給被告充分辯護的權利。”

高文謙認為，共產黨自身沒有任何法治的歷史基因，因為共產黨本質上是中國傳統中的皇權文化與蘇俄共產國際思想理論結合的產物，用毛澤東本人的話來說，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在中國兩千年皇權專制的體系下，根本沒有法治，皇帝的旨意高於一切，同時中國傳統社會也根本沒有法治的概念，有所謂“人情大於王法”之說。

高文謙說，共產黨執政後，對法律的定義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換句話說，法律只是共產黨手裡進行統治的工具，只是個擺設，日常管理是靠中央指示和紅頭文件。用毛澤東本人的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在世時是毛一個人說了算，毛死後是鄧小平說了算。到了江澤民時代雖然權威減弱，但仍是黨比法大，由中央常委說了算，胡溫時代依舊是如此，根本沒有法律的地位，以致鬧出堂堂的外交部發言人說出“不要把法律當擋箭牌”這樣的笑話來。

高文謙對《大事件》舉了幾個案例，說明共產黨建政以後是如何的無法無天：

第一個是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習仲勛與高崗、劉志丹一起創建陝北紅軍和陝北根據地，劉志丹在戰爭年代死亡後，剩下習仲勛與高崗。高崗後因高饒事件（高崗、饒漱石）自殺，習仲勛成了黨內西北山頭的代表人物。1962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劉志丹》小說問題被打倒，起因為毛澤東的一句話：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劉志丹》小說被指為是為高崗翻案，但當時高崗已經死亡，因此就追到當時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頭上，習仲勛從1962年開始被流放、監禁，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到平反。

第二個是彭德懷。彭德懷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上萬言書，批評大躍進，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將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加了一頂“裡通外國”的帽子，

指他 1959 年出訪東歐時與赫魯曉夫有勾結，很多批評大躍進的意見都是從赫魯曉夫那裡來的。當時，彭德懷反駁：“蘇聯人說話我聽不懂，我說話蘇聯人聽不懂，我怎麼裡通外國？”彭德懷表示，如果認為他和蘇聯人勾結，就應該把當時給他翻譯的人找出來作證。但就連這樣一個很容易做到的要求，毛都不予理睬，仍執意將彭德懷打倒。

第三個是劉少奇。三年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後，黨內已開始重新反省當年彭德懷的建言，但劉少奇在 1962 年代表中央堅持彭德懷“裡通外國”的罪名不能平反。

儘管劉少奇這樣討好毛澤東，但最後的下場卻跟彭德懷一樣。文革中，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而給劉少奇定罪的“證據”，都是逼供所謂“知情人”而來的。

鄧小平審“四人幫”時，雖然經過一次形式上的司法審判，但本身仍是政治審判。江青在法庭上表示，她是毛澤東的一條狗，主席讓她咬誰就咬誰，她只是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如今給她定罪，把毛澤東放在哪裡？審判長聽後急忙拍桌子，下令將江青拖出法庭，不讓江青再有講話的機會。

當時林彪集團與“四人幫”兩案一起審理，為林彪的四大幹將之一、海軍政委李作鵬作辯護律師的，是當今中國知名的法學界大老張思之。林彪集團審判完後，李作鵬給張思之寫了一首《評律師》詩：“尊敬公證人，天知無偏心；官方辯護詞，和尚照念經；遵命防風險，明哲可保身；邊鼓敲兩下，有聲勝無聲。”

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這首詩說明了律師曾幫過小忙，但不起什麼作用，也可從中看出審判江青和林彪兩個集團，名義上是司法審判，實際上完全是政治審判，當年給林彪集團加的罪名許多是不實之詞。

還有就是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冤案，他僅僅因為不同意

戒嚴，就被軟禁 16 年，直到逝世，沒有經過任何司法程序。高文謙指出，綜觀中國黨內鬥爭史，這些重大案子沒有一件做得實，中共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不斷製造冤案、又不斷平反的歷史。中國之所以無法成為法治社會，就在於共產黨不願意放棄一黨專權的制度。

現在對薄熙來案的審理，高文謙表示，還是表現出黨比法大，定罪在先，先抓人，再羅織罪名；胡溫的作法，與毛澤東整劉少奇、整林彪，鄧小平整趙紫陽一樣，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中國的司法審判無法取信於民，因為都是黑箱作業。

黨代會前的權爭不可避免

高文謙認為，每次中共的黨代會前，總有大事要發生，這基本上是一個規律，因為黨代會（特別是換屆前的黨代會）都是權力格局的重新洗牌，圍繞權力再分配，黨內各派都會有一場爭鬥。黨代會本身其實不起任何實質作用，而是像人大一樣的橡皮圖章，所有的人事安排都在會前預先敲定，完全是黑箱作業。中國對外宣稱“大國崛起”，但十幾億中國民眾連選擇自己領導人的政治權利都沒有，這一點連信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伊朗都不如。

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一旦這樣的博弈未達成妥協，或一派未戰勝另一派，黨代會寧可不召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澤東在 1956 年舉行中共八大後，中共九大要一直等到 1969 年才召開，中間隔了 13 年，完全不按照黨章的規定，原因就在於毛澤東在大躍進時，已明白黨內高級幹部對自己的不滿，一旦召開黨代會，毛澤東有可能被選下去，讓劉少奇上台，因此毛澤東刻意不召開黨代會，等發動文革、將劉少奇打倒後才召開。

鄧時代比毛時代有所進步，黨代會一般能按時召開。儘管如此，每次黨代會前也都伴隨着權力鬥爭。中共十四大召開前，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出局。中共十五大前，陳希同出局。陳良宇在十七大前出局。

高文謙解釋，中共十八大與往常不同的地方在於，政治老人全面凋零，影響力式微，不僅中共當年打江山的一代，如鄧小平、陳雲、薄一波等人，都已過世，而且就像江澤民這樣資歷的的一批人，也已經老邁年高。而當前社會矛盾又異常尖銳，原有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中國面臨必須重新作出選擇——究竟走回頭路、往前走、還是保持現狀。所有這些因素，使得這次黨內爭鬥的激烈程度超過以往。

高文謙說，當年鄧小平也面臨著黨內左派的壓力，不過他很聰明，因為毛左佔據意識型態的制高點，鄧小平的一套無法自圓其說，共產黨既然搞革命，為什麼現在又搞起資本主義？因此鄧小平提出“不爭論”。

當年鄧小平靠著權威，可以“不爭論”，江澤民時代，社會矛盾還不是非常嚴重，到了胡溫時代，從鄧小平時開始積累的社會矛盾已逼近全面爆發的臨界點，高文謙對《大事件》表示，胡溫缺少權威，根本壓不住，這也是薄熙來敢於挑戰中央的原因。

如今，中央對處理薄熙來的作法，高文謙認為就是想繼續保持現狀。“中國的體制，或是讓像薄熙來這樣的野心家上台，或是讓像胡溫這樣碌碌無為的人上台，一種是奸人，一種是庸人，稍微有點思想、為人正派的人，就像割韭菜一樣，早就在黨內鬥爭中一一被割掉了。”

打倒薄熙來 中國的改革和民主反而大倒退

薄熙來事件，讓部分近 10 年來對胡溫不作為感到失望的人，又重新燃起對胡溫新政的期待，人們紛紛猜測中共內部的自由派是否正試圖抓住此機會推動政治改革，但中國知名異見人士王希哲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指出，薄熙來的特徵，恰是經濟上的多元，政治上也以一個地方大員的資格，向共產黨中央一元化集權傳統挑戰。現在右翼自由派以薄熙來有“野心”、想“奪權”的理由將其打倒，中共十八大本來很可能開啟的常委、甚至總書記等以民意為基礎的競選，被“黨中央一元化”的勝利封殺了，這些人以為打倒薄熙來中國民主就能更加發展，結果卻是恰恰相反，中國的改革和民主反而大倒退。

王希哲為中國知名異見人士，長期投身於中國民主運動，1996 年與劉曉波發表《雙十宣言》後，被迫經香港流亡美國，抵美後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1998 年被選為自由中國運動領導人和中國民運組織海外圓桌會議協調

人，2005年與徐文立、倪育賢、方圓、劉國凱、薛偉等組建“中國民主政黨聯盟”。

評價薄熙來，要看是站在共產黨還是人民的立場

薄熙來在倒台前，被不少人視作敢作敢為、為中國帶來另一條改革路子的領導，倒台後，對其不利的評價則紛紛湧現。王希哲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其實要分析薄熙來案，應該從兩方面來看：是以人民的利益福祉為立足點，還是以共產黨的統治利益為立足點？如果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薄熙來竄黨奪權、有政治野心、另搞一套，那就很糟糕，但如果從人民的利益福祉來看，薄熙來在大連、在重慶，都為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例如“五個重慶”、“民生十條”、“共富十二條”，讓重慶人民安居樂業，在人民眼裡，薄熙來是個好官。

王希哲補充：“中國剛開始搞的航空母艦工程，其中的特殊鋼，也是薄熙來從大連市市長剛升到遼寧省省長時，牽頭由大連鋼廠聯合撫順特鋼組建東北特鋼集團搞出來的。”

所以如果從人民利益福祉來評價，王希哲認為薄熙來可說是個好幹部，其他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如果要評價薄熙來到底是什麼樣的幹部，可讓重慶人民公投，而非由中南海來決定。

王希哲對《大事件》表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只有改變一黨專政的情況，才可能打開中國民主的大門，要改變，就需要改革，中國要改革有兩條路，一條自上而下，一條自下而上，現在特別是右派的菁英份子，總迷信蘇聯式自上而下的改革，希望中國也出一個戈爾巴喬夫、葉立欽，一聲令下，一個晚上就改革成功。

但王希哲說這條路走不通，中共和蘇聯不同，蘇聯是1917



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講演(王希哲提供)

年的十月政變後，一夜之間建立起新政權，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政權由新權貴家族所掌控，他們因掌控權力而擁有經濟利益，讓他們不會主動放棄權力。

因此王希哲對《大事件》說，中國的改革只能夠自下而上。自下而上也有兩條路，一是毛澤東推翻國民黨式的

武裝革命，雖然現在有些人鼓吹革命，但大多數人都不接受，因為不現實，因為中共建立政權是用武裝鬥爭打天下，這樣的特殊性，使得中共政權非常頑強，因此雖然現在內部高度腐敗、統治機器非常虛弱，但想用外部武裝革命辦法推翻共產黨是不可能的，即便真要這樣做，建立起來的新政權也不可能是民主政權，因為新政權勢必要用專政的方式鎮壓反革命。

另一條路是促進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後，經濟利益分化和政治路線分歧的基礎上的政治分化，分出兩派，王希哲認為這是必然要發生的。分出兩派後，必然要向民間社會尋找支持力量，因此會再發展出兩黨，如此就可將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體制打破。

王希哲對《大事件》指出，這條道路也符合美國民主歷史的經驗。“我們看今天美國民主黨、共和黨的競選過程，想把它移植過來，實際上，想移植任何東西，都要從土壤的培養開始，才能讓這棵樹逐步壯大，美國在歷史上只有一黨，都是華盛頓獨立戰爭時由革命黨分化出來，慢慢演變成今日的民主

黨、共和黨。”

打倒薄熙來扼殺了多元化路子

王希哲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力量的出現，是在向中央叫版，代表著黨開始逐步分派的趨勢，這種趨勢一開始，原本就更可能以左的形式出現。雖然薄熙來的路線表面上是左，但實際上最初表面形式是左是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趨勢是向傳統一元化的中央挑戰，讓局面開始出現二元、多元化，有利中國的民主進步。因此薄熙來勢力的出現和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改革在中國社會內部的實際的發生，而不是將薄熙來扼殺了，再去指望中共出一個葉立欽，去下令民主改革。鎮壓了薄熙來，就是把這條多元化的路子扼殺了，使得中國又回歸“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一元化局面。

王希哲說：“所以如果我們站在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就應該支持薄熙來，但這樣的支持不是支持他個人，而是支持中國的改革和進步。”

王希哲解釋，薄熙來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共產黨得了天下後，由於集權和對他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執政路線總是忽左忽右，甚至走向極端。文革時期就是毛澤東的左的路線走到了極端。

王希哲對《大事件》說，毛路線的特徵有兩點，一是經濟上單一公有制經濟，必須割資本主義尾巴，二是政治上高度一元化集權。

1976年毛澤東逝世，黨內右派發動政變，對左派進行專政後，鄧小平開始領導向右轉。王希哲指出，鄧小平只是覺得過去毛澤東過左的極端行不通了，因此想向右“過河”，摸出一條路子來。但其實鄧小平也不是想發展成右的極端，仍

希望走一個不左不右的路子，所以他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如果我們的改革結果造成兩極嚴重分化，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鄧小平也不想讓中國兩極分化嚴重，否則社會矛盾加遽，共產黨過去的革命也沒有意義了。

王希哲說，事實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下一發展起來就失控，經過江朱、胡溫兩代之後，中國貧富差距驚人地加大，社會普遍不公，道德信仰完全缺失，權貴官僚和國內外大資本掌控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人民創造的各種各樣的財富，也就是所謂的蛋糕，被各種利益集團盜取，人民得不到改革果實，人民的痛苦、人民對社會的不滿已經達到極其尖銳程度。胡溫中央卻束手無策，放任局面惡化。

於是，中共的一些地方大員就開始在自己管轄的地區尋找合適的發展道路。王希哲對《大事件》表示，所謂的“廣東模式”、“重慶模式”，就是在這種極端向右偏的大背景下出現的，這樣各種各樣的探索都是積極的，其中，汪洋的探索較向右一些，較注重的還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薄熙來較注重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但也並非不照顧資產階級的利益。

“薄熙來的主要表現為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向無節制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極端局面一種略為向左的糾偏。”王希哲說：“但他只是糾偏，實際還是鄧的路線，而非毛的路線，強調的還是重慶多元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這很有成效，所以薄熙來還是比較忠實的鄧的路線。”

王希哲對《大事件》表示，到底是“廣東模式”好，還是“重慶模式”好，應該由人民來選擇，中央不應該強行將其中一種模式撲滅，本來“重慶模式”被撲滅後，“廣東模式”應該感到高興，但實際上“廣東模式”並不高興，將“重慶模式”撲滅後，“廣東模式”事實上也不敢做事，變得噤若寒蟬，反而將中國生氣勃勃的生態抹殺了。

王希哲認為，薄熙來鼓勵“唱紅”，不過是為了以共產黨的歷史故事來凝聚“改開”30年已經一片散沙的人心。但因為略有點表面紅色，就引起了右派的恐懼和仇視，誣指他復辟毛路線。其實薄熙來在重慶的施政，無論經濟政治，哪有什麼毛路線？薄熙來的特徵，恰是經濟上的多元，政治上也事實上以一個地方大員的資格，向共產黨中央一元化集權傳統挑戰。

而上述經濟、政治上的兩點特徵，王希哲認為正是今天的中國政治改革所最需要的，但恰就是這一點，成了薄熙來被中南海胡溫中央打倒的最根本的罪狀，指薄熙來有“野心”、想“奪權”，想爭當“常委”、“總書記”。“莫名其妙的是，自由派也忽然跟著共產黨把這樣的帽子當做罪名加給薄熙來，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總書記本來就是應該由全黨黨員自由站出來競選的。有誰是天生的？誰該被指定？這些都是應該被推倒的封建制度。”

王希哲對《大事件》表示，現在很多海外知識分子說，薄熙來其實是最像西方政客的政客，不討好上面而是注重民意，想靠民意和施政成績上位，中國若有競選，薄熙來最可能被選上去。但現在右翼自由派卻以各種理由打倒、誣陷薄熙來，中共十八大本來很可能開啟的常委、甚至總書記等以民意為基礎的競選，就被“黨中央一元化”的勝利封殺了，政治的大黑箱、大惡鬥，大拼殺甚至大混亂又要出現了，中國的改革和民主就不是進步而是大倒退了，這些人以為打倒薄熙來中國民主就能更加發展，結果卻是恰恰相反。

“中央對付薄熙來的手段也也是極其卑鄙的。”王希哲說，1970年鄧小平發動政變，將左派打倒後，由於右派官僚在文革時長期受到迫害，因此希望中共今後再有路線鬥爭，都不再搞得“你死我活”，必須依靠法治，但這次，中央見到薄熙來擁有大批民意支持，認為如果中共開始搞民主改革，薄熙來很



李一哲事件，左2為王希哲（王希哲提供）

可能坐到上位，因此想把薄熙來拉下去。

“一開始，胡溫想搞路線鬥爭，說重慶應該反思，後來發現路線鬥爭搞不倒薄熙來，就把黨內路線鬥爭刑事化，千方百計往海外放消息，出口轉內銷，抹黑薄熙來，現在不是‘你活我也活’，而是搞‘你死我活’了。”王希哲對《大事件》表示，中央還用公權力封殺一切異議網站和反對聲音，例如北京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副教授王錚在網上發出公開信，呼籲民眾和她一起舉報“中共中央非法拘禁全國人大代表薄熙來”，並指出自3月15日以來，其家人不斷要求探望薄熙來均遭拒絕，目前王錚的下落不明，據四川人權組織“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得到的消息，王錚與其他七個人在天安門廣場被逮捕。

王希哲表示，當局這樣完全藐視法治的作法，也會失去人民的信賴。“就算薄熙來、王立軍在重慶時曾‘黑打’，胡溫這樣的‘倒薄’，這才是名副其實‘黑打’，這樣做等於將自己放在爐火上烤，等胡溫下台後，如何保證案子不會翻過來？到時

仍舊會是你死我活。”

薄熙來得罪的人眾多

但既然薄熙來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又代表政治上的多元化的方向，為什麼仍有如此多人反對他？王希哲對《大事件》解釋，第一是因為一些海外民運、自由派人士被表面現象迷惑，認為薄熙來“唱紅”是文革復辟，第二，薄熙來將許多中央“巨室”得罪了。

王希哲指出：“孟子說過：‘為政之道不難，不得罪巨室’，有人說薄熙來是太子黨，如果薄熙來現在還代表太子黨的利益，根本就不會下台，所以薄熙來其實恰恰相反，他背叛了太子黨。”

王希哲表示，太子黨有兩種，一種是較傳統的太子黨，理想主義較濃，這些人大多數在文革時被打倒或被整肅，另一種是既得利益者，就如鄧小平、陳雲、彭真所認為的，他們在文革中受罪，他們的子女也跟著受罪，所以現在要給他們的子女補償，改革開放後，所有的好處都讓給了這些人的子女；因此中國腐敗最大的根源就是鄧小平，這一批太子黨，也是最腐敗、最令人民憎恨的太子黨。

王希哲對《大事件》說，薄熙來在重慶打黑，被打擊的黑社會背景，就是彭真之子所代表的太子黨的勢力，因此薄熙來在重慶的成就，不只把胡溫得罪，也將縱容包庇重慶黑社會的前任賀國強、汪洋們得罪，更把李莊的後台，彭真之子傅洋們得罪了；薄熙來還迎合人民呼聲，要官員公示財產，把中共從胡溫上下全部官僚都得罪了。

“薄熙來也是全國唯一敢向西方大公司大財團下手的人，西方的大財團在西方，或許會老老實實經商，因為西方法治嚴格，但西方大財團一到中國，與中國官僚勢力勾結，仗恃自己

勢力大，肆無忌憚做壞事，薄熙來嚴罰了販賣假肉、作假商標等的沃爾瑪，下令停業整頓，讓西方大財團咬牙切齒。“王希哲說。

薄熙來把中共上下、海內外勢力都得罪，是王希哲認為如此多人反對他的原因。

假共產黨迫害真共產黨

王希哲對《大事件》指出，薄熙來根本上是走鄧小平的路線，“唱紅”只是表面的顏色，就算薄熙來有些毛澤東的特點，也不應該用這樣的手段打倒他，而是應該讓人民自己選擇。“你可以對人民說，薄熙來上台後對國家有危害，你們別支持他，否則你怕薄熙來上台後會搞法西斯集權，其實現在你就在支持法西斯集權。”

如果說“唱紅打黑”是薄熙來的罪狀，王希哲問，共產黨的政治委員帶領人民“唱紅打黑”是他的本色，難道要薄熙來“唱黑打紅”？所以胡溫中央打擊薄熙來，就是假共產黨迫害真共產黨，就好像真國民黨不會搞台獨，李登輝打擊宋楚瑜、馬英九等人，就是假國民黨迫害真國民黨。

王希哲認為，中共黨內不管哪個派系跟哪個派系競爭都可以，但都應該在公開、民主、法治的遊戲規則下，全黨公開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公開競選常委甚至總書記。

王希哲對《大事件》表示，如今薄熙來事件只會讓中共的政治鬥爭在十八大前變得更嚴重，中國的自由右派以為薄熙來被打倒後，就能把民主改革的希望寄託在溫家寶、胡錦濤身上，實際上胡溫打倒薄熙來後，統治基礎更薄弱，因為過去的敵人主要是右派，現在連左派都反對他，因此中央只會更加專制。

“一個要推行改革開放的領導，首先要對自己的統治有信

心。胡溫中央更加專制，只會讓統治者與右派的矛盾加遽，再加上左派的反對，胡溫不可能想老老實實幾個月後就下台，若不是將十八大延期，就是胡錦濤還會留任中央軍委主席，但這樣做，又會和習近平一派發生利益衝突，所以今後中國可能發生政治上大混戰的局面。”王希哲說。

“中共要搞改革， 否則薄熙來死不了”

最新一期《明鏡月刊》披露薄熙來被中共最高層定下“三大罪”後，新華社4月10日晚間11時證實中央因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检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王軍濤：薄熙來仍可能東山再起

在此之前，部分評論人士認為，薄熙來仍至少可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職到中共十八大，中央或讓薄熙來擔任有名無實的職位，讓他體面的退休，新華社4月10日的消息幾乎等於宣佈薄熙來仕途的結束。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異議人士王軍濤此前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認為，薄熙來雖然被撤職，但政治生命剛剛開始。王軍濤的看法，有分析認為太過樂觀。

雖然對薄熙來的政治舉措無法認同，但王軍濤受訪時指

出，在重慶時，薄熙來成了一個意見領袖，給了新左派一個實踐的機會，但是受黨國體制的約束，薄熙來不可能有真正的當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的機會，中央免除了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職務後，讓他完成成為左派政治和精神領袖的蛻變，王軍濤認為，如果兩年內中國政治出現變局，薄熙來一定會東山再起。

薄熙來遭“雙停”的消息披露後，王軍濤仍認為薄熙來的政治生命沒有完全終止。王軍濤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目前終止的只是共產黨體制內支持薄熙來的聲音，但當體制外三項條件具備時，薄熙來還可東山再起。

王軍濤解釋，第一，薄熙來要願意東山再起，王軍濤認為薄熙來有這樣的意志，他不會甘心失敗，第二，在薄熙來仍身強體健、有能力時，中國發生政治轉型，第三，中共當局不把薄熙來做掉。

王軍濤對《外參》說，中共當局毀掉薄熙來的方式有兩個，第一，軟禁薄熙來，但是在中國政治破局時，所有對政治犯的迫害都解除了，因此軟禁薄熙來沒有用，第二，抹黑薄熙來，但中國開禁後，社會和官場將呈現混亂狀態，相較之下，薄熙來的事會變得不那麼嚴重，就如同清末轉型還未到時，大家對清官提出各式各樣的指責，但轉型發生後，大家發現官場都相當黑暗，特別是新產生的軍閥更黑更亂。

但薄熙來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就此打住。王軍濤補充，如果中共中央在下一輪的改革中，把薄熙來要做的事情給做了，那麼薄熙來就不被需要，他也無法東山再起了。

薄熙來與陳良宇、陳希同的差異

1995年，前政治局委員、前北京市委書記的陳希同因副



王軍濤（資料圖片）

市長王寶森涉貪自殺，2年後被開除黨籍，接著被控貪污罪、玩忽職守罪，判囚16年；2006年，由於秦裕案和社保基金挪用案，中央宣部革去陳良宇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的職務，之後陳良宇被開除黨籍、判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囚18年。薄熙來被免去職務並遭立案調查，很難不令人聯想到陳希同與陳良宇案。

王軍濤對《外參》分析，薄熙來不像陳良宇或陳希同。“陳良宇和陳希同案在民眾看來純粹是權力鬥爭，看不出兩人下台或不下台有什麼區別。”王軍濤認為，薄熙來有兩處與陳良宇和陳希同不同。第一，對社會腐敗和不公極度不滿、思念毛澤東、希望中國走一條新道路的毛左和新左來說，薄熙來是一個代表旗幟，第二，在想救黨、救國、救父輩江山的紅二代看來，薄熙來是一個本來能成為他們領袖的出色人物。

王軍濤表示，對於上述兩類人來說，薄熙來是一種政治需要。“說他有多壞都沒用，就好像現在說毛澤東壞，有些人不相信，認為是抹黑他；這兩類人需要薄熙來，不是因為把他看作是聖人，而是有政治上的需求。”

王軍濤對《外參》指出，歷史上有大成就的民粹主義領袖，

在剛開始崛起時會有些聖人的光環，到後來即使這個人大奸大惡，人民也不太在乎，只要他能為人民出口氣、代表人民就行。

《紐約時報》引述兩名接近政治局常委的消息人士指出，3月7日政治局九常委的會議中，八名常委，包括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都支持調查薄熙來，而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持反對意見，周永康此前曾認可薄熙來的“打黑”。報導稱，為了達成更廣泛的共識，胡錦濤和溫家寶會見了黨內元老們，包括朱鎔基、李鵬、李瑞環、喬石。

王軍濤對《外參》表示，即使多數常委都認為該調查薄熙來，但每個常委想調查薄熙來的原因可能不一樣，溫家寶處理薄熙來的原因大概最符合現在知識份子、右派主義者的想法，另有人或認為薄熙來做得太過份、衝撞共產黨的規則，還有人可能覺得薄熙來得罪到自己。“例如賀國強、汪洋，兩人或許認為薄熙來整了自己的舊部屬，雖然這些幹部在地方上都待一陣子就走，不見得與部屬有多深厚的感情，但面子上總掛不住，且可能因為提拔錯人，留下壞記錄，想往上升時遇到障礙。”

“要搞改革，否則薄熙來死不了”

最新一期的《明鏡月刊》披露，溫家寶、賈慶林提出要將薄熙來一撿到底，“雙開”甚至送上法庭，不容他有任何翻身的可能性。

王軍濤認為，薄熙來即使上了法庭也打不倒，只要先前分析的三個條件符合，薄熙來仍有再起的機會，而且若激怒支持薄熙來的群眾，這群人可能四處傳播謠言，而薄派的太子黨又知道相當多內幕，若他們將這些事往外炒，造成互相爭鬥、互相造謠的情況，共產黨將非常難看。

王軍濤對《外參》表示，若說中共中央能從薄熙來事件



谷雁翔(個人網頁)

吸取到教訓，就是如果還想建立一套維穩模式，就應該把薄熙來的政策吸收到自己的底下，如同鄧小平雖然 1989 年下令鎮壓民主運動，但經濟上卻把當時民主運動提出的訴求以更徹底的方式實施，讓許多人得到初步的滿意。

1848 年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均以失敗收場，但使各國君主與貴族體制動蕩，間接促成德國及意大利統一運動。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總結 1848 年的革命時表示：“正如馬克思所說，那些鎮壓 1848 年革命的人違反自己的意志充當了這次革命的遺囑執行人。”

王軍濤指出，由於 1848 年的劊子手成了革命遺囑執行人，使得革命的動因消失，所以如果要讓薄熙來徹底“死掉”，共產黨就需要進行改革，或者左改，或者右改，總之不能基於鄧小平的模式，否則薄熙來“死不了”。

英國政府要求調查英國公民案

2011 年 11 月，與薄家有往來的英國人尼爾·伍德 (Neil Heywood) 在重慶下榻飯店中被發現氣絕身亡。4 月 10 日，與薄熙來被“雙開”的消息相隔不到一分鐘，新華社也公佈了谷

開來和張曉軍遭移送司法機關的消息。新華社報導稱：“據警方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移送司法機關。”

《外參》披露，王立軍之所以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感到生命受到威脅，他作為公安局長，發現谷開來涉入尼爾·伍德的謀殺案，向薄熙來報告，薄當場搥了他一個耳光。第二天就抓了海伍德專案組的 11 人，打死其中兩名公安人員，另一人被迫自殺。

王軍濤對《外參》表示，對於谷開來和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的事件，他還持保留態度。“我對任何未經公正司法體系調查的案件一概抱懷疑態度，我自己就是被共產黨法庭多次抹黑過的人，當時的法庭與現在相比還好得多，至少司法辦案人員對我個人都沒有什麼惡意，所以除非把谷開來放到美國或其他西方的法庭，加上一個好律師辯護，我才相信司法結果。”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則認為，谷開來和張曉軍可能確實有問題。英國政府 3 月 25 日表示，關於尼爾·伍德的死亡事件出現新的可疑線索，因此英國政府已請求北京政府重新調查此案。英國《泰晤士報》引述尼爾·伍德友人的話指出，尼爾·伍德死前不久曾提及自己與薄家人的矛盾，擔心自己的安危。

谷雁翔早在英國政府求北京當局重新調查此案時，就對《外參》表示英國方面肯定掌握到一定的證據，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這就不單純是中國國內政治鬥爭的問題了。”

“處置薄熙來，政治鬥爭是觸發點”

谷雁翔先前接受《明鏡》採訪時指出,如果過度集權統治,不只將損害中國經濟,也會損害中國老百姓的利益;“重慶模式”不符合歷史潮流,只能是一個權宜之計,不能是中國的發展方向,因此解除薄熙來掌權的職務是對的,因為他畢竟代表集權一方;薄熙來政治局委員職位應該無法持續做下去,因為能拿掉他的書記一職,就說明政治局常委們已經下定決心,不能讓再他掌任何權力。

不過谷雁翔說,如果薄熙來沒有做違法違規的事,就應讓他繼續工作,從團結穩定的角度講,中央有可能讓薄熙來做一個沒有實權的位置。但如果薄熙來做了違法違規的事,就必須依法制裁。

如今,中央宣佈對薄熙來立案調查,谷雁翔對《外參》表示,薄熙來的政治生命已終止。谷雁翔說,先前中央用“免兼”兩字宣佈解除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等職,因此他認為7、8月份召開的北戴河會議才將基本底定薄熙來的前途,這次則用“停止”兩字,5年前陳良宇被立案調查時,中央的措辭就是“停止”其政治局委員職務,說明薄熙來案已收集到一定的證據。

谷雁翔認為,中央嚴格處置薄熙來,政治鬥爭是一個觸發點,因為政治鬥爭,最後才注意到刑事犯罪的調查。“薄熙來高調想進入常委,可是中國不是公開競選的環境,如果一個人公開競爭,一定會引起內部的明顯鬥爭。想公開競選是正常現象,很難說它是錯誤的,也不能因為對發展政策和方向有不同意見就給誰治罪,所以從過去20年的歷史來看,政治鬥爭基本通過刑事調查的手段來進行,這樣國際社會也能接受。”

谷雁翔：薄熙來不具備東山再起的條件

王軍濤認為薄熙來東山再起的條件之一，就是中國發生巨大的政治轉型，谷雁翔對《外參》表示，中國如果發生巨變，將是思想較開放、年輕的人主導，這群人願意快速推動中國的政治進步、走民主法治的道路，就像葉利欽，如果不挑戰當時的黨政體制、推動巨變，很可能在莫斯科市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休，或還沒退休就被拿下，但他推動了巨變，當上總統。

“有野心或雄心的政治家們唯一能夠迅速晉升、打破現在權力體系的方法，就是推動政治改革，這是他們能動員群眾的有效方式，但薄熙來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谷雁翔分析，第一，薄熙來過去從來沒有大張旗鼓宣傳民主法治，他只是通過鐵腕手段進行市政建設、基礎建設，薄熙來沒有民主法治的形象。

第二，谷雁翔表示，薄熙來屬太子黨，大陸老百姓對太子黨普遍沒有好印象，儘管他的“打黑”獲得一些民心，但“打黑”不足以讓他當上最高領導人，如果之後薄熙來又被揭露出確實藉著“打黑”排斥異己，反對者將更多。此外，即使薄熙來最後無罪，他所做的不代表中國前進的方向，軍隊不會支持他；若薄熙來有罪，則會增加人民對惡腐高官的憎惡，所以薄熙來不具備東山再起的條件。

谷雁翔認為，現在需注意的是薄熙來事件引發社會不穩，否則倒楣的將是老百姓，美國經濟也可能受到影響，不過，在民主國家，這類事件不會讓人擔憂政局，由此更能看出中國不政改將沒有出路。

周永康或為自保同意辦薄熙來

薄熙來事件受全球關注，在中共當局大力調查下，涉案者越來越多，傳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也受秘密立案調查。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華府分社社長馬利德（Richard MacGregor）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在處理薄熙來一事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肯定經過一番辯論，周永康可能為了保護自己、讓自己好好退休，在薄熙來事件上與其他人達成共識，而周永康希望讓薄熙來接任政法委書記一職，是高層處置薄熙來的原因之一。

馬利德有 20 多年亞洲報導經驗，曾於大陸、台灣、東京、香港工作，為《金融時報》北京分社前社長、總部新聞部副總編、華府分社首席記者，著有《黨：中國共產黨統治者的秘密世界》（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書。

第一個西方風格的政客

王立軍闖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所引發的事件如滾雪球般擴大，馬利德對《明鏡》表示，薄熙來事件是 1989 年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大的一次政治地震。

當薄熙來還是大連市長時，馬利德便曾見過他，薄熙來給他的印象是光鮮亮麗，與其他許多中共官員顯得不同，雖然薄熙來從商務部長調到重慶任市委書記，看起來是被發配邊疆，但他並未從此站在政治舞台的邊緣。“薄熙來很有自信，很有領袖魅力，他成功運用媒體，讓自己變得受歡迎；他幾乎是第一個有西方風格的中國政客。”

薄熙來下台前，9名政治局常委中除了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外，另6人都曾到重慶，對薄熙來的“唱紅”表達肯定，因此一開始，馬利德認為薄熙來的作法似乎走得順利，他處在一個很好的升遷位置上。

但馬利德強調，重慶不是薄熙來建設起來的，而是黃奇帆；浦東是上海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打造浦東的黃奇帆10年前就做了同樣的事，之後他又打造了重慶，因此所謂的廣東模式，有些誇大的成分在，薄熙來到重慶後，引進了一套政治模式，他“打黑”，讓前任市委書記，也就是汪洋感到難堪，他也“唱紅”，並獲得6名常委的肯定。

“很明顯，薄熙來有很多敵人，因為他是高調的人物，很公開地競爭進入常委。”馬利德對《明鏡》表示，根據共產黨的不成文規定，爭取高層職位只是一場內部的競選，通常不會像薄熙來這樣公開競爭，因此薄熙來的作法引發一些人的不滿，使得薄熙來更容易受到攻擊，但重點是曾與薄熙來關係密切的王立軍。

馬利德指出，1989年以後，中共的一個統治原則就是高層的分化不能公開化，但在薄熙來事件上卻不是如此，王立軍跑到美國總事領館，等於把高層的分歧公開讓美國知道。由於中共官員每個人都握有彼此的把柄，就在薄熙來一步步朝政治局常委之路前進時，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讓薄熙來的敵人有了將他拉下馬的機會，薄熙來貪腐之事也接著傳



馬利德 (Richard MacGregor) (資料圖片)

出。

據媒體報導，薄熙來夫婦在大連時貪污數字驚人，雖然普遍傳谷開來已向海外轉移了80億元人民幣資產，但有消息指薄家的海外資產遠超過80億。

馬利德對《明鏡》表示，王立軍進入美國總領事館後，被視為完全的叛國者，而王立軍將一些骯髒情事主動爆料給美國，讓中共非常難堪，“一旦你讓體制難堪，這個體制就會把你吞噬。”

馬利德認為，薄熙來被拉下馬，可說是官僚體系紀律戰勝了個人魅力與企圖心。

蘇維埃式的制度

著有《黨：中國共產黨統治者的秘密世界》一書的馬利德，對中國共產黨的結構與運作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接受《明鏡》採訪時曾介紹，所有的中國制度都是蘇維埃式的，完全從蘇聯照搬過來，比如組織部的構想、黨控制軍隊的制度。“列寧都可以毫不費力的立刻認出中國所採用的模式。”但身處中國，卻不會覺得當地有蘇聯的影子，因此從這方面來說，這是黨的驚人成就。而且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幅員廣闊的中國無法生存。”

馬利德指出，中共體制僵硬與彈性並存，由於黨堅持一黨

專制，所以僵硬，但這個體制的適應性比許多人想像得都來得強；它也是一個無所不在、令人敬畏的體制，當越瞭解中國的政治官僚時，就越會發現它像高盛的董事會，由 25 名重要人士（中央政治局委員）控制著每個領域、每件事務的所有訊息。

馬利德表示，毛澤東曾提出“繼續革命”的概念，但現在的中國，比起繼續革命（revolution），更多的是繼續洩漏訊息（revelation），這給了共產黨一個很大的彈性空間。

中國駐英國的大使劉曉明 2012 年初接受英國 BBC 廣播公司採訪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只是中國的一個執政黨，不能把中國稱為共產黨國家，但可以說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馬利德表示，中國的體制不是像過去蘇維埃那樣的共產主義體制，若要形容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情況，最好的說法是引用蘇維埃的玩笑話：“從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間最長的一段路（The longest path from capitalism to capitalism）。”

馬利德對《明鏡》表示，過去 30 年來，中國最大的改變就是公民自由，許多在毛時代下無法做的事情，人們現在都能做，可以到處旅行，可以買名車、住豪宅、把小孩送出國唸書，只要別涉入正式的政治運動中、別想和黨對抗，所以除了非政治性的自由外，中共還是在“三 P”上有很嚴格的掌控：個人（personnel）、宣傳（propaganda）、解放軍（PLA），這三項在體制的核心中堅若磐石。

馬利德解釋，中共以委派職務的方法控制著個人，這些委派的職位遍佈各政府單位，包括媒體、智庫，所以沒有所謂的“獨立個體”；解放軍也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黨的軍隊，雖然軍隊確實變得更獨立、更專業、確保有更多的預算，在過去 5 到 10 年間也更敢言，他相信軍隊在外交事務上會有更大的影響力，但馬利德不認為黨會失去對軍隊的控制。

不過，由於網路的推動，官方媒體比過去更加“正常化”。

馬利德認為，官媒為了存活，也需要營收，但官媒不會真的公開爭辯中共對西藏、新疆等敏感問題的核心政策，它們不會讚揚民主，另外，媒體也不會直接攻擊高層領導。

中國政治融合了貴族和菁英

雖然認為貪腐是黏合整個體制的接著劑，因為“如果每個人都獲得一小部分，那每個人都能在不動搖體制的情況下有前進的動力”，但馬利德也對《明鏡》指出，貪腐仍是中國必須改善的問題，如果不改善、不透明，體制不會永遠穩定，而獨立的反貪腐運動，可能“帶動整個大廈的顛覆。”

馬利德指出，中共也希望年輕、富有、成功的人入黨，因此中國政治融合了貴族（aristocracy）和菁英（meritocracy），從高層來看，溫家寶、胡錦濤都是平民出身；從腐敗問題來看，在中國，腐敗不是發生在特定群體身上，要腐敗，不必生長在有良好關係的家庭中，這可說是另類的“平等”。

但馬利德也認為，中共對所有貪腐者的起訴，背後都有政治因素。中國政治體制裡處理著眾多利益群體的利益，就算是被外界歸為同一派的人，也有不同的利益，如習近平是太子黨，薄熙來也是，但薄熙來如今出了事。

“薄熙來案裡，雖然人們談論著上海幫，但我認為比起派系鬥爭，更多的是利益衝突，這是有關個人的競爭、是有關以不同風格經營共產黨的競爭。”馬利德對《明鏡》說。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谷開來和張曉軍與英國商人海伍德（Niel Heywood）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薄谷開來和張曉軍有重大作案嫌疑，但不少人認為此案涉及政治鬥爭，而非單純的經濟利益矛盾，新華社4月18日特地發表評論，稱海伍德案屬刑事案件而非政治鬥爭。

馬利德對《明鏡》指出，如果考慮到谷開來的身份，很難說這個案件沒有政治成分在其中，“當中國領導惹上麻煩，他的家人通常也會有麻煩上身。”但馬利德強調，海伍德案已遠超過僅是將資產轉到國外、收賄貪污等事，而是涉及毒殺一名外國人，這是非常嚴重與驚人的事，“我想當局可以容忍你貪腐，但無法容忍謀殺”，美國、謀殺等因素，讓此事大大升級，這也是中共當局嚴正看待此案的原因。

在免去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前，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的記者會強調“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令外界猜想將左派擁戴的薄熙來拉下馬，是否代表著政治改革即將啟動？

馬利德表示，溫家寶用文革來警告進行政治改革，同時也是對薄熙來的一擊，但他認為溫家寶講的不是19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是指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利用群眾讓黨失去權力的無政府狀態情況；薄熙來在重慶搞唱紅打黑，儘管許多高層官員不喜歡，卻沒有辦法反對一個讚揚毛澤東的人，因此王立軍事件給了他們一個機會，因此溫家寶在呼籲的，並非民主選舉的改革，實際上，馬利德也未見到中共進行體制改革的跡象。“中國的政改會在黨內進行，最重要的辯論也是在黨內進行。”

但薄熙來事件確實反映了中共接班機制的缺失，馬利德對《明鏡》指出，中國遴選領導班子的過程很不穩定，非常不透明，很多暗箱作業，薄熙來案可能會讓9名常委暫時停止這個遴選程序。

調查薄熙來與谷開來的單位不同

王立軍是導致薄熙來下台的重要因素，第二個因素則是英國商人海伍德命案。馬利德對《明鏡》指出，薄熙來現在受中紀委調查，但谷開來和張曉軍則移送司法機關，這是兩案的重要區別，由此看出要逮捕和拉下自己人，都由黨親自處理，而谷開來和張曉軍則不是黨紀律要處理的目標。

馬利德表示，中國的體制核心仍是列寧模式，也就是在頂上有個政治組織，有效地控制政府，它們有自己的規則，自己監管自己，這點從薄熙來案可看出。

馬利德認為，薄熙來有革命家庭的背景和聲譽，許多資深官員與薄家都有關係，也能從薄熙來的位置上獲得益處，因此很難想像他被拉下，還面臨坐牢的可能。對這樣一個人以及其家人進行調查，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而比起陳良宇案，中共當局經過幾個月的秘密調查後才公開說明，馬利德認為官方在薄熙來案上非常快速地做出聲明，中共高層在此事情上展現了一致性，因為他們將公眾當成一個不成熟的群體，如果表現出不一致，則可能導致民眾上街示威。

但馬利德也對《明鏡》表示，中共高層在處理薄熙來的案子上，應曾有過重大的分歧。“能讓中紀委立案調查的案子，必須是政治局常委 9 人一致通過的，在取得這樣的共識之前，肯定會經過一番辯論。”

《紐約時報》引述兩名接近政治局常委的消息人士指出，3 月 7 日政治局九常委的會議中，八名常委，包括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都支持調查薄熙來，而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持反對意見。明鏡網也報導，薄熙來向調查人員表示，其所作所為均為周永康授意與認可，“周永康才是老闆”。外界盛傳周永康為高層在十八大前下一個處理的對象。

但馬利德認為很難預測周永康是否會受影響。“反正周永康 2012 年底就要退休了，他可能想保護自己、好好退休，因此在薄熙來事件上與其他人達成共識。”

薄熙來下馬前，曾傳出周永康準備讓薄熙來接任自己政法委書記一職，馬利德對《明鏡》分析，高層處置薄熙來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周永康想讓薄熙來坐上政法委書記，管理國家安全，而像薄熙來這樣的人任政法委書記，可能是非常危險的事。

對於王立軍、薄熙來、谷開來的可能判刑，有說法指王立軍是所有案件的參與者，因此餘生將在監獄中度過，而雖然薄熙來和谷開來想將責任推給周永康，但薄熙來可能會被判無期徒刑、死緩甚至死刑，谷開來則可能性命不保。

不過馬利德認為薄熙來不致於被判死刑，但他的政治生涯從此結束了，“薄熙來如果沒被送進牢裡的話，也很可能被開除黨籍，”至於谷開來，由於涉嫌的是謀殺，因此很可能被判好幾年的徒刑，在牢裡待上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可能被判死刑。“但我懷疑即使她被判死刑，也會是死緩。”馬利德對《明鏡》說。

薄熙來案反映中國社會的成熟

薄熙來事件堪稱 1971 年林彪案後中共最大的政治危機，傳高層對此案的處理曾有過嚴重分歧，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薄熙來案讓中共面臨嚴峻的挑戰，如果處理不好，牽涉的不是某些領導人會落馬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共領導體制將受到巨大的衝擊，因此聯合起來是中共領導層的唯一途徑。

李成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高層政治和代際更替、中國國內區域發展、中國中產階級、美中關係等，已出版《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明鏡出版社 2012 年出版）、《中國新一代領導人》、《變化中的中國政治版圖——民主的前景》、《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超越經濟轉型》等多部中、英文學術專著，目前兼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常務執行理事、美國國會中國工作小組顧問委員會委員、美國華裔菁英組織“百人會”的常務理事、美國當代國際事務研究所常務董事；2008 年，李成先後擔任希拉里·克林頓和奧巴馬的競選顧問。

薄案反映中國社會的成熟

李成4月中在NCUSCR舉行的電話會議上，分析了薄熙來落馬的原因和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李成表示，目前對於薄熙來事件的看法有三，第一，認為此事與中共派系鬥爭有關，第二，認為與薄熙來個人的政治企圖心有關，第三，認為與中共高層間的意識型態衝突有關：李成指出，三點都有道理，但沒有哪一點能確切描述整件事。

李成認為，薄熙來有非常強烈的派系認同，也是個政治投機者，並代表著中共極左的意識型態，但對於中共來說，真正的危機是王立軍和谷開來事件，兩事件都令中國民眾相當震驚，涉及的層級都非常高，也嚴重打擊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李成分析，薄熙來之所以能掌權這麼久，主要歸因於中國政治的派系競爭與緊張關係。根據李成的觀察，中共有“一黨兩派”，一派是以太子黨為主，另一派是胡錦濤為代表的共青團。

在明鏡出版的《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一書中，李成指出，自90年代後期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真正掌權開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逐漸形成了兩個非正式、半公開化的聯盟，至今越來越明顯，兩股勢力為了權力、影響力和政策控制力相互爭鬥，形成“一黨兩派”的情況，所謂的派就是一個同盟，某個同盟是由不同派系組合起來，現在這樣的爭鬥已不再是零和遊戲，而是勢均力敵、相互牽制，與中共近年來主張的黨內民主和權力制衡的呼聲相符。

李成在書中特別闡述了菁英同盟與平民同盟，菁英同盟裡，有太子黨、上海幫、海歸、企業領導，如今太子黨在政治局中占了28%的席位。民粹同盟的核心是共青團，團派在十七屆中



李成（布魯金斯學會）

央委員會裡占了23%，在政治局裡占了32%。李成認為，中國政治在鄧小平、毛澤東的強權人物政治結束後，派系鬥爭會越來越活躍，如此促成了派系角逐的半公開化，以及某些下屆常委角逐者的政治游說行動。

李成在電話會議中描述了兩派之間的抗衡：薄熙來素有“大砲”之稱，時時刻刻準備好攻擊對手，尤其是溫家寶，另一方面，胡錦濤和溫家寶也將薄熙來視為對

手，認為薄熙來的個性將把中共帶向分裂。

只是，薄熙來在社會上還有三股主要力量的支持：第一，左派知識份子，即所謂的新左派；第二，部分太子黨，這些人或與薄熙來理念相同，或與薄熙來有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第三個群體包含了不滿的民眾、認同薄熙來的平均主義、薄熙來打黑、或認為薄熙來是有能力領袖的人。

另一方面，薄熙來也有四群敵人。第一，自由派知識份子，這些人不只把薄熙來當作毛派，也將他視為納粹份子，第二個群體是司法專業人士，他們認為薄熙來在重慶和大連的許多作為踐踏法律，第三個群體為黨內菁英，其中也包括認為薄熙來不遵守黨紀、會給中國帶來麻煩的軍方領導，第四個群體是中國的海內外企業家，他們不認同薄熙來式的民粹主義，也擔心他反市場化的傾向。

李成相信，薄熙來的落馬對中國政治發展來說是非常正

面的事，它暴露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嚴重缺失，另一方面，則能促使中國領導、知識界和民眾達成一個新的共識，推進政改進程。“如果中國領導未把握住這個機會，未來幾年中國將會處在巨大的危險下。”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曾造成中國社會的動盪，李成認為，薄熙來事件和天安門事件最根本的不同，就是薄熙來案發生至今，中國的社會、經濟沒有出現混亂情況，反映出中國社會的成熟度。

李成先前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可能與台灣的“江南案”一樣，會是一個政治上的轉折點。發生於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案”，為筆名“江南”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在美國遭黑道份子刺殺身亡的案件，1985年1月，蔣經國下令逮捕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並取消國防部情報局。

李成對《大事件》指出，“江南案”最終讓蔣經國意識到，必須解決黨禁、報禁的問題，因為國民黨在此事件中已經失去了道德的至高點，政府也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

李成在電話會議中表示，薄熙來案也引發中國媒體呼籲法治、政改的聲浪，同時給了溫家寶和其他開明領導人強調政改的動力，即使是其他先前反對政改或黨內選舉的領導人，也或許會覺得政改才是中共唯一的出路。

聯合起來是中共高層的唯一途徑

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分析認為中共高層在如何處置薄熙來的問題上曾產生嚴重分歧，但李成在電話會議後接受《明鏡》採訪時指出，也許為了顧忌公眾的反應，高層曾有過一些不太重要的分歧，但他相信高層有很強的利益

驅動，要在這個問題上達到一致，因此他不認為高層對薄熙來案曾有過重大的分裂，以後是否會有則要看國內形勢的變化。

“中共高層展現出一致性，因為他們明瞭這件事對中共政權的挑戰太大，如果處理不好，牽涉的不是某些領導人會落馬的問題，而是整個共產黨領導體制將受到巨大的衝擊，在此情況下，聯合起來，應該是唯一的途徑。”

李成對《明鏡》表示，讓張德江接任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位，就是妥協的結果，張德江本來就是太子黨、是江澤民偏愛的人，如此太子黨與共青團的力量仍會保持平衡。高層達成妥協，不只是為了讓習近平順利接班，更全面地看，是為了讓整個第五代領導人都順利接班。

雖然薄熙來式的社會主義或毛澤東主義可能結束，但一些社會問題仍在，新左派運動也可能會找到新的領袖，李成指出，官員貪腐、國營企業壟斷等問題，都造成民眾對領導層的不滿，因此雖然薄熙來落馬，中國領導仍需要注意可能的社會反彈。

李成認為，現在對胡溫政權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贏得民意、讓政權更制度化地移轉，要達成此目標，第四代與第五代領導人都應該進行政治改革。“這不是可以等到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第二任期時再做的事，而是應該在未來幾個月立即行動，以重親獲得合法性和民眾的支持。”李成舉例，可在十八大選拔高層官員時，引入更多黨內選舉機制，例如列出 10 或 11 名候選人，由中央委員會選擇其中 9 人擔任常委。

“很難相信還有人支持薄熙來”

薄熙來事件涉及範圍廣，網路傳聞眾多，據傳谷開來為了免於被判死刑，主動供出周永康與薄熙來計劃政變、扳倒習

近平。

李成首先認為，中共若要真正制止謠言，就應該讓官方媒體更開放，人們就會想從官媒裡找答案，而不是尋求社交媒體給與解答。而對於政變一說，李成認為一點道理都沒有。“當然，雖然薄熙來與習近平都是太子黨，但兩人有利害關係，可是當面對來自共青團的巨大挑戰時，他們曾經聯合在一起。”

薄熙來下馬前，曾傳出薄熙來可望接任周永康政法委書記一職，李成也不認為這則消息準確。“薄熙來任大連市長時，廣泛傳聞他竊聽大連市委書記的對話，其他領導也應該知道此事，這個嚴重的錯誤將是他成為周永康繼任者的重大阻礙。”

李成在薄熙來剛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後接受《大事件》採訪時就已分析，雖然薄熙來還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但只是暫時的，在秋天召開中共十八大前，中共對王立軍和薄熙來的案子應該會有個交代，並且對薄熙來、對王立軍，都可能有不同的指控。

王立軍案發生前，李成認為薄熙來入常的機會是 80%，王立軍案發生後，薄熙來入常的機率是 0%，李成對《明鏡》表示，即使中共的專制政權倒台，薄熙來也不可能再回到政壇。“薄熙來的能力有限，他犯了很多錯誤，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民粹主義的觀點還會延續很長一段時間，民眾當中也會有些人同情他，但只是極少數。”

《紐約時報》引述兩名接近政治局常委的消息人士指出，3月7日政治局九常委的會議中，八名常委，包括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都支持調查薄熙來，而周永康持反對意見。李成對《明鏡》表示，他很難相信王立軍事情發生後，還有常委會選擇支持薄熙來。“即使有些傳言是真的，周永康在十八大後也要退休了，這樣做沒有什麼好處，對目前的高層來說，一致性是最重要的。”

媒體經常指出政治局 5 名常委曾到訪重慶，公開支持薄熙來的“唱紅”，李成分析，其實並非所有到重慶的常委都支持薄熙來，至少有兩名常委的到訪可用另一種方式去解讀，一位是賀國強，一位是習近平。

李成表示，賀國強和薄熙來之間有嫌隙，他如何會去支持薄熙來？薄熙來或許希望讓賀國強的到訪看起來是在支持自己，但實際上或許只是兩人之間達成某種協議。而一些媒體對習近平在重慶時說的話，也解讀成是習近平要求薄熙來不要搞文革式宣傳，並非支持“唱紅打黑”。

北京政治圈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舉行了兩天的秘密擴大會議，作出了兩項決議：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展開秘密立案調查、延期召開中共十八大。消息人士稱，薄熙來事件打亂了十八大會議的其他事務籌備工作，所以很可能不得不推遲會議召開日期，初定 2012 年 12 月份甚至 2013 年春天。

李成對《明鏡》分析，中共原本就宣佈十八大會在 2012 年的後半年舉行，所以如果在 12 月份舉行並不算推遲，如果到 2013 年初才叫推遲。“當然按照慣例是在 10 月份舉行，不過現在延後的理由是，不這麼做權力過渡的時間會長達半年，這說得過去，所以推遲到 2013 年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李成也認為，外界已經認為中共內部不穩定，因此中共也有很大的動力讓十八大準時召開。

“薄熙來面臨的指控會非常嚴重”

對於薄熙來案，李成表示，中共不只應該透過合法的司法程序處理，而非讓政治手段介入，還應該藉此機會真正促進司法、政治的改革，最終讓中國憲政化。

至於薄熙來可能面臨的指控，李成認為會非常嚴重，可能包括在重慶建立自己的政治王國、干涉官方調查、試圖分裂高層領導、竊聽其他領導的談話、收買左派知識份子以散佈謠言、在打黑時虐待他人、涉入與中國境內和外國公司的貪腐情事，最嚴重的指控，就是共謀殺害英國商人海伍德。

“薄熙來和王立軍當權時，有的案子已被證實使用暴力，在王立軍當上重慶公安局長的幾個月內，他逮捕了數千人，也處決了一些所謂的貪腐官員和商人，這些案件可能都會被重新審視，有的審判結果還可能改變。”李成認為，薄熙來最嚴重的刑責是死刑，但之後可能會改判成無期徒刑，即使不是死刑，薄熙來也非常可能要終生坐牢。

有人質疑谷開來與張曉軍所涉及的並非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因為一來谷開來並不缺錢，二來在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惹出謀殺案、豈不毀了薄熙來的仕途，因此認定此事為政治事件。李成對《明鏡》分析，有些人追求金錢的慾望是沒有底的，此事不應該是政治問題，更多的還是經濟糾紛與形式犯罪。“谷開來怎麼敢介入政治？她已經可能得到另一個指控：與可能的外國間諜關係密切，這是很大的罪名。”

而在此時間點牽扯出謀殺案，李成認為或許是因為薄熙來的醜聞即將曝光，為了自保才引發這起事件，否則醜聞一旦傳開，薄熙來也當不了常委。

新華社在宣佈調查谷開來的專稿中，不尋常地把谷開來稱作“薄谷開來”，李成認為有兩種可能性：第一，顯示谷開來與薄熙來的關連性，暗示薄熙來是背後的主導者，第二，暗示谷開來有外國護照，或外國居留權。李成傾向第二種解釋，且第二種理由比第一種更重要。

雖然先前傳出黃奇帆涉案，但黃奇帆仍是重慶市長，李成認為，這顯示出中共當局不想碰太多人。

薄熙來案與陳希同案性質完全不同

新華社4月18日發表評論，將薄熙來被立案調查，與前北京市市委書記陳希同、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違法違紀被處理之事相提並論，指出中國大陸《刑法》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李成分析，薄熙來案和陳良宇案都能見到“一黨兩派”體制下兩方勢力的妥協與平衡；接任陳良宇的人是韓正，接著是習近平，現在則是俞正聲，三人都是江澤民派、上海幫，而取代薄熙來的是張德江，兩人也都是江澤民陣營的人，兩案不同處是，陳良宇案只牽涉貪腐，但薄熙來案涉嫌更多嚴重的指控。

至於陳希同案，李成對《明鏡》表示，兩案的相同處都是中央領導人想要鞏固自己的權力，於是從地方官開刀，陳希同案時鄧小平還健在，江澤民的勢力則不特別穩固，派系淵源也不是特別清楚。但薄熙來與陳希同案應該強調不同處，因為兩案不只是意識型態的不同，在權力鬥爭、涉案人的強烈政治企圖心，以及王立軍和谷開來兩件突發事件方面，都讓整個性質完全不一樣。

“有人說，從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事件看出，每個黨代會前都會有一個地方首腦下馬，我覺得這是偶然，不是必然的。”李成說。

如今，薄熙來的支持者見到薄熙來與其家人所涉入的案件，瞭解薄的為人後，李成認為這些人對薄的支持會大大降低，太子黨也不會有人願意與薄熙來站在同一邊，因此薄熙來的勢力已大幅削弱，但一些與社會公義、社會貧富不均、特權階級相關問題的運動還會持續，在上位的中國領導應該更重視這些問題。

“民眾對薄熙來支持度的延續，取決於薄熙來的判刑。在中國老百姓的觀念裡，貪腐是很普遍的情況，如果薄熙來只被判貪污，老百姓會質疑為什麼只抓薄熙來，所以當局應該拿出讓大部分老百姓都能信服的說法。而要再度取信於民，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勢在必行。”李成說。

薄熙來是否並不顯得特別壞

王立軍與薄熙來案發生至今，即使外界傳聞不斷，但中共高層始終口徑一致。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政治科學系教授傅禮門（Edward Friedman）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中共當局比大多數人想像的更擔心自己在中國的合法性，也比大多數的旁觀者更認為中國可能不穩定，薄熙來事件讓中共領導層更加小心維持一致性，同時更謹慎評估是否讓每個利益團體都感到滿意。

傅禮門為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畢業於哈佛大學政治系，專長中國大陸政治與外交、美中關係、台灣政治、國際政治經濟、革命，曾任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顧問，著有《一黨獨大制下的政治轉型》、《亞洲地區合作和其敵手》、《社會主義下的中國鄉村》等多部著作。

薄熙來是整個體制的威脅

薄熙來的政治野心，幾乎已成為評價其人時的最重要特徵。《外參》月刊引述中共內部人士的消息指出，薄熙來最崇

拜秦始皇和毛澤東，認為自己是第三個中國最偉大的人物。傅禮門對《外參》表示，政治企圖心，正是薄熙來與兩位落馬高官——陳希同、陳良宇最大的不同處。

傅禮門指出，薄熙來是高幹子弟、太子黨出身，予人一種自命不凡的形象，“我認為薄熙來不只是想當常委，他很有政治企圖心，也覺得目前的中國領導很被動，並未做出什麼成績，而下一代的習近平不比胡錦濤更主動，這些因素都促使他奮力往上爬，以便讓自己坐到重要領導位置上。”

傅禮門對《外參》分析，薄熙來視習近平只是另一個聯盟建設者（coalition-builder），不願意承擔風險，因此他有必要成為帶領中國往前邁進的那個人，有了在重慶的經驗後，薄熙來也認為自己能動員民眾、改變現狀，薄熙來的高度企圖心加上其餘牽扯出的案件，都讓此案與陳希同案、陳良宇案完全不一樣。

就是薄熙來這種特立獨行的風格，讓強調穩定的高層領導開始擔憂。傅禮門指出，中共高層認為中國充滿緊張氣氛、社會問題，目前領導層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平衡所有問題與勢力，以免中國分崩離析，而薄熙來正是整個體制的威脅，在胡錦濤一代下台、新政權尚未穩固之際，如果薄熙來仍握有權力，會相當令人擔憂。

中共當局的維穩態度，可能只會令中國這口悶鍋的壓力日增。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懷默霆（Martin K. Whyte）先前接受《明鏡》採訪時指出，一般中國老百姓覺得自己沒有宣洩不滿的管道，中國社會好像一個悶鍋，裝著民眾的怒意，而政府只想蓋緊蓋子，出了亂子也找方法掩蓋，假裝一切如常。

懷默霆表示，雖然沒有跡象顯示逐漸加劇的分配不均，以及伴隨而來的民眾憤怒，會對中國的政治穩定造成嚴重威脅，但這不表示中國民眾的不滿，不會在未來某一天爆發。“在



傅禮門（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中國有各式各樣的不滿情緒，主要跟目前的分配不均無關，對我來說，更關鍵的是公眾對官僚體制濫用權力、貪腐和其他程序不公等議題的不滿，特別是濫用權力的情況。”

傅禮門對《外參》指出，對許多人來說，中國的專制政統治是顆未爆彈，這股能量只會越累積越多，最終爆破，雖然傅禮門不願預測中共政體最終是否會倒台，但他相信薄熙來便是認

為，目前的統治階層只想維持穩定，如果不立即進行全面的大改變，中國可能分崩離析，這造就了他的政治企圖心。

據悉，薄熙來的行事作風讓一些人看不慣，也得罪許多人。主政遼寧時，薄熙來和曾是中國首富的遼寧華晨汽車集團董事長仰融因設廠問題鬧翻，薄熙來指控仰融侵吞國有資產，逃到美國的仰融則將薄熙來和遼寧省告上法庭，薄熙來被調離遼寧，改任商務部長。商務部長期間，薄熙來已有“小毛澤東”的稱號，之後其上司吳儀以“裸退”方式抵制薄熙來接任副總理，2007年薄熙來被“發配邊疆”到重慶，在重慶的強力“打黑”又讓賀國強、汪洋難堪。

薄熙來也涉入多起謀殺案。除了英國商人海伍德命案外，英國《每日郵報》報導，薄熙來與谷開來為了剷除政敵，2002

年下令炸毀一架中國北方航空客機，導致機上 112 人死亡，其中一名罹難者為中國國家安全部人事司司長特別助理李岩峰，其丈夫韓曉光是大連酒店大亨，與薄熙來的政敵時任大連市委書記于學祥關係密切，當時李嚴峰帶著胡錦濤女兒及中共元老李先念女兒所寫的信件，搭上該班飛機到大連欲救出在獄中的韓曉光。大連電視台美女主持人張偉傑的失蹤案和大連前副市長袁憲千女兒墜樓案，據傳也和薄熙來夫婦有關。

《外參》月刊披露，中共最高層內部議論的薄熙來罪名，並未在向省部級和司局級幹部傳達的文件中提及，但中共最高層早就在內部定下薄熙來的“三大罪”：陰謀政變、貪腐和政治謀殺。

雖然薄熙來的強勢作風讓自己豎立政敵，目前傳出的貪腐案又可追溯到薄熙來在大連的時期，但薄熙來依舊是一路走到了重慶市委書記的位置。傅禮門對《外參》表示，很多人都想問，為什麼薄熙來涉入如此多的貪腐、黑打、謀殺案，卻仍掌權如此之久？“他們得問自己，是否是體制給與薄熙來這樣的權力？是否許多體制內、甚至高層的人都這樣做事，所以薄熙來的行事並不讓他顯得特別壞？”

對薄熙來的指控有限

《外參》報導，王立軍掌握了周永康與薄熙來的材料，複製成 8 份分別保存，聲稱如果周永康不保護自己，這些材料讓自己足夠與周永康同歸於盡。報導說，為了降低重慶政變對中共統治的傷害，防止薄熙來和他的支持者進行政治反撲，中共中央 4 月 10 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將薄熙來和谷開來確定為刑事犯罪，對外顯示出改革和反腐敗的決心。

傅禮門認為，薄熙來案爆發後，政治局常委裡的薄熙

來主要支持者會立刻被孤立，但其他人也都同意，隨著真相一一被揭發，他們必須立刻行動，且討論的重點應該放在維持統治階層的穩定與一致。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定罪名。傅禮門對《外參》表示，拉下薄熙來後，政治局常委必須考慮的是，該如何給薄熙來定罪的問題，以及審議薄熙來的所作所為時，勢必要回到毛澤東身上，此時也需要對毛澤東重新評估，此外，由於薄熙來案所涉及的複雜利益關係，拉下薄熙來對仍掌握權力的人有什麼影響，也會是權衡重點。

傅禮門預估，當薄熙來案的調查越來越深入時，擔心薄熙來案將影響自己的人，為了自保，將會發出不同聲音，“所以到了該如何定罪薄熙來的階段，相信政治局常委中會有更分歧的意見。”

“對於薄熙來案，當局應該還在全面蒐集資訊，但也已經掌握了一些不願公開的訊息，不願公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高層不願讓薄熙來與某些事有連結，而這些事可能將所有高層的領導都捲入案件中，所以我猜測高層傾向侷限這個事件的發展，對薄熙來的指控也會有所限制。”傅禮門對《外參》說。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異議人士王軍濤先前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目前終止的只是共產黨體制內支持薄熙來的聲音，但當體制外三項條件具備時，薄熙來還可東山再起。這三個條件為：第一，薄熙來願意東山再起，第二，在薄熙來仍身強體健、有能力時，中國發生政治轉型，第三，中共當局不把薄熙來做掉。

傅禮門對《外參》表示，依據目前的情況來看，薄熙來將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但對於未來，沒人能說得準，因此當然也不能排除中國的房產泡破崩破、經濟問題排山倒海而來、南中國海發生戰爭等等因素，也有人批評中國領導人並未與時俱

進，當這些不穩定因素產生時，薄熙來是否有機會還很難說。

為了維持穩定，當局大力發展經濟，但當經濟情況無法讓滿足人民時，動亂可能產生。美國加州柏克利大學經濟學家巴丹〈Pranab Bardhan〉先前接受《明鏡》採訪時指出，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需要集權主義，特別是當有權有勢的政治家族扭曲了國家的金融配置，以及不負責任的地方官員和地方企業夥同攫取收益時，集權主義實際上扭曲了中國的發展。巴丹認為，如果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化，可能使得經濟繁榮的都會區更容易爆發抗議事件，產業產能過剩、公營行庫財政體質不佳、中產階級的互通有無再加上來自外地的移民工，都使得都會區的動盪更難以控制。

對於中國的未來，傅禮門曾撰文道，在一個逐漸依照高壓、集權中國的喜好而型塑的世界裡，受經濟問題困擾的民主國家不再有能力強行推動人權與民主，但從其他國家的興起與衰落可看出，當專制的中國大幅度重新塑造世界政治時，中國共產黨政府某程度上可能變得傲慢、過份擴張，進而傷害了自己，因為中國那種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無論在何處都無法持續。

傅禮門指出，中國世代無論維持多久，不論從價值或目標來評估，對工業化民主國家都不是好事。不過，傅禮門認為21世紀不會是中國的世紀，超級強權不容易維持或取得，中國若要成為世界的超級強權，必須先有個不尋常的觸發事件，如歐美金融體制的崩塌。

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傅禮門認為，中國的統治階層將致力打造一個對共產政權的價值和雄心友善的世界，一個對不負責任的統治階層的目標和利益友善的世界。即使北京最終無法達到此目標，認真對待中國政權的這一目標仍相當重要。

強調一致性，不動周永康

儘管中共高層試圖將調查薄熙來一事說成是反腐而非權力鬥爭，但外界仍紛紛猜測與薄熙來關係良好的周永康可能遭到調查、甚至下台。《大事件》透露，王立軍當年從遼寧到重慶，並不是薄熙來點將調去的，而是薄向公安部要一個厲害的局長，具體指揮“打黑”，周永康雖然已不是公安部長，但還是推薦了王立軍。2009年，周永康更給薄熙來打私人電話，對王立軍的仕途做出安排，談妥王將在三年內升三級。消息人士說，薄熙來通過王立軍和周永康的乾兒子孔濤，得到周永康的秘密支持。

《大事件》也指出，周永康已被江澤民稱為“叛徒”。博訊網報導，薄案發生後，周永康曾在胡錦濤及江澤民面前含淚自我批評。人民日報4月24日刊登周永康3月對於維穩的長篇談話，周永康同日出席第七次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最高法院院長會議時，指出“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允許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分析認為周永康是為了破除外界的謠言。

傅禮門對《外參》表示，薄熙來事件發生後，不論是周永康或其他曾與薄熙來站同一陣線者，第一反應肯定都是考慮自己的利益、評估此事對自己的派系有何影響，這點毫無疑問，因此若做出什麼樣的反應，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

“周永康在薄熙來案發生後基本保持沉默，我覺得高層之所以不動周永康，是因為對外顯示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保持一致性是中共歷來強調的，王立軍事件爆發後，最重要的不是派系分歧，而是維護黨的可信賴度，所以許多人都說其實中共內部分歧嚴重，否則為什麼要強調一致性？”傅禮門說。

在傅禮門的認定中，中共為“後現代專制體”，其強大的軍力、增長的經濟和中央集權是這個政體的特徵。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中共不計代價維護統治權的證明。

傅禮門對《外參》說，中共高層認為，周永康很快就要退休，而他的位置也會被其他強硬派、相似派系背景的人所取代，因此沒必要引發紛爭，讓周永康留在常委中是最好的選擇，中共高層要給外界一種“沒什麼大不了”的印象，要達到這目標，相信高層做了很多努力。

傅禮門也認為，為了盡可能讓事情看起來正常化，中共十八大會如期召開。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相信，薄熙來的落馬對中國政治發展來說是非常正面的事，它暴露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嚴重缺失，另一方面，則能促使中國領導、知識界和民眾達成一個新的共識，推進政改進程。前觀察家報和南華早報總編輯芬比（Johnson Fenby）也指出，薄熙來的垮台，可能有助於中國的改革。

但傅禮門對中國的改革前景持較悲觀的態度。“薄熙來事件讓中共領導層更小心翼翼，他們會更謹慎評估是否讓每個利益團體都滿意。”傅禮門對《外參》指出，中共官員其實比大多數人想的更擔心自己在中國的合法性、更覺得自己沒有權力，他們也比大多數的旁觀者更認為中國可能不穩定，因為這些人比外人更知道中國哪裡發生了暴力、抗議事件，也更清楚無法將上級命令下達到地方的情況。

“因此薄熙來事件會更讓中共思考如何避免社會動盪，在不讓掌權的勢力有任何不滿、維持穩定的主軸下，若要提到改革，高層恐怕會做的不多，中國體制不會有太多改變。”傅禮門說。

薄熙來未注重 維護軍隊在地方上的利益

薄熙來落馬引發中共政壇地震，傳軍方也受影響。美國中央俄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homa）歷史系系主任、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李小兵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分析，薄熙來和軍隊的關係並非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導致現在薄熙來出事，軍方就想與薄做切割。

李小兵為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歷史學博士，研究現代中國歷史、中國軍力、美國亞裔、越戰與韓戰，李小兵目前擔任西南區亞洲研究協會會長，俄克拉荷馬中國專家與學者協會會長、《北美中國研究學刊》和《西太平洋雜誌》主編，主要著作為《中國軍隊歷史》、《韓戰之聲：美國、韓國、中國士兵的個人故事》、《21世紀的台灣》等。

軍隊正劃清界線

薄熙來事件影響的不只是高層領導、商界，可能還包括軍方。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中共中央軍委已派出五個小組到四川、重慶、昆明、貴州等地調查薄熙來與成都軍區各部隊的

關係，查看是否有高級軍官或部隊捲入案件中，又在多大程度上捲入。

報導稱，在王立軍案發生後，薄熙來 2 月高調參觀位於昆明的解放軍第 14 集團軍。此部隊的前身是抗日戰爭的山西新軍，由薄一波組建。3 月薄熙來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北京“兩會”上，還有解放軍代表當著記者們的面向他行軍禮。盛傳第 14 集團軍的高級軍官也被中央調查。

香港人權民運信息中心透露，重慶警備區司令員朱和平正接受成都軍區調查，他本人仍有人身自由，但已缺席多個重要場合。朱和平跟薄熙來關係密切，2009 年，在薄熙來的幫助下，朱和平從發展商取得一塊優質地皮建國防培訓館。

李小兵對《大事件》指出，薄熙來跟軍隊的關係建立在太子黨的淵源上，過去軍隊的高幹子女，現在變成軍隊的主要領導，包括二砲政委張海陽、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以及一些海軍副司令、成都軍區成員，都是太子黨背景，薄熙來在遼寧和重慶期間，也重視和軍隊建立關係，例如贈送成都軍區毛澤東銅像。

李小兵表示，雖然薄熙來重視與軍隊的關係，但卻幾乎沒見到他與軍隊發生利益關係，因此目前看來，軍中力保薄熙來或支持薄一波的人很少。“軍隊對他都敬而遠之，就是他沒有注意維護軍隊在地方上的利益。”

被視為與薄熙來關係密切的張海陽，在薄熙來下台後曾在媒體上消失了一段時間，引發人們對其命運的猜測。但最近中國官方媒體公佈張海陽率團訪問芬蘭、匈牙利的消息，分析認為可能是為了穩定軍隊、對外表示團結，也可能是中央想減輕薄熙來事件對軍隊的衝擊。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在重慶打黑時，據傳一些成都軍區的房地產受到影響，軍區親屬的公司被迫關閉，當



李小兵。(李小兵提供)

軍隊需要薄熙來的幫助時，薄也沒有出手相助，因此薄和軍隊的關係並非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當薄一出問題，大家自然不會與他站同一陣線。

李小兵認為，現在中央對軍隊的調查，主要不是調查軍隊涉入薄熙來事件的程度，而是想劃清薄熙來與軍隊的界線，而軍區和各總部的人也欲與薄熙來做切割，

中央應認為不能一棒子打死一群人，應將薄熙來事件認定為內部矛盾、黨內解決。

自從中央宣佈調查薄熙來之後，各大軍區紛紛表態，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正確決定，絕對聽從胡錦濤的指揮。二炮總政治部主任殷方龍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強調更加堅定自覺地聽黨指揮、維護大局及嚴守紀律；海軍政委劉曉江則呼籲黨員幹部勿打探、聽信、傳播小道消息；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在《求是》刊文強調，中國軍方應“始終堅持用法規制度規範部隊工作和生活秩序，嚴格約束官兵言行舉止，確保全軍上下集中統一和純潔鞏固”。被解讀為軍方向中央高調表忠心的表現。

第五代領導人接班後，李小兵認為胡錦濤還會保留中央軍委主席的位置。“這是個傳統，從鄧小平到江澤民，都是從國家主席位置上退下來後，還保持軍委主席職務，胡錦濤下來後，

對團派等等還會有一些安排，而且胡錦濤再任軍委兩年，對習近平也有保護作用。”

在江澤民交棒給胡錦濤時，江澤民便曾“扶上馬，送一程”，短暫留任軍委主席，延後2年才將實權交給胡錦濤。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目前的軍委與胡錦濤的關係不錯，最近10年，軍費增長快速，軍隊待遇大幅改善，許多將領，特別是中青年將領都被提拔上去，因此對胡溫政府都非常支持，軍委與胡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李小兵說，習近平和軍委的關係就差一些，雖然習近平是軍委副主席，但因為習近平常年在地方上任職，在北京待的時間不多，因此與軍隊的聯繫也不非常緊密。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改革家？

李小兵認為，薄熙來在中共改朝換代期間，自己採取政治手段、急於入常，不但步調並未和中央一致，還打亂中央的計劃和部屬，因此不被中央大多數人接受，使得薄熙來的個人問題變成組織和路線上的問題。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中國的官場有鬥爭、有門戶觀念，但並沒有明確的派系分別，“薄熙來被劃為太子黨，但實際上他是單槍匹馬，現在牆倒眾人推，很多人還落井下石，其他太子黨並未出手相助，所以政治鬥爭中，只有有太子黨背景的人，沒有太子黨派系。”

但也有人認為中共未來的改革，就需要薄熙來這種獨樹一幟的人。不少人對胡錦濤的“無所作為”感到失望，認為他謹小慎微、不願冒險的個性，令他只會按部就班做事，而沒有改變既有格局的魄力。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這種從下到上的重慶模式，

是過去沒有出現過的，因此中共的改革或許還需要這種和中央不同方針者，如果按部就班，改革的步子反而沒什麼變化。“中共首先想要黨內政治改革，也需要新人物、新方法，但這個人還是應該立黨為公，有遠見，可開闢一條新途徑，同時被中央所接受。”

“其實中央前一段時間也是在觀察重慶的改革，希望薄熙來能唱一台好戲，能成為胡溫最後的政績，只是沒想到薄熙來只為了自己。”李小兵說。“薄熙來受薄一波影響很大，薄熙來有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思想，比較容易唱高調。”

今後的中國政經改革，李小兵認為還是由下而上更有希望。“有了地方影響力後，讓其他地方跟進，不要只等中央有英明領袖、時代偉人出現，不會有的，像朱鎔基、溫家寶，他們雖然清廉，但想改革也都不容易。”

薄熙來可能輕判

目前中共僅稱尚在調查薄熙來的違紀，對薄熙來是否會被判刑、會遭判多重的刑期，外界有諸多預測。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還有民意支持度，一些人看來對薄熙來還有些保護作用，如周永康，因此中央對這問題遲遲無法做結論。

李小兵指出，薄熙來是江澤民最早提拔的人，薄熙來會如此張揚，也是因為他認為江澤民的勢力很大，江澤民對胡錦濤和溫家寶也不是很滿意，所以胡溫對薄熙來問題的處理，可能在往後給江澤民作為一個藉口，胡溫可能為了給江澤民留面子，對薄的處理打折扣，李小兵判斷，薄熙來的判刑應該不會像陳良宇、陳希同這麼嚴重。

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判 18 年刑期，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被判 16 年刑。李小兵說：“薄熙來的父親是中共元老，

陳良宇、陳希同都沒有這樣的背景。”

江澤民早年與薄一波的交情，讓薄熙來被視為獲得江的蔭庇。江澤民 4 月 17 日在北京會見了前來中國參觀的星巴克集團總裁舒爾茨（Howard Schultz），分析認為這代表江澤民仍有影響力。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與陳良宇、陳希同仍有相同處，就是個人勢力膨脹，認為自己的政績就是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保證，反而給中央製造壓力，且低估了中央的能力；中央對個人英雄主義、個人崇拜非常反感與戒備。“他們忘記緊跟中央的腳步，比自己的創新、政績更重要，三人也都涉及許多經濟問題，得罪的人也多，特別是地方商界人士，這樣就給中央一個為民除害的機會。”

李小兵指出，中央可容忍不同看法，可以討論、可以爭論，但對外必須口徑一致。毛澤東過去已表示，大家開會時可以爭破頭，一旦統一口徑後，對外就是唸稿子。到江澤民的時候更重要，因為強人政治的時代已經過去，在強調集體領導的情況下，統一步伐更為關鍵。

雖然可能對薄熙來判輕，但李小兵認為涉入謀殺案的谷開來、張曉軍可能被判重，不過判 20 年徒刑，對領導的親屬來說已經是很重的刑期。

中國政治鬥爭可能更激烈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每次的政治鬥爭對中共的威信、中央領導力都是一次削弱，但這樣的鬥爭也可能促進中國政治改革，讓新一代領導人警覺如果不採取新的措施，恐怕會引發同樣的事件，讓中共的威信再受挑戰。

2011 年 10 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十八大於 2012 年

下半年在北京召開，但根據路透社報導，當局正考慮推遲十八大的建議，以縮短從十八大結束到 2013 年 3 月人大會議的這段交接班時期。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中共十八大應不會延後召開，因為不管是在位或退休者、得益或是失益者，都不希望十八大的召開節外生枝，“現在做的就是談條件和妥協。過去的十五、十六、十七大，最後都能達成相當程度的滿意，現在國內已經開始造輿論，為幾個應該能進常委的人做準備。”

李小兵認為，中央的政治鬥爭已越來越多元化、複雜化，過去不管是毛、鄧、江時期，都是由元老派作主，現在省市級領導和中央可能有不同看法。“現在是集體領導時代，過去是論資排輩，誰上誰下、誰前誰後，比較容易有區別，現在每個人的經歷、學歷、政績都差不多，所以在後強人時代，政治機會就顯得非常重要。”

李小兵對《大事件》舉例，美國政壇裡，傳統勢力已式微，一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就可能有十幾個人表態，大家都認為自己有機會當總統，因為每個人的資歷都差不多，中國在建國功臣、開國元勳勢力逐漸消退後也會如此，屆時鬥爭可能更激烈，完全看政治的操作和個人的黨內影響力。

重慶和廣東 模式之爭還將持續

重慶模式所代表的，是增加中央集權，廣東模式所呈現的，則是減少政府權力。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認為，增加集權或減少政府權力的辯論，不會因為薄熙來的下台而消失，未來重慶模式還會持續，重慶和廣東模式之爭也還將持續下去。

谷雁翔為《美國企業評論》編輯委員，曾獲紐約州立大學學術傑出與創意活動校長獎、聯合學術卓越研究獎等多項獎項，2005年至2006年以美國富布萊特學者身份訪問20逾所中國頂尖大學，研究領域為不動產市場、宏觀經濟、外匯市場等，其論文可見於《金融研究期刊》、《經濟與金融季度評論》等眾多期刊。

增加集權或減少權力的辯論會持續



谷雁翔（個人網頁）

2007年11月，薄熙來接任重慶市委書記，隔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讓世界重新檢討政府管控的必要性，全球金融危機也成為薄熙來增加政府集權的助力。4年來，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打出名號，但集權作法與其中的“唱紅打黑”，也引發爭議。

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重慶模式”就是增加集權或減少集權的辯論。“重慶模式”的提出，除了有政府出手干預的實際需要外，也因為掌權階層不想放棄權力、不想更快實行市場經濟，因此強調政府保持權力的必要性。

“現在的辯論是，有些人認為應該增加一些集權，有些人認為應該繼續減少集權、走市場的路。”谷雁翔說。

薄熙來在重慶所推的公租房、戶籍制度和醫保制度改革等，都獲得正面評價，薄熙來主政後的隔年，重慶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就成長了170%，經濟成長率為14.3%，但薄熙來推動的“唱紅打黑”，由於大張旗鼓又爭議性高，使得一提到“重慶模式”，外界往往只想到“唱紅打黑”。

谷雁翔對《明鏡》指出，“唱紅打黑”只是“重慶模式”的表面，是薄熙來增加自己知名度的方式，他的最終目的是

進中央政治局常委。雖然“唱紅”可讓退休的老人作為一種娛樂，中國也確實存在很多貪官、黑社會，因此很多老百姓也喜歡“打黑”，但薄熙來藉打黑排斥異己，這點一般老百姓不一定知道。

薄熙來的“打黑”受到許多批評。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華爾街日報》報導，評論人士指責薄熙來以“打黑”作為掩護，將忠於自己的黑社會領頭者扶植起來，一些商業界人士也被控是黑幫成員，財產遭沒收。

重慶市人大代表張明渝則在本屆全國人大開會期間被公安帶走，他被釋放後接受《明報》採訪時透露，王立軍曾要求他以“污點證人”的身份作假證，供稱曾公開批評“打黑”的華夏銀行重慶分行高層牟春旺行賄，張明渝表示王立軍威脅他“如果訴訟進行不順利，會對他不客氣”。

張華在香港《蘋果日報》上的評論指出，薄熙來的第一個錯誤是處死重慶事前司法局長文強。薄熙來視文強為障礙，指控這位汪洋主政時深受賞識的本地幫代表人物是黑社會保護傘，將其處死，引起極大爭議，破壞了黨內潛規則，薄熙來也被質疑處死文強是政治報復；張華認為薄熙來的第二個錯誤是過度鼓吹“重慶模式”，儼然成為黨的理論家，“薄入主重慶四年間，私欲熏心，做了不少錯事，這也屬咎由自取。”張華評論道。

谷雁翔認為，如果過度集權統治，不只將損害中國經濟，也會損害中國老百姓的利益；“重慶模式”不符合歷史潮流，只能是一個權宜之計，不能是中國的發展方向。“現在多數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認為繼續搞集權是錯誤的方向，擴大改革開放、進一步放權、進一步增加民眾對政府的監督才是正確道路。”

既得利益者利益越大，政改越難推

這幾年，中共領導人當中談論政改最多次的就是溫家寶，在溫家寶任上最後一次兩會結束記者會上，溫家寶強調“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雖然溫家寶多次談論政改，但都沒有具體說明在剩下的任期內將做什麼。谷雁翔對《明鏡》表示，目前未見到政改之路走得順的跡象，這說明改革的難度非常大，儘管認為改革是對的，但怎麼改，可能涉及到許多人的利益，加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家的財富越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越大，要改革更加困難。

“如果改革，官員得到灰色或黑色收入的渠道就越來越少，而且許多高級官員的親屬都在經商，他們的利益也會大幅減少。”谷雁翔說，國營企業的壟斷利益非常高，員工待遇非常好，改革也會傷害他們的利益，所以從誰開始改？光是這個問題就解決不了，誰也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

《金融時報》指出，溫家寶在兩會結束記者會上提出的政改問題，語氣之重、點出問題之敏感，都是前所未見，這本身就是對保守派對手的公開抨擊，溫家寶強調政改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是對宣稱政改會導致中國動亂的保守派的一記耳光。

谷雁翔對《明鏡》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剛開始時，辯論的是改革開放的速度問題，有人認為應該快一些，認為改革速度快了，大家都得到好處，國家容易穩定下來，胡耀邦、趙紫陽都是提倡加快改革速度者，有人認為應該慢一些，因為改革速

度快，反而會造成不穩定局面。

“大家批評的保守派，例如鄧立群、陳云、宋平、姚依林，現在回過頭來看，會發現他們的主張是‘慢’，他們從來沒有反對改革開放。現在就像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樣，對於政改的辯論也只是快慢之爭。”谷雁翔說。

不過，薄熙來被中央免去重慶市委書記後，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重慶和廣東模式之爭還將會持續，這樣的爭論其實就是增加集權或減少政府權力的辯論。“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數人同意撤銷薄熙來的職務，所以以後可能不允許大家再公開讚揚‘重慶模式’，但關於增加集權或減少集權的辯論，還會持續。”

谷雁翔提醒，在中國，對發展方向和政策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中共允許公開討論，是明顯的進步。

經常與“重慶模式”相提並論的“廣東模式”，則是改革開放、推動市場經濟的模式。谷雁翔對《明鏡》說，雖然廣東模式長遠來看較符合歷史趨勢，但中國不能只停留在廣東模式上，還必須改革政治體制、增加法治，如此才能保證市場上的公平競爭，同時實現普世價值，落實憲法中的幾項自由。

薄熙來 20 多年來，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遼寧省金縣縣委副書記，一路攀升至遼寧省委常委、商務部長，最後坐上重慶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位置，能力令人刮目。谷雁翔對《明鏡》表示，薄熙來是有明顯工作成績的，過去多年來的步步高升，是需要經過人大和中共中央批准的，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人說他是靠某個大人物將他提起來。

“不像毛澤東時代，一句話就能把王洪文提拔起來。這次李源潮去重慶宣部解除他職務的時候，也提到了重慶這一屆領導班子和群眾的成績，儘管沒有說是薄熙來的功勞，但薄熙來是重慶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不能說與他一點關係都沒

有。”谷雁翔說。

中央組織部長李源潮3月15日在重慶召開的領導幹部會議上宣布薄熙來下台的決定，表示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性質嚴重，影響惡劣，這次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是鑒於王立軍事件造成的嚴重政治影響，中央從當前的形勢和大局出發，經過慎重研究決定的。

李源潮也表示，中央對重慶的工作、對重慶的發展變化是肯定的，近年來重慶市委市政府團結帶領全市廣大幹部群眾，銳意進取，扎實奮鬥，各項工作取得了新進展，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要把重慶市這些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績，重慶市廣大幹部群眾為之做出的貢獻，同王立軍事件區分開。

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鑑於“重慶模式”不是中國的發展方向，解除薄熙來掌權的職務是對的，因為他畢竟代表集權一方；薄熙來會下台，最重要的原因仍是路線和方向之爭，亦即中國是繼續改革開放還是走集權的爭論，其次的原因才是權力鬥爭，因為薄熙來主要想進入常委，看不出有想當第一的跡象。

谷雁翔認為，薄熙來政治局委員職位應該無法持續做下去，因為能拿掉他的書記一職，就說明政治局常委們已經下定決心，不能讓他再掌任何權力。“解除薄熙來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數人的決定，一、兩個人是做不到的。”

如果薄熙來做了違法違規的事，谷雁翔指出，就必須依法制裁，這樣才最透明、公開、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央如果靠政治權力處理這件事，就不符合現代的普世精神，可能會有黑箱操作、個人恩怨牽涉其中，像文化大革命的反右運動一樣。

集權或民主，何者符合國家利益？

薄熙來被免職當天，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紅色中國等左派網站都出現了網頁無法正常訪問的訊息，有消息指中宣部和國新辦要求這些網站暫時關閉，防止它們成為煽動左派聚眾鬧事的平台；也有報導指出，當局為了防止左派上街鬧事，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加強戒備。

中國學者陳子明在《德國之聲》的文章指出，曾經大肆吹捧薄熙來、創作《薄熙來之歌》、將薄熙來視為中共黨內健康力量，甚至直接呼吁薄熙來當總書記挽救中共、挽救中國的一批毛派網站被關閉，說明了中共最高當局不僅僅是因為薄熙來對於王立軍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或者可能他本人有貪污腐敗問題而把他拿下去，而且是從政治上否定了以“唱紅打黑”為特色的薄熙來路線，或者說是回歸文革、回歸晚年毛澤東的“前三十年”路線。

谷雁翔對《明鏡》分析，從官員的角度講，倡導左派路線有實際利益需要，增加集權，就能增加他們的利益，第二，不僅是中國學者，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集權符合國家的利益，例如過去幾年，中國因為集權程度較高，金融市場管制嚴格，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較小，只讓中國的出口減少，經濟增長並沒有低於 8%，其次，民主制度在短期內也不能解決人民最痛恨的腐敗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根據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佈的 2011 年貪腐指數報告，最貪腐國指數為 0，最清廉國指數為 10，俄羅斯的評分為 2.4，印度為 3.1，中國是 3.6，巴西為 3.8。谷雁翔表示，印度有 60 多年的民主進程，但印度的腐敗程度比中國還高，俄羅斯從 90 年代初開始進行直選，腐敗程度也比中國高，巴西則是 1989 年開始直選，但腐敗程度和貧富差距跟

中國差不多。

貪腐指數報告讓認為民主制度不能提供有效解決腐敗和貧富差距擴大的人，有了數據上的證明，雖然美國這個高度民主的國家，貪腐指數是 7.1，情況遠比中國良好，但過去 20 年貧富差距也擴大。

谷雁翔對《明鏡》表示，美國政府過去幾個月不斷討論赤字和債務問題，為了替自己的政黨爭取國會席位和白宮寶座，共和黨人使出拖延戰術，或想辦法不讓經濟早點復甦，如此就可以讓奧巴馬下台。2 月份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老百姓對國會的認可率降到 17%，為有史以來最低。因此民主制度有時也可成為官員爭權奪勢的樂園，造成所謂的無效政府，合法但無效。

其他歐洲國家也是如此，可為了選票而拖延不解決問題，谷雁翔表示，這都給一些官員學者提供了證據，指出搞民主未必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有一定的集權可能反而更有效。

“當然長期來看，走民主與法治是對的道路，集權只是特殊條件下的權宜之計，如美國這次大衰退，政府也加強干預，只是干預程度比中國低得多。30 年代大危機時，美國政府干預的程度就高得多了，當時美國也出現是蘇聯的路線對，還是美國路線對的辯論。”谷雁翔對《明鏡》說。

越殘酷專制越沒有派系

薄熙來的下台，激起對共產黨內派系對立的各種猜測。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黨內有和薄熙來觀點一致的人，也有和他處於同一幫派的人，薄熙來事件若體面解決對他們有好處，因此現在一定有人要保薄熙來。

谷雁翔進一步解釋，一個政治體制裡有派系是很正常的

現象，民主國家或地區，如台灣、香港、西歐和北美各國，派系的分別都是很明顯的，中國在毛澤東時期沒有派系，大家都聽毛主席的話，當年希特勒掌權時沒有派系，朝鮮在金正日的統治下也沒有派系，因此越是殘酷專制的政權，越沒有派系，有派系、能公開，都是種進步。

“在民主國家，部長因和總統有明顯政策分歧，辭職或被辭職並不罕見，個人或集團爭取權位，也是正常的現象，只是中國還沒發展到公開競選的水平，才會被評論為‘震蕩’，有時有人會使用不正當手段，造成中國政局不穩、經濟衰退，損害人民的利益。”谷雁翔對《明鏡》說，中國和美國都應注意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借機破壞，政治人物很可能會藉機會採取行動擴大自己的權力，且往往都是意想不到的方式。

“回顧中國歷史，辛亥革命後，多少政治家想當權，結果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混戰的狀態。中國現在很穩定，所以有野心的政治家不容易活動，但凡是成功奪取江山的政治家都有他的創造性，能讓很多人跟著他走，儘管回過頭來發現，他造成對中華民族的浩劫。”谷雁翔說。

因此，谷雁翔認為現在應該注意的，就是有人煽動混亂、革命。薄熙來事件如果能夠穩定地處理，對中國和美國都是好事，因為中國如果繼續改革，經濟更市場化、更透明、更法治化，可促進中美經濟交流，中國也更容易做到美國提出的一些建議，例如保護知識產權、貿易上的自由競爭等。

對奧巴馬政府來說，因中國影響導致美國經濟復蘇受挫，會降低連任的可能。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連任前促穩定，連任後再去鼓動民主進步是奧巴馬的上策。中國艦船此時高調游弋釣魚島和南海是為了吸引中國人民的注意力，不會持續。激化事態不利於奧巴馬競選連任。

住房問題， 重慶模式提實在方案

“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已成為中國發展道路上兩個最具代表性的模式，其中重慶模式著重政府的服務與管控，廣東模式追求公民參與和法治，前者為大政府小社會，後者是小政府大社會，兩個各具特色的模式引發各界熱議。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博爾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經濟系榮譽教授鄭竹園在接受《內幕》採訪時分析，重慶模式在住房問題上提出實在的改善方案，但廣東模式提倡的精神是“行正道”，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更有利。

鄭竹園 1927 年出生於廣東，1943 年獲廣東省政府保送入中央政治學校經濟系，1949 年流亡香港，之後赴美深造，至今共撰寫中、英、日文專著 40 部，論文近千篇，為中國大陸經濟問題著名專家。鄭竹園先後任教於新澤西西東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密西根大學、威州羅倫斯大學、印州博爾大學，自 1985 年以來多次被列入“世界名人錄”及“美國名人錄”，鄭竹園也是博爾大學創校以來首位獲得“卓越成就獎章”的亞

裔教授。

重慶模式重住房政策

一談到重慶模式，大眾最熟知的莫過於“唱紅打黑”，但其實對重慶人口結構與民生影響最大的要屬公租房計劃。博爾大學經濟系榮譽教授鄭竹園在接受《內幕》採訪時表示，相較於廣東模式，薄熙來到任後開始推行的重慶模式更為具體，此模式的重心為“居者有其屋”，由政府

出地出錢，計劃未來建設 4000 萬平方米的公租房，目前，全重慶市的公租房建設已開工超過 1000 萬平方米。

重慶市在 2010 年啟動大規模公租房建設計劃，目標解決 50 多萬戶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標誌著公租房和商品房的住房“雙軌制”上路。2011 年 2 月重慶已正式接受公租房申請，根據“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約束”的制度，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賃住房和棚戶區、城中村改造的安置房將保障 30% 至 40% 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的居住需求，60% 至 70% 的中高收入群體則由市場提供的商品房解決居住問題。

鄭竹園對《內幕》指出，重慶公租房目地在保障中下收入者，特別是讓民工有住處，只要年滿 18 歲、在重慶有穩定工作和



鄭竹園（個人網頁）

收入，單身人士月收入 2000 元以下、家庭月收入 3000 元以下就可申請公租房，不論是農民、學生都有地方居住，如此拉近了城市與農村的距離，改善從前城鄉對立的情況。

此外，鄭竹園表示，重慶也在檢察機關裡培養“人民監督員”，從社會各界遴選一批依照程序監督檢察機關審辦案件的民眾，“人民監督員”還可對檢察結果提出自己的意見。

根據 2011 年 10 月 17 日的報導，自 2004 年 10 月全重慶市檢察機關開始進行人民監督員制度試點以來，有人民監督員參與監督的案件共有 628 件。其中自 2009 年 1 月全市全面推行該制度至今監督案件 181 件，其中，多數監督員不同意擬處理決定的案件 3 件，檢察機關採納 3 件。

鄭竹園對《內幕》表示，人民監督員制度防止了貪污、未秉公處理等事件發生，提高辦案的質量和透明度，人民監督員對檢察機關提出的意見也均被採納，令檢察機關重新審視案件，這些都是重慶模式下比較實在的部分。

廣東改革開放歷史長

相較之下，鄭竹園對《內幕》分析，廣東模式顯得比較籠統，省內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施政特點，如深圳、惠陽、廣州均有自己的改革與創新，有人更認為廣東模式應以廣州模式作代表，而廣州模式最突出的是動員人民的能力，例如在全民參與亞運會與治水上均取得成功，此外，廣州也注重培養人才，建構職業學校與企業合作的體系，並在施政上徵求地方的意見，而不全交由政府來掌控。

整體來說，廣東模式注重主動開放，重視個體發展，並朝預算、人事、國家企業等各項公開化的目標前進，同時重視人才的培養和任用。鄭竹園說明，2011 年以來廣東新任的地

級市黨政正職 24 人中，“60 後”的為主幹，占了將近 80%，“70 後”的則逐漸嶄露頭角。此外，超過 80% 的人擁有研究生的高學歷，也有海歸博士任市長。

鄭竹園對《內幕》分析，廣東因為歷史背景不同，是最早改革開放之地，因此改革風氣也較盛行；目前全中國的 6 個經濟特區，3 個在廣東，其餘分別是福建廈門、海南省的海南島、新疆的霍爾果斯。

“自從鄧小平 1978 年的南巡後，廣東開始有珠海、深圳、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從此與外國的經濟活動有了聯繫，所以廣東模式的形成有很長的歷史。”鄭竹園表示，廣東的開放也反映在網路問政上，此措施讓政府在網路上與民眾對話，為順應時代科技的創新舉動。此外，廣東也提倡黨組織退出企業，讓企業擁有更大的自由，都是一種進步。

鄭竹園對《內幕》表示，2007 年汪洋接任廣東省委書記後，提出自己的一套想法，主要為一些基本概念；汪洋強調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上的法治建設，依法行政、推進司法公正、保護市場的合法權益，認為如果一切依法辦事，就會形成一個真正的法治、民主、現代公民社會，不用太多的政府管制。因此，開放、法治、重人才，可說是廣東模式的特點。

長期來看廣東模式更有利

重慶與廣東模式一個重點在政府、一個重點在市場與個人，鄭竹園表示，雖然兩者方法不同，但目地都是希望提升人民生活，也都各有長處；例如在解決中下階級人民住屋問題上，重慶模式更完善，而在提供公租房的同時，政府也嚴格限制投機性購房和炒房，因此重慶的炒房問題不如廣東那麼嚴重。

受到熱議的“唱紅打黑”，鄭竹園認為某方面來說達到安

定社會的效果。鄭竹園對《內幕》表示，“打黑”見到了成效，基本得到社會贊同，“唱紅”有回歸原來社會主義的意味在，因此受到很多人批評，但“唱紅打黑”都目標社會穩定，也是一種成就。

重慶模式是政府在領導、重視民生，廣東模式則希望由民間領導，目標建立自由開放的公民社會，注重“人”的因素，鄭竹園說：“廣東接近香港、澳門，開放氣氛下，形成許多重慶沒有的社會條件，例如廣東有全國最多的華僑，從前中國革命的領導人，比如孫中山、洪秀全，也都是廣東人，廣東在改革過程中一向居於領先地位。”

因此鄭竹園認為短期來說，重慶模式收效明顯，比較實在，但長期來講，全面提升公民意識的廣東模式對區域的前途發展更有利。

重慶模式難大規模推行

雖然重慶模式較具體、收效明確，但如果想推行到重慶以外的地方，恐怕不適用。鄭竹園對《內幕》解釋，建設房屋最重要的是土地，有土地才能執行相關政策，而公租房需要廣大的建設面積，重慶多年前已開始徵用土地，並成立公司、管理工地，但別的城市是否能像重慶這般規劃土地徵用措施？如果沒有儲備土地，一時之間要建成大規模的公租房很困難。

重慶模式的另一個問題是顧及了住房，但沒辦法保障工作。重慶公租房打破了城鄉和內外的差別，不設戶籍限制，外地人也能申請住房。重慶是中國唯一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省級行政單位試驗區，第一階段目標在2011年內實現338萬農村人口轉戶進城，讓農村轉移勞動力在城市生存、穩定下來，但農民工如想拿到重慶戶口，就必須放棄老家農村的土地。

鄭竹園對《內幕》表示，雖然農民工到城市工作後，可以住進有保障的公租房，進一步成為城市居民，但原來的土地就得歸政府所有，問題是政府是否也保障了工作？如果能在設備良好，有完善教育系統、醫療設備的小區定居下來很不錯，但如果工作沒了，鄉下的土地也沒了，農民工該怎麼辦？

此外，重慶模式能否長期推行也是個問題。鄭竹園對《內幕》指出，薄熙來可能在中共十八大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註：此篇文章完成時薄熙來尚未下台），薄熙來的後繼者是否會延續重慶模式還很難說，雖然汪洋也是十八大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但鄭竹園對廣東模式的延續比較樂觀，因為廣東模式提倡的民主、法治均是“行正道”，靠的是市場經濟與人才的發展，而非如重慶模式由政府主導，因此即使領導人更換，模式仍持續的可能性更大。

提高重慶模式地位 阻礙中國改革開放

中共 18 大即將在 2012 年召開，外界均睜大眼睛觀察各地諸侯如何吸引輿論、創造進入領導核心的最佳機會。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教授谷雁翔在接受《內幕》專訪時指出，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一方面配合了實際政策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治權力上的爭鬥，尤其重慶模式是權宜之計，如果提高此模式的地位，會阻礙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註：此篇文章完成時薄熙來尚未下台）。

谷雁翔研究領域為微觀經濟、金融管理、投資等，為《美國企業評論》編輯委員，曾獲紐約州立大學學術傑出與創意活動校長獎、聯合學術卓越研究獎等多項獎項，2005 年至 2006 年以美國富布萊特學者身份訪問 20 逾所中國頂尖大學，其論文可見於《金融研究期刊》、《經濟與金融季度評論》等眾多期刊。

重慶與廣東模式的經濟政治考量

2008年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讓大家驚覺法令管制的重要性，谷雁翔對《內幕》表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慶模式產生。“西方次貸危機反映了對金融界和其他領域的放鬆管制，原本西方認為放鬆管制可以增加企業的創造力和經濟的活力，但放鬆管制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企業家過度投機，他們的行為造成對投資者、人民乃至世界經濟的巨大危害，因此西方瞭解到法律層面的管制不能過度放鬆。”

谷雁翔解釋，當經濟出現巨大問題時，需要政府的干預，所以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投入幾萬億美元現金緩和經濟危機的巨大破壞性。而重慶模式這套新構想的提出，目地有兩個，一個是政策上的現實需要，一個是政治鬥爭。

“在政策實際應用方面，由於西方爆發次貸危機，中國政府出手干預，同時掌權階層不想放棄權力、不想更快實行市場經濟，因此他們藉西方經濟危機宣傳重慶模式、製造輿論，強調政府保持權力的必要性，因此重慶模式也代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一樣，既反映了實際政策上的應用，也反映了政治權力上的爭鬥。谷雁翔對《內幕》解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模式主要提倡大力推動市場經濟、學習西方，因此有長期的淵源在。

另一方面，中國一直存在著想加快改革速度以及想減緩改革速度的兩派之爭。谷雁翔說，兩派觀點均有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實際需要，例如認為國家改革速度快了，會造成不穩定局面，另一派觀點則認為，改革速度快了，大家都得到好處，國家就容易穩定下來。“但官員所講的話，究竟是考慮集團的利益，還是自己的利益，很難分辨。”

谷雁翔對《內幕》表示，市場經濟百分比越大，政府的權



谷雁翔（個人網頁）

力越小，官員們的既得利益就越少，此外，2012年就要舉行中共十八大換屆，掌握大權的官員和太子黨們，希望保持政府的控制、減緩市場經濟的腳步，如此便能維持他們的政治權力和巨大的經濟利益，就如同300年前的英國，資產階級希望開放、平等，但原來的貴族希望維持原本的體制。

而權力不大的中層幹部，需要通過市場經濟喚起經濟活力，有了政績之後才能爬向高層，因此，谷雁翔表示，這批人更可能鼓吹市場經濟。另外，過去30年崛起的企業家也需要更開放的市場經濟，這些人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為他們希望在高層領導中做自己的代表，而他們掌握就業機會、手裡有大量資金，也有比較大的發言權。

“至於老百姓，屬於弱勢的一群，基本上沒有發言權，說的話也沒什麼人聽，只能通過群體騷動來發聲，所以最近這些年的群體事件越來越多。”谷雁翔對《內幕》說。

在中國只要掌握了權力，財富也能跟著來，其中不乏見到貪腐情事，根據“透明國際”所公佈的“2010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中國在178個國家和地區裡排名第78位，中國科級、處級幹部被揭貪污的情況屢見不鮮。谷雁翔指出，就是因為

掌權的利益集團能獲得巨大的好處，因此更不願意放棄權力。

“我懷疑廣東和重慶模式的提出，恐怕政治上的動機還更大。廣東原本就是講改革開放，從黨 14 大開始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建立法治，本來就是大趨勢，所以特別強調廣東和重慶模式的討論，背後有政治因素在，想通過這種辯論，看誰好誰壞，以取得下一次權力分配的席位。”谷雁翔認為，從政治角度來看，太子黨可能更希望保持重慶模式，而新興資產階級和後起官員可能更希望保持廣東模式。

市場經濟需要良好法治環境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2011 年 7 月在中共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上強調，廣東要積極探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新途徑新方法，全面建設法治廣東。在此前 5 月於珠三角各市產業轉型升級巡回檢查講評總結會上，汪洋也指出，要依法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產權、合法經營和合法權益，努力把人情社會變成法治社會，為加快轉型升級和提升軟實力提供法治支撐。

谷雁翔對《內幕》分析，發展市場經濟需要有很好的法治環境，如此才能保證公平競爭，在良好法治環境下的市場經濟，可讓大多數人得到好處，最有利經濟發展，因此法治社會已被證明是對人類發展最有效的社會，不只是發達國家，還有最近發展起來的新加坡、台灣、香港、韓國都是例子，中國過去 30 年改革開放的經驗也證明了這點。

“中國是經濟的後起之秀，正是因為過去 30 年逐步推行廣東模式，才有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所以長遠來看廣東模式較符合歷史趨勢。廣東模式是推動市場經濟的模式，也是改革開放的先鋒模式。”但谷雁翔說，雖然中國在法治方面的進步明顯，卻還不夠理想，因此廣東模式推行的同時，還需要進

一步完善法治環境。

至於重慶模式，谷雁翔對《內幕》表示，就是共產黨領導下高度干預的模式，實際上重慶模式就是中國模式，但如果過度集權統治，不只將損害中國經濟，也會損害中國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如果提高重慶模式的地位，谷雁翔認為將阻礙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重慶模式不符合歷史潮流，只是經濟上一時的權宜之計。因為傳統政府控制大家比較熟悉，也比較容易使用，只要一聲令下，大家照做就是了。”

國家分裂與民族問題關係更大

左派網烏有之鄉對提倡法治、自由的廣東有另一番看法。在2011年9月發表的《世界危機下的重慶模式與中國未來——烏有之鄉第三次重慶模式研討會紀要》中，與會學者官員認為如果重慶模式被利益集團阻礙不能獲得成功，那麼中國很可能會面臨一場混亂、動盪、革命。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指出，今天中國走到亡黨亡國、矛盾大爆發的邊緣，就是廣東模式發展的結果。如果在全國推廣廣東模式，中國必然淪為一個徹底的出口導向型的殖民地國家，中國必然因此而崩潰、分裂。

但谷雁翔認為重慶、廣東模式和國家分裂的直接關係並不大。“國家分裂與民族的歷史問題較有明顯關連，例如新疆和漢族人在歷史上的仇恨，從乾隆大規模殺新疆人，到新疆納入中國版圖，建國之後王震鎮壓新疆，加上新疆的政治家在背後挑撥民族仇恨，這樣的力量比經濟力量大得多。”

谷雁翔進一步對《內幕》解釋，儘管新疆得到的經濟利益或許相當大，但民族情緒會使老百姓忽略經濟利益，有時老百姓也不瞭解分裂出去後自己的日子可能過得更不好。而西藏傳統上便是相當獨立的地區，歷史上西藏強大時甚至有能

力進攻中原；清朝初年西藏才真正納入中國版圖。毛澤東時代由於中央政府和西藏貴族之間的嚴重矛盾，中國軍隊進入西藏、14世達賴喇嘛出走，班禪則被拘留在北京，直到文革後才允許其回西藏，因此儘管過去西藏從中央政府獲得巨大的好處，但歷史上的民族矛盾，加上宗教信仰對西藏的影響深遠，藏人或許不在乎物質上的利益。

蒙古同樣也是民族矛盾地區。谷雁翔指出，毛澤東時代曾對蒙古進行過嚴厲的鎮壓，因此也有民族仇恨情緒在，而宗教力量和歷史上民族間的仇恨容易被獨立勢力的政治家所利用，加上毛澤東時代為了鞏固權力，不允許中國民族間的自由流動，否則民族問題可得到緩解。

“如果少數民族的年輕人到北京、上海，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生活，民族情緒也可能不那麼明顯，所以關鍵是讓少數民族覺得自己受到平等的待遇、事業和生活越來越好，並且多到內陸工作生活，才能減緩分裂的壓力。”谷雁翔對《內幕》說。

谷雁翔表示，在中國現在法治不健全、市場體系不夠發達的情況下，發現了問題，如果靠制度本身來解決，很多時候解決得比較慢，因此通過權力來解決也是好事，然而重慶模式的一個挑戰是，由於依賴“好官”來解決問題、維持體制，如果官員不明智、犯了巨大錯誤，則代價也會非常大，這點在毛澤東時代已有了證明。

谷雁翔對《內幕》說，由於依賴明智官員是件危險的事，因此全世界基本放棄專制體制、實行民主法治，但相對來說，廣東模式也有自身的挑戰：如果完全依靠法律和市場機制，當出現體制本身無法解決的重大問題時，也可能造成極大損害，如同西方的經濟危機，這時就需要政府的控制。

重慶模式的政治依賴性強

中央支持下的重慶模式，集中了政府各部門的資金，目標將重慶打造成中國西部的經濟重鎮，但美國著名智庫密爾肯經濟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資深經濟學家黃華躍在接受《內幕》專訪時提醒，重慶模式的政治依賴性亦強，如何持續下去是個問題，這得看重慶未來的發展是否依靠本身根植西南部的經濟關係（註：此篇文章完成時薄熙來尚未下台）。

黃華躍為國民城市銀行（City National Bank）資深 VP 暨資深經濟學家、密爾肯經濟研究院前地區經濟主任、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前資深經濟學家暨地區預測主任。黃華躍專業領域為美國、中國、台灣等地的地區經濟、發展與經濟預測等議題，著有《美國的工作：經濟成長與競爭的投資和政策》等多部專書。

中央主導重慶模式方向

2008 年開始的全球金融海嘯令中國政府做出內需導向的

經濟策略，重慶就這樣成了中央大力支持的地區。黃華躍對《內幕》表示，不同於自主性強的廣東模式，重慶模式是中央政府已經掌握了經濟發展和開發方向，認為重慶能成為經濟重鎮、把中國西部的經濟撐起來，因此集中了政府各部門的資金和配合，爭取將外國投資引進重慶。

相對來說，黃華躍指出，廣東在過去的政治背景下，由於當時的政府“不知道該指導些什麼”，因此開了一塊地，邊走邊看，邊看邊改，等於實現了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因此廣東的自主性較高。

廣東模式裡，有認為應以廣州模式為代表，但黃華躍認為深圳模式更具代表性。黃華躍對《內幕》分析，廣州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地方，不像深圳、上海、溫州有自己的品牌，因此似乎缺少自己的模式；當深圳開始開發時，廣州還遠遠落在後頭。

1979年，在鄧小平的設想下，深圳特區成立，並在短短20多年裡便獲得耀眼的成績。注重開放、效率的深圳模式，帶動了溫州模式、浦東模式的出現，汪洋主政廣東後浮現的廣東模式，也可說是深圳模式的推廣衍伸。

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是兩個不同政策環境下的產物。黃華躍對《內幕》表示，深圳是中國的第一塊試驗田，深圳剛開發的時候，計劃性相當低，中央放手讓深圳市政府自己摸索，先將香港、台灣的資金引進，做小規模的成衣、鞋子、傢俬產業，再接著引進科技產業；重慶則是中央政府已經決定好的立體性建設，後者的基礎設施、金融體制、外國公司的投資，都是全套引入。

深圳已習慣倚賴自己



黃華躍（密爾肯經濟研究院）

中國在 1999 年提出推進西部大開發的策略，加上中央對直轄市的政策、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等政策，均讓重慶的基礎設施獲得飛快發展。黃華躍對《內幕》指出，過去 10 年，中央政府對區域經濟起到相當大的主導作用，例如重慶、天津的產業開發方向，雖然在政府主導下有進步之處，但也有比較僵化的部分。

至於深圳，黃華躍說，雖然起步之初施展拳腳的空間較大，但之後某些產業顯得跟不上整體經濟發展的速度，加上長江三角洲的開發比深圳要快、資金投入要多，中央政府給長江三角洲發揮的空間也很大，都導致深圳在產業架構的提升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電子產業的發展。

黃華躍對《內幕》表示，雖然不像投入資金大、政治依賴性強的重慶，未來的發展方向較能看得出；深圳由於自主性和自發性較強，未來 10 年的發展方向較難預測，例如電子工業未來會如何，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以外的市場，但在可塑性較高、金融市場開發空間大的情況下，深圳有好幾條路可走，擺脫困境的彈性也較大。

“現在中國已經是一個各區域經濟發展自主性可以很強的

國家；外面市場對中國產業的需求、中國本身經濟與各區域的經濟發展如何平衡，都需要很大的流動性和可塑性，深圳具有這樣的條件，比如東莞再發展下去，應該往廣州挪，還是往深圳挪？深圳有潛力將廣州一些比較好的產業拉過去；所以深圳模式的生命力會挺強的。”黃華躍說。

因此相較於重慶模式，黃華躍更欣賞深圳模式，他同時也贊同廣東的政治開明與各地之間的競爭。“廣東包容不同聲音，重慶聽不到這種多元聲音，它就是一個在西南獨大的城市。我喜歡見到一個空間裡有好幾個非常強的經濟模式互相競爭，但競爭外，或者出於政治壓力，或者出於經濟壓力，這些地區之間也有合作，比如深圳和香港之間、深圳與廣州之間，以及深圳與海外其他地區，都有這種張力。”

黃華躍對《內幕》指出，由於過去深圳在開發過程中，中央並不那麼支持，加上本地條件的限制，因此深圳經歷了好幾段艱苦時期，例如中央的政策從珠江三角洲偏向長江三角洲，而珠江三角洲又包含了香港、廣州，深圳該排在哪儿？“所以相對於重慶和天津，深圳企業家與當地企業養成一個倚賴自己的好習慣，使得深圳模式成為一種較靈活、較依賴外面的模式。”

根據 2011 年 9 月深圳獨立研究諮詢機構綜合開發研究院所發布第三期 CDI 中國金融中心指數報告，全國 29 座城市的金融中心指標：金融產業績效、金融機構實力、金融市場規模、金融生態環境等綜合競爭力排名中，第一至第 10 名分別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杭州、南京、天津、大連、成都、蘇州，其中成都從 2010 年第二期的第 19 位上升到第 9 位，為升幅最大的城市，位居西部之首。

黃華躍對《內幕》表示，此份報告顯示重慶的競爭力並不特別強，反而是成都的成績相當不錯，因此當指導性或政治

意識太強的時候，對長遠的經濟發展不一定有太大的幫助。

政治風向決定重慶模式持續性？

在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爭論上，汪洋的“做蛋糕”和薄熙來的“分蛋糕”，究竟何者更重要，一直是議論的焦點之一。黃華躍認為，雖然分蛋糕是必須的，但一來，在中國蛋糕很難分，因為從政治方面出發的成分比經濟方面的成分還多。

“現在上海、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都上去了，珠江三角洲也已有顯著提升，接著就往西南或往北走，從中央的角度來看，未來 10 年將幫助兩個地方，一是天津、一是重慶，再往後就把投資的重點往西挪，比如西藏，因此這樣的切蛋糕已經跟政治掛勾了。”

其次，如果重在分蛋糕，蛋糕不一定永遠都這麼大、能滿足所有人，但做蛋糕者起碼知道自己的蛋糕有多大，對經濟發展握有主導權。黃華躍對《內幕》表示：“一個特別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看該區域如何主導發展方向，全世界各大經濟區域都有這項特色：不管如何開始，但往哪個方向走都有自主性。”

黃華躍指出，深圳的競爭力是自己賺回來的，現在能把中國經濟帶上去的，不是外國的 500 強，而是中國的本土企業；中國的自主產業，不是賣資源，而是賣加工，將產品拿到外頭競爭。相對而言，中央可以將錢仍進一個經濟區域裡，但這樣的競爭力是用錢養出來的，好比每年美國聯邦政府都會撥出一大筆款項給經濟落後的地方，但一般政策主導的發展都無法長久。

雖然現在看來，重慶什麼問題都能解決，至少 5、6 年內，當中國政治風向仍往重慶吹的時候，重慶可說基本要什麼有

什麼，但黃華躍對《內幕》表示，重慶的問題是持續性在哪？如果重慶未來的發展是依靠本身根植西南部的經濟關係，則前途不可限量，但如果重慶在中央主導下，倚賴成都、昆明等地的資源；5年後當中央政策改變，成都、昆明或許不願意再與重慶走在同一條路上。

深圳的問題，則在如何提高科技研發以及如何處理金融中心的走向上。“深圳科研方面的自主性不夠強，所以這方面的競爭力稍微落後，使得比較高級的科技上不去；同一時間，由於長江三角洲的科技開發投入很大，台灣、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電子工業科技開發在這幾年都比深圳快速，或說整個華南地區的科技都比起天津、北京差了一點。因此如何提高科技研發和投入是一個課題。”

其次，黃華躍對《內幕》指出，中央政府已計劃在天津建構一個金融中心，深圳應該儘快尋找自己的特色，讓自己能與上海股票市場、香港和天津金融中心並存，否則深圳金融中心無法永續發展，對深圳經濟將是很大的打擊。

“這麼多年來，深圳企業的风格和文化都非常好，所以應該把本身企業和深圳的優勢結合，比如美國硅谷，與美國其他的金融中心都沒有太大的關係，但與舊金山的風險投資很有關係。”黃華躍解釋，舊金山不像芝加哥或紐約，並非一個大規模或很有活力的中心，但它有一項優勢：其風險投資面向全世界，硅谷是世界科技的龍頭，因此舊金山等於騎在龍頭的背後，龍頭跑到哪，就跟到哪。

黃華躍對《內幕》表示，深圳有很多台灣的大企業，因此深圳能不能抓住機會，當台灣企業轉型、把工廠轉移到其他地方時，把握住剩下的一部分，先把科技結合在深圳的金融市場上，並利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調動資金、集合人才，是深圳需要做的。

後記

本書所集結的採訪文章，為 2010 年中之後對全球各地研究中國者所做的專訪，尤其著重在分析“胡溫”政權與其領導下的中國情勢、新一代領導人上台後的中國走向、中共體制的變化，以及“薄王”事件上。

每個重點議題均採訪了多位專家學者，這些不同成長與教育背景、生活在不同環境的受訪者，從政治、司法、經濟等不同領域切入同一個議題，為讀者提供了豐富多元的看法。這些文章完成後，均陸續發表在明鏡新聞出版集團下的《明鏡》、《外參》、《大事件》、《新史記》、《內幕》雜誌中。

專家學者在本書中所提的觀點，大部分並未過時，有的分析雖與目前的實際情況不相符，但也代表了這些專家學者累積了多年的研究與觀察經驗後，得出的獨特看法，給其他人提供另一種思考的方向，讓我們在分析未來的中國局勢與領導人作為時，能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而這個不一樣的角度，或許正是大部分人沒注意到的盲點，透過這個不一樣的角度，也或許更能精準看到中國的未來。

柯宇倩

2012 年 7 月 27 日於紐約

中共換代：從第四代到第五代 / 柯宇倩作. —— 第一版. ——
臺北市：領袖出版, 2012.08

面； 公分

ISBN 978-986-88622-1-0(平裝)

1.政治權力 2.中國大陸研究 3.文集

574.107

101015666